M. Aurel Stein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卷二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伏霄汉 巫新华 /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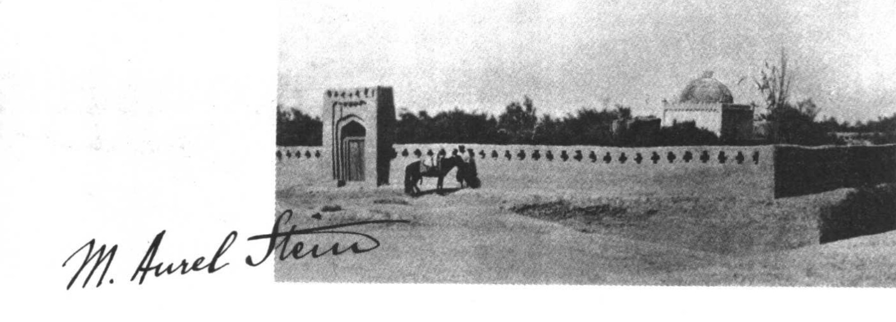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伏霄汉 巫新华 / 译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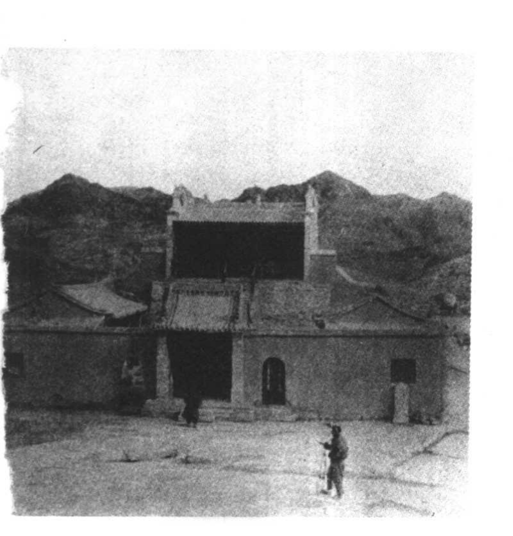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卷 一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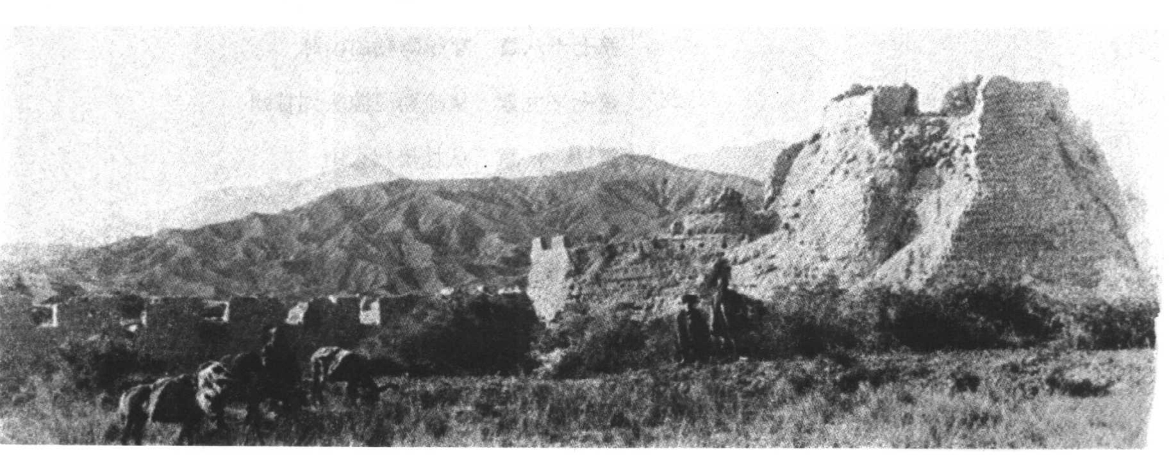
卷 三





卷四





M. Aurel Stein

第二十一章

达玛沟附近的几个遗址

奈克·拉姆·辛格正指挥着发掘人员试着挖出一条沟，我那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中国秘书在一边仔细看着，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画笔，随时准备记录偶然被挖出的任何遗物的位置，而我则趁此机会到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废墟去转转。这些废墟零星地散布在旁边一处3英里大小范围河滩上的圆锥形的沙丘和红柳丛之间。除了塔提地带满地散布的陶片外，这里保存下来的遗迹是一些几乎已被侵蚀殆尽的简陋的小房子，墙壁是用灰泥和灯芯草建成的，清理起来或是寻找文物都比较方便。

但是在这几个小型遗迹的最南面，在被穆拉·霍加称为达拉布赞墩的地方，在一座周围地面被风蚀而形成的小土台（地理学上称之为"雅丹"）上，我成功地发现了一座佛寺。尽管寺庙顶部堆积的沙土和遗物残片还不到1英尺厚，但我们还是从这里挖出了绘有壁画的残垣、灰泥浮雕作品和一些破损十分严重的婆罗谜经卷残片。尽管这些出土文物本身的价值不大，但这个发现却足以给历史添上一条重要史实：虽然这里离达玛沟还不到1英里，但它却和哈达里克以及远处的丹丹乌里克在同一时期被遗弃。这个发现有它自身的价值:它让我更加肯定了我的怀疑,即这几个被同时遗弃的定居点原先虽然依靠同一水源却又相隔遥远的原因纯粹是当地持续的干旱。

这些调查给了我许多机会得以对哈达里克附近的沙漠地区所发生的自然变化进行细致观察,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一度布满了村庄。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些干裂的土地(大概就是它们标示了许许多多小型的农业定居点的位置)是如何形成,然后在风蚀与河流的作用下逐渐被掏空的。一些坚硬的黄土小台地比四周的凹地高出了6~13英尺,精确地见证了附近地面的原始高度,堆积在它们顶部不厚的碎陶瓦层和相似的残片解释了为什么在不间断的风蚀下它们依然挺立。在这些土台的四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到处是风蚀后留下的痕迹,像水波对河岸的侵蚀一样明显,这都是风从下面刨蚀后的结果。从不大的居住点上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灯芯草矮墙和护墙,由于自身的不牢固,被滚滚而来的风沙铲出了一个个的小坑,正好留住些风沙,覆盖在上面。

环绕在四周空旷土地上的圆锥形沙堆高出原始地面 15 英尺以上，它们自身紧密结合的结构也说明了同样的现象，团簇的红柳树丛一成不变地覆盖着这些小沙丘，红柳包底部的红柳大多都已经死去，上面的却长得十分茂盛。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小沙丘造成了红柳树丛这样的面貌。当人类文明在这里停息后，是红柳首先占领了这里，然后负责留住过往的流沙。以低矮的红柳为标志展示着的，我所目睹的这一进程的最初阶段扩散到了整个被遗弃的普那克（Ponak）地区和老达玛沟。一旦扎根，这些红柳便开始为阳光与空气而与不断堆积在它们四周的沙丘作斗争，这促使了它们的主枝不断向上拔高。在它们极力想摆脱沙土令它们窒息的包围之同时，沙也跟着往上堆积。这样，由沙组成的沙堆也相应地变高，变大。

在哈达里克与巴拉瓦斯特之间大约是中点的一个小区域的边缘地带，我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考察，通过对一处宽敞的几乎是按时间顺序准确排列的遗址进行观察，我完全明白了上述沙堆形成进程停止的时间。在一座巨大的覆盖着红柳的沙丘脚下，一些被埋的坚硬灰泥浮雕残片从被风蚀了的黄土丘边上显露了出来。通过对这个小沙丘侧面进行发掘，小堆小堆的沙土滑落，我们便可以看到更多的灰泥残片。这些

残片原先组成的浮雕上刻有一些巨大的光环装饰，放置在佛殿里，毫无疑问它们与哈达里克庙宇同属于一个时期。

这些浮雕残片被磨损的情况也说明，这是一些小型的站立佛像和雕花饰边，毫无疑问它们暴露在流沙中遭受摧残已经长达几个世纪，直到附近的沙丘延伸到足够大，以保护所剩无几的神殿，要不然，它们将被风沙破坏殆尽。在它们被发现的地方，水平高度比最近的一个雅丹还要高出大约3英尺，而后者比它们本身周围被风蚀后凹地的底部要高出6~10英尺。因为这些浮雕残片被埋在圆锥形沙丘斜坡下，大约3英尺的差别很明显地揭示了风沙侵蚀的进程。沙丘本身则高出分布有残片的地面足足16英尺。

诸如刚才所提及的在附近地带进行的探险，把一切能带走的遗物小心打好包，对那些不能带走的物件拍好照片后重新掩埋，把掘开的所有地面全部填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对主要遗迹发掘和清理的同时完成。就是靠这些不间断的多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我在10月3日上午离开哈达里克的时候，除去一些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已经收获得太多。被我带走的那些经卷残片，足以装满骡子身上的那个大尺码的旅行箱，而这一箱比我前一次旅行的总计所得大约还多了三四倍。

离开达玛沟地带之前，我决定到绿洲南部的地方去找找。穆拉·霍加告诉过我，根据一位村里老人的陈述，有人在给阿古伯火药厂寻找硝石时发现了些“古代文书”，但只把它们当作没用的垃圾扔在原地。就只有这一丁点线索可循，此次可谓一次真正的“寻求”历程，尤其是连穆拉·霍加都对那处遗址一无所知。但这次寻找传言中的遗址之旅还是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考古兴致。

这次旅行给了我十分难得的机会寻访达玛沟主要的绿洲，并且能够考察当地奇特的灌溉状况。当地最近的一个聚居村落马拉克阿拉干便是靠这种灌溉系统兴起的。1901年我首次接触到这一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带，那里灌溉区的移动替换，以及其替换之频繁深深吸引了我。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说法，当时我所探访的那片被遗弃的

田地与居住点，是由一处耕作区转变为现在的样子的。仅仅在60年以前，这片耕地已经向南靠近和田克里雅大路方向推进了8英里，即从地处沙漠植被带的老达玛沟旧址一下子移到马拉克阿拉干的西北方向。这使我明白了，越来越难以引到足够灌溉用水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一迁移使得耕作区更加靠近水源。这一源自于奴尔（Nura）和托尔特依曼（Tort-Iman）附近山泉的小溪流在皮德蒙特（Piedmont）沙砾层的大斜坡南麓重新露出地表，在夏季洪水来临以前，绿洲就完全靠这条溪流灌溉田地。

这样，绿洲的流动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和愈来愈干旱的气候联系起来，而这一干旱气候在历史上已经如此大范围地影响了中亚地区的地理环境，这在细心的观察者看来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对亚洲广阔土地发生的巨大自然环境变迁进行系统调查上，功劳要归于我的朋友艾里斯沃特·亨廷顿先生（Mr. Ellsworth Huntington)。基于这一认识，他在1905年秋天对和田东部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地貌考察研究，并且在他那引人入胜的著作《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里，特别提到了这一耕作地区有据可依的变化，而可获取的水供应量的减少似乎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最为简便的解释。

然而，有迹象表明当地特殊的环境很可能也在影响着这一变化。我记得1901年在我第一次拜访这一地区时，便有传说在达玛沟那里，耕作区域来回迁移已经重复发生过好几回。在离当前这一绿洲中心往北6英里之远的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有一道开口，看起来十分令人好奇，它似乎可以证明这一转向北部的移动已经固定了下来。在去往哈达里克的途中，当我在那里驻足时，我便明白了从1901年以来，马拉克阿拉干地区的居民已经增加了许多，而灌溉区正在向老达玛沟地区被遗弃已久的田地的方向扩展着。但对于这片聚居地得以形成并发展所依赖的奇特的供水状况，却是在我从哈达里克南向达玛沟和麻扎—托克拉克—艾肯附近传言中的旧址行

进后，才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从哈达里克朝西我们很快到达了达玛沟亚尔（“亚尔”意为梁沟、悬崖——译者），这里很靠近溪流被拦截的地方。水流轻快，却很浅。溪水被截之后通过渠道流往马拉克阿拉干。接着我们沿着溪流向上走进达玛沟亚尔地区的一片芦苇丛生的广阔的凹地，凹地两边紧密地排着长有红柳的沙丘，红柳茂密的枝条业已干枯。凹地看起来像是溪流河床，当时溪流比现在宽得多。大约又走了3英里，我们到达了这片绿洲的东部边缘，眼前的景色也由枯燥乏味、低矮丛林覆盖却又无可收获的沙丘，变得有生气和令人振奋起来。在接下去往南的几里路上，我们将要经过的全是“英坎特”（yangi kent，新村庄——译者），全是大约在20~25年前新开垦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小沙丘依然挺立在水平地面上。它们上面肯定也曾被红柳覆盖过，但现在红柳都已经被拔去当柴烧了。分散在四周的民宅就经常用这些小沙丘的沙土铺地。除此之外，这里的土地似乎被精心耕作过，小路也用坚实的土墙沿边围着。接着我们绕着绿洲年代较久远的部分往右走。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转移到这里，一直到我们正沿着走的沙库勒（Shakul）水渠开辟了通往克里雅的大路。

在路的南面，所有这些耕作过的土地都被称之为“新村”，在过去的30年间逐渐地出现在这片绿洲上。在达什（Dash）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绿阴满地的花园，它坐落在一户富裕人家的房子附近，在那里我离开了营地的帐篷。沿着渠道往南又骑行了1.5英里，我到达了大“图格”（Tugh）——大堤岸。通过这条大堤，达玛沟河的水被安全地送到各主要绿洲。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横亘在塔里木盆地里极其壮观的工程。将近200码的一座大坝锁住了达玛沟亚尔的前部，大坝构筑的十分坚固，从它湿软的底部向上拔起不下30英尺。整条长堤由夯实的泥土构成，并且每隔一小段便有厚厚的一层灌木枝叶。它的顶部十分宽敞，可容一条大道通过。在南边，一大片水域被茂密的柳树林

厚厚地圈起。这片水域是达玛沟河水漫滩形成的，在这里把水输往各条渠道。溪流流经的凹地向南望去宽阔低浅。达玛沟亚尔的地形很自然地导致河床往北延伸，这看上去很不一样。它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是一条恰似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蜿蜒河谷，深深切入松软的土壤，两岸高达60~80英尺。它的前方芦苇丛生，杂草蔓延，暗示着这里隐藏着的水源，但看不见有任何流动的水流。

还在哈达里克时我就听说了这座大坝，但只有亲临其境，我才深深体会到绿洲的伟大历史，辉煌的过去与现在。听说在我到访的17年前，一场罕见的夏季大洪水从山上奔腾而下，冲进达玛沟河床，把这一小段几近干涸的水道冲刷成一个又宽又深的河谷，朝马拉克阿拉干方向向前延伸。

把达玛沟的全部供水引到比它深的“亚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亚尔下切的很深，很可能会使得广阔的绿洲无法得到灌溉。水流被新的河床吸收，将严重影响灌溉达玛沟田地的引水渠的正常工作。因此，在间隔1年后，当地的伯克们在克里雅按办(考虑到将绿洲闲置不种要使他遭受损失)号召下,开始共同努力,修建这座大坝。鉴于当地人口稀少居住分散,而且各绿洲间还存在着利益分歧,想聚集到足够多的劳动力,可想而知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另外,除非每年在夏季大洪水期间,也就是当大坝进入维护期间,都得雇用大批人员进行维护,否则大坝很难保持有效的功用。

达玛沟河的水源过去一直靠喀拉苏（Kara-su'）河和另外一些泉眼的供水得到了保证，那些泉水在夏季大洪水几个月里更是在灌溉田地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在新筑成大坝又使得亚尔前方的周围地带获得新的水源，使当地额外地获得新的稳定供水。这直接促成了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的形成。这一聚居地的稳步壮大，得益于始终保持丰沛水量的泉眼；也正是因为它们，使得这里新的定居者比达玛沟本身更少的依赖于喀拉苏（夏季洪水）的水量。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断言，滋养着达玛沟各条渠道的喀拉苏河的流量并没有因为新的泉眼出现而下降。理由很明显，后者

是地层深处的地下水外溢流出的，它们的相对高度远低于供水给达玛沟河的来源于8~9英里外的前山萨依（Sai，戈壁砾石滩——译者）的水流。

对达玛沟大坝的观察帮我弄清了两个有趣的地理事实。有证据表明，达玛沟河再次向公元1840年被遗弃的旧村落移动，而这一移动则是导致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大裂口——亚尔出现的直接原因。要不是这座大坝的及时兴建，很有可能所有可获得的水源都将流向亚尔，而使滋润着现在村庄里土地的沟渠全部干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居民区也会因此而转回古达玛沟人原先居住的地方。后来我在1908年的再度访问使我更加确信，尽管没能得到达玛沟河流的任何水源补给，仍然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古老的村落正因为马拉克阿拉干富余的水被转移到旧水渠一线而在重新复活。

除非有能解决问题的大型水利工程出现，否则绿洲将不可避免地受着被抛弃的威胁。这样的命运清楚地表明，耕作区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由于气候干旱而导致水供应量下降引起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学到一种知识，当人类在投入可称得上是历史因素的力量时,当人类去面对这样的变化时必须拥有上文介绍过的这样一种组织能力。假如这样一套有效的水利管理方法没有被介绍给中国人,让他们对那片土地进行再征服,进而促成当地经济的发展,仅仅靠当地资源在达玛沟亚尔上建坝的设想就会因工程太大而无法实施。这么一来,达玛沟的村民们将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独自去面对灾难,而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说明他们所能采取的拯救方法,就会如同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当地传说那样,被迫迁移使耕作区来来回回不断重复地移动变化。

考察过大坝后，我的向导便带着我沿达玛沟河芦苇丛生的蜿蜒左岸向南走。大约走了1英里多路，我们到达了受当地人敬重的圣地麻扎托克拉克。麻扎坐落在一大片优雅古老的托克拉克艾肯河谷丛林里。再往西一点儿离溪流不到半英里的地方被称之为“老亥特”，这是穆拉·霍加从远处看到过却从未亲自到过的地方。

10月4日早上我开始清理这一小片荒原，大概长200英尺，宽130英尺，明显被严重侵蚀过的一片土地。打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正在挖一堆古代的垃圾，这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旅行所挖到的，我至今仍清楚地记着的那一堆令人讨厌的东西。从那仅仅覆盖有1~2英尺厚流沙的堆积层中照例散发着刺鼻的味道，里面还是那些腐烂已久的动物遗体，破烂不堪的粗织物与毛毡，木制的破旧用具，特别是像今天的织布工用的那一种。虽然没有找到预期中大量的阿拉伯茶叶，但一开始发现的纸质经卷残片就足以叫我满足，经文是用汉字和潦草的婆罗谜文字写成的，后者大概是古老的和田人的语言。这些材料及文字记载同样准确地证明了这里与哈达里克应该是在同一时间废弃的，在这一堆废弃物中间，原先必定建有一些小型建筑物，只是现在除了地面及散布其上的土台外，已别无他迹可循。

这一天的工作在晚上终于得到回报。在这片荒原的西部边缘附近有个工人挖出了一堆杂乱的木简，每一片木简的平滑表面都刻有一行汉字。由于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这些木简或多或少有明显的腐朽，而且由于埋在杂物堆里，里边的腐败物质和盐分使得它们外表结了一层外壳。尽管在移动时我们尽一切可能加以小心，这些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木简还是被弄碎了好些。我的中国秘书也对这些发现表示出了极高的热情。在他的帮助下，我最终还是将大部分碎片拼合了起来。

最后我们收集到不止50件这样的木制文书。木简的大小和形状相差都很大，有的很平滑，两边光滑的表面都写有汉字；有些则像一根根的木棍，四面都写上了文字。其他的仅仅是刻在被劈开的树枝上，通常是红柳枝条。它们仅仅只是把劈开的那一边简单地磨平，写上字。而另外一边则保留原来半边的圆柱形，而且经常还留有树皮。根据蒋师爷所能辨认的木简来看，大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或是简短的命令，或类似于此的各种各样繁琐的文书，记载内容大多与当地的行政管理和灌溉有关。其中有些还写有两种文字：除了汉字，还写有潦草的婆罗谜字体文字，这

M. Aurel Stein

种连和田人也不懂的语言似乎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

不用怀疑，我所发现的这一处出土“废弃文件”的遗址是一个小型的办公场所。一个名叫海依杜拉·霍加（Haidul Khwaja）的年长村民，同时也是为穆拉·霍加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们大约40年以前寻找硝土的村民们是怎样地在这一片垃圾堆上挖宝的。这也解释了它们没有得到较好保存的原因。由于没能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仅在一天后他们便放弃了这个废墟，无意间却使这些文献见了光，以至于表面开始腐烂。令人好奇的是，当地传说中还隐约记着这个旧址是官方性质的，因为穆拉·霍加和其他达玛沟的几个老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叫阔纳二塘（Kone-otang）是“古老驿站”的意思。

有几片刻有汉字的木简上只有月和日的记载，而已经进行的细致检查也没能发现任何记录有我们渴望知道的完整日期。尽管如此，上面所记载的汉字和婆罗谜文字以及18个月后在这片遗址附近喀拉羊塔克和哈达里克两处遗址出土的与其记载相吻合的艺术品，便足以表明麻扎托克拉克地区的文物属于唐朝汉族人在塔里木盆地统治的时期，即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这一推断也表明了达玛沟绿洲与此相反方向的另一个边缘地带——哈达里克等地往下，麻扎托克拉克以及喀拉羊塔克往上，现在的灌溉区域与大片在同一时期被遗弃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区域间的利益关系。

然而，当我们记起丹丹乌里克那一大片业已荒芜的定居点时，问题便出现了：这片土地被弃的原因。丹丹乌里克我在1900年曾去考察过，据亨廷顿先生的调查，这片地区的供水来源与麻扎托克拉克同属于一个水系，那么这两个地区应该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被废弃。丹丹乌里克地处深入大漠足有56英里更北的地方，如果说用以灌溉的供水枯涸是这些旧址荒芜的唯一可能原因，这些地区共同依赖一条水流却彼此相隔那么远，这些废弃情况所出现的年代先后顺序的巧合很令人好奇。大漠中或者在当前的绿洲附近清理过的古遗址中逐渐积累的大量证据，促使我们做出这样的

结论：像这样可获取的水资源干涸在塔里木盆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而且这与一段足以影响整个亚洲中部甚至有可能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大范围干燥期有关。亨廷顿先生在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工作之后找出了这个历史事实的原因。循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在策勒与克里雅之间的大片地区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各条河所携带的水将不足以送到诸如丹丹乌里克之类更遥远的遗址地区。除了现存的绿洲，河水也不足以灌溉附近一度被开垦过的整个地区。

但这个事实决不能证明这样的推断：干燥使得曾经一度被耕作的地区在荒芜了几个世纪之后仍无法重获生机，因此他们最初被抛弃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人类同自然界中的不利条件所作的斗争是由开化了的集体来完成的，就像考古探险向我们展示的塔里木盆地里绿洲一样，人类的因素使得问题更趋于复杂，而其间的复杂性也告诫一丝不苟的学者在下结论之前一定要谨慎，必须多方寻找确切的历史证据。在这样的地方，耕作完完全全依赖于精心维护的灌溉系统，而后者在任何情况下的维持又只可能通过组织严密的合作和足够的人力才能实现，就像这里的绿洲，前后左右都是极其干燥荒凉的不毛之地，除去水需求量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耕作区的逐渐缩小乃至于完全被抛弃。在这些原因中，我只需要着重提出那些因外敌入侵、瘟疫或管理不善导致人口的减少，以及因政局的长期动荡而出现的安全保障问题，等等。

为了对每一种情况发生的最有可能原因作出准确判断，我们需要准确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不是沉寂的废墟或是研究中做出的推测所能替代的，而关于中国新疆任何历史时段的可信材料还相当的匮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明白无疑地确定公元8世纪末，丹丹乌里克和哈达里克地区，也许也包括达玛沟地区附近的几个小聚居地被放弃的时期，正是唐朝统治在塔里木盆地逐渐消失的时候，而当时这样严密有序的绿洲组织状况只有依赖有效的中央政权方才得以存在。

M. Aurel Stein

第二十二章

前往克里雅和尼雅河

我的营房设在达什一个富裕村民静静的农庄里，持续两天的工作使我得以彻底清理麻扎托克拉克古代遗址的所有出土文物，10月6日早上我圆满地结束了达玛沟一带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发前往克里雅（今于田——译者）。前往克里雅计划的实施时间被推迟的远比我料想的还要久，1901年我曾两度沿公路到达克里雅，这次我改变路线，转而访问公路北侧一个繁荣的新兴沙漠绿洲阿其玛（Achma），它的存在归功于15年前突然出现的一些泉水，泉水给喀拉吉尔亚尔（Kala-kir Yar）带来了丰沛水资源，因此这里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很快出现了一个足以容纳800户居民的绿洲。我在刚刚清理去沙丘而开垦得到的土地上跋涉了足有3英里，白杨掩映下的新修道路笔直通向前方，吉格代林带向北延伸直到消失在视线里，这一切令我感到十分振奋，这是与沙漠斗争成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一地区曾屡次见证这种斗争结果的出现，但如今要保持这样的结果却是一件难事。

今天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一个来自盐岭山脉（Salt Range）古里阿那（Guliana）的旁庶普穆斯林在阿其玛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据他所说，他同他的心灵向导一位毛拉（Mullah）从克什米尔漫游到了拉达克，然后又到了依玛木·贾法尔·

沙迪克圣地朝圣。他的乌斯塔（Ustad，即师傅、导师——译者）已经去世，他大约在6年前，来阿其玛定居，在那儿和他的维吾尔族妻子得到了土地，从他的衣着和骆驼可以看出他生活得很好，村民们对他这个沙依德的帮助也使他赞不绝口，然而他似乎很思念他那贫瘠的盐岭山区，说很快要动身到那里去，他操着一口奇怪的旁遮普语，这令我不禁怀疑他在故乡将受到怎样的接待，他毫不掩饰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想过要得到父母或亲戚的消息。

从阿其玛和它毗连的拉依苏（Laisu）小绿洲，我穿越托克拉克一个茂密的林区向东南进发到达了西沃尔（Shivul）湿地的边缘。在一个荒废孤寂的小兰干附近宿营一晚后，我参观了一个残留着许多陶片被称为吉格代库都克的塔提。它在兰干东南约5英里处，湿地边缘的沙丘与普鲁群峰裸露的沙砾斜坡在这里交会。这片可怕的不毛之地距克里雅湿地仅有2英里多，这里，毫无疑问，曾经是可耕土地的一部分，至于那是多久以前，我不能确定。饱受刺眼的阳光和灼人热浪的摧残，我很高兴看到这条绿阴婆娑的宽阔道路，它贯穿了湿地，一直延伸到城镇和克里雅地方官署。

为了与这个穆斯林人熟识起来，并且确保在他曾经漫游过的5个经度地区，即向东超过了车尔臣绝大部分沙漠的地带，无论我做什么探险研究都能得到他的协助，我做了一次必不可少的停歇，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获取新鲜补给的耽搁，我的停留肯定不会延长到5天，克里雅是我可以确保更换骆驼的最后一个地方，从8月起，某种无法解释的疾病就使我的骆驼接二连三地死去。我们尽了一切可能照料这些在喀什噶尔得到的高大魁梧的动物，不失时机地给它们休息的时间和丰美的牧草。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看到它们从喀拉塔什山谷返回它们曾悠闲地嚼着牧草的和田却少了两个同伴，我不禁羞愧难当，在达玛沟工作期间又有两头接连死去，无须在克里雅途中死去的第五头佐证我也可以确信，很明显某种传染病感染了整个驼群。

克里雅很多巴依都拥有骆驼，而我要购买精力充沛骆驼的消息几星期前就恰到好处地传到了衙门。不过要选出合适的骆驼却也是件费时的事儿，从我一进入他的领地，克里雅按办霍大老爷（Ho Da-lao-ye）就对我极尽殷勤，并表示乐意协助我的工作，我到达后第二天拜访他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很快意识到，尽管我的主人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年轻，但他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却并非徒有虚名，他似乎很清楚对历史的爱好与把我吸引到这个地区来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他对我的研究领域等方面提出很多问题，这些都给我初级的口语知识带来巨大的压力，霍大老爷曾是乌鲁木齐官员协会的秘书长，他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的一些地方奇怪地令我联想到了印度秘书处一位年轻而聪颖的朋友。我在和田听说他公开表示愿意保护他管辖的人民免受课税之苦。他对这方面的忧虑不管是真诚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都不大可能激发当地伯克们的热情，加强他的力量。

当地伯克们接到明确的指示寻找适合我旅行使用的骆驼。然而，尽管按办回话时在我面前一再强调了这道指示，但是可供选择的牲畜的供应并不迅速也不令人满意，倒是不那么博学的人，比如1901年就在这个衙门帮助了我的朋友黄大老爷(Han Da-lao-ye)，经过深思熟虑会安排得更好。两天来，我以检查连成长串骆驼的枯燥过程为乐，这些骆驼不是太幼小就是劳累过度，显然更适合沙漠旅行的牲畜都被谨慎地藏了起来，在露天市场买骆驼是克里雅史无前例的，除了给拥有健壮合适牲口的伯克们施加压力，别无他法，我占用的庭院外的道路很快形成了一个小型集市。在这里，人们都认为伯克们接受了条件适合的骆驼主人的贿赂，一开始就准备敲我的竹杠，1901年曾帮助过我的古怪的阿富汗老商人阿不都拉汗也肯定了这一点。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到衙门多次的催促最终取得了胜利，尽管面对种种拖延时间的计谋，到了第五天7头高大强健的骆驼还是被挑了出来。

评价骆驼的优缺点需要毕生的经验积累，或者说是从天生了解骆驼的人那里继

承下来的知识，在这种事上能信赖哈桑阿訇的诚实以及他尖刻的言语在那些狡猾的骆驼主中间的影响，对我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慰藉，结果证明我的信赖是完全有理由的，我在克里雅以平均每头30两银子（约等价于5英镑）购买的骆驼跟哈桑阿訇随后在尼雅从一个投机商那里获得的另一头骆驼被证明是我此后旅途运输的坚强支柱。尽管沙漠考古探险中运输供应的压力和问题是如此巨大，可我那勇敢的克里雅骆驼从未令我担忧，它们出色地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经过约摸两年的长途跋涉它们依然是那样的强壮而俊美，甚至当我返回印度之前不得不处理掉它们时，还卖得了高出70%的利润——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印度政府。

为了不在惯有的讨价还价上额外浪费时间而得到一个公平的价格，给这些牲畜定价的时候，我请求按办的仲裁人来裁定，霍大老爷不失时机地对我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拜访，与其说是为了协助做出某种决定，不如说是为了享受一次有关古老的唐僧和泛泛的考古知识的学术探讨，一发现他学术上的偏爱，我便投其所好地马上送给他一些中文原版史书"西域记"和"法显传"的手抄本，从客人的千恩万谢和他在探讨关于古代地理知识时所关心的许多话题可以看出这份礼物送的恰如其分。他的学术爱好无疑也触动了我；然而我更乐意我们不是无边无际地闲谈而是有条不紊地讨论他来访的目的。承认了对骆驼一无所知后，这个友好的年轻按办大度地挥霍着我和他的时间讲述他最初如何考察所有供筛选的骆驼。然而，当我们站在路上时根本就没有这种考察机会。形形色色的游民蜂拥而来，请愿、诉苦接连不断，直到这个和蔼可亲的父母官忙得头昏脑涨，我可不羡慕那个必须得应付那些混乱嘈杂场面的翻译。最后，霍大老爷只得退回到我在庭院里的帐篷，把决定留给我自己来做，这才解救了自己。

然而这个长时的拜访并非没有给交易带来一点儿进展，我设法使老穆拉·霍加免于被按办解雇，那个长期的琐碎的村庄税务账目给我诚实的达玛沟向导带来很多苦

M. Aurel Stein

恼，甚至差点儿毁了他。依布拉音伯克几星期前由于被指责性格懦弱很不光彩地被按办罢黜，现在他的事情已出现了转机，由于我强调前行的旅途中需要依布拉音卓有实效的帮助，按办毫不犹豫地答应让他代表当地官府伴我前行，我完全有把握从他身上得到我过去沙漠里老管家的高效率服务，他也将得到一个适合的空缺作为回报。

伯克位置的频繁变动是地方行政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个原因对中国的政治利益，地方小贵族相互间的攀比和官僚们的荷包同样有益。因此，在我的重新举荐下很快官复原职的依布拉音兴致勃勃地与我一同踏上了旅途。一桩额外的交易增加了我的现金储备，由于马继业先生以我的名义在喀什噶尔银行开出的汇票不能够在克里雅衙门换兑，通过接收克里雅衙门一批51块马蹄银或者说把2550两白银等值货币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对我来说，不必从喀什噶尔运送这些沉重的白银真是求之不得。克里雅按办对此也同样欢迎，因为他可以相应地减少他在喀什噶尔的现金支出。

在克里雅停留期间，我一直努力工作以便补上在前些时候由于沉重的发掘压力而耽搁的却又必须得做的记录和要写的信件。几乎写了一夜的信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10月13日开始了第二次前往尼雅（今民丰——译者）的长途跋涉。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毗邻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的沙漠古代遗址，1901年我在对这个公元3世纪的遗迹第一次勘察中有许多重大发现，当年不得不搁下的许多遗址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由于它远离任何一个较大聚居点，为了解决在沙漠深处确保足够的淡水供给需要做周密的准备。为了给他们赢得时间，我赶在沉重的行李队伍之前，两天走完了从克里雅到尼雅的60英里路程，由于需要运输新的货物、需要结算的账目等，我们无可避免地推迟了出发时间，因此当我们到达途中一个小小的沙漠绿洲耶斯玉勒衮（Yes-yulghun）时已近午夜。

第二天，当我徒步和骑骆驼跋涉了12个小时穿越了一些部分地方分布有较小

沙丘的荒僻沙砾地带到达熟悉的尼雅绿洲时，天已经很晚了。而热情的接待使我忘却了旅途的疲惫，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勘测员拉依·拉姆·辛格已按时到达来参加我新的探险工作，他关于我们分手以来克里雅、尼雅以南区域已完满完成三角测量工作的汇报令我极为满意，我上次旅行后依布拉音伯克治理了尼雅两年。多亏了他至今尚在的影响，这片小绿洲随时乐意提供帮助。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有消息传来，旧的遗址附近又发现了新的遗址。

从第一个在尼雅遗址中发现简牍文书的老向导磨坊主依布拉音那里我了解到，一群尼雅农民和来自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一带的喀兰达尔（Kalandar，乞讨者），无疑受到我上次探险成功的鼓舞，1902 年冬天开始在“阔纳沙尔”（Kone-Shahr）寻找宝藏，不过他们的冒险活动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回报。3 次长途跋涉把我带到伊玛木·贾法尔·萨迪克的麻扎外尼雅河干涸的地方，位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广袤的丛林带中，但季节的变化对景色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上次经过这儿时广阔的森林是一派冬季的萧条寂寞，白雪覆盖着大地，现在整个丛林在秋季炙热的色彩中燃烧。茂密的托格拉克披上了鲜艳的红色和黄色外衣，沉浸在它们短暂的光辉中，覆盖了宽广地域像成熟的庄稼一般在微风中起伏的金色芦苇也是再美妙不过的背景，偶尔可以看见几棵艾莉格奴斯（Eleagnus），或是高大的野生白杨依然绿叶繁茂，随处可见的红柳不甘平庸地展示一簇簇紫色的细叶。

从偏僻的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圣地返回的朝圣者队伍给如画的林中景色增添了人类活动的生机，他们大部分是快活的和田人，与他们谈论他们家乡的人和地方，嘱托他们向我那些遥远绿洲的朋友问好也使我很高兴。空气清新宜人，如同欧洲晴朗的秋日，温度计显示最低华氏温度是 17~20 度。早晨不必顾虑酷暑和强光将要带来的烦恼，万事万物似乎都昭示着这是狩猎的季节。由于每天都要赶很长的路程，还要照料一队人和牲畜，到林中追逐似乎很丰富的猎物对我来说只是不合实际的幻

M. Aurel Stein



⑧1尼雅挖掘工在安迪尔河附近的灌木丛里

想，但我的小猎狗总是保持着警惕，以不变的高涨热情追逐着野兔、狐狸和鹿。只有喀尔达什伯克（Kardash Beg）这条狗让我那条年幼的牧羊犬大惑不解，它是勘测员作为旅伴从喀让古塔格山区带来的。

与我上一次旅行相比，虽然到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圣墓的路线没有变化，但是尼雅河干涸的河道却有了显著的变化，在我第一次旅行时还是干河道的河床，这次突然变成了河，我们只能在尧干托格拉克附近一处浅滩渡河，而根据我们以前考察所了解的情况河流应在东面几英里的地方。经过询问我搞明白1904年夏天的洪水剧烈地改变了尼雅河道。我立刻想到河水向西偏移可能会将河水重新引到已经被我们清晰地标绘在地图上的旧河床，1901年我们发现它已经干涸。第二天我们的亲眼所见证实了我的猜测。河流的回归确保了河床两岸葱郁森林的生存，要是保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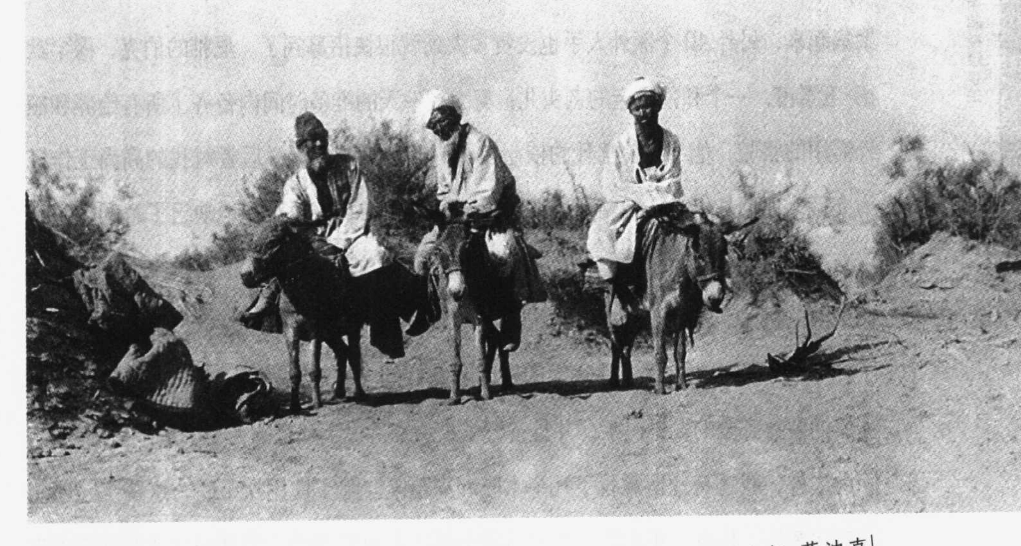
年前的状况这些故河道的树林似乎注定要慢慢枯死的。

第三天我再一次看到如画般成群的夏依赫（Sheikh，朝圣者）的马匹，朝圣者们的行装中还有一捆捆用破布做成的准备献给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齐亚拉特（Ziarat，即圣墓——译者）的旗幡。由于走在人和装备的前面，我抽出时间前去探访那个裸露着沙砾的圣墓小丘，据我猜测它的顶部大概是那位神圣战士永久安息之地，坡上数不清的小土堆是追随他的无数殉教者坟墓的标记，山脚下一个美丽茂盛的树林里简单地树立着一些粗糙的横木用以象征圣地的大门，上面挂着大量怪异的物品：破布、牛尾和其他许愿的祭品，我碰到一个举止行为看起来很古怪的迪瓦那（Diwana，即乞丐——译者），他从喀什噶尔来，定居在这儿，依靠朝圣者的慷慨施舍为生，他和他的小儿子一起给我虔诚的瞻仰参观做向导，像绝大部宗教献身者一样，他也强烈地表现出了恰拉斯（Charas）习惯的影响。

我没有给我的人在圣墓美食店浪费时间的机会，而是当天，10月18号，将行程推进到能获得水源的最远处。按照朝圣者的惯例，我从圣墓清真寺买了一只羊又将它作为祭品送了回去，这足以缓和并安慰任何宗教感觉上的疑虑，尼雅人十分乐意向沙丘脚下的小湖对岸的圣人墓表示敬意，我只能凭空推测，他们大部分土地可能都与圣墓清真寺有关，也许他们必须向圣墓清真寺交纳的什一税，目的并不是使他们产生特殊的敬畏和依恋，而是如同远方慕名而来的朝圣者那样，完全出于自愿。

在吐勒库其库勒（Tulkuch-kol），麻扎以北4.5英里的地方，一块小而肥沃的绿洲被大约15个人从密林中开垦了出来，我们驻扎在一个以当地仅存的小湖命名的地区。尼雅河河水在此之前就已经消失在沙海之中了，只有夏季洪水期才有河水注入这个小湖。夜晚，我让人从印度带来的4个水箱和25个羊皮水囊都装满了水，不过挑出我们准备保存在这里的给养，以及与当地牧羊人商议照料我们的马驹等琐事使我一直忙到深夜。我博学的中国秘书以前的职业毁坏了他的健康，为了减少水和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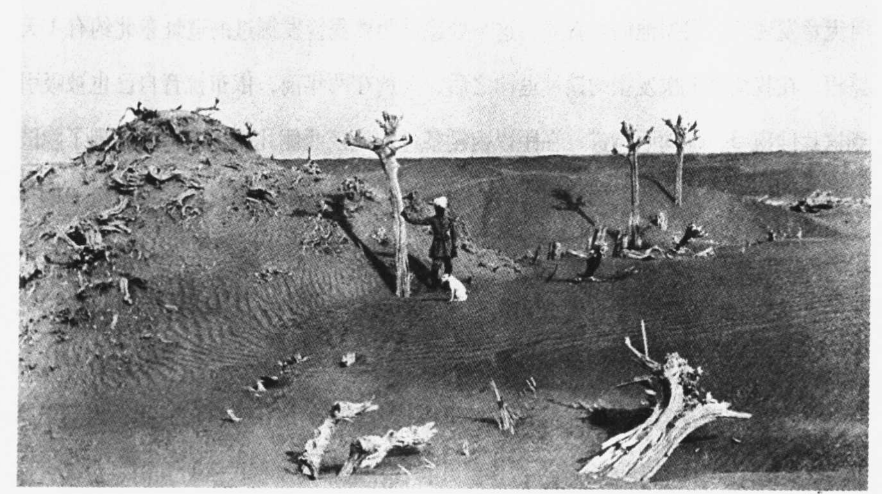
㉜从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清真寺归来的和田朝觐者

行李的重量，同时使他免受旅途劳顿，我不得不让他留下来照管仓库。我们要去的遗址，是几个寻宝人在大有希望获得金子的诱惑下，于沙漠中漫无边际地进行搜索时无意发现的，根据他们的叙述，这一处遗址距离我曾发掘过的遗址东北约有 1 天路程，在我离开上次发掘的遗址返回之后，大约在两年前，依布拉音自己也被吸引到这片沙漠里，他向西行进，在距以前勘察过的地区西侧几英里的地方发现了隐匿在沙山中的一大群古代建筑遗迹。可喜的是，上述两件事发生时都曾经有过一场持续的降雪，迫使那些寻宝人没有办法对废墟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在这条消息的引导下，我决定在可利用的铁水箱和山羊皮水囊数量允许的情况下，带尽量多的人手，以便尽快展开发掘工作，由于我的老向导得到好处本身就是极好的榜样，以及对我在第一次探险中所作所为给人的信任感，还有能够得到丰厚报酬的吸引，12 个曾伴随我第一次探险并且住在尼雅的发掘民工听到消息全部火速

聚集起来，另外40个额外人手也没费多大劲就很快招募到了。尼雅的伯克，穆罕默德·玉素甫，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努力在一天的准备时间内备齐了所有给养和额外需用的骆驼，他与喀拉喀什的依斯拉姆伯克是亲戚，听说后者对我的高尚工作极为支持，他便加倍热心地给予帮助，他因刚来尼雅不久而对当地缺乏了解的缺憾被依布拉音伯克及时给予了弥补。那些挤满了我的帐篷前来欢迎依布拉音伯克回返他们中间的村民们脸上流露出的喜悦说明，依布拉音伯克的行政管理深得人心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这样一些主动的帮助和友好的支持下，10月15日我召集到了所需要的装备齐全的发掘民工，并且备好了足够维持民工和我的人1个月生活的给养，除此之外，我还特地留意找了几个木匠和皮革匠。除了使用坎土曼，这些工匠还能在打包装箱、修理皮革水袋之类的事情上提供专业的帮助。当日骆驼载着行李于夜间到达了，我们把不需要的箱子和其他物品放入仓库后，第二天早晨向北出发。

⑧③尼雅遗址废墟附近古果园里枯死的桑树



第二十三章

尼雅废墟

我们10月20日早晨离开了最后一个住处，告别了尼雅河的尽头。5头骆驼为队伍驮运着第一批水，队伍里有50多名民工。自1901年冬天那些幸福的日子以来，我时时记挂着那片古老的土地，所以愈发期望能够尽快动身。遗址现在几乎已成为路标，人人皆知，不过路途中一个意外的发现耽搁了行程。离开吐勒库其库勒走了大约5英里，刚经过正渐渐变稀疏的林带中牧羊人丢弃的小窝棚，在我观察路东侧高大的红柳包时，依布拉音和他的几个同伴过来告诉我，他们曾经在这里发现过几个遗址。

我们来到了那块隐秘的所在，发现是一块不大的空旷地，南北约340码，东西约170码，地上有古代的街道、带围栏花园的遗迹，还有几间泥木结构房屋的残余痕迹。由于四周地面剥蚀得很厉害，因而地表没有沙和其他废弃物来保护这些稀少的古代房屋遗迹。从那里一处损坏最小的房屋遗址中我只能辨认出一些有墙基木，曾经用来支撑过几个小房间屋顶的木骨泥墙。根据我以往所考察类似古代建筑经验，足以使我相信这些古代遗迹，与过去尼雅遗址那些主要遗迹一样，可追溯至3世纪。1000多年来它们暴露在沙漠的强风中，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发掘的东西。有一点很重

要那就是这片古代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指尼雅遗址的范围）竟然延伸到这么远的南方。我很兴奋，毕竟自己又一次置身在早已经枯死的白杨和果树之中，而这些树活在世上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的繁盛时期。

重新上路后，我们又在一条活的托格拉克林带中穿行了1英里多。从树干的粗细、树皮的裂缝看，这些树多半已经很老了，在一些树林中还倒着许多死去的树，到处可见弯曲狭窄的河道在沙丘之中间或蜿蜒地冒出，这条将干的河道把洪水带到了这片半生半死的树林边缘，又因为洪水消退而断流了。但是这可能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因为只有这样大的野生杨树才能够把它们的根伸到地底足够深的地方，以保证在偶然遇到洪水时屹立不倒。

我们离开了这些生着浅色叶子的树，拐弯向西北行走了1英里，穿过一个阴沉的满是红柳包的沙丘迷宫，当时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置身于一小片开阔地，一排排已经完全干枯的白杨树和桑树的树干挺立在那里，这是我1901年就来过的一处古代果园或农场。这里的积沙不多，在大约60码以外的距离上，可以看得见间距规整的一排排古树。

萨杜克（Saduk），那个从麻扎来的牧羊人向导，提出要带领我去看以前未曾发现的几个废墟，他牵带着5头驮水的骆驼在前面引路。他带的路好像比我1901年所走的路稍微偏西了一些。走了不到半英里，我们意外地来到一块不大的从东南到西北长约300码的平地上，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剥蚀地面和四处散落的陶片，以及其他物品残片。周围有许多草草建造的栅栏和似乎是用来表示道路的一行行杨树。在这片平地的中央，有块小岛似的高地，其上有一个住宅遗址，房屋的墙壁由泥土和木材筑成，还有一部分墙壁仅只是在芦草篱笆上敷以胶泥的简单制作。这些墙连同遗址原来的泥巴门道均未超过两英尺的高度，值得考察的房间也都很小。

然而，在从前像这样破旧的废墟，我们也发现过不少的古物，好像上帝对我格

外垂青，让我们也会像以前那样，在这里发现大量的古物。跟我来的几个民工刚刚清理了这间只有8平方英尺的房子的一角，作为实验性的发掘，就清理出几片保存完好的简牍，用古印度佉卢文写成，就是我在以前的挖掘中发现的那种奇怪简牍。在这样破烂的房屋中，竟然找到了古人通信的物件，我欣喜不已。刚开始挖掘就发现了简牍，这可是个好兆头，而且这些简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关键性证据，用以证明这个遗址与我在1901年探险中找到的第一处遗址属于同一时代。现在这个遗址在第一处遗址以南整整4英里。

简牍的发现着实鼓舞人心，但我们需要尽快把辎重车队转移到依布拉音所说的大遗址群，所以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走了0.75英里后，见到了古代的房屋，但我们只能匆匆地观察一下。一排高高的红柳包丘把这些房子遮住了，我们先前在东边的路上看不到它们。这些废墟周围到处都是胡杨，虽然很老，但仍长着不少叶子，这让人感到挺奇怪，而其他的树木大多都死掉了，只剩下干枯的树干树枝，都不同程度地腐朽了。毫无疑问，在沙丘侵占了这些荒废的古建筑之后，这片行将灭绝的森林仍然生长了很长时间。看着这些古老的树木，尽管树干都裂开了，可是树尖上仍然枝繁叶茂，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里是沙漠气候，条件恶劣，经常干旱，但这些原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仍然存活了下来，它们要经历多少的苦难啊！

经过3英里的艰难跋涉后，到了古代的两片大的居住地，它们是1901年探险中我们所到之地的最南端。几年过去了，这些废墟仍然像我当初所见的那样，这很叫人欣慰。它腐蚀消磨的程度与我的照片里和记忆中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那个大木雕被覆盖了几寸厚的沙子，它是我那次探险中在一个衙门里发现的，一同发现的还有一把椅子，但因携带的东西太多，所以就把大木雕扔下了。我们快速向北行进，去找上次探险中的第一个标志物——一座土坯砌筑的小佛塔。从上次探险以后到现在，风似乎刮去了流沙以下的3层土，但因时间有限，没能仔细察看。

暮色里，西北面高大的沙丘拖着长长的阴影，看起来分外雄伟。虽然队员已经很累，但我们仍然又前进了2英里。然而，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根据本地的详细地图，我知道我们现在离一群废墟很近，上次探险在这里停留的最后一天曾经见过这些废墟，但是最后我不得不没有考察就离开那里，留作下一次这里再做考察。当侍从给我搭帐篷时，我就出去寻找这些废墟，很快就找到了那些埋在沙中的梁椽。走了这么远的路，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才找到了它，我觉得自己像个朝圣者，经历了漫长的跋涉之后，终于到达了圣地。在暴露的地面上，我发现了一个大的木托架，装饰着犍陀罗（Gandhara）风格的雕刻。我坐在木架上面，四周一片寂静，我联想起了1700年前在这块地上活着的生命，而现在却被流沙和风蚀吞噬了。这个夜晚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第二天早晨，我把队伍分了组。测量员拉姆·辛格带上3头骆驼，带着足够的

⑭尼雅遗址废墟中北部的房屋（挖掘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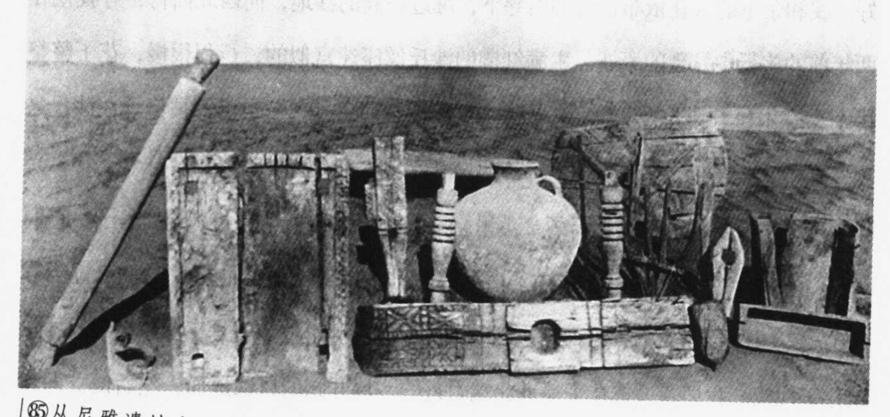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水，去东北方向寻找废墟，据那个尼雅村民依斯拉木阿訇说，那座废墟距离我们所知的地点有一站的行程。然后，测量员再向正北走，只要累不垮骆驼，走得越远越好。我和余下的人在依布拉音的引导下，翻过高高的沙地，向西北而行，寻找他在两年前的旅行中发现的废墟。生满红柳的沙丘像座迷宫似的，行程很慢，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到了最近的废墟。它是一个梁木搭建的房子，一半已经被掩埋在沙丘之中，红柳丛恰好在这里消失。

在光秃秃的沙丘中又穿行了2英里，一路上经过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房子。它们位于一条线上，这条线肯定是一条由尼雅河给水的某条河道最西北段，它位于我1901年发现的最北部的一座废墟以西和西北边的2英里处。但是，不断出现的沙丘挡住了视线。我把营地选在了遗址北端附近的一块开阔的风蚀地面，然后便立即开始考察这毁坏极其严重的遗址。

这是一座相对较小的房屋，三四英尺见方，上面盖上了沙子，这让奈克·拉姆·辛格和别的人开了眼界。因为风化侵蚀作用，产生了低气压，房屋所在的狭长高地呈舌状，现在还有一排排白杨树，表明这是一条灌溉渠道。刚开始清理房屋西段的地面，就发现了大量的佉卢文文书，找到了第一个 Takhta，又发现了一些中国碎银。在房子的3间起居室中，一个接一个用古代印度语写的文书出现了。居住在这房屋里的最后一个人可能是3世纪中叶的一个小官，丢下了这些“作废的文件”。如通常的官方文书一样，这些文书也是长方形的，上面紧紧地封着木片，双层楔形简牍通常被用作半官方的通信，方形的木片和木条写着各种各样的记录和描述，这些在第一个废墟中都发现了。

民工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刮去地面上的沙子，发现古物后自豪地告诉给大家，而把进一步的清理工作留给我。在从前的挖掘中，我熟悉了这些文书的外形。但是，当把沾在上面的细沙除去后，我发现了许多方形和楔形的文书，原来的细线仍保存



⑧⁵从尼雅遗址废墟出土的家具和家庭用品（公元3世纪）

得完好无缺，一些还带着封泥，而封泥上还盖有印章，我还是忍不住又兴奋起来。我发现它们上面有爱神，有一个人像可能是赫尔莫斯（Hermes），受到了古典凹雕的影响。在这个荒凉的沙漠废墟中，又一次见到了与古希腊、古罗马有着联系的艺术品，时空的概念在此时此地好像消失了。

挖掘出的家庭用具对我来说也很熟悉。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一眼就认出一把装饰着希腊佛教风格的精致雕刻的木椅，编织工具，靴子的楦头，一个大的吃喝用的盘子以及捕鼠器等等。根据奈克·拉姆·辛格的介绍，我很快了解了灰泥和木墙的各种建造方法。尽管风化使邻近的地面比原来的高度低出15英尺，毁坏了一部分建筑，但是厨房、客厅、芦草城墙的遗迹仍然可辨。

载着这几个小时取得的胜利品，我们下午又折回到营地附近的一座更大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城墙和城墙之间的物体都完全腐蚀掉了，只剩下了高大的柱子标志

M. Aurel Stein

着木头建筑的位置，木柱色彩褪掉了，柱体也裂开了口。通过勘察，我发现它似乎是厕所或马厩，约50平方英尺，是一个层层垃圾堆积而成的垃圾堆。我根据从前的经验，有足够理由去发掘这个肮脏的垃圾堆。垃圾堆经过17个世纪的掩埋后，仍然发出刺鼻的气味，借着微风，灰尘、细菌都灌进人的眼、喉、鼻中。

在这个马厩似的垃圾堆上，民工们一层一层地挖掘，终于在离表面7英尺下，挖出了一个小木箱，长约8英尺，宽约6英尺，高5英尺多，可能被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当作垃圾箱用。在另一堆更难闻的垃圾堆里，混合着各种小杂物，有各式各样的布片——蚕丝做的、羊毛做的、棉花做的、毛毡做的；还有羊毛毯，绣花的皮革，扎起来的辫子、线绳，铜铁制的箭头等等这些物品的碎片，以及精巧的漆制品和木制、牛角制品的残片。我们还发现了一打多的标签似的小木片，刻着极精美的

⑯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木制食橱



中国汉字，后来蒋师爷解释说那文字是用来说明各种礼物的。

然而，几年后，博学的汉学家沙畹先生对这些文字做了学术分析和阐释，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小木片所具有的独特收藏价值。他指出，小木片之中至少有8件最初是附在礼物之上，这些礼物很可能是在新年之初，或是皇室成员互赠的，或是大臣进贡的，礼物之中有一个是宝石。木片的一面写着送礼人的姓名，提及了他的礼品以及良好祝愿，另一面写着收礼者的姓名、爵号。有一件是皇太后送给她儿子的礼物和祝福，有一件是太子的妻子送给皇上的一个妃子的。

这些皇室的贵人大多只标明了姓名，但是他们也可能只是统管几个绿洲的地方小头领的家族成员，能不能从中国的历史资料中查找出这些人来还是个未知数。有一个皇室的夫人被称作“且末（Chu-mo）公主”，且末就是今天的车尔臣，在东北

⑧⑦尼雅遗址北端沙土掩埋下的废墟





⑱尼雅遗址废墟中的房屋（发掘中）

方向不远处。这些没有记载皇家物品扔在垃圾箱里，难道礼物是从那个离此地不远的、已经完全坍塌的大居住地送来的？还是在被垃圾掩埋起来之前，它们放在了一个今天已完全消失的、建设的时间更早、也更雄伟的建筑呢？

在垃圾箱底下，发现了一小堆谷物，捆扎在一起，保存得十分完好，旁边有两只木乃伊似的老鼠尸体，是在吃粮食的时候死掉的。

清理这些废弃物的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才结束。不过，在此之前，已有足够的人力开始发掘一座向南延伸的小遗址，由奈克·拉姆·辛格来监督发掘工作。当我把所有的民工都召集来这里挖掘之后，进展的速度非常地快。一些房屋已经风蚀得非常厉害，但在断垣之内并没有多少积沙。其他的屋子保存得较好，可是屋里充满了

积沙，有一两间沙子堆到了屋顶，清理起来很费力。但是，民工们凭着惊人的毅力，加上依布拉音伯克循循善诱，我还承诺谁先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会得到奖励。就这样，民工每天工作 10~11个小时。我自己要做精确的计划，记录所有的观察和发现，忙得不亦乐乎。

除了建筑用的木刻、家庭用品、日用工具，如纺织工具和靴子的楦头以外，几乎每间屋子里都发现了佉卢文简牍，有的是用来通信，有的用来记账，有的用来打草稿，还有的用来记事。尽管这座大建筑（Pompeii）很简陋，最后的居民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实在价值的东西，但有些房间里还有炉子、舒适的炕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当年在这里住得很舒适。在这些房子附近，随处可以发现有栅栏的花园，以及有白杨树或果树排列的大道留下的遗迹。有些地方受到沙丘的保护，园中的那些枯萎褪色的树干，主要是桑树的树干，仍旧直直地挺立着，有 10~12 英尺高。但在其他地方，树木都倒在了地上，或者只有树桩留了下来，大杨树表明在这些房屋的最南端原来是个方形的池塘，但大杨树也未能幸免，也是或倒或只剩下个树桩。在红柳丘的脚下，我能准确地判断出房屋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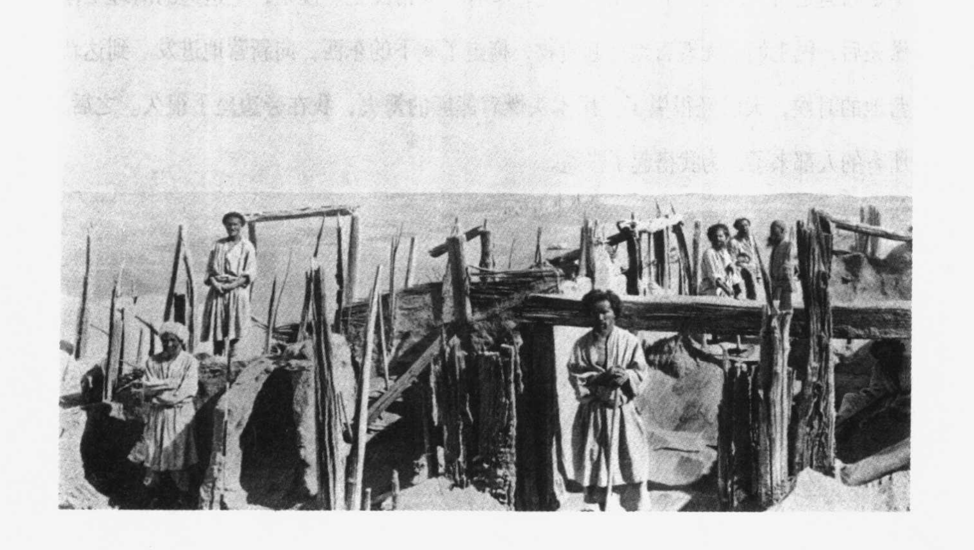
这些古代的房屋很多部分保存得十分完好，如同到了一户人家。不需要太多思想，就能知道它最初的模样，但他也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不时联想起新疆现在的房屋与此有着相同特征，这样我越发希望我能得到博物学家所能得到的尊敬，因为我发现了这些埋葬了近 17 个世纪的古迹。

但是，最迷人的莫过于开阔荒凉的沙漠。最北端的遗址延伸到红柳沙丘的区域之外。眼前的沙丘像海洋里的波浪，只有褪色的树干，或者成排干裂的木柱，还能表明在这沙丘上曾经建造过房子。我一直感觉像是置身于海洋之中，从远处看，那些遗址像一幅图画，如一艘沉船，现在只剩下几根木头。这里还有新鲜的微风，以及大海的静谧。

开始几天，我觉得很难把思路集中到五花八门的考察工作上，一心想倾听北部沙漠那诱人的呼唤。若越过地平线上最后的沙丘，再一步步深入那些无名的遗址，那将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然而，一路的观察发现不允许我沉醉在那遥远的废都美梦之中，但是我仍然期望着丢开一切阻力，徜徉在那沙的海洋中。

我觉得这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晚上，在依布拉音的指引下，我翻过了东南面的沙丘，去看一看 1901 年发掘过的最北部的遗址，另外我要根据距离的远近和所剩给养的多少，确定新营地的位置。这个夜晚极其明朗，红光散照在新月形的沙丘上，造成很迷人的效果。刚到达了目的地，向导那双锐利的眼睛就发现了测量员的骆驼正朝我们走过来，在广阔而单调的沙丘上，站着一个男子。当拉姆·辛格到达我们这里时，他告诉我一个不快的消息，尼雅村民依斯拉木阿訇所说的位于东面的遗址没有找到。

⑻尼雅遗址沙土掩埋下的大房间（发掘中）



之前，他坚持向北而行，结果经过一天的行程，却未找到任何遗址，他所带的给养已经用光。第二天，他转向东南，想寻找一些行走的标记。但是，最后他越来越迷惑了，于是决定在骆驼累坏之前（但此时骆驼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为防不测，就赶回了营地。在那如奥德赛一般的长途跋涉过程中，拉姆·辛格到了我 1901 年营地以北 13 英里处，但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古建筑遗址。不过，这也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因此可以集中精力应付眼前的考古工作，而不再胡思乱想。很奇怪，尽管沙丘的高度在逐步增加，在他所到的最北部营地，拉姆·辛格却发现有一些活的胡杨，那或许是因为与这里的遗址相比，在那里，尼雅河的河水更接近于地面。

跟与他同名同姓的人一样，依斯拉木阿訇，那个谎报军情的和田人，他很可能也喜爱浪漫。然而，他所说的在东面的遗址，我以前就考察过，不可能只是因为他指错了方向，而不能再次找到它。于是，第二天早晨，依布拉音和两个爱冒险的同伴，带着一羊皮袋水，又被派往东去，让他们独立去寻找。我这队人马已经清理了西北部的废屋，于是在第四天，我利用运水的骆驼，把营地再往南迁移。3 头骆驼不足以运走所有的行李和食物，但是，幸有一大帮民工。夜里，把这边的清理工作做完后，民工们毫无怨言地扛起货物，拖走了剩下的东西，向新营地进发。到达新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用木头燃着熊熊的篝火，我在旁边坐了很久。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为我搭起了帐篷。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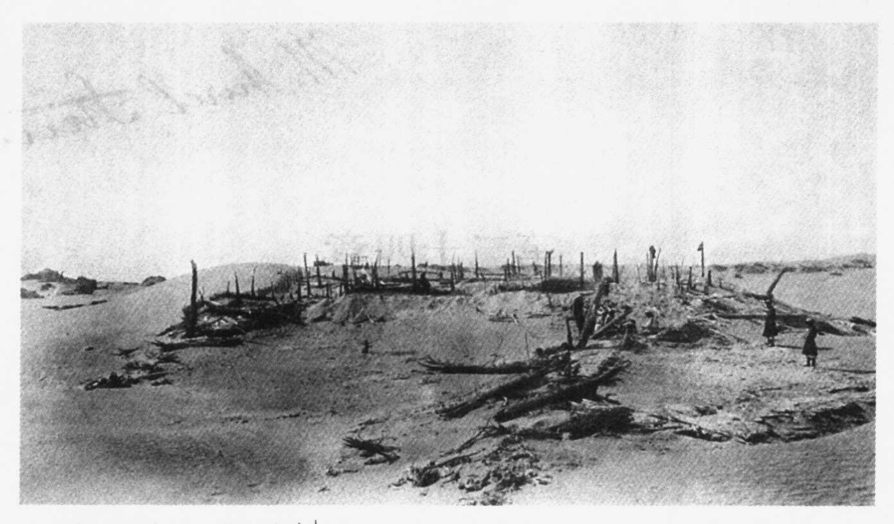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章

埋藏的档案室

我选最西边的一组遗址作为营房，上次探险时我就来过这里，但由于为时已晚，来不及系统地发掘就离开了这里。自那以后，我就一直想重返此地。很快，我就发现这些我一直期望的遗址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样。10 月 24 日清晨，在遗址南面一个很小、几乎完全腐蚀掉的建筑物中，不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漆制品和编织物碎片（看上去像是竹子编的），还发现将近 3 打官方用的简牍。

这些发现使我很受鼓励。下一步，我派人去挖掘 N.XII 号房屋旁边的较大的废弃房屋，1901 年的考察就是在它那里结束的。在那里，我发现了不敢奢望的胜利品。清理完正中大厅北面的屋子后，发现了一些精巧的木刻碎片，包括一块犍陀罗风格的梁木，表明这个房子是个富人的住处。他是个有地位的官员，因为大厅东面有一间长而窄的屋子，有几面窗户，或许曾经雕过棂格，完好地保存着几大片佉卢文简牍，其中一个简牍有 3 英尺长，简牍两面似乎都是书信的草稿。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在中央大厅南面一约 26 英尺×12 英尺的房间附近，刚开始挖掘几坎土曼（Ketman，即新疆式馒头），就挖出了简牍。它们大多是楔形的，用来传达行政命令，其他的方形碎片上写着账目、名



⑩尼雅遗址中古代居住遗迹

单和五花八门的官方文件，很明显，我们遇上了一名大官的档案库。简牍上盖了厚厚的沙子，有五六英尺，这对简牍起了保护作用。我们接二连三地找到了60多份这样的文书。然后，仔细搜寻了房屋剩下的部分，又找到了一些文书，有些在地面上，可能是在主人离开以前，它们被扔在角落或者墙根处。

鲁斯塔木（Rustam）是挖掘工中最有经验、也最可信赖的一个。他在清理地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第一次清理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一大团陶土或石膏，看起来像断墙的残块，离屋子的北墙很近，简牍被紧紧地堆在了一起。虽然我想它不过是偶然才落在那块地方的，但我仍命令不要碰它，鲁斯塔木在它和墙之间挖出了一个保护完好的双层楔形简牍，还保留着带印戳的封泥，我只得允许去掉封泥才能打开。刚拆掉封泥，我看见他急切地把双手挖进地下，就像我的小猎狗挖鼠洞一样。我正要发问，就看见他自豪地从地底下6英寸处挖出一份完整的长方形文书，它的两个封泥，还没动过，封口也未打开。鲁斯塔木更来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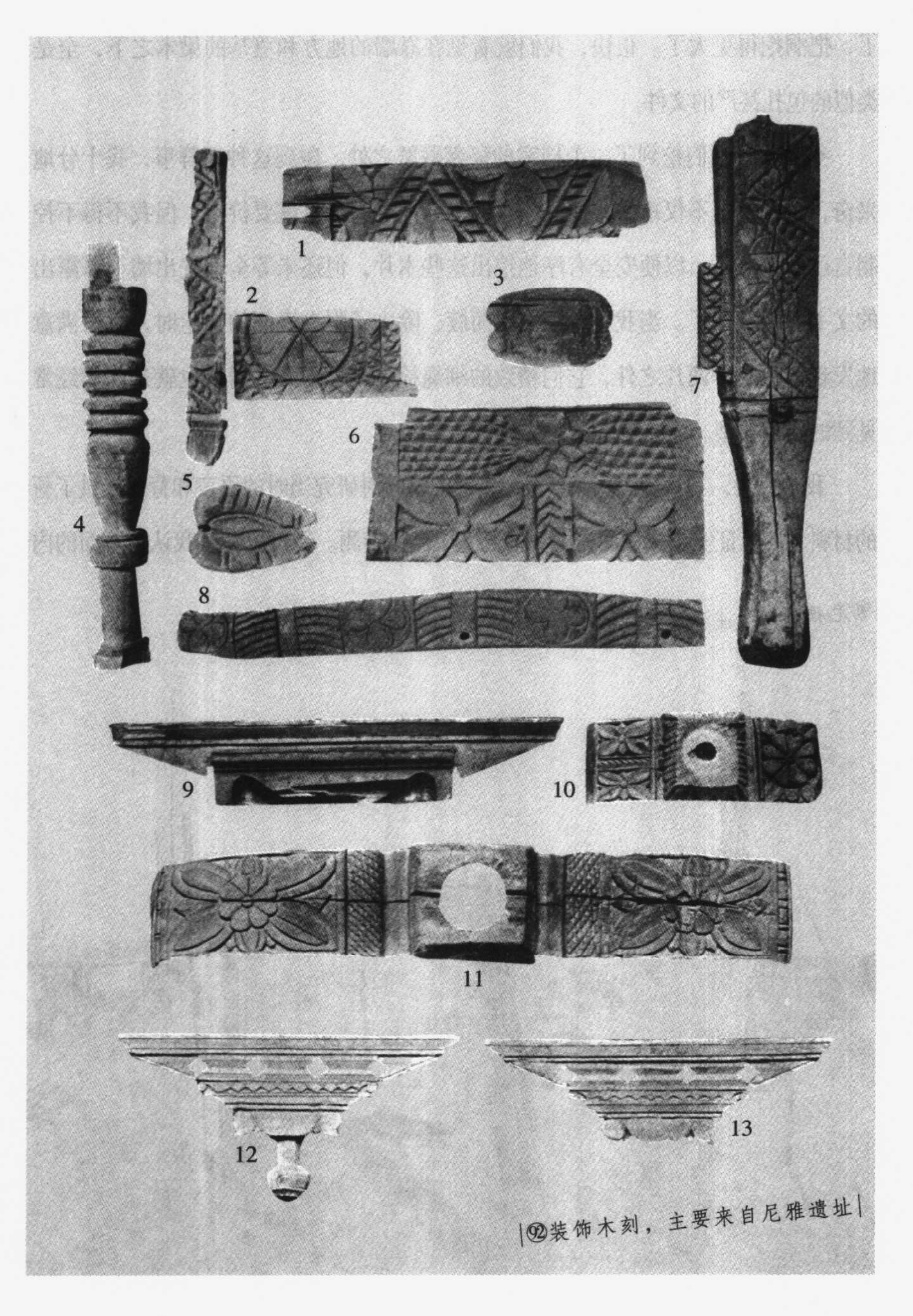
了，把洞挖得更大了。很快，我们就看见在靠墙的地方和奠基的梁木之下，全是类似的包扎甚严的文件。

很明显，我们挖到了一个档案的秘密藏匿之处。碰到这种新鲜事，我十分地兴奋，这些文书不仅重要，而且保存的十分完好，具有重要价值。但我不得不控制自己耐着性子，以便安全有序地挖出这些木片，但还未等全部挖出墙下暴露出的文书，天就黑了。当我检查长方形简牍，除去了附在表面的灰尘时，我很满意地发现，除了一两片之外，它们精致的细绳拴口都未打开，封口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类型。

我很高兴，不只是因为保存这样完好的简牍对研究当时的语言和背景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证实了我从前在类似情况下所作的猜测。经过思考，我认为里面的内

|⑨尼雅遗址沙土掩盖下的废墟，门上装饰有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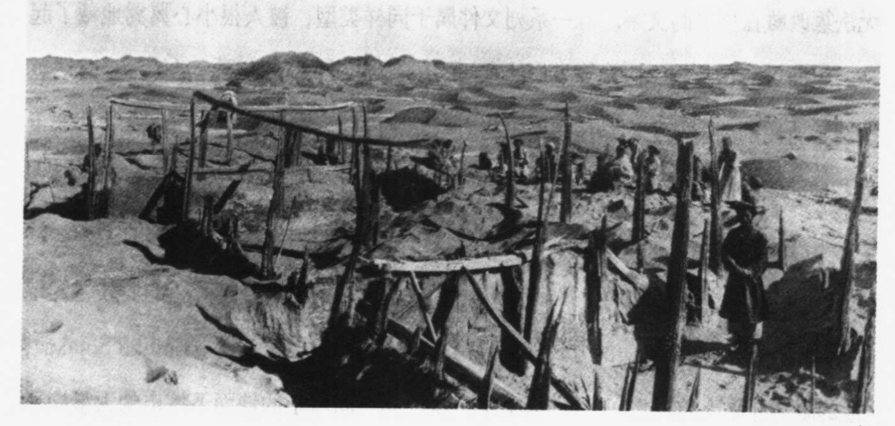
⑨²装饰木刻，主要来自尼雅遗址

容必定是契约或协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法庭上生效。封泥在木片盖子的中央，细绳从底下穿过，把木片盖子和其他的木片紧紧地捆在一起，只要不打破封口，就无法篡改藏在里面的文字。有一系列文件属于同样类型，被人很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里面可能是契约、协议等类似的东西，所有的文件都有摘要，显然不是陈述叙事通常所用的类型。它们是住在这里的大官秘密保存起来的契约，还是有关他的土地和财产的协议呢？

几年之后，等这些文件全部破译了，或许才有希望得出答案。但同时，一些例外的情况似乎证明我的猜想。那天深夜，我察看了那两封已经打开了的简牍，发现原来都是私人信件，写信的方式如同是写给尊贵的阔日伯索亚喀（Cojhbo Sojaka），"他的眼力介乎人与神之间"。那天下午，从在同一间屋子的地面下挖出的大量楔形简牍，上面记录了军部的命令，大官肯定就住在这间房子里。我很想知道两封文书的内容，是什么把阔日伯索亚喀和这些契约等物品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寻宝人，在渐暝的黄昏中，接着又在烛光下，挖出一个又一个简牍。这种工作要极其小心，以免损坏任何封泥，但是我意识到活是在晚上干不完了。为了保护这些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以免那些比简牍更有价值的古物被人偷偷挖去，我让人把地上的洞口仔细地堵上。在挖过的地方，我把我帐篷里的一张桌子拿出来，颠倒地放在地面上，把桌腿系在墙柱上，并封住了这些拴绳，我的这项发明，就连最聪明的寻宝人也会被迷惑住，去把桌子移走。老实的依布拉音伯克被留在这里，在夜里照看剩下尚待挖掘的宝物。他要睡在阔日伯索亚喀破旧的房间里，因为怕引燃旁边干燥的木头，他不敢生火，我担心伯克恐怕要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了，最低的温度已达到华氏 18 度。

当我把封泥放在用一枚精美的狄奥多托斯（Diodotos）金币复制的电铸版上的时候，看到这个第一位大夏（Bactrian Greek）皇帝发出了电火花，我不禁想到古希



⑬尼雅遗址居住点废墟的中厅和办公的地方（发掘之后）

腊艺术品保存到今天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啊，在这个遥远而又荒凉的地方更是如此。夜里，我开始清理带回来的文书上的封泥，发现几乎全部都像第一次印上去那样新鲜，大多数是古典的凹雕，有帕拉斯·普罗马乔斯（Pallas Promachos），有拿着棍棒、披着狮子皮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还有宙斯穿戴盔甲的半身像。

用作简牍封盖的大多数木片在凹下的框中有两个印章，有时达3个，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假设：契约或协议是在证人的见证之下签订的。在只有一个印章的木片之中，有两个木片写着在鄯善（Shan-shan）或者罗布泊的中国官爵的称呼，字体采用的是中文碑文用的字体。有几个简牍，为了保护凹处的印章，外面紧紧包裹着丝布，足见其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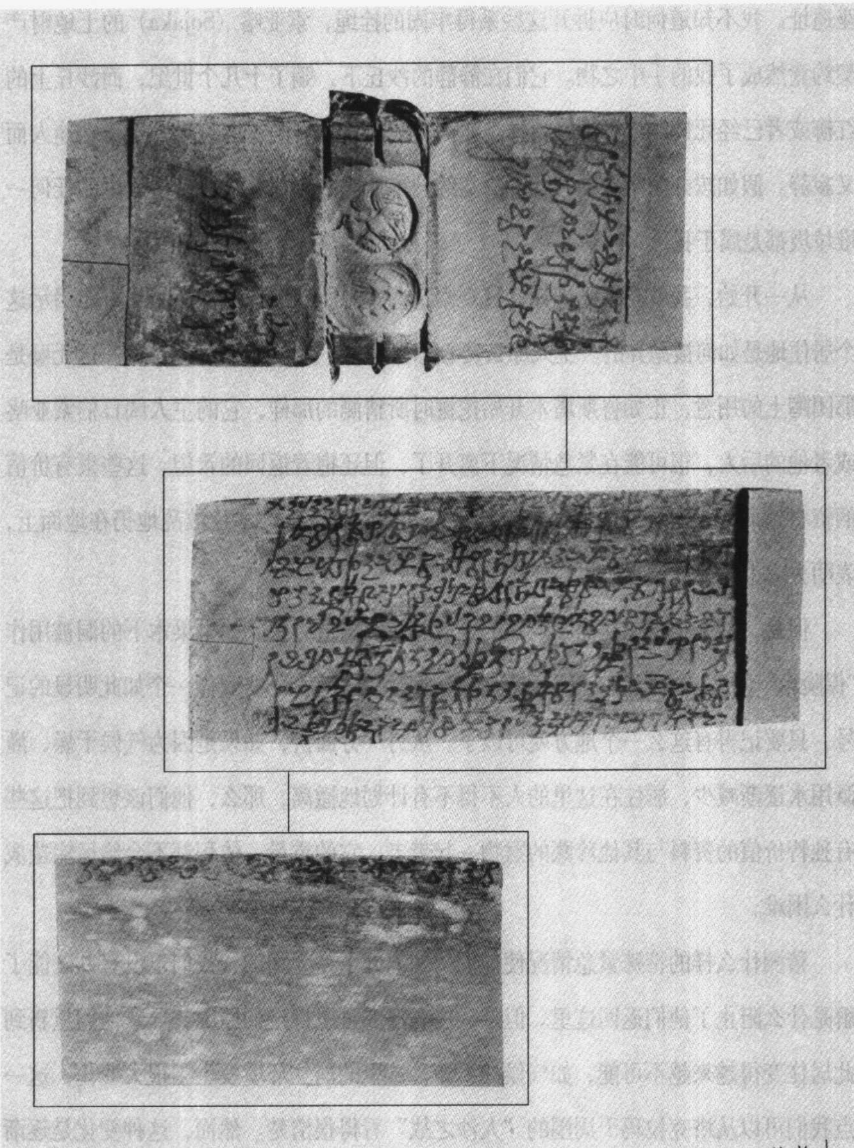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早，我们继续清理工作，又发现了遗址中保存最好、最完备的文书，加上原来已经挖掘出的文书，这样总共就有了3打，是迄今为止出土最多文书的一

座遗址。我不知道何时应拆开这些系得牢固的拴绳，索亚喀（Sojaka）的土地财产契约竟然成了我的手中之物。它们在静静的沙丘下，躺了十几个世纪，而沙丘上的红柳或者已经死掉，或者即将死掉。然而，我是这么喜爱这些垃圾，觉得它迷人而又寂静。假如按办乐于接受“我”的契约，承认它的合法性，我希望这里的任何一堆垃圾都是属于我。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应该认真观察这些文件所在的环境，因为它可能揭示这个居住地是如何被抛弃的。主人那么费心思去藏它，同时又作了标记——这无疑是那团陶土的用意，正如鲁斯塔木开始挖掘时所猜测的那样，它的主人阔日伯索亚喀或者他的后人，很可能在紧急情况下离开了，但还抱着返回的希望。这些很有价值的资料外面并没有覆盖物好好地保护它，其他内容一致的木片散乱地扔在地面上，表明去时很匆忙。

但是，似乎很难描述简牍贮藏的环境和它的构造方法。如果梁木下的洞被用作“保险箱”的话，那么也该找得到其他的贮藏物，而完全不必要做一个如此明显的记号，只要记得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是因为气候干燥，灌溉用水逐渐减少，居住在这里的人不得不有计划地撤离，那么，他们该想到把这些有独特价值的资料与其他珍藏的财物一起带走，它的重量、体积都不会给运输造成什么困难。

猜测什么样的特殊紧急情况使他们匆匆离开了是无用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能了解是什么阻止了他们返回这里。但是，仍有许多可以肯定的原因，导致他们重新到此居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如气候的干燥，这里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塔克拉玛干周围的“人沙之战”看得很清楚。然而，这种变化是逐渐进行的，在黄沙掩盖之前，并不妨碍人们来到这个被遗弃的地方发掘。所以，可以肯定自被弃以来，就一直有人来这里寻宝，寻找丢下的任何有价值或有用的东西。



㉔在隐藏的档案室出土的长方形佉卢文木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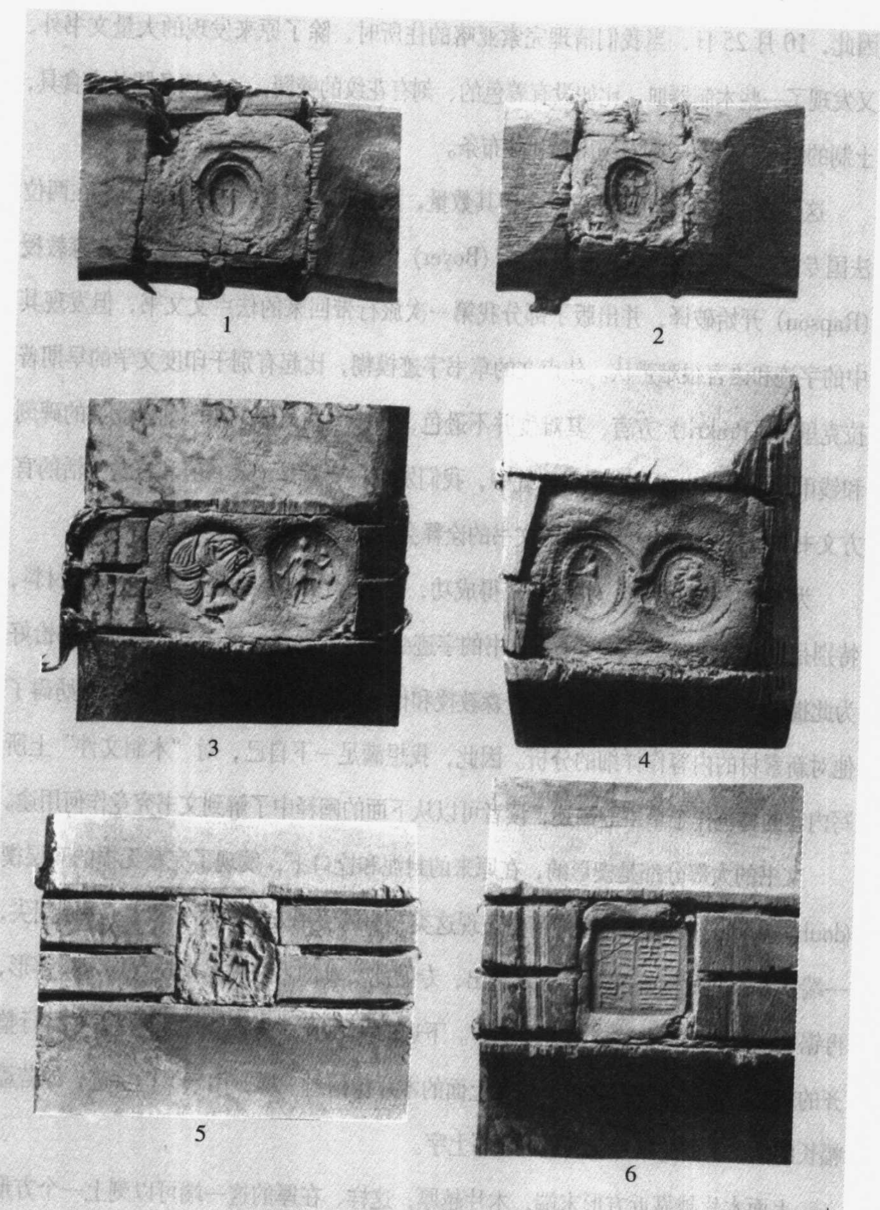
因此，10月25日，当我们清理完索亚咯的住所时，除了原来发现的大量文书外，又发现了一些木制器皿，比如没有着色的、刻有花纹的壁橱，一个四条腿的大食具，土制的坛子，以及一些农场用具和破布条。

这些古代文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数量，更在于它们完好的保存状况。在两位法国专家塞那特（Senart）和包耶尔（Boyer）的帮助下，我的朋友E.J.拉普森教授（Rapson）开始破译，并出版了部分我第一次旅行带回来的佉卢文文书，但发现其中的字迹和语言很难辨认。佉卢文的草书字迹模糊，比起有别于印度文学的早期普拉克里特（Prakrit）方言，其难度并不逊色，其中一些只能根据印度西北部的碑刻和钱币才可以认出来。在尼雅遗址中，我们发现主要就是记载官府和日常生活的官方文书和信件，无疑这次发现的文书的诠释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并最终获得成功，与我合作的语言专家需要更多的材料，特别是一些足够的完整的文书，文书的字迹必须清晰无误，这次发掘出的文书恰好为此提供了大量素材。但是，拉普森教授和他的助手忙于出版佉卢文文书，妨碍了他对新素材的内容作详细的分析。因此，我想满足一下自己，对“木制文件”上所写内容的特色作个草草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下面的阐释中了解到文书究竟作何用途。

文书的大部分都是楔形的，在原来的封泥和拴口下，发现了完整无损的双层楔(double wedge) 形文书，它们清楚表现这类文书的使用方法。两个木片，一端削尖，一端切方，两片恰好配对。可以看出，专做此文具的木匠先是把这双层木楔铸形，再锯成或劈成两块，这样可方便工作。下边的一块木片很平，正面上写着一行行整齐的文字，最多不超过4行。盖在上面的木片像信封一样，用来保护字迹，如若篇幅长的话，上面的木片背面也可以写上字。

上面木片越靠近方形末端，木片越厚，这样，在厚的这一端可以刻上一个方形凹口，用来盖上封泥。两个木片的尖端都钻有孔，穿过细绳可以把它们拴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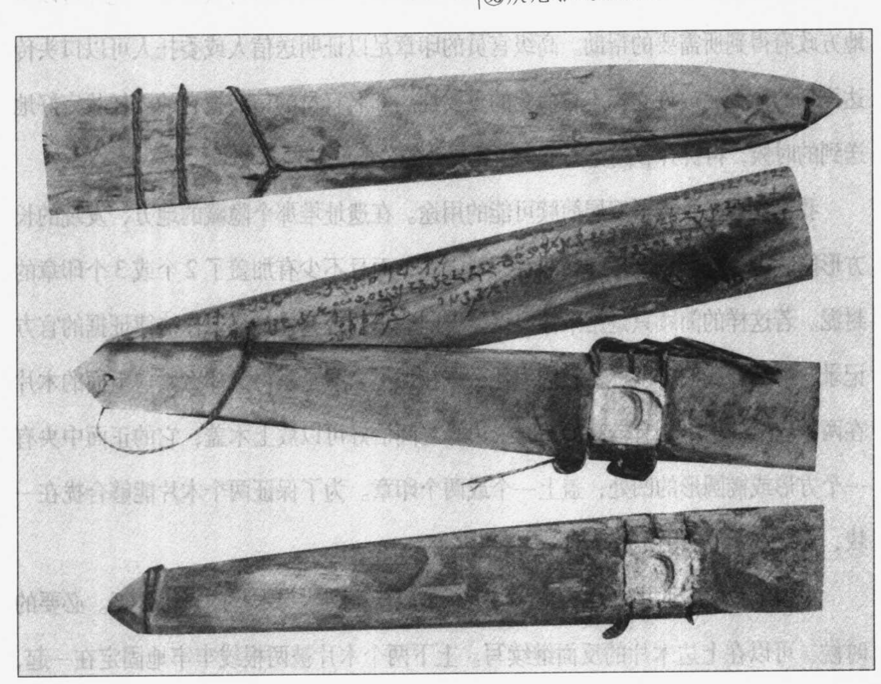


⑨⑤尼雅遗址佉卢文木简封泥上的凹雕印戳印记

在拙著《古代和阗》一书中，收录了F.H.安德鲁斯先生所绘的图，对这种创造性的大麻绳系绳法描述得甚为明了。穿过了两个木片，聪明地打了一个结，系紧两个木片，把细绳拉向方形一端旁边的封口，在那里绳子做一个交叉，边缘刻上3条凹槽，把绳固定起来。于是，在凹处填上陶土，盖住了叠在一起的线子，发送者的印章就印在了陶土中。所以，这对木片只有切断细绳，或打碎土封，才能被分开。

把内容写在这对木片的内侧，这种独创性的安排完全防止了信在发送到收信人手里之前任何不经允许的偷看和篡改。接收者看到封口完好，就可以打开，阅读里面的内容，或者切断绳孔处的细绳，或者割断这些折叠的细绳，然后抽出下面的木片。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仍然可保留一个很方便的拴口，读完后再把下面的木片放

⑯从尼雅遗址废墟出土的佉卢文木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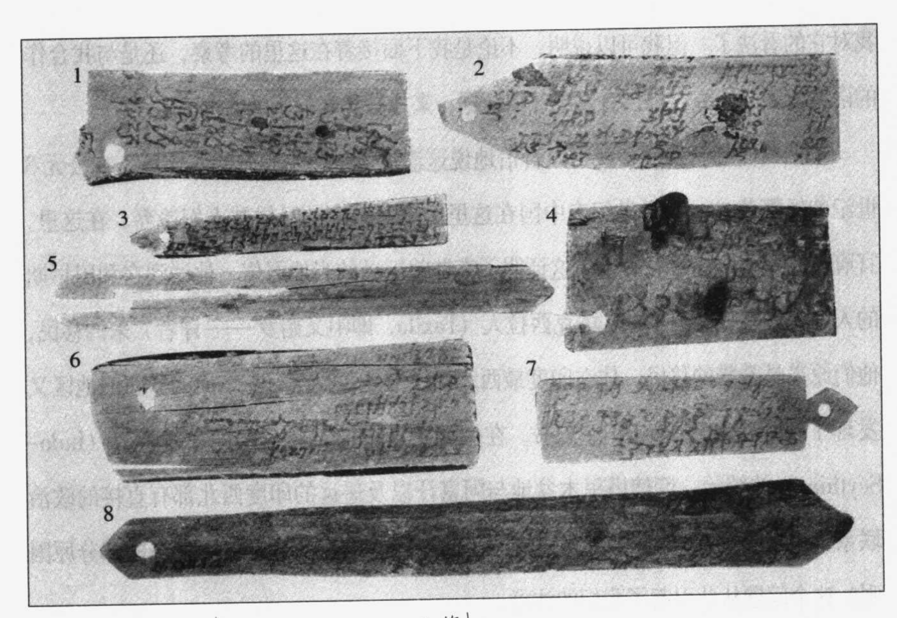
在原来的位置，有些几百年前首次打开过的双层木楔，我们今天打开后仍然可以复原。收信人的姓名、官位都写在盖简正面封口的右边，而在下边木片的反面，则写着送信人或者委托人的名字。

然而很奇怪，所破译出的双层木楔中似乎没有一个记载寄信人的情况。刚开始一看，这让人感到很奇怪，但是从这些信件的内容和基本特征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所有信件的开头都是 Mahanuava maharaya lihati，意即“大王手谕”，显然是官方的文书。自那时起，拉普森教授和他的助手证明了双层楔形文书通常是用来向接收者传达命令，或者在执行命令时要求接收者予以配合。这样，这组全部解析完的简牍包含了各种指示，有的是给信使送信的指示，有的对满足信使提出的问题给予帮助，还有关于担心逃犯的叙述，等等。

这些楔形文书很可能是赐给委派人的委任状，用以执行行政命令，凭此可以从地方政府得到所需要的帮助。高级官员的印章足以证明送信人或委托人可以口头传达详细的命令，或许它标志着命令的重要性。知名官员的信使把它的委任状完好地送到的时候，再拆开和阅览文书中简要提及的公务就显得多余了。

我已经谈了长方形双层简牍可能的用途。在遗址堆那个隐藏的地方，发现的长方形简牍很多竟然还未打开，印章原封未动，而且不少有加盖了2个或3个印章的封泥。若这样的简牍只是用来作协议、合同、契约或其他最终要作法律证据的官方记录，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它们为什么藏在那里，绳子系得又那么紧。下面的木片在两个较窄的边上刻有较高的边缘。边缘之间恰好可以放上木盖，它的正面中央有一个方形或椭圆形的凹处，盖上一个或两个印章。为了保证两个木片能够合拢在一块，这一对木片似乎是取自同一块木头。

下边木片的正面用来写字，这些字总是成行排列，与木片的长边平行。必要的时候，可以在上边木片的反面继续写。上下两个木片被两根线牢牢地固定在一起，



⑰从尼雅遗址出土的长方形的佉卢文木简

这细线被三道沟槽固定在上边木片的正面。一旦折叠的细绳和凹处的印章固定好，再要分开它们而又不切断那暴露在外的绳子，或者不打碎封泥，那是极不可能的。这样可以预防不经允许就打开写在两片木板里面的文件，或篡改其中的内容。同时，它表明唯有细绳保全完整，上边木片上的封泥没动，才能证明里面的内容真实确凿，再没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证明它的真实可靠性。

我刚才所做的描述自然而然地会引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但在这里我无法再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次探险的范围之广，工作量之大，使得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概括从中得出的结论，虽然我 5 年前就来这里考察过，但我打算在《沙埋和阗废墟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和以后的《古代和阗》中谈及。但是，我发现在这里出土的文书上面的语言文字还不够详细，没有新的东西，在这里也就无法陈述

我对它的看法了。但我可以说明，不论是我下面接着在这里的考察，还是与我合作的语言专家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推翻我之前所做的推论。

根据我们的新发现，我可以自信地说这遗址属于一个零散的农业区，在公元3世纪曾经繁荣过，在3世纪末中国在这里的统治结束的时候被人们遗弃。在这里，官府仍使用印度语言和文字，这证明了玄奘曾记录的当地习俗，他谈到在和田早期的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从塔克西拉人（Taxila，即呾叉始罗——译者）来的移民，他们原来是希腊的移民，住在印度最西北部。但是，我以后在东面的罗布泊地区又发现了佉卢文和普拉克里特文书。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的统治一度使塔里木盆地与阿富汗以及遥远的印度西北部有直接的政治联系，这个政权的重大影响是否也是佉卢文和普拉克里特文字广泛传播的部分原因呢？这个问题从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第二十五章

在废弃绿洲的最后几天

在我们所发现被掩埋的小型档案室遗址的东面，有3座更小的居住遗址与之相连，它们都被沙丘半掩着。我们用了10月25日和26日这两天时间发掘这3处地方，只是并没有得到与前面类似的惊人发现。但通过这3处居所，我们能观察到许多当时家庭住宅的有趣细节。3处居住遗址其中之一被高达7~8英尺的流沙堆掩埋，经发掘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木制双层托架，它是用来支撑主厅屋顶的。这个托架大约有9英尺长，1.5英尺高。托架两侧均有细心设计，轮廓鲜明的浮雕。托架底部的方格中刻满了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图案，它们有的身体长着双翼，有的长着鳄鱼的头和鹿的腿。这些图案由犍陀罗借鉴自西方而来，古代和田对其尤其珍视。中部方格中的图案，是一个花瓶，其中枝干上叶和花都是下垂的。这整个都是追随当时印度神庙柱头（Indo-Corinthian capital）的风格。想要整个地把这块大木头运走看起来是不大切合实际的。我非常高兴我的工兵下士的技术非常好，能将一块块方格仔细分割开，并用串珠线脚记下了分割处。接下来要做的是将每一部分掏空，这样它们的重量就减轻了许多，马匹也驮得动了。切割工作干得很出色，我相信，当这块雕刻样板在大英博物馆被重新组装时，只有内行才能发现其结合处。



⑱尼雅遗址居住点中发掘出的房间，木制双托架

在同一房屋建筑的西南角有一个房间被深埋于沙丘之下，因此它的墙和屋顶基本上得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两堵外墙上有坚固的黏土，四面墙都有烟熏的痕迹，同时整个房间内只在屋顶下有一扇窄小的窗户。这一切都表明，这间屋子在冬季是个非常温暖的角落。在火炉的上方，我发现了一系列很小但保存非常完好的佉卢文简牍，很明显是有关主要的家庭收支状况及事件的记录。这也许是因为屋子里弥漫着黑暗，否则的话，这屋子早就被彻底清空了。最后的居住者很明显忘了检查一下火炉上方曾用作存放琐碎“文件”的架子。

从这处营地我还再次来到了那块有珍贵文物堆积的遗址。1901 年时，我曾对它进行过清理，并有许多有价值的发现。我时时牵挂着这一小块遗址，现在我能松一

M. Aurel Stein

口气了，因为风或其他破坏因素尚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它。我再次来到这儿，一个特定的目标就是在那个遗址中寻找一些东西。1901年时我认为有些东西没有价值而将它们扔掉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惭愧。它们是一些很坚硬的皮质碎片，很特别的钻了很多孔，一端呈圆形。后来才知道，它们原来是盔甲的皮鳞片。我发现我们曾清理出的废物堆仍在房间的一边，未被破坏。我旧日的向导依布拉音是这种寻找工作的能手，经过他仔细的清理后，失踪的鳞甲得以重见天日，我也能稍许心安些了。我们在沙漠中的另一次长途跋涉是往北大约1英里。两年前，当依布拉音和一位同伴“寻宝”时，在此处碰见了人骨遗骸。当时他们将其命名为“麻扎”。在一个孤立的红柳包边，我确实发现了一些古代墓地的迹象——在一小块高地的风蚀斜坡上，不仅散布着大量人骨，而且还有发白的破裂木板，它们以前是用来做棺木的。不幸的是，由于风蚀，没有完好的骨架得以保存下来，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头骨用以测量。这些是不愿追随印度火葬风俗而宁愿被土葬的虔诚佛教徒吗？或者我所面对的是某个异族的墓地？答案无从知晓。当我仍在这处营地时，一支经过挑选的队伍在依布拉音带领下用了3天时间成功地在东南方找到了一些废弃的住宅。它们被掩埋在高大密集的沙包之中，因此5年前未被发现。测量员们搜索的区域，是在通往1901年所发掘过的最南端遗址以东及东南方这样一条线上。他们提出了充足的理由，将我们的营地于10月27日迁至此处。因为没有骆驼，我只得再次依靠人力去搬运最需要的工具及我们留在水箱和皮囊中的水。5英里的负重长途跋涉非常累，但一开始工作，我们又精神抖擞起来。到第二天晚上，这八九座住宅，连带其户外居所及牛圈，均被发掘出来了。大部分住宅都很小，而且建得很粗糙，这正符合古代定居点最东端住宅的特点。另外一些住宅坐落于台地顶部，台地犹如岛屿一般，耸立于风蚀地面上，约有20英尺高。这些住宅由于流沙的侵蚀而不再有考古价值，但有一处大型遗址保存较好，估计属于某位有权势的人物。我们从中发掘出了一些

佉卢文简牍，按数字排列。此处遗址附近的栅栏和果树林都保存得非常好，在一片果林中，我发现了一株已发白的桑树树干。那棵桑树大概有14英尺高，沙土里遗留着厚厚的缠绕的葡萄藤。这些日子强劲的东北风刮了过来，卷起漫天黄沙，大地一片灰暗，我们的发掘工作非常累人。随着我们的工作向南推进，我们的周围（如果还有什么的话）也变得越来越阴暗，尽管时不时会有活着的矮树丛出现。密集的沙包上有成片的缠绕在一处的大红柳，死的或是活的，有40英尺或是更高。遗址必须得在这些沙包中才能找到。在沙山的一边，从沙山脚下会冒出带着破裂木块的遗址，另一边则有被严重风蚀的地面，这构成了一幅奇怪的图画，令人产生孤独感。只有当我穿行于迷宫般的红柳包中，搜寻深藏其中的遗址时，我才会深切体会到这旧日绿洲的荒凉。天地之间都被笼罩在了浓浓的灰雾中，就像死亡世界中的一片土地。当我最终来到位于遗址南端稍许开阔一些的地方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此处沙丘相当低，红柳丛很茂盛。正如我到达那天就注意到的一样，在一大片死去的胡杨树中，仍有几棵顽强地活着。在这片仍在与死亡抗争的丛林中，共找到半打故宅，建得很粗糙，并不大，一天的发掘足以将其清理完毕，其间发掘了许多价值不太大的简牍。但大家都急于想从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回到自己的家园，所以干得格外卖力。

在曾经肯定是住所的遗址中，经常见有很厚的羊粪层。一开始，我对此很为不解，但后来我明白了，当夏季的洪水仍然流经这个离古遗迹最近的地方时，此处周围草木丛生。于是这些遗址在被遗弃很久之后，又成了在此牧放的羊群的栖居地。我在想，有多少还活着的枯萎的胡杨树老到曾目睹羊群在这片神奇的遗址中吃草。

最后一处遗址直到10月30日早上才清理完。返回遗址的第一天，我就从这座简朴的住宅里获得了3块佉卢文简牍。此处风化严重，最近刚被发掘过。我们只发现了一些木制老鼠夹子，经雕刻过的锁及类似的家庭用具，但遗址周围的环境特征



⑲尼雅遗址居民点废墟，建在黏土阶地之上

却有趣得多。据此地 60 码处有围成一矩形的死桑树，树干高约 10 英尺或是更高。这些死桑树曾为一大蓄水池遮阴，蓄水池的洼坑至今仍清晰可见。大蓄水池的源头是一条古河道，离此地并不远。因为就在最近的那条沙脊后面，残存着一座人行桥，尚有 90 英尺长，横架在一条古河床上。这座桥现存的部分由两组稍经打磨的杨树树干组成，每一根树干长约 40 英尺，用作步行桥是足够宽了。至于桥墩，还有两根立于原地，半掩且隐藏在东部桥头的沙丘中。树干越过斜坡及一大峡谷直伸开去，这个大峡谷深约 15 英尺，有风蚀斜坡。相对于生机勃勃的小溪盈满洼坑的时候来说，现在的河床真是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纪念品了。在河的左岸，已枯萎的果树遗迹往上延伸至 200 码处。在那儿，很深的河岸表明了此处曾有一方形大蓄水池，因为据此处西北 2 英里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古代河床的遗迹。古河床有些地方完全被

流沙覆盖，只有通过低矮的沙丘和成片的死树林中间或露出的陡峭河堤，我们才知道这个古河床还在延续。有时古河床的痕迹会非常隐秘，如果没有桥附近的一些峡谷的明显痕迹，将其辨认出来是不太可能的。最后，蜿蜒曲折的河床与一宽阔的溪谷状洼地汇合，并向远方延伸，其间红柳和野白杨间杂伴生。

在那儿测量员于早些时候曾发现过陡峭的河岸。从一高达50英尺的沙脊顶部向外去，沉静宽阔的山谷绵延数英里，两岸大沙丘“达坂”对峙而出，高达200多英尺，就像耸立于荒原的真山脉一样。站在我身旁的依布拉音曾搜索过这个大峡谷及其以西区域好几次，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古遗址，但都毫无发现。显然，此处是夏季洪水期间尼雅河水在经过灌溉绿洲中的渠道后最后注入的洼地。如今这条河床当然久已无水了。在这片奇怪的土地上，干旱是最显著的标记。

⑩尼雅遗址南端古居民点废墟（发掘中）



M. Aurel Stein

虽然晚间最低温度曾达到华氏零下20度，但午间的太阳仍很热。沿着已干涸的古河床横穿沙丘是很累人的，因此在我们回到南端的遗址后，一个短暂的休息是受欢迎的。小蓄水池周围的树木已发白破裂，当我在池边树阴下坐下时，我想到，是该为那些和我一起在这片旧日绿洲辛苦工作的人留个纪念了。我的印度帮手是尼雅发掘工作中最熟悉的身影了。现在他们立即在17个世纪的沙漠风暴都未曾将其连根拔起的古树下聚集了起来。令人尊敬的依布拉音被安排坐在正中间，他手里摇晃着一根木棒。他总是用这种方式催促尚未到位的人。我的小狗喀尔达什伯克(kardash beg) 总是乐意站在相机前面。这次它当然在我身边，表明了它对发掘工作的兴趣。从吐勒库其库勒来的马匹也到了。我们将穿过森林回到依曼贾法的麻扎堡。我们最先遇到的树木是枯死的，但后来我们逐渐看到了浓密的森林，泛着秋色，令人心旷神怡。以前我从未在新疆看到过深蓝的天空下如此灿烂的色彩。当我经过在丛林中留下深深印迹的亚尔沟时，我是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的。它们是否看见过洪水流入那个我曾辛苦工作过的远方山谷？当树木的根尚能从河道中汲取水分时，它们长得很高大。如今枯死的枝干仍然如此。随风摆动的野草丛看起来就像麦地一样。我常常沉浸于这种幻觉中。天空由于繁星点缀而格外耀眼。我们来到圣洁的定居地，扎下帐篷，做一天停留。我需要为参与工作的人员发工资，并采集新鲜补给和交通工具。黑夜将一切残破之物都仁慈地隐藏了起来，只留给了我们这个奇趣的沙漠圣地。

我在此地待的时间是最短的。我在北方旧遗址的成功发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但我更为满意的是工作进展的如此迅速。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东部的罗布泊(Lop-nor) 区域，那才是这个冬天发掘的重心。那里据此地还相当远，大约400英里，基本上全是沙漠。早点到达就多方面而言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我明白在路上会有许多古遗址等待发掘。



⑩古池塘周围死树的树干

所以我勉强抽出10月31日一天在麻扎停留，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参与尼雅发掘工作的大部分人员在恶劣的环境及饮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英勇无畏地工作，如今都已筋疲力尽，拿到工钱后已回到家中。对于将留下的人员及我自己带来的团队，新鲜的供给将自绿洲买来并分发下去。最新的"发现"需要仔细地打包，放入很快做好的箱子里。除了珍贵的佉卢文简牍，所有的东西都被运到我在和田的库房，安全地保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傍晚时分我忠实的达克（Dak）信差吐尔地及时赶到，带来了3大包来自和田的信件。我试图处理这些堆积的邮件，结果忙着写到了凌晨3点。那个傍晚，寒冷的东风刮了起来，我小小的营帐非常冷。我意识到，冬天已来临了。

第二十六章

安迪尔河

11 月 1 日那天早晨，我们开始分头行动。勘测员拉姆·辛格带着仪器从南边去往尼雅和索尔夏克（sorshak），他将沿着昆仑山脚继续他的测量，并且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将测量区域延伸到罗布泊。车尔臣绿洲是我和他之间能够会合继续前进的最近一个会合点。有两条可行的路线在绿洲的东面会合，其中一条是沿着山脉的西面，另一条是贯穿沙漠的。我自己和剩下的人则为了到车尔臣之前再去一趟安迪尔，出发穿过高高的沙丘东行。1901 年我曾在那里考察过一座古堡和佛塔，但由于时间不够，没有全面考察这个遗址，考古职责也不允许我放弃再次考察的机会，即使远离去车尔臣最近的路也在所不惜。更何况在尼雅意外获得的奇异古物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听说我打算前往安迪尔，麻扎村一个青年农民，即上次探险考察时那位忠诚可靠的向导，对我谈起一块写着字的板子，是一两年前他去安迪尔古堡附近寻宝时找到的。返回村子后，他把东西交给我检查，确实令我大吃一惊。那竟是一块不平常的长方形木版，保存完好，两面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佉卢文文字，可以看出与尼雅文书的年代大致相同。但是，1901 年我在安迪尔古堡的发现已经证明，遗址应是属于

8世纪初叶，可能过后不久就废弃荒芜了。那么假定他们说的是真话，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只有去现场才能解决的考古难题。而正如下文将要述及的那样，这个问题的解决实在具有非常广泛的历史意义。

为了不给已经十分劳累的骆驼和人增加更多的负担，同时尽早取回留在尼雅绿洲的重行李，我们只得沿1901年曾平安到达安迪尔的老路前行。所以有关这段旅行我将只做简短介绍。开始走过的地方时而是座凄凉空荡的高大沙脊，时而是低平的盐碱滩，长着少量灌木丛，只是枯寂地标志着古代河道。沿途我们遇上了刺骨的东北风，让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沉重郁闷沮丧的气氛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我们11月2日晚上最终到达亚通古孜河的尽头时，在那里本就十分窄小的丛林带中的树都落光了叶子，像冬季的落叶树林一样光秃秃地立在那里。这种景象与3天前碰到的壮丽秋色间的对比让人震撼。

再往前走，河流渐渐干涸，变成了三角形迷宫似的水道和托格拉克丛林。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吉格代布隆（Jigeda-bulung）小绿洲。我的老朋友、农庄的主人阿卜杜勒·喀里木阿訇（Abdul Karim Akhun）仍住在那里招待我，岁月使他变得有些驼背，但仍精神抖擞地照管着他的土地。他只是抱怨说主要由于河道变迁不定，收成仍是很坏。上次我来的时候向西移动的河流几年前就又移回旧河床了。

尽管阿卜杜勒·喀里木再也没有能力吸引新的定居者来垦荒，但这里的水量还是比较充足，他还是有效地完成了增长了的预算，并还留有大量的剩余产品。所以，我们不仅有足够的供应给自己和我从旧驻地带来的人，还可以满足另外从尼雅来增援我们的15个人。另外依布拉音伯克又在一夜间成功地从这个偏远的居住点的30个居住零散的农户中选出一些人组成了一只当地的民工小分队。

11月4日从亚通古孜绿洲出发时，直接目标并非沙迪克声称取得佉卢文简牍的那片废址，而是安迪尔河末段以西沙漠中他父亲萨姆沙克（Samsak）几年前去过的



⑩比勒尔孔汗村庄废墟的内部

阔纳沙尔古城。上次来时人们不肯告诉我那个地方，要不是通过马继业先生得到消息说，亨廷顿年前曾在这一带考察过显然与萨姆沙克所述相符的遗址，从而支持了萨姆沙克的说法，亚通古孜村民这次恐怕还会矢口否认呢。经过多方探询之后，亚通古孜村一个名叫库特鲁克（Kutluk）的老牧人终于承认知道这片遗址，说它就位于一片有着低矮沙丘、长着沙漠植物的宽阔地带中。

除了这个，本地向导对这里的地理情况也不是十分地了解。我们负重的队伍向东跋涉了一整天，时而是300英尺的大沙脊，时而是低平的盐碱滩。在翻过了第四座沙脊之后，我们扎营在一个狭窄的名叫羊塔克恰瓦尔（Yantak-chaval）滴水全无的小平川上，枯死的红柳树干给我们提供了木柴。第二天一早，向导带我们通过一条羊肠小路走向安迪尔河。走了约6公里的达坂高地后，我们来到一片阔地的边缘地带。这里布满了高大的红柳包，低沙丘间还长着相当茂密的胡杨林。

3个小时的时间在疲倦的等待中虚度，尽管空气的能见度相当好，独立的大红柳包也提供了宽阔的视野，通过望远镜，我连一点遗址的影子都没见到。最后向导

们垂头丧气地回来告诉我们什么都没发现，这已经是午后的事了。由于我们的牲口从亚通古孜河之后就再也没喝过水，我们的干粮也几乎用完，我认为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去东边的安迪尔河，然后在那里等待我派出的向导报告有关调查的最新消息。带着全队靠指南针我们又向前走了2英里，直到在更大一片阔地上的高大杨树枯死树干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时我们在阔纳协亥尔被拖住了，其实那里离我要找的地方就几百码远，那是一些房子的遗迹，木质结构十分简陋，但全貌还是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个区域只有少量红柳幼株，不多的沙丘，一望可知这个遗址的样子更像古代城堡，如那种散得很开的建筑遗址，以及塔里木人一律称为"塔提"的撒满陶器碎片的建筑遗迹都不同。怀着热切的期望，我很快就到了那里。一到那里，我就发现简陋的泥墙环绕着那些房屋，多处可见这些泥墙的痕迹。勘测表明，泥墙中的这块椭圆形地域，纵轴长约236码，方向为东北—西南；横轴长约210码。这里的地形条件较差，加上向导又对本地的实际地理情况缺乏了解，如果不是我坚持继续进行寻找和勘察，就不会于不经意间发现这片遗址，因而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是，这种欣慰之情没能持续多久，迅速的初步勘察之后，想要在这里取得丰硕考古成果的预期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大量的观察结果表明，这个荒村遗址的年代并不久远，尽管它有简陋的城墙，现在只能这样给定性了，另外很少受到流沙的保护，遗址中暴露在外的未经或很少经刨削的原木柱子和顶梁既没有严重发白，也没有破裂也同样说明问题。不过根据经验，这个聚落遗址毫无疑问仍然曾长期经受了荒漠的狂风和严酷气候的暴虐对待。

撇开所有考古学上的向往，仅与人们曾经在这里抗争过，最后被迫屈服，并遗留下来的沙漠遗迹的神奇诱惑相比，多1000年少1000年的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从东南角上的一道大约11英尺宽的仍然半开着的木门进到城墙里面，当我穿过那些毁坏的零散分布的房屋时，与外面的生活痕迹相比，里面的这些大量无言的证物

让人感到奇怪。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对这种恍如隔世一般的聚落遗迹置之不理。

幸好我有一批优秀的民工，又从亚古孜通找了些帮手。使试验性清理工作能够很快完成。行李已被安置在西墙外一块光秃秃的地上，我就让他们在两个不是十分简陋的遗址上开始工作。室内流沙没有堆到由粗糙的胡杨树干和柴草与泥土构成的屋顶。但那已足以保护由竖立的芦苇捆和外涂泥层构成的墙壁了。整个梁架全都没有好好加工过，仅仅用些未经刨削的胡杨树干，横架在山墙的顶上而已。这些小屋只有两三个房间，且都空无一物甚至连土炕和灶台也没有。同样的状况在现代绿洲的贫困农舍中依然存在。

第二十七章

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

11月8日早上，我决定向沙漠东南方向继续前进，在穿越38英里的低矮沙丘和红柳包及盐碱滩之后，到达了我1901年来过的，安迪尔遗址的显著地标——高耸的佛塔。

因为时间紧急，上次在这里只发掘佛塔和它东南方向约1英里的一个古戍堡内部，而且有些房舍由于被沙子埋得太深还被漏掉了，所以再一次来到这里扎营，我的考古热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慰，大致勘察之后我确定中间那座小庙的遗迹并未在过去的几年中受到破坏，上次就是在这个小寺庙遗址中我发现了重要的唐代汉文题记。接着我赶紧奔向南方0.25英里的地方，在那里沙迪克自称找到了佉卢文简牍，那简牍在伊玛目·贾法尔·沙迪克麻扎就已经给我了。那块地方到处是低矮的沙包，里面有很多扎堆生长在一起的已经枯死和仍然活着的红柳。沙包之间是被风蚀的硬土埂，沙迪克毫不犹豫地指出了那个地方，开始觉得像台地，只是有点矮，但仔细地靠近观察之后我就明白了，松软沙坡上这些几英尺高的东西绝非无关紧要，它们是粪堆，中间还露出一座半毁的小屋的土坯墙，这个遗址之所以能暴露出来十有八九是因为上次我来探访之后，旁边的沙丘有所移动。



|⑩安迪尔城堡废墟内部|

沙迪克说几年前有一批寻宝人洗劫过它，但他们只是在上面钻了些洞却没理会就在旁边的粪堆。我一开始翻动这个粪堆时，陶器碎片、破毡块、粗布片和坚硬的粪块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写有佉卢文的简牍。随后民工们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在日落之前大部分废迹就被清理出来了。房屋遗址里铺满了厚厚一层厩粪和草，残存的土坯墙只有3英尺高，这个居住遗址中还有两个房间依稀可以辨认出来。在它们和隔壁房间的地板上，找到了好几块字迹模糊的简牍碎片还有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佉卢文简牍、刻板制作没有花饰，倒数第二行那几个奇怪的字符也许是虚名一类的文字。还有一件很奇特的收获，那就是一块柔韧的树皮，内侧写着一行非常潦草的字，看起来可能是婆罗谜文字。

当然，在这个小遗址中发掘工作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局限于每个单件遗物的价值，

而在于给整个安迪尔遗址历史的发现注入新的希望，1901 年我们发掘城堡内的废庙时，曾找到过公元 719 年的汉文题记和许多写有婆罗谜文、藏文、汉字的文书碎片，从这些迹象中我认为这个古堡是公元 8 世纪初的中国哨营，后来被吐蕃占领，并在 8 世纪之内被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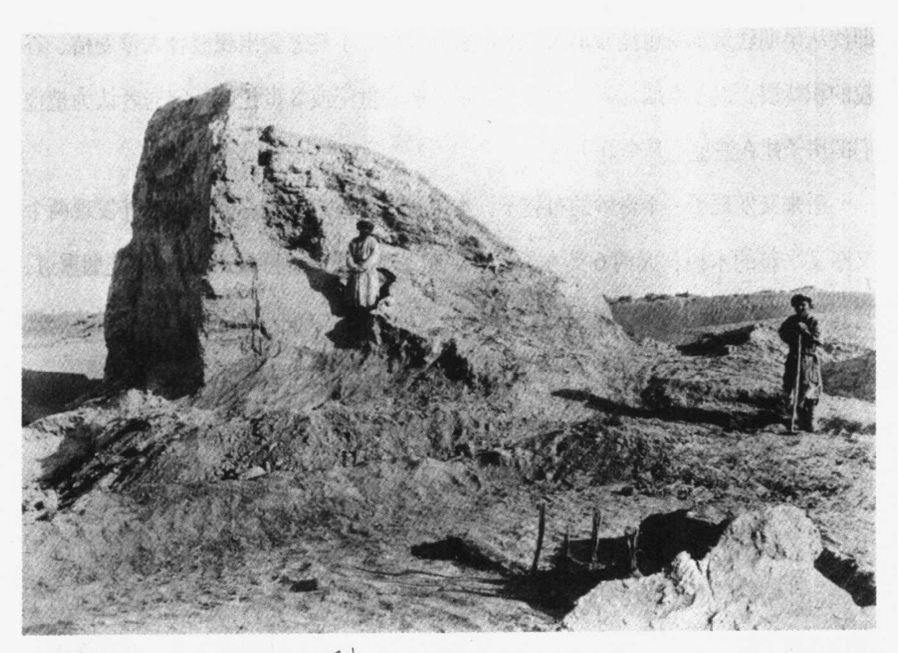
大约公元 645 年间玄奘从印度返回途中，曾经穿越沙漠从尼雅到车尔臣（今且末——译者），令人惊奇的是，在这 10 天的路程中，他没有发现任何人烟，但他提到在安迪尔一个地方，离尼雅 4 站，车尔臣 6 站左右的地方，应该是安迪尔遗址。到达一个废弃的居民点遗址。当时传说叫“靓货逻故国”。据他说，这里“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前面，我就说过在 1901 年的发掘基础上有个问题很难解决，那就是在一个早

⑩安迪尔遗址中受风蚀作用的古墙



M. Aurel Stein



⑩安迪尔遗址中的废弃塔和受风蚀作用的居民点遗迹

已应该废弃的遗址上又挖出来较早时期的遗迹，不过很快就在我眼皮底下，在同一遗迹中找到了许多佉卢文简牍，这些简牍在证实沙迪克所说的话同时，也就已经让我找到了合适的解释。很明显，我手头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古老的遗址在上个世纪之后又被重新建上居民点，从其书法之古老可以看出，这些佉卢文简牍与在尼雅发现的属于同一时期，约为 2 世纪或 3 世纪，继而到了印度斯基太人占优势的年代，玄奘称其为“靓货逻” (Tukhara)。那个发现简牍的小屋所在地一定就是玄奘在沙漠废墟中看到的那个靓货逻故国。

我 1901 年所发掘的文物可以证明，就在玄奘走后十几年，中国军队重新控制了整个新疆东部，由此，这个地区的情况又重新好转，于是新的居民点建了起来。

即使从早期建筑本身也能看出第二次定居的迹象，不然怎会出现混合大量麦秸、谷粒的积草层，以及断墙瓦砾上的粪堆。很显然7世纪或8世纪的新定居者认为把他们的房子建在遗址上是个好主意。

后来又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布袋子，本来我没有注意到它。但其中意外发现两个又窄又平整的木板，大约6英寸长，有一组茶杯大小的洞的那一段显然被烟熏过，直到后来我的一个助手怀特（H.G.Evelyn–White）在大英博物馆中研究它时才发现它们是日常用的壁炉火板。它上面的孔刚好与那时烧火用的细木棍吻合。

11月9日我们继续对唐堡附近的遗迹进行勘察。我发现了一些被严重侵蚀的居住点，但我们只在其中一个找到了可查到年代的两个佉卢文简牍残片。还有一个圆塔和一个方形塔的遗迹，它们是古戍堡周围仅有的能与早期居住点发生联系的实物遗迹，那些佛塔遗迹都还有18英尺高，用大号土坯砌筑而成。很显然长久以来由于风蚀造成了较大破坏，致使这里很少有古老结构的建筑遗迹保存下来。在城堡南方约1英里的地方，裸露的土堆上有一些模样十分古老的陶片，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中国汉代的铜钱。这处遗址也能证明风蚀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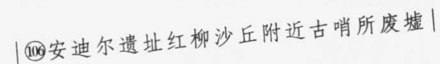
我的那个乐于助人的老练中国向导给我带来了最明确有力的证据。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唐代古堡的土墙有一段是建在结实的垃圾堆上。事情是这样的：古堡唯一的那个大门西侧约100英尺的地方，有一段土墙被严重侵蚀得几乎成了平地，一个民工在返回营地途中经过此地。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忽然看见坚硬的垃圾层中戳着一根小棍，那小棍是用动物皮革折成的。我立刻被叫到了现场，并亲自把它取了出来。那块皮革被展开之后才发现是一份保存相当好的佉卢文文书。大小和折叠方法都与1901年在尼雅遗址最大的垃圾堆中发现的皮革文书一样。

在勘察埋藏有古代文书的垃圾堆过程中，我发现它向下延伸了6英尺，最下面才是坚实的天然黄土，在墙的另一侧垃圾堆被夹在后来修建的坚实的土墙之中。在

那个埋藏了很多东西的小垃圾堆中有大量不同种类的布料，诸如上好的丝绸和毛毯的碎片，还有一个骨制刀柄。看来，在7世纪这个城堡的建设者们选这里作为地基之前，垃圾堆应该就已经存在很久了，真不知道城墙的其他地段之下还埋藏着多少早期居民的废弃物。

不管后来出现的建筑在保护叠压在其下的建筑方面有多么大的作用，它毕竟留下了大堆的沙土，所以接下来发掘整个古堡中那些我从前没有挖到过的那些遗址，对于我的民工来说，将是相当艰难的。随后，我们清理了包括古老居住点一个大厅在内的所有遗址，但只发现了一些很好的木箱，线脚齐整，尽管直径有1英尺，仍然可以看出是用旋转车床制作的，还有一些精致的火盆，看来是冬天房间中为了避寒使用的。在蒋师爷和奈克·拉姆·辛格的监督之下，民工们紧张地工作着，我则抽空去偏远地方考察那些打听来的遗址。向北方前进，经过了一个大佛塔之后，我弄清了，原来我上次来时注意到的那个不成样子的夯土墙，是个大型城墙的一部分，那个围墙已经被风侵蚀得难以辨认，同时有一半都埋在沙丘中。只有通过仔细观察，把这里那里的断墙连起来，这个大型城墙的形状才得以初见端倪。它是一个从南到北约540英尺，从东到西约340英尺的椭圆形城墙，城墙基地约有30~45英尺厚，夯筑，城墙上部砌有一层层土坯和黏土。不过城墙建造得很不规则，很可能经过多次维修，其中很少一部分现存的城墙残留的高度给人以推测原始高度的可能。没有高大沙丘的地方散落着棕色、黑色的陶片。风蚀作用首先破坏了外面的城墙，接着毁掉了里面的所有建筑。东面的城墙受损较为严重，而南面的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放眼望去整个遗址一片凄惨景象，即使像我这样已熟悉沙漠景观的仍然感到震惊。这个地方看来再进行发掘也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了。但是这里曾经大规模修建的古老城墙，还有城内大量样式古朴的陶片，都强有力地说明这些遗迹应该归属于早期“靓货逻故国”聚落。

其他一些短期调查是根据安迪尔向导提供的线索由北向南进行的，调查的内容是一些较大的圆锥形红柳堆，其中一个红柳包曾经是一个古代戍堡。古戍堡呈方形，夯筑。这里受损状况相对较小，仍有48英尺高。一个突出的方形残墙基底仍然护卫着南面的门。大约48英尺宽窄的院子中除了东墙下一大堆草垛与牲畜粪便之外，地面完全裸露着，只有一些曾经从侧面支撑内门的胡杨木柱还直直地立着。在清理院遗址时发现了一些大块的横木，我的民工们认出是用桑树和杨树做的。这就说明古堡建设期间或在此之前一定种植过这类树木。但我并没找到能证明人们又一次在这里定居的任何古老物证。尽管城墙保存得相对完整，不过这一点可能说明的年代却比较近。但是西墙那边20英尺高的长满活红柳的大沙包说明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根据已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地区考察取得的经验，除非这个遗址的年代可以追溯


⑯安迪尔遗址红柳沙丘附近古哨所废墟



到吐火罗古国时期，否则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红柳包出现，在其南方及东南方约半英里处有个侵蚀严重的居住点，大块土坯的尺寸和相似的结构特点，表明它属于早期纪元，但在这里进行的研究遗迹确定年代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我完成这些向南部进行的考察，返回时是沿着一条古老河床行走的，古河床从现在安迪尔河河床向东北方向延伸，经过唐代戍堡东边半英里左右的地方。沿着这条古河床四处可见早已枯死的古代果树的残桩断根，但是再也没有结构性建筑遗迹被发现。在最后一批聚落遗址的发掘工作完成之后，11 月 12 日晚上我把营地转移到了安迪尔河的上游。

第二天清冽的早上，我把工钱发给了尼雅来的民工，然后看着他们老老少少一群人踏上长达 4 天的归途回家。这之后我出发穿过河流，去考察向导牧羊人米赫曼 (Mekhman) 告诉我的位于河流附近丛林中的古遗址。尽管冬天已经很近了，但河面仍有大约 40 码宽，2 英尺深，流速可达 1 码/ 秒。细密的红柳林让前进变得困难，但最终，在经过一番迂回之后，我们还是到达了浅水渠旁一个建造粗糙的水磨。

⑩⑦去车尔臣沙漠路线上为我们举行的达斯提汗（Dastarkhan）



在离河差不多2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完全用朽蚀的胡杨木建造的小屋遗址。清理完这个遗址的唯一发现就是埋入地下泥土中的麦草，这些东西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农场，农业十分发达。很有意思的是，有一条深沟从库尔尕齐（Korgach）穿过茂密的丛林一直向北延伸，米赫曼说他曾沿着这道深沟一直走到了数英里外的一个叫比勒尔孔汗（Bilelkonghan）的废弃村寨的遗址。当天深夜我渡过托格拉克（Toghrak）草场边的安迪尔河后，发现我的营地扎在了胡杨林与茂盛的芦草丛——库木什（Kumish）之间，这里离河的右岸不远。为了赶在我向东进行沙漠穿越旅行之前把大批急信寄往喀什噶尔和印度，我第二天忙了一整天，当然，这样空闲的一天对于补充给养和水而言时间无疑是充裕的，另外这里不限量供给的饲草对畜生来说相当舒适。与此同时，安排了4个安迪尔人赶往前方去清理我们下一个营地的泉眼。

接下来的11月15日，我们出发向车尔臣挺进，像从前玄奘一样，我们将经过6站。在尼雅与车尔臣之间果然如他所言："空寂无息，满眼流沙。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因此屡有丧亡，概鬼魅之所至也。"在这种荒寂之处，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这就是为什么那虔诚的前辈们会相信那些给人带来伤病的鬼魅故事了。而对于经历过恶劣环境的我来说，在这条古代沙漠主要道路的沿途有着更多其他不那么可怕的景象需要观察。这条主路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是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的那部分，它几乎转向东北方向，从昆仑山山脚开始的戈壁缓坡和大沙脊向北延伸，一直到达沙漠边缘，那里分布着沙生植物，植物带宽窄不一，成为戈壁滩的北缘。这里的地下水在戈壁萨依地带又一次接近地表，除了滋润灌溉胡杨树、红柳和其他沙漠植物之外，还会给一些泉眼提供水源，没有了它们的话，这条路上就不可能有商队来往。事实上，这些井里的水都略感咸苦，而且有些地方的水咸苦

M. Aurel Stein

得都不能喝。咸水井再加上夏天的酷热，洪水中繁殖的蚊子以及风暴所带来的危险，从5月起到9月一直阻挠着来往的商旅。但是只要那些从山上流下的河流水量足够多，它周围的灌木丛及芦草丛就会扩展开来。因此，在我们过了安迪尔河到苏丹里克乌格勒（Shudanlik-oghil）和钦格里克（Chingelik）的两站中，我们穿过了大片繁盛的沙漠植被。据说它们一直延伸到北方，并能给安迪尔塔里木（Ender Talim）人的牲畜提供足够的过冬草料，沿着这些枯燥的草场走，我想起了马可·波罗是如何形容“车尔臣省”的：“全省多沙……所见之水，大多苦涩。”但在某些地方的确可以找到淡水，当军队到来时，人们即携妻带子，赶着家畜，逃入两天行程远的荒漠之中，他们知道那里有水可以饮用，足以生存并饲养家畜。却不可能被敌人发现，因为风无时无刻不在吹动流沙，所有踪迹转眼就被覆盖了。

当我们离开那些喀拉木兰（Kara-muran）河夏季发洪水时留下的无数险峻沟壑之后，第三天开始，越往前走越来越多的裸露沙丘出现了，而其间的种植带则越来越窄。后半程有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刺骨寒风，同时，冰冷与沙雾让人越来越不舒服。当第四天晚上翻过几座沙包之后，我们到达了一个称为羊塔克库都克（Yantak-kuduk），即骆驼刺井的地方。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路边有一瓢牛奶和一筐鸡蛋，这是车尔臣伯克先期给我们送来的。多么令人感谢的礼物呀！在这条主路的其他地方，我们从未与人接触过。前方地表都是布满低矮沙丘的贫瘠萨依碎石地，只有一些低洼地带有少量的植被。在其中一个叫喀拉斯提（Kalasti）的地方我们驻扎下来，这是到车尔臣之前的最后一站，有一个强盗的头盖骨放在那里给过路者提出警告或者说信号。

第二天早上，我们只走了5英里就遇到了迎接我们的车队。那是车尔臣伯克斯得克（Sidik）和一些当地的望族，还有4个暂住车尔臣的顽固帕坦商人，他们殷勤地以他们家乡的萨赫普（Sahib）礼节招待了我们。当我发现这几个帕坦人的家乡都

是在那几个我所熟悉的域外地区如斯瓦特、布奈尔（Buner）、巴焦尔（Bajaor）时，对他们这些东印度商人中具有冒险精神的先驱者到场感到倍加荣幸。他们通常从和田或者若羌用小篷车队运送印度商品到焉耆，然后再到东北部的吐鲁番。现在他们已经发现车尔臣是个极佳的中途站，他们应该十分了解前方道路、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信息，但是直到在村长——我的主人和他自己人的共同努力下按时布置起来，安排了大量肉食和干果，专门为我举办的宴会开始，我也没找到一点时间去询问这些消息。

不过我在路上有大量的时间来收集当地的信息，因为前往绿洲的整个行程中一马平川，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观转移注意力。最终，当一块布满了树木和房子的土地清晰地出现在雾气弥漫的地平线时，我们看到了一条已经干涸了的古老河道那里耸立着一个标志性的红柳包，这里的一切都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老村长20多年前努力的结果。他曾经利用一个早期灌水渠道，在现在这个绿洲之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居住点。早几年的时候，水还能够用，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最终还是不能确保种植的成功。实际上，这就是造成新疆绿洲不稳定命运主要困难的绝佳代表。接着我们快马加鞭到了一个从前定居点的遗址，我的当地向导曾告诉过我，它的西边有几段残破的土墙，西南角一带是分布着大量的古代物品的零散碎片的“塔提”。最终薄雾还是降到了我们身上，我那些随从都急不可耐想继续赶路，早点走过早期定居点。我则走进了那个从前的农耕区，早期定居点的田地与庭园很像，有长势良好的树木，坚固的房子，让我觉得到了一个富裕的农庄，实际上今天一整天我都听着对于车尔臣肥沃土地和由河中引来的充沛水量的赞扬。在火把的光线下，我们骑过了一个新的大市场，然后就到了吐尔逊巴依（Tursun Bai）那舒服的房子，它看上去像个大厦。

第二十八章

车尔臣河沿岸

车尔臣（今且末——译者）完全与我第一印象所想的那样，这两天停顿（我也只能同意休息两天）给过去5周不停在沙漠中奔波的人与动物都带来了新鲜、愉快的变化，在路上吃过了那么多芦苇与多刺的灌木之后，马匹终于可以尽情地吃干苜蓿了，骆驼也不必再吃像霜打了似的嚼吉格代（Jigda，即沙枣）树叶了，民工们则备好了充足的冬装。更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市场闲逛，还可以跟没事的游民一起神侃。

从途中我得到的消息中可知，车尔臣绿洲正在稳定的发展中。在发生叛乱之前，那里只是中国用来关押和田囚犯的地方，现在已从一个恐怖的只有一些简陋可怜小屋的流放地，逐渐发展成一个大绿洲，甚至有可能比尼雅还大，再也不像30年前的样子了。我们无法较为准确地统计出整个新疆人口和其他情况，但根据车尔臣地区早期居民的数量，我们可看出该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所以，很明显地，定居在那里的种田人不下500户。

这里有大量可耕地，数量超过任何开垦计划的需要。所有当地人都一致认为，靠雪山给水的车尔臣河的河水足够供应一个比克里雅面积更大的绿洲，但现在紧缺

的就是民工。车尔臣的大地主巴依也正期望着新的民工。和田的劳动力不断流入进来，但速度还有待提高。漫长的沙漠道路显然不利于劳动力流动，同时还因为那些贫苦的种田人不愿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搬到这里的抵制心理。

不管在哪个年代，只要大沙漠里的南部路线有人经常往来，那么单凭车尔臣在罗布泊与克里雅之间的有利的地理方位，就足以保证它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玄奘和马可·波罗都曾提到过车尔臣，而我沿着那条曾把他们带往中国的路线行进，并亲眼目睹了车尔臣在被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之后，是如何来大规模发展自己、重现昔日风采的，我对此甚感欣慰。到达的第二天，我就不顾琐碎的修修补补的工作、运输计划等，骑马到了绿洲的中心地带。在那里，一个新建的市场里人流熙熙攘攘，我感到非常惊喜，况且，那天不是赶集的日子，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拉玛占(Ramazan) 4 天前刚刚结束，但现在是农闲时期，还是有四五百人聚在一起，充满节日的气氛，哪怕仅仅有几家商店和餐馆没开门呢。

在市场尽头的街上，是中国驻车尔臣代县长王大老爷的简朴但干净崭新的官邸，而那几座破旧不堪的茅舍则是从前的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人们从中很容易看出来车尔臣前后的变化。那个下午天气寒冷，还有些雾，远一点的景物看不清。车尔臣绿洲年轻的沙得克 (Sadik) 伯克给我们带路。小路旁邻近的地方还是颇有看头的，比如，惬意的人家，大量幼小果树，以及打扮漂亮的男男女女从阔尔索(Corso) 集市上回来，所有这些无一不告诉大家车尔臣的繁荣昌盛，除了和平与相当出色的管理，还能有什么别的重要原因促进车尔臣的经济发展呢?

车尔臣这个例子表明，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在新疆沙漠的南缘那些孤立的定居点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在《汉书》中，车尔臣被描述为一个有 230 户人家的狭小地区，中国人称之为“且末” (chu-mo)，它有可能就是在尼雅发现的佉卢文木简上反复提到的恰勒玛丹那 (Chalmadana)。公元 519 年，当中国佛僧宋云 (Sung

Yu）从罗布泊到和田的途中经过此地时，他发现了一个住有100户人家左右的绿洲，并将之命名为“左末”（Tso-mo）。100多年之后，玄奘沿同样的路线，他提到了在“沮末”（chu-mo）有一叫“折摩驮那”（Chê-mo-t'o-na）的古代王国，其位置与现在的车尔臣相同。玄奘见到了古城的城墙，但却不见人影。在玄奘经过此地不久，中国在这个地区重新建立统治，《唐书》记载说车尔臣或且末仍是一个防御重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车尔臣省”（Province of Charchan）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城镇无数，古国重要城市叫车尔臣。”但是，到了18世纪末甚至更早，定居点就又消失了。直到上个世纪初叶，中国又一次开始把车尔臣作为小的流放点。起初，居住点发展得很慢，穆罕默德人叛乱的动乱局势一定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但从那时起，重建的发展趋势就一直没停过。在官府的支持和强制之下，西部一些绿洲的人来到这里，但之后又都逃回了原来的家园，尽管如此，这里的人口还是稳定增加。我们穿过一条河流，虽然时间已经是深冬，河水依然没有结冰，四五条河道里充满了河水，水量比秋季的和田河还要多，此刻，我体会到了大自然对待车尔臣绿洲是多么的宽宏大量。但是，谁又是能预测到这些资源能否被全部开发，还是在或近或远的年代里，这里会不会又变成一个荒凉之地呢?

第二天，我参观了西南方向的绿洲中的静寂的“塔提”，那里的一切说明我的忧虑并非无稽之谈。经过风蚀地带，“塔提”一片凄凉，上面布满了陶器碎片、玻璃碎片金属的及其他的坚硬材料碎片，这些表明曾有人在这里居住。从现在耕地边缘向西南方向是一片片平坦的碎石“萨依”，延伸四五英里，遍地都有像小岛一样的黄土堆。根据黄土堆，我们可以看出没有被风化以前的耕地的高度，而在亚勒古孜吐克麻扎（Yalghuz-tug Mazar），也被称为凄凉的亚克斯堂达特（Yakstandard）附近，人们又在车尔臣人称之为阔纳协亥尔（Kone-shahr）的地方垦殖新的耕地。除陶器

之外，其他大量的遗物也在很早以前或业已被寻宝人挖走，或已被破坏了。

沿着一条“塔提”附近的旧河道走了将近2英里，到了它与一条灌溉渠的交汇点。二十几年前，穆萨伯克（Musa Beg）曾试图重新利用这条灌溉渠，在到车尔臣途中，我们也穿越了这条渠道。从灌溉渠往西，直到一处由阿亚克塔尔（Ayak-tar）的夏季洪水汇集形成的洼地，这里布满了陶器碎片。从坡度平缓的冲击扇的结构来看，历史上的车尔臣河应该很容易引过来。然而，由于受到严重的风蚀，肥沃的黄土被风吹走，南边的“塔提”只剩下了小石子，虽然从这里往下、沿河岸还有成千上万的丰裕土地，但不太可能改变这里一步一步被风化的命运。

向导给这些“塔提”起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我们不知从何处下手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至于发现的小残片，我也无法确定它们的年代。风蚀的巨大力量在这里一览无遗，据说以至于至今还没有人在这里发现中国铜钱，要知道中国铜钱在其他遗址可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只找到了微不足道的铜币典型的边缘断片。现在，南边那些以前的耕地被风刨蚀到了皮埃蒙特（Piedmont）沙砾，与现在的绿洲相邻的阔纳沙尔塔提可能是中世纪车尔臣地区所在的位置，阔纳沙尔塔提仍在继续受到风化的作用，我们可根据两地的不同特征，判断出塔提形成的年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风蚀作用的例证，与阿亚克塔尔（阔纳沙亥尔）相连有一塔提，塔提的中心有一黄土柱“金鸡独立”，周围的黄土则都不见了，它的斜坡之上满是远古模样的坚硬陶片。

整整一天寒冷的东北风都呼啸不止，多亏晚上我能住在吐尔逊巴依家，免受风寒之苦。通过各种努力，我们及时地雇来了去若羌所需的骆驼、准备好了给养以及民工们过冬时要用的设施。这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供我们进行考古发掘，所以，我就在11月23日上路了。这时，拉姆·辛格仍在南边的昆仑山山脉做测量工作，我就留下指示，让他沿山脚继续向东测量，测量得越远越好，然后去若羌和我们会合。

前往罗布泊的商旅队路线大部分是沿着车尔臣达里雅河岸，我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推进我们的行程。因此，我必须准备好充足的水、牧草及燃料，以满足民工们的要求。一路上，除了约24英里处的一个叫塔提让（Tatran）的小村庄外，在到达瓦石峡（Vashshahri，若羌或者说罗布泊地区最西边的一个居民点）之前，再也没有人烟，150英里的路程都是丛林及沙漠无人区，因此我们必须带上7天的给养。

前两天，我们在右岸紧靠河床而行，实际情况比在地图所显示的更好走。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红柳堆、被芦苇覆盖的大草原以及胡杨林连续不断，让人觉得索然无味。我在车尔臣就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向导，他是个相当棒的猎手，在塔提让种地，除了他用火枪赢得的丰功伟绩之外，他那敏锐的视力，以及出人意料精确的方向感很快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轻车熟路，十分准确地在极少有地标的荒漠中判定我们的方位，他的这种娴熟技艺感染了我，虽然天已经冷得伸不出手来了，我还是很高兴地拿出平面仪，开始测量。

在第三段行程开始的那天早上以前，我去了赫定（Hedin）地图上的一个叫梯木（Tim）的小型土坯遗址考察，我再一次领教了这个叫做依斯买尔·帕万（Ismail Pawan）作为猎手的勇气。这个遗址位于河对岸，我于是提出渡河过去，但他却提出了质疑，因为河床底部的很多地方是烂泥，人又无法看出其凶险，根本不能承担马的重量，人走上去会十分危险。而且现在水面又漂着浮冰，冰块在一天天变大，这又给我们增加了困难。

我们到达肖尔库勒乌格勒（Shor-köl-öghil）牧场时，依斯买尔·帕万建议涉水而过，虽然广阔的泥岸之上结了一层冰，冰层看起来还是太薄。但是，我带来的车尔臣人和依斯买尔·帕万带着我的里程计，安然渡了过去。然后，他们很勇敢地涉水通过了两条河水湍急的河道，每一条都大约50码宽，将近4英尺深，当他们侦察回来、围着火堆取暖时，我看到了他们被浮冰割得伤痕累累的发抖的大腿，这令我想起了法国先驱们，他们为挽救即将漂走的大军，在齐腰深、结冰的别列津纳

(Berezina) 河奋不顾身地建设桥梁。尽管刚经历过这样一段艰苦的旅行，依斯买尔·帕万还是主动提出带我过去。我呢，考虑到我不能自己通过，就爽快地答应了他，他安全地把我背了过去，但也遇到了麻烦，在攀登两条沟渠交界处陡峭的河岸时，他给摔了个嘴啃泥，而我则结结实实地摔到了地上。在到了对岸之后，民工们用芦苇生起熊熊的大火，我可以烤我的衣服了。

梯木遗址离我们刚才渡河的地方并不远，离河岸也就几百码，这是一个小的方形土坯石块结构的遗迹，原来很可能是佛塔地基。现存外形约 11 英尺长，高出现在的地面约 7 英尺。土坯尺寸之大，建筑之细致，证明了这里伊斯兰化之前 (Pre-Muhammadan) 就曾经有人生活在现在的河道附近，这也支持了这样一个的推论，即后来这条河不像其他几个支流及咸水湖那样，它的主体流向没有太大的变化。

离开梯木后，我们不再沿着河走，而是绕到一连串沼泽的南部边缘，这些沼泽与那条河的流向大致平行，沼泽可能就是洪水形成的咸水湖的遗迹。这些洼地被茂密的芦苇覆盖，有些水但不多。胡杨林时隐时现，它们大都长在沙质地面上的岬角之上，伸出的岬角凌空在 Köls 之上。余下的行程约 43 英里，可我们分两次行军才走完，所经之地主要是盐碱草地，长有少量的芦苇或红柳。天气寒冷，天空万里无云，根据我记录，11 月 26 日最低温度华氏零下 34 度，远远的南部是雪山，若要不是天空晴朗，这里的风景绝对要比北边赤裸裸的沙丘地区还要压抑。在那里，大沙丘画出优雅的波浪线，沙脊蜿蜒其间，构成一道变化无穷的地平线，让眼睛应接不暇。

在第四次行军以前，我在伊斯玛的带领下去考察我在车尔臣就曾听说过的遗址。在沼泽与河之间长满丰饶的丛林，这次考察让我领教了沼泽地和丛林的厉害。从扎在穷库勒 (Chong-Kol，即大湖) 岸边的营地出发，向东北前进，依斯买尔·帕万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全穿过沼泽带。从泉眼流出的水还没有结冰，如果没

有我们的向导那令人称奇的方位感，我们恐怕瞎忙活半天，也找不到穿过沼泽地的路线。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仅有四五百码的河道，穿过了沼泽地带。但即使是在这里，土地也软得很，承受不了负重的牲畜。芦苇高达10英尺，甚至更高，在这样浓密的芦苇丛里穿行可是件苦差事，即使有依斯买尔·帕万和他的小马为我们开道。

依斯买尔·帕万的马个头不大，但非常结实，在行军过程中，我越发对其钦佩。除了那高大的主人，它还要驮着主人的食物，够它自己吃上10天的草料，一杆又大又沉的火枪，毛毡以及依斯买尔·帕万在这天寒地冻的季节里在丛林里扎营所需的其他各种东西，但是，它从来不曾落后过片刻，在难走的地方还甘当领队，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终于，前方出现一个覆盖着红柳的沙脊，依斯买尔·帕万在老远就说那就是遗址。洼地不时出现（若夏季发洪水，洪水可能到达这里），洼地上长满了浓密的胡杨树和其他灌木，骑起马来非常困难。洼地之间，胡杨树长得很高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不断遇到被扭曲的胡杨树，我们被迫迂回而行。到处都有的鹿、野猪和其他小动物的痕迹，我意识到伊斯玛那古老的猎枪在这里的作用。

亚勒古孜墩（Yalghuz-dong），又叫“荒凉的小丘”，建在与低沙脊连接的红柳包上，由松软的砖建成，长方形的城墙，顶部是圆锥形胡杨木，底部与沙脊相连，包括3个小建筑。尽管红柳丛挡住的沙子，保护了其中的几部分，但现存城墙的高度仅仅只有几英尺，根本不像什么高级建筑的遗迹。小丘高出地面约30尺，上面散落着大块的横梁或厚板的胡杨木碎片，伊斯玛认为它们也可能是棺材的碎片，但没有什么能证明它原始的位置或用途。城墙保存的很不完好，奇怪的情况都让人觉得困惑。但是，土坯不大，比较松软，表明它的年代不久远。伊斯玛又带我去了一处遗迹，它位于第一处的东北方1.5英里，与第一处长方形建筑很相似，但它建在一条明显是古灌溉渠道的低地旁，但是我心中的疑团仍然没有解开。与上一处遗迹一样，它的墙也只高出地面约2~4英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属于什么高级的建筑物。

顺着那个渠道向东走约半英里，依斯买尔·帕万带我到了他称之为阔纳塔木里克（Kone-tamlik），即“老墙”的主要段落时，谜底终于揭开了。在这里，我见到了一排超过12堵的长方形城墙，其土坯与上一处建筑物的相同，保存相当完好，从东向西排列在一个小沙脊的顶端。它们之间的尺寸差别很大，最大的约50英尺×42英尺，每堵墙的一个侧面都有一道狭窄的弧形门道，高于其他部分，这里的东西使人想起在西面的穆罕默德墓地常见的那种城墙，这种推测很快就在沙脊边缘附近的墓地得到了证实。

一排粗糙的胡杨木树枝盖住了棺材，棺材是由一根中空的树干制成。当我和民工们移开了泥土，朝南的骨架的脚露出时，很明显这里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墓地。由于已知这个遗址的性质，我就不再打扰那个死者，让他安静地留在那个孤独的墓中。在出发进行另一段长途跋涉之前，我们将那个暴露在外的墓地又一次盖上。在伊斯兰教墓地是不可能发现什么有历史价值的遗物的，而要从这个死者身上收集人类学上的测量研究则需要较长时间，那样我们将被迫延长待在这里的时间，我和我的民工都不愿意这样做。

当然，即使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确定其年代，但这些发现具有相当的地理学价值，因为很清楚地，在并不遥远的从前，当车尔臣河的河道在更南的地方时，也许就是我们曾经经过的那一系列沼泽所标志的地区，在地理状况与塔提让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曾经有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居民点，而现在河道北移，其间干燥的过程也给邻近的土地带来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不得不走大片的盐积物形成的土壳，接着小心翼翼地穿行于早期盐碱水湖，在湖里连芦苇都要死了。很快，我们就重新回到了一系列泉水供应的沼泽以及沿着它们的南部边缘适合骆驼行走的道路。没有一丝风，夕阳绚丽灿烂，南方的雪山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山高超过18 000英尺，与这种绚丽的景象形成对比，前面的道路显得更加暗淡。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前进，一直持续到深夜，才返回原来那条河床，累得人筋疲力尽。河道弯弯曲曲，很难一直沿着河道走，我们一次又一次错误地沿着干涸的沟渠河道前进，穿过像以前行军中所经过的盐碱覆盖的草地，磨破了骆驼的脚掌。有些草地裂开了缝，加之驮着沉重的行李，所以走得更慢。在阿克依拉克（Ak-ilak）的一个壮观的胡杨林中，我们驻扎下营地，直到午夜才吃上了晚饭。

第二天，我们又一次经历了这样的苦难。开始，我们沿着河岸下行，到了一个叫拉什喀尔扎特玛（Lashkar-satma）的牧场，阿古柏的一小股军队曾在这个牧场屯兵，然后，向东南行，穿过一个高大荒凉的沙丘带。大的半月形流动沙丘高约120尺，尖尖的，凹面面向西南，说明这里盛行东北风。来到这里不久，我们就明白了整个罗布泊地区这种风都很流行。在亚喀托格拉克（Yaka-toghrak）时，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在沙漠丛林的边缘停止前进，这些丛林是靠从山脚流出的地下水而得以存活下来。这里的柴火充分，我们不必再担心寒冷，但是，浅井里的水却无法饮用，这预示着我们在罗布泊地区将要面临又一挑战。

M. Aurel Stein

第二十九章

在瓦石峡和若羌

11月29日，脚掌痛疼的骆驼和马匹步履蹒跚，累得筋疲力尽，到罗布泊地区第一个小绿洲——瓦石峡剩余的30英里今天不可能走完了。况且，前方很长一段距离都是起伏的巨大沙达坂，它们从山下的沙漠带一直延伸到北面的山口。所以，当傍晚我们找到一个有草，还有可将就饮用的淡水的地方时，我非常高兴。那里离路边一个被称为牌路（Pailu）的地方不远，牌路题在柱子上，有一间小屋，柱子正是克里雅地区与若羌地区的界碑。

3个月前，我的老朋友潘大人已经接任了若羌隶属的阿克苏道台。夏天在和田的时候，我让蒋师爷用他的优雅毛笔字，给我这位博学的朋友修了一封书信，请他在他新上任管辖的地区为我们的探险活动提供官方帮助。由于相距太远，我还没得到回信。但是，现在界碑的出现预示好运的降临，好像潘大人从远处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啊！我已经到了潘大人所辖的地界上了，可以马上得到本地的帮助。在印度西北边省，我染上了疟疾，从那时起我就时而发烧，时而正常，弄得疲惫不堪。我等待着行李队伍赶上来，瓦石峡的地方官——伯克却不期而至，他是我们从车尔臣出发到现在为止所见到的第一个人。这里距离瓦石峡仍有10英里的路程，所以，

当可敬的当地伊斯兰教教徒凯派克（Kepek）戴着他的官帽，领着他的儿子，拎着一大葫芦牛奶出现在面前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本来正在担心没有民工和向导在瓦石峡进行考察，但他们的出现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后来，他们又在若羌盛情地招待了我，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二天一早，又前进了不到4英里，到达了早期定居地布满散乱碎片的中心地带。在路线南北两侧，红柳堆之间风化的土地，南北延伸了约1英里远，这是塔提的典型特征。在裸露的沙地上，散落着大量各种各样的陶器碎片，从半透明的棕色陶器到淡青色的精美光滑的陶器，数不胜数，美不胜收。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粗糙无光泽的杯子以及青铜色小物体，比如：扣子、箭头，各种黏合而成的珠子以及石珠。我在遗址捡到的铸币以及从瓦石峡村村民手里收集的铸币都属于唐宋年代。从此可以判断，在13世纪或元朝时期，中国就占领了这里。

由于红柳堆的庇护，6间房屋保存得较好，它们的砖墙从4尺到7尺高度不等。每间房屋包括一间或两间小屋，我们对它们进行了认真地清理，但没有发现任何遗物。一个小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它是由烧得很硬的砖建成，而其材料在塔克拉玛干南方的各地方都找不到。在另一个遗址是土坯砌成，这种土坯在每一处遗址都能见到，尺寸相同，皆为15英寸×8英寸×4英寸，但它的土坯横竖交替码放，我后来在甘肃时看到了新旧房都用这种泥瓦工艺。

经我观察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大致印象：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比其对和田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上面这个结论已经被霍普森（Mr.R，L.Hobson）的分析所证明，他指出这种光滑的陶片中的有些属于宋朝时期湖南窀州（Ho-nan Chunchow）作坊的碗。但没人能证明中国对这里与日俱增的影响只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靠东、曾经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盛极一时的贸易路线，还是因为中世纪早期的一个中国定居点所造成的呢？

根据现在的高度，可以推断出这个村庄遗址被放弃的年代，它有10英尺或更高，有些遗址被沙丘覆盖，沙丘上面又长满了红柳，而另外一些遗址没有遮拦地受到风蚀，高度就降到了6~7英尺。在狭长的旧屋遗址地带和东面光秃秃的碎石萨伊，都有裂开的死杨树干和果树木。原有的肥沃土壤的最上面一层土已经全部被吹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原来的河道显得较高的原因。在绕过旧址边缘之后，这条河道向着东北偏北方向转去，恰与东面3.5英里处的实际河流在夏季洪水中的河床走向完全一致，那条河长满了茂密的胡杨林。最后，行进了2英里之后，我们到达了主河道旁的新瓦石峡，新栽的植物已经成长起来，但植物仍不繁盛。

这里有濒临倒塌的房子，也有崭新舒服的客栈，人们可以从这鲜明的对比中领略这个神奇的拓殖历史。多年来，在上级部门的批示下，中国地区管理部门一直致力于利用瓦石峡中可提供的水资源来创造一个小绿洲，从而方便和发展车尔臣与若羌之间的交通。显而易见，中国统治者早已明白了这条古老路线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毕竟官员们懂得其在地理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要真正实施起来可不是容易的任务。

从克里雅来的凯派克是这里的原始居民，30年前他首先来此地垦殖土地，他有3个儿子，和他们的父亲一起开垦土地，并使这里日益繁荣。一任又一任按办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新的定居者，如预供食物、种子或许下其他动听的诺言，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压力措施，但是一旦收成没有他们想得好，或者该偿还预供用品了，这些人就会溜走。整个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广阔绿洲农业正在蓬勃发展，各个绿洲为吸引劳动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此像瓦石峡这样一个边远的绿洲很难留住流浪的老乡。现在，来这里种田的共有20来户人家，也有了所谓的伯克，他最后还是缩小了他的发展计划。由于缺乏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伯克已经采取措施，建造一些房子。建好了客栈、粮仓和巴扎，凭着这些东西，伯克就可以向远在阿克苏和乌鲁木齐

(Urumchi) 的若羌按办报告其所谓的政绩。

不管伯克建造这些东西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我都对于瓦石峡方面给我们提供的住处和给养帮助深表感谢，其中最有用的莫过于动物用脚掌，我们把它缝在那可怜的动物蹄子上裸露出来的新鲜肉垫上，车尔臣河洪水过后，河道坚硬且多盐，骆驼疼得无法忍受。如果没有我经验十足的养驼工哈桑阿訇及其惊人的技术和勇力，我们无法给骆驼缝上脚掌。事实上，给每个受伤的骆驼再钉上合适的脚掌要花上个把小时，同时还要五六个人摁住那痛苦的"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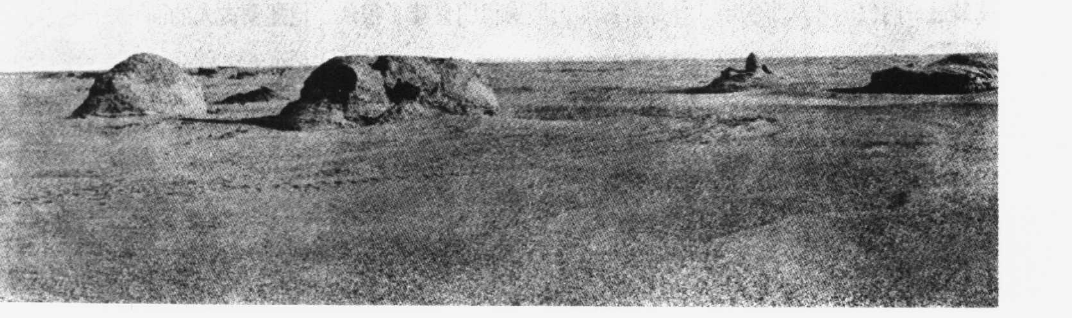
12月1日一大早，我就开始了前往若羌的最后两站的跋涉，大约还有50英里，全程几乎都是砾石斜坡，只在向北的方向上散落着一些少量的红柳苗和长刺的灌木丛。在塔特里克布拉克（Tatlik-bulak）河旁的狭长的植物带，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过夜。第二天，天空雾蒙蒙的，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远远地看到了若羌绿洲的树木。离开车尔臣以后，今天我们遇到的第一批旅行者，他们是两个商人，穿着厚厚的皮衣，赶着50头毛驴，驮着羊毛去和田。当夕阳渐落时，若羌的伯克们到一个最边缘的耕地块来接我。他们对我如此的重视，毫无疑问是与潘大人在地方衙门里的关照有关。

在简单的达斯提汗上，我喝了一杯茶，精神倍增。接着，我又向前走了6英里，穿过了散落的贫瘠土地和其间的很多荒废的地块，到了已经漂上了冰块儿的宽河道。对面新建的市场在黑暗中显得很大。很快，我到了富裕的吐尔逊巴依家，他家的房间很宽敞也很舒服。我的主人是那些罗布人（Loplik）中的一个，他们多多少少都算是流浪的打鱼者，已经与世隔绝地在罗布地区的湖泊、沼泽边生活了几个世纪了，就最近一两代内才从事农耕。他那舒服的土坯房很明显建了很久，他那蒙古人的面庞让我真切地感到我是真的到了罗布，就是马可·波罗说的"罗布沙漠边缘的城镇"了。

这就是热切渴望在冬季探险的沙漠了！在我的初步计划中，我就把目光放在了罗布泊北部的遗址，赫定是1900年在那次值得怀念的旅行中发现的那些遗址。在勘察过他们的遗物以及这个地区我们能够考古的遗址之后，我计划继续沿着已经被遗弃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马可·波罗曾走过的路线前进，向着沙漠东北方向的沙洲（Sha-chou）或敦煌去。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搜集到的有关这条路线的信息异常之少，如果想要避免严重的危险及重大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制定出一个完备周全的关于运输及供给的计划，这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者曾经说过：在穿越沙漠以前，人和牲畜需在镇上休息一周，积聚体力，给人和牲畜带上一个月给养，一离开这里，就深入沙漠了。

我这次不仅仅要穿越沙漠，还要进行许多在基本未知的土地上进行探险，这意味着待在沙漠里的时间会更长，携带更多的民工。前途的情况越不明朗，节省时间对我来说就越重要，我很清楚地知道，只有天气足够寒冷，冰不会化，我才能保证在无水的沙漠中进行工作。为了排除在资源奇缺的沙漠中各种延迟的可能性和预防突发事件，我们必须准备好充足的运输工具和给养。

⑩⑧米兰遗址西废弃佛塔和寺庙群





⑩9若羌地方长官廖大老爷

所以，在若羌的短暂停留期间，我必须处理好各种事情。在3天之内，我必须组成一队有50人的民工发掘队，至少准备足够他们吃5周的食品，而我自己的队员则至少待上一个多月，并且要收集足够多的健壮骆驼，以供运输之用。因为我们要带很多水，更贴切地说是冰，以提供在穿越罗布泊北部的无水区时7天行程之需，以及在遗址期间和返回途中之用。穷尽了当地的所有资源，我才收集到21头骆驼，其中还包括在车尔臣雇的6头骆驼和我自己的骆驼，问题看来更加严重。若没有阿不旦（Abdal）那个渔夫的茅屋，情况会更糟糕，塔里木河的水在那里全部流进沼泽，是个很好的中转站，我可以把一些去敦煌路上暂时不用的全部行李和矮种马存在那里。

虽然本地只有四五百户人家，地方官廖大老爷很乐于助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

早晨，我去了由地方巴依的房子改成的简朴的衙门。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不仅是出于他对潘大人的尊重，也是出于他对我的关心。廖大老爷大约35岁，体形较瘦，是一位行为举止温文尔雅的典型的中国官员。与其说是做官，还不如说是流放，这里也没有什么油水，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肥得流油。所以，招待也很简单，除了一个中国记录员和几个陪我的巴依，还有两个维吾尔族村民，他们穿着刽子手穿的红色长袍，成了宴会上的主角。

按办大人的房间温暖且收拾得很整齐，我坐在他的左边，是为尊位。他举止极为优雅，说话沉稳，却充满了权威感，没有多久，他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样的场合，蒋师爷的话就多了起来，他对新疆的每一个中国权贵了如指掌，从蒋师爷这儿，我了解到廖大人是我1901年曾见到过的莎车按办刘琦（Liu-chi）的内（表?）弟。刘琦那机智、优雅、和蔼可亲的长辈风范让我印象深刻，虽然大家广为流传他使用各种所为人不齿的手段搜刮民财。莫非著名的刘锦堂（Liu chin-t'ang）就是他的叔叔？那刘锦堂可是声名显赫，在阿古柏死后，也即1877年，他收复新疆。为了纪念刘锦堂的贡献，中国为他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庙宇，我第一次去喀什噶尔时，就曾拜谒了这座庙宇。

作为刘锦堂将军的后代，他们在朝廷中享有显赫的特权。所以，在我上一次来新疆时，听说刘锦堂大大小小的亲戚们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或者很有油水的职位，我也就不感到吃惊了。在新疆事务中，刘锦堂的家族大权独揽，再加上与左宗棠（Tso Tsung-t'ang）的关系以及刘锦堂的湖南老乡，虽然说新疆要改革，但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蒋师爷娓娓动听地给我讲着衙门里的逸闻趣事，让我忘记了路途的疲劳，有关刘锦堂家族的情况我深信不疑。

然而，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琦大人栽了个大跟头。被夺去了管理权之后，他现在离职住在乌鲁木齐，为回遥远的湖南老家做准备，他希望能在老家隐居

起来，做些学问。由于他兄弟的失宠，廖大老爷于是也前途未卜。廖大老爷原来任二墩县（E-tun-hsien，未能够查找到对应的名称，权作音译——译者）的按办，那是个较为现代化的地区，但乌鲁木齐和喀什噶尔的几道调令下来，他便被派到贫瘠的罗布泊地区，实质上无异于一次流放。朝廷和新疆行省拨的钱刚刚够给这个不幸的地方官提供温饱之需以及维持一个最基本的行政职员。这个贫困的地区需要官方的资助，他连给他那蜗居做任何装修的钱都没有，何况官员修修自己的寓所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一个像廖大人这样很有修养和博学的头脑的人，却埋没在凄凉的罗布泊荒原，实在是让我同情不已。

蒋师爷把上面的逸闻趣事也讲给了廖大人听，廖大人以后多次回访我，我则拿一些有关旅行的中国古书、照片、地图和古物给他看，并鼓励他，他显得非常高兴。廖大人很有才华，他知道如何发号施令，令行禁止。若羌绿洲非常之小，据估计总人口也就300户人家，实际也许还不到这个数字，因此，想要找到50个去沙漠中参加发掘工作的民工绝非易事。如果没有按办颁布严厉命令，这项任务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管是从克里雅，以及北部绿洲过来的拓殖者的后裔，还是罗布人的后代，听说要在严冬离开家，去东北无人知晓的无水沙漠，前途未卜，他们都被吓坏了。当然，我心里明白将要面临多大的凶险和困难，如果我们不能很快找到遗址，那将会面临缺水的危机，如若阿特米什布拉克（Altmish-bulak）的咸水泉还没有冻冰，那么会更加危险。所以，我是心急火燎，既要保证所雇佣的民工身体健壮无比，还要保证他们带好足够的冬装以及充足的给养。

征集到符合这样要求的民工无疑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仅他们自己充满忧虑，他们的亲属也哭天喊地，好像他们是要去死一样，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或装病或用其他狡猾的手段溜走。我一直期望能像在和田或尼雅那样，能得到当地向导的示

范性鼓励，第二天，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两个强壮的猎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就是老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Tokhta Akhun）！在1900—1901年，他们俩曾经参与赫定在罗布泊周围地区的探险活动。在瓦石峡时，我就让人去他们家里，邀请他们参与我的探险活动。幸亏按办的信使在阿不旦找到了他们，接到信后，他们骑马日夜兼程，走了60英里，现在终于兴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们都没有从阿不旦直接去过沙漠中的遗址，所以一过沼泽地之后，他们就发挥不了向导的作用了。但是，他们明白即将要走的沙漠是一种什么样的地面状况，而且由于他们当过猎手，所以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对要在沙漠中过冬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们的出现恰到好处，表现得又很沉稳，这给忐忑不安的若羌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老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的乐观，丰厚的报酬，以及按办许诺免除劳役，最终，我选定的民工拿出了作为男人的勇气，看上去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了。

老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在我身边，我也就放心了。他们有着持久的耐力以及自立能力，这正是在沙漠中旅行所需要的，参与赫定的探险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他们俩都很了不起，虽然比较粗鲁，但却棱角分明。老穆拉赫今年已经是奔60的人了，瘦而健壮，脸上布满了皱纹，是典型的蒙古人类型，声音尖而刺耳，就像老妇人心情不好，要发脾气。他还清晰地记着当年发生过的往事，那时，他和罗布人同伴们在塔里木河以及它的源头靠打鱼维持生计；若羌刚刚开始垦殖时，只能间歇地种燕麦和大麦；夯土和土坯砌筑的房屋还没有出现。他总是想追逐野骆驼，他对它们在南部山麓荒凉的栖息地非常了解，并经常去那里打猎。靠在若羌卖野骆驼肉，他发了财。他对东北部沿喀拉哈顺（Karakshun）边缘的沙漠也比较熟悉，喀拉哈顺是罗布里克人对东北部广阔的沼泽地和咸水湖（靠日益干涸的塔里木河供水），我们像中国人一样，习惯称它的蒙古语名字——罗布泊。25年前，当中国政府努力地重新开通这段被遗忘的从阿不旦到敦煌的商旅古路时，就是这位老穆拉赫和一位已经

故去的罗布人一起，引领一队勇敢的中国官员通过了沙漠，并且成功地发现了沙漠之路。

托合提阿訇，从阿不旦来的另一个帕万（Pawan），情况则和毛拉不同。他是吃苦耐劳的罗布里克人后代，但已改变了祖先的生活方式，适应了这个地区新的生存状况。他比较年轻，约摸35岁，身材魁梧结实，脸庞宽阔，颧骨凸出，头发稀少，体现了塔里木独立的渔业游牧的纯种蒙古人的体格特点，这种人种在帕米尔的克尔克孜人中也存在。他说罗布里克地方话，元音发得较重，话语生硬。所以，即使是跟我从莎车和和田来的讲维吾尔语的老乡，也经常很难听懂他说的话。

但托合提阿訇的见识可不像传统的罗布人那样，仅仅局限于河边和沙漠。他曾冒险沿着北面的新定居点，到过焉耆，也曾追随赫定到过南边的西藏高原，以及其曼塔格（Chimen-tagh）蒙古草原。他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装置以及工具非常感兴趣，而且比我那一本正经的老仆人更善于扎我的帐篷或者行军床，因为那老家伙对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但是，他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一来到，他就给了我一个碎片，两面写着早期的藏语。其实，在我去勘测米兰古堡以前，他就发现了这个碎片，米兰古堡在俄罗斯绘制的地图上位于离若羌到阿不旦的其中一条路线附近。这个发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托合提阿訇详细的描述，那些古戍堡附近肯定有古代寺庙的遗址，为此，我想修订我的计划，决定顺路去米兰做尝试性发掘。

在若羌，我成日成夜地做着准备工作，但仍然在想近在咫尺的文物。大量的因素使我相信，若羌绿洲在过去的罗布泊地区像如今一样占有主要地位。若羌绿洲之所以存在，这归功于那条从车尔臣东部的昆仑山脉流下来的最大支流，那条河流向罗布泊洼地，它为若羌所提供的灌溉水量要远大于从塔里木河末端那低而松软的河床中得到的水量。大量的地理学事实使人相信，当年在去莎车和中国内地途中，马

可·波罗所写的罗布——“沙漠边缘有一重镇，行人在深入沙漠以前在此休息”。马可·波罗笔下的“罗布”肯定就是现在的若羌。

而且，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把别处作为“古纳缚波（Na-fo-lo）王国，即‘楼兰’”的首府。玄奘从且末（Chu-mo）即现在的车尔臣出发，向东北走了约10站之后，到达的就是这个地方，也是这位佛教圣僧回到中国内地之前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我不可能一一陈述《汉书》上记录的以及玄奘描述的历史事件，来证明交替使用的名字“楼兰”或“鄯善”（Shan-shan）从汉代直到唐朝都是适用于整个罗布泊地区以及其邻近的广大沙漠地区和河流沿岸的丛林地带，还有可能散布其中的小绿洲。然而，我所叙述有关的地形学现象都被《汉书》等书有所记载，当中的记载都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若羌是“楼兰”或“鄯善”的人类主要聚居区。

所以，对于我而言，能够发现那些一直未被注意的古代定居迹象在若羌现在的中心耕作区，即使只在表面，也会令我心满意足。在我住处东面非常近的地方，有一组椭圆形围堡建筑的废墙，很多人都知道有它，称其为斯皮尔（Sipil）。尽管为了方便耕种，有的土墙已经被拆掉，有的则腐蚀现象严重，仍可以辨别出城墙的遗迹，墙从南到北也就半英里多一点，高从12~20英尺不等，宽度约1/3英里。内部布满了田地与房舍，经过快速的勘测之后，还发现了4处有很多大块砖建成的古代建筑，有的还被现代定居者所利用。其中一家房屋有个12英尺宽的圆顶，我可以认出是小佛塔的遗址，当然，它很久以前就被寻宝者挖过了。

在西北约1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叫作“吐拉”（Tora，即“塔”）的古代遗址堆，蔚为壮丽，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离河岸不到300码的地方，伫立着一座陡峭的巨大土堆，高出灌溉地面50英尺多。斜坡上有大量的大石头，和一层厚厚的垃圾，说明它是人造的。顶部的土坯式结构损坏也较为严重，现存的顶部直径约16英尺，北面的高度达12英尺。基座的直径更大，可能是长方形或椭圆形。毫无疑问，这是

一个佛教时期的土坯结构佛塔遗址。遗址基座如此之大，不太可能是由单一结构建成。基座上盖了一层层垃圾，挖开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史前时期曾有人在此地居住。石头和古代的垃圾掺杂在一起，现在这里的人们把这些垃圾挖了出来，用来做肥料，这大概就是其他遗址消失的原因。

有证据表明，这些石料都是从远方运来的。在唐代时，中国人在罗布泊以南3站地建立一哨所，哨所就在从罗布泊到车尔臣的路线之上（恰和现在若羌的位置相照应），称为“石镇城”（the Stone Town)。有没有可能：若羌就是“石镇城”呢？《唐书》上记载：从汉朝开始，具体说至少从公元前77年开始，“石镇城”所在的地方就是楼兰或者说鄯善的首府，因为其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而一直被中国政府所重视。若羌具有战略性的地位：最著名的柴达木（Tsaidam）到西藏的路线与到和田、焉耆和敦煌的路线在这里交会，也难怪中国政府近些年在这里又建了小哨所。哨所大约于10年前用黏土建成，小巧却很整洁，但现在都空了，主要由于若羌人解散了那里的守军，因为100来人的守备队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笔额外的财政开销。但是数年之后，一支东干（Tungan，即今回族——译者）叛军的出现很好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先见之明，那支叛军从西宁逃窜到柴达木，现在仍骚扰着若羌南部山中的蒙古牧民。

尽管工作令人疲倦，但我在若羌的3天还是令人兴奋的。没有风，阳光灿烂，大多时间我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山的南面。我招集和购买够了眼下沙漠探险所需的人员和给养，我还从一个过路商人那里得到有关穿过沙漠到敦煌的路线的信息，而且他给我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给养、草料，甚至散碎的银子，希望我们能到他所在的那个新定居点。由于把阿不旦作为大本营，我就可以不必完全依靠若羌了，只要罗布泊那边的条件允许，我们就向东出发。

到12月6日的时候，万事俱备，只待出发。就连骆驼的冬衣也接近完成，我

们从若羌人手中买了大量的毛毡毯子来缝的，因为他们山上有特别多的羊，所在地价格也就比较低，只有测量员拉姆·辛格的缺席才让我感到一丝不安，自从车尔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晚上，廖大老爷向我告别，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古代的事情以及我们俩都认识的远方朋友。这些天，一直听蒋师爷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我耳濡目染，能够比较流畅地说汉语，于是，我用我这上不了台面的汉语最后一次向廖大老爷表示衷心的感谢。夜里，队员们在外面的空地上，开了个露天的巴扎，若羌一半的商人和游民都来了，这时，拉依·拉姆·辛格也到了。

从普鲁附近开始在印度测量局以前工作的基础上，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从昆仑山脚，一直到瓦石峡西南的一个山峰，独立完成了测量工作。天寒冷了下来，也许可以以冰的形式来运水，我兴奋不已，可这苦了我们的测量员，他的老毛病风湿病又犯了，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不管怎样，他都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所幸，我们要去米兰进行考古，可以让他留下来，休息几天。

第三十章

向罗布沙漠进军

1906年12月6日早晨，我离开了若羌。在黎明前很久，我就起来了，我足足花了4个小时才把队员们叫醒，看样子在很长时间内是不会再见到这样的场面了。开始2英里是精耕细作的农田，然后到了一块比较窄的适于耕种的地块，即“塔特让”(Tatran)，听说这里每隔两年耕种一次。低矮的红柳苗肆无忌惮地蚕食着这些土地，因为这里既缺乏水源又缺乏人力。旁边有一条结了冰的浅河，把田地分成两个区，回头一看，我发现我的50个民工列队整齐。每两个人跟一头毛驴，毛驴背上驮着面粉和民工们冬季穿的厚重的毛皮大衣，以及最简单家什。我们还带了够毛驴吃一周的燕麦，而且我还特别在意，带了几个工匠，如两个木匠、一个铁匠和一个毛皮匠，他们带全了工具。所有人看上去都像个民工的样子，准备好面对未来的任何艰难险阻。

当我仔细察看我的全体队员时，大多数人那种典型的蒙古人外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工的家属和伯克们一直送我们到碎石萨依上的最后一块地，在这里互相道别，他们大声叫着“尧勒保勒送”(Yol bolsun，即“一路顺风”——译者)，在今天，又听到这句维吾尔语，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将近20英里的跋涉

中，我们一直在单调无味的荒凉斜坡上向东前进。在我们左边的地平线长着低矮的红柳丛，时不时看到活的或死的胡杨，因为从山上会偶尔流下来少量的雨水，带来了一丝潮气。在一整天之内，南边的荒芜的山脉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陡坡上长着参差不齐的荆棘丛，据说野骆驼在那里栖息。

我们在羊达什喀克（Yandash-kak）过夜，高大的沙丘之间长满了死的红柳，我们找到了两口深6英尺的井，水量充沛，且味道尚佳。第二天一整天，我们一直行军，沿途上没有任何特殊的景观，穿过了27英里裸露的山麓地带，到达了加罕萨依（Jahan Sai）的边沿。穿过加罕萨依几近干燥的宽河床，天渐渐黑了，我们就在灌木丛中最高的一个红柳包上点燃了烽火，这条多沙丛林一直向东延伸，以引导那些远远落在后面的民工。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骑着马先去探路，直到找到了一条小河和几块耕地，接着来到一个浅浅的溪流，旁边生长着茂盛的胡杨林。

那就是米兰河，加罕萨依的一个支流，一两代阿不旦人民利用这条河的河水，建立了一个叫“米兰塔里木”（Miran Tarim）的小聚居地。在这个地区有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他们一边开垦土地种小麦，一边又不放弃在河边打鱼的生活。直到深夜，驮行李的骆驼队才到达。虽然时间已晚，但我们终归有东西吃。我们有充足的木柴与水，当我坐在一堆燃得最旺的篝火边烤火的时候，红红的火焰照亮了周围的小树林，这好像意味着我即将进行的考古工作一片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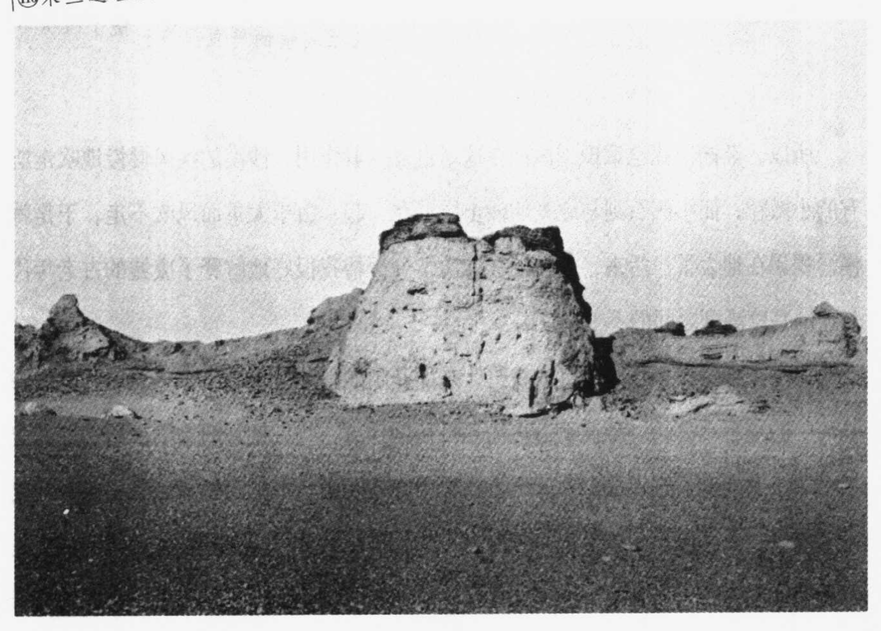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12月8日，我与一群民工离开了溪旁的营地，越过了上面的薄冰，在托合提阿訇的引领下，奔往他说的在东边不远处的遗址。头半英里是一块块田地，有的长着红柳，有的每两三年轮回中耕种一次。然后，我们沿着灌木覆盖的草原，途经一个用木柴和芦苇建成的简陋的茅屋。10年前，为了拦截从西宁逃往柴达木的东干叛乱分子可能从山区去若羌，中国军队曾在此掩蔽。很快，我们就又出现在平坦的赤裸裸的碎石废地之上，狭窄的低矮山脊绵延起伏。山脊走向一致，基

M. Aurel Stein

本是南北走向，再加上奇怪的外形，好像暗示曾有河水流经这里。

在第一座山脊附近，有商旅队向东走的痕迹，即到敦煌和阿尔金山（Altin-tagh）的路线，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完全被毁掉的旧址，系坚固的砖建成，现存的高度大约15英尺。寻宝人从一侧挖进的一条坑道，毫无疑问地表明它过去曾是佛塔。佛塔基座下面风蚀台地的高度和周围的地面的高度差别很大，达7~8英尺，足见佛塔的历史是何等的悠久。开始，我有个疑问，台地上是沙砾的，这是不易被风化的，后来，当我踩在废地上时，我发现他的地面表面上看上去是沙砾，但沙砾实际上就是一薄层小圆石，下面是细沙，走在上面，我们的脚印陷入地面很深，很容易穿透表层，踏入细沙中，这在真正的沙砾地面上是不会发生的，于是，上面提到的疑团也解开了。

⑪⓪米兰遗址废弃哨所的南侧面和中心的棱堡





⑪芦苇屋前的罗布渔民，摄于阿不旦

所以，渐渐地我也意识到风蚀在这里也发生着作用，沙漠的疾风慢慢地吹走所有的小微粒，而小圆石则与原先的沙土层混在一起，由于太重而风吹不走，于是就慢慢积累在地表了。后来，上述的准地质学分析帮我很好地解释了废墟的古老年代与遗址基座高度之间的不平衡。

佛塔顶部给我提供了极好的视野，东面开阔的平地之上冒出很多遗址，就像内陆河中的很多小岛屿。从这里过去约800码的地方，我们见到的是第一组遗址，包括4座小的废弃建筑，最左边的那个一看便知是个腐朽不堪的佛塔，中间偏右的也是个佛塔，个体偏小，但保存得相对好一些，显而易见，它周围破落的墙壁曾经是个城墙式的建筑。另外两个遗址是方形建筑，为特别坚硬的土坯建成，上面覆盖着

太多的碎片，可能还没有被人发掘过。

迅速地勘测之后，我迅速赶往1英里外与托合提阿訇会合，据说那里有本地遗址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古堡。从远处看，在平坦的地面之上，古堡显得非常高大。然而，我靠近它后，迫不及待地沿损坏严重的西面墙走时，我不禁大失所望。墙壁已经破碎不堪，棱堡也很大，但建筑的质量非常之差，说明他建设的时间相对较晚。

整个古堡是个不规则四边形，外侧东面和西北的墙长约250英尺，而南面和西面的城墙就稍短一些。几个角落有巨大的椭圆形塔突出来，而其间的掩体由靠近中心的防御棱堡保护。南面的塔尤其高大，离墙线约9英尺，现在仍高达43英尺，它应该是城堡的主楼。像整个城堡的结构一样，这个建筑的墙也不规则。相对低矮的部分是由踩实的黏土构成的，而上面则为砖石结构，土坯很粗糙，与上一处遗址相比，这里的土坯较小，土坯之间每隔1.5~2英尺是红柳枝层。墙的顶部看上去厚度有11~12英尺，胸墙部分厚厚的红柳枝层和土坯层紧密相间。

这个荒废的要塞建造地的确比较够简陋，里面的结构都被暴露在外。在城堡壁垒里面和接近东墙的地方，在凝固在一起的废弃物之下，风蚀形成了一个10英尺的洼地，可见其历史有多长。东墙向外倾斜，墙后有一层砾石和沙子，显然是本地盛行的东北风吹来的，并对城墙起到了保护作用。在这里以及不远的东北角，几根木柱露出砾石地面约1英尺左右，在托合提阿訇去年春天来这里时，那些木柱曾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时，在发掘的时候，好像才挖了一锹，他就挖到了成捆的红柳枝，那可能是屋顶，发现了一页写有藏文的纸，也就是他在若羌给我的那张。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地方来进行我渴望的实验性发掘工作了，于是我马上让民工们沿东墙排成一线，立即发掘。对于第一个发现的人，我许诺要给点奖赏，因此这50个坎土曼干得分外卖力，不大一会儿，一排小房子就从砾石与沙子之下露出头来。它们都是

用砖砌成的，几根粗的胡杨树干支撑着由红柳枝与土混合成的屋顶。尽管它们的排列基本与古堡的城墙平行，但这些小房间布置得却是极其不规则的。最大的一间约为16英尺×11英尺，而小房子的宽度却不足5英尺。

别瞧房间小，半截还埋在地下，但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垃圾。从一开始发掘，很多写有藏文的纸和木片就大量出现了。前人留下的各种各样的垃圾被挖了出来，一直挖到底，纸和木片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眼前，有的完整，有的为碎片。纸张的大小和质地变化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写在椭圆形叶子上，一行一行地很整齐，很明显是婆提文书片断，内容涉及宗教内容，但大多数是写在薄薄的纸张上，让我想起了在丹丹乌里克和哈达里克的发现，但后者是非宗教的。

更多的木简被发掘了出来，大多形状狭窄，长度大约8英寸，两面都刻有字，不断发现左下角有一封泥洞孔，显然也是非宗教的。木简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甚至连做标记的时间都没有。第一天工作结束，我们总共出土的木简超过了200件，同时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大量的布料、武器等，例如：很多件奇异的盔甲，用厚皮毛制成，涂有黑漆和红漆，很有品位；丝绸刺绣；刻有藏文的角质图章；做工精细的骨制骰子。这一切说明这里的遗址蕴藏着极大的考古价值，当然其蕴藏的垃圾也是大量的，有历史证据表明这是吐蕃统治最后时期埋下的，即公元8世纪或9世纪。

第一天的发掘就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我在帐篷中花了大半夜时间才整理、清洗、分类、查看完，若不充分地发掘一下这个考古的宝库，实在太可惜了。所以，第二天一早，我让奈克·拉姆·辛格和蒋师爷负责在这里继续发掘，我则去向东北方约1.25英里的一个遗址，托合提阿訇说那里有雕刻的遗迹。出发不久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现在停下来，彻底地考察完米兰遗址，则必然要冒着将对罗布泊沙漠北部的各大遗址的考察无限期推迟的危险。东北方的这个遗址是个庙宇，其中心部分是坚

实的砖瓦结构，面积很大，约46英尺长，30英尺宽。边上的残骸上有粉刷得很好的浮雕遗迹，被设置在建筑装饰之间，设计得相当好。在仅有的几名民工清理东段地基的一小部分时，发现了大型灰泥雕塑的碎片，其中包括模刻得很好的大头佛像，与热瓦克佛塔里的浮雕的风格很相似，即为希腊风格佛教艺术。

现在，我更是认为这个庙宇的年代比前面那个西藏的古堡要久远得多，大量的观察表明，它可能是像安迪尔一样，远古的遗址后来又被重新占领。对于这个庙和其他年代更为久远遗址的仔细发掘需要很多的民工和大量的时间，在向北之前，我不可能腾出这么多人与时间，于是，我决定回头再来这里，不管发生什么都一定要来。阿不旦就在附近，我拟议中的大本营就是阿不旦，我可以相应地调整一行计划，然后开始去敦煌的沙漠之旅。

所以，在进一步快速搜寻整个遗址之后，我沿原路回到了古堡。在那里，我把昨天和今天挖出来的东西小心地埋入原地，以防在我回来之前，有寻宝人来拜访这个遗址，把这些古代贫困潦倒的士兵留下的遗物给挖走。还没等掩埋完，天都快黑了，我步行回营地，天气寒冷，我仍兴奋不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高兴，难道是在看似没有多大价值的遗址，意外地发掘出那么多古物，而我却又把古物埋在了原地?

然而，我不能高兴得过了头，在回营之前还要克服种种困难。到达营地之后，我发现拉依·拉姆·辛格已经按我的计划重新入队，但风湿症还没有好，仍躺在床上。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在进入罗布沙漠之后的探险中，我迫切需要他的帮助。到达最后一个有马可饮用的水的地方之后，我们将不得不步行，显然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需要骑一头骆驼，但那就意味着携带的冰的数量要减少，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沙漠中探险的安全系数就会有所降低。

探险队队员总共15个人，包括赶驼人和罗布猎手，在对必需的食物、行李及

所需冰量的重量进行认真地计算之后，我得出除了我们15个人之外，另外最多可以再加上35个民工。这样，我们就不会因水源（即“冰块”）不足，而被迫提前返程。所以，12月10日早晨，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挑选出15个人，与他们结清账务，我允许他们探险期间可以回家。当然了，我们自然也把前两天工作中最没效率的民工挑了出来。可是，那些留下来参加探险的人却满脸愁容，好像会发生什么灾难，但说实在话，他们谁也没有装病，以后也没有。当他们知道我买下了被解散的民工面粉，以贮备给他们自己用时，也许他们的疑惧就减轻了。

之后，我们就沿着米兰河向北走。大约走了10英里，丛林渐渐变得稀疏，从山上日益干涸的河流中注入湖中的河水已经结了冰。然后，是一片盐碱草地，偶尔有一棵红柳来缓解这无穷的单调。再往前又走了9英里，到达阿不旦。阿不旦是个破旧的小渔村，都是些小茅草屋，是罗布里克人保持传统的生活习惯最典型的渔村。离那里还很远的地方，有两个伯克穿着中国官服，来迎接我们，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库木恰普坎（Kum-chapkan）是离这不远的另外一个村庄，沿河而下走不多远就到，其中的一个伯克吹嘘这个村庄有多好。有了在瓦石峡的经历，我已经习惯了中国官员对垦殖土地的热情，就像波特金（Potemkin）小说中的转变。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善良的罗布人都很乐意地展示他们在渔业及牧业上所取得的成果。

为了能保证第二天按时出发，我已经让穆拉赫负责，打造渡船，并让骆驼队在黎明前离开米兰。所以，一到阿不旦，我就很满意地看到有5个独木舟被很巧妙地绑在了一起，一群经验丰富的罗布人划着桨，已经把一部分行李和给养成功地运过了塔里木河。在这里，河床深而顺畅，约50码宽，平均流量不到6英尺/秒。这条河真正吸引人的不是它的外貌，而是它的源头，雪水从昆仑山脉、帕米尔和天山流下，经过我眼前这条狭窄的河流，流进新疆干燥的盆地。

在右岸，我用毡子搭了个帐篷，把易燃的芦苇小屋腾出，阿克奥依（Ak-oi）

作为仓库，用来装可以留下的行李，由我最信赖、最老实的提拉巴依（Tila Bai）照管。他知道除了在和田发现的珍贵古物以外，我为去敦煌预留的散碎银子也都留在了这里。他还要关照一下马匹，因为我们骑马走过第一段无水的路程之后，马匹将被带回来。

把我忠心耿耿的助手蒋师爷留在阿不旦更是件棘手的事情。我知道他非常想与我一起去大戈壁，但他那双脚连走短程的平路都受不了，更别提漫长而艰苦的大沙丘与风蚀的地面。给他留出一头骆驼又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像他请求的那样，让他那瘦小的身躯坐在驮行李的骆驼背上，那么就得再加上他和仆人用的冰及其他给养，这也不现实。况且，在我已制定的明年春天和夏季去完成中国化的土地考察计划，蒋师爷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怎能让他受沙漠之苦呢？于是，尽管他不情愿，但最后仍留了下来，住在伯克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芦苇屋里，并帮我邮寄信件，与我们的共同朋友，即若羌的按办，保持联系。

把多余的行李和给养分出来，并放好，我一直忙到深夜。直到12月11日早上，我才把队员都叫起来，庞大的探险队开始了沙漠之旅。现在，弯弯曲曲的塔里木河还没有结冰。沿着塔里木河，走了5.5英里，到了阿克库勒（Ak-kol），就在这里，远处库木恰普坎村的芦苇房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根据以前他们打猎的经验，毛拉和托合提阿訇说向东北约3站地的路程，有一淡水潟湖现在应该已经结冰，那个湖是最北边的英苏（Yangi-su，意即新开的河）河形成的。

我知道那片湖泊和沼泽地总称为库木库顺（Kum-koshun），离库木恰普坎下面三角洲的源头还有很长的路程，而且因水中的盐分更大，结冰会更晚。尽管前几天夜里最低温度已到霜点18度，但白天还是感到比离开安迪尔之后的任意一天都暖和，毫无疑问这是海拔降低和没有风的结果。接着，来到一片单调的草原，草原上长满芦苇，偶尔有些红柳丛，向东北走了约8英里后，我们走出草原，黄昏时分到

达了一个叫阿拉木霍加库勒（Alam-khoja-kol）的咸水湖岸边，发现沼泽地的河床上冰已经结得很结实，我感到如释重负。所有人都被派去切冰，在一大堆篝火的照耀下，大家一直忙到了午夜，把特地从若羌带来的粗毛毡口袋装满了冰。

第二天一早，我5点钟就把民工们叫醒，但到了9点后，全队才整装待发。11头骆驼驮冰袋，每头驮3袋冰，但冰袋太重了，所以，所有的袋子都要拆开，平均冰袋、给养和行李的重量。令我高兴的是，腾出的重量不是放在了呻吟的骆驼的脊背上，而是由有效率的驮架（Shotas）来完成。根据新疆人的实践经验，驮架通常由放在顶部的两个短梯组成，行李放上以后，可以自如地取下。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6个人便可以完成。但现在每个可以利用的骆驼驮了400多磅的东西，因此6个人也不能算多。而小袋的冰则由另外的30来头毛驴来驮。我的想法是在走过最后一块有饮用的水或冰之后，让毛驴再继续前进两天，然后把冰卸在那里，并作为中转站。当然，那些毛驴也需要喝水，但渴了两天、卸下重物之后，它们会很快地沿着我们来的路回去。

我们在冰上凿了一个洞，从洞口打出水来，在哈桑阿訇的照看之下，每头骆驼痛痛快快地喝了6~7大桶水，它们可以好几周不用再喝水。一旦离开最后一个咸水湖和咸水池塘，就再也没有任何草料提供给它们了，一直持续到赫定曾到过的遗址正北的阿特米什布拉克咸水泉，才能再见到芦苇地。哈桑阿訇也没忘记带上一些浸满了油菜籽油的麸皮，为了在路上不时地能给每一头骆驼1磅左右的麸皮吃，虽然味很难闻，但对严重缺食的骆驼来说无异于是种奢侈品。这种麸皮就是所谓的“骆驼茶”，赶驼工说在寒冷的冬天，漫长的旅程中，若没有草料，骆驼就拿这种东西充饥。从若羌出发，哈桑阿訇他就充满了勇气。他爱和人吵架，说话尖刻，不能期望他会做出太大的贡献。然而，我这次派他照管“沙漠之舟”，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并证明他一直炫耀不停的，在我们的塔克拉玛干探险中所

获得的经验。不管怎样，凭直觉，我觉得正是哈桑阿訇的存在才使这次沙漠探险具有了吸引力。

12月12日，征程漫漫，但却无事发生。我们沿着粗糙的路面而行，显然是罗布里克打鱼人经常走的结果。这条路向东北延伸，路上不是荒凉的盐碱草地，上面长有少量的红柳树，且大都死掉了，要不就是沿着浅浅的洼地边缘而行，开阔的水面还没有结冰，洼地边长着大量芦苇。夜幕渐近，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叫亚格孜马克库勒（Yaghizmak-kol）的咸水湖边扎营，湖水已经完全干涸。我想在探险开始的头几天，趁着骆驼还精力充沛，尽量走更远的路程，越远越好。于是，第二天早上4点钟，我就起床了。但由于缺水，矮种马要被赶回去，尽管骑马来到这里的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愿意赤着脚趟水过去。结果呢，他们摆出各种理由，想继续骑马，启程的时间被迫推迟。

为了进一步减轻行李重量，我决定再走一小段路程，到了猎人们说的那个有冰的地方，把民工的部分给养留下来，并拨出两个队员，让他们留下来照看这些行李，作为前方探险的基地。当我宣布了人选之后，我那沉默寡言的莎车仆人穆罕默德·朱发现他没有被选中，他大失所望，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无理取闹，像个疯子。他的这种表演很精彩感人，但做得太过分，没有人理睬他。看到这种情形，就连我那个惧怕长途沙漠旅行的克什米尔厨师也大笑不止，不久，我这位可爱的老助手恢复了常态。

经过4英里跋涉之后，我们接近了一片开阔水域的最北端，那是柴奴特库勒(Chainut-kol）的一部分。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说，这个湖是塔里木河的支流英苏给水的最北端的湖泊。在高高的芦苇丛中，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找到了藏在芦苇丛中的小池塘，里面的水可供动物饮用，表面结了层薄冰。然后，多余的给养很快卸了下来，由艾则孜和喀斯木阿訇（Kasim akhun）照管，前者是拉达克人，后者一

直为测量员看管马匹。我还吩咐他们两个，一旦毛驴回来，就立即把它们赶回到半路上的中转站。我高兴地看着毛驴美美地喝着水，这样，它们就可以驮着水再往前走两站了。

来自库木恰普坎和阿不旦的渔民来附近的咸水湖打鱼时，他们大都在这里落脚。根据赫定的书及罗布泊的草图，我可以确定迄今我们走过的路线，与赫定在1900—1901年从塔里木三角洲，也即喀拉库顺（Kara-koshun）开始，穿过罗布沙漠去阿不旦所走的路线相同，不过方向相反。我知道要到达赫定第一个发现的那个遗址，我们必须向东北偏北的方向走，那样肯定会遇到赫定所走的路线。除了赫定的行走路线图和指南针，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引导我们前进，而且，也没有哪个罗布猎手曾经从南向北走，进而找到那些遗址。但经过一天的沙漠之旅，加上以前的经验，他们很快熟悉了周围的地理状况，我对此深信不疑。现在这个浅浅的大湖，就是赫定在1901年费尽周折才过去的那个湖，从那以后这个湖几乎快干涸了，只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咸水湖。赫定首次发现的遗址的位置几乎就在正北，所以我就可以根据指南针，一直向正北走，而不必绕弯，或者浪费时间。

跋涉了2英里多之后，到达了一个咸水湖的南端，这个咸水湖是英库勒（Yangi-kol，即新形成的湖）的一部分，英库勒是罗布渔夫对这里的专有称谓。尽管已经有3年没有再注入水，这里的鱼仍然很多，在附近的一个芦苇屋中，我们就看到很多堆起来、等着要晾干的鱼。据说，因为湖水的盐分越来越多，鱼正在迅速消失。有人打破刚结的冰层，徒手抓了很多快要死掉的或已僵硬的鱼。尽管味道很重，民工们终于算是改善了一次伙食。

咸水湖周围是大块大块潮湿的盐碱性土地，再往前走，地块的面积变小，证明了英库勒正在迅速萎缩。像猎人们所知的赤裸裸的库尔班库鲁库勒（Kurban-kullu-kol）大盆地，这里大多数洼地已经完全干涸，附近新生了芦苇和红柳，于

是，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在白天的行程中，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给我讲了不少东西，我得知现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已与赫定当初所见的景象不同了。赫定1900年到这里以后的3年里，英库勒盆地地区被从塔里木河的支流英苏河流出的水注满了。但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河水流到这里，这些咸水湖不断萎缩，水中的盐分也相应地显得越来越多。

从年轻时代起，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就在英库勒沼泽地追赶鹿等猎物，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回忆说有树的地方就是原来的西岸。他们的父辈告诉他们说，有一段时期这些盆地曾经也充满了水。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还有稀疏的芦草，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死掉，这说明仍有水间歇地流进来。在某些洼地里没有任何植物，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解释说是因为过去那里的水太深。

12月14日我把骆驼早早地赶了出来，于8点钟出发。路上的困难尽管越来越多，但到黄昏时分，我们还是赶了近16英里路。由于最近又有新的水源注入，有的湖里还有水，有的湖床上只剩下一层盐碱，湖的大小不一，这表明我们仍在英库勒沼泽地带。走了刚刚4英里的时候，连绵的长有稀少沙漠植物的地区就被抛在了身后，说明我们接近了受强风侵蚀的地区，从赫定描述中，我知道罗布沙漠北部地段受到的风蚀最为严重。

这里是狭长的沙脊或者说阶地带，为坚硬的黏土质，中间被小的奴拉合(Nullah)分开，虽然不深，但很陡峭，只有风蚀和流沙才能形成这样的地形。阶地或者说雅丹（Yardang）（维吾尔语，专指荒漠风蚀地貌，因赫定采用这个叫法而得名——译者）的顶端都是相互平行的犁沟，它们与奴拉合或沟渠一样，其走向从东北到西南，是本地盛行风方向的标志。雅丹边上裸露的泥土是坚实的断层土，显然是古代湖床的沉积物。这里受风蚀作用的时间一定不长，要不然返潮时会停止剥落；此外，在许多地方，我还发现了长在雅丹之间的枯死芦苇。

在这条北部沙漠的第一道哨位线之后，又出现了大大小小、干涸了的咸水湖。洼地里仅有的几个水塘由于盐度太大，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水仍没有结冰。在穿越那些雅丹的过程中，只见到一块地上生长着红柳和芦苇，说明近年的来水持续的时间太短，不够植物生长之用，或者仅有那块地方接触到了水。

干涸的咸水湖上结了一层盐碱，即“肖尔”(Shor)，骆驼的蹄子痛得厉害。夜幕降临时，我们到了低矮沙丘之间高6~7英尺的风蚀沙洲和沙脊，我马上给骆驼松了行李。这里，光秃秃的沙地上有很多变白了的胡杨和红柳，还有大量的蜗牛壳，表明水生植物曾在这里一度繁盛。大约走了1英里，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在高大的沙丘脚下扎营，沙丘上有灰白的红柳，有的还活着。在潮湿的地方，向下挖了约5英尺，水就出来了，但很快发现这水咸得连骆驼都喝不了，我们不禁大失所望。

M. Aurel Stein

第三十一章

横穿三角洲

12月15日早上，我把30头毛驴驮来的冰袋小心地安顿在最高沙丘的背面，并且做了明显记号。之前，我特意多带了两个民工，现在，他们两人就赶着毛驴，尽快回到柴奴特库勒。在柴奴特库勒休整两天之后，他们将赶着毛驴再返回沙漠中的中转站，驮来民工们所需的口粮，骆驼吃的草料，还有冰块，因为现在冰袋里的冰已经用完了。然后，他们将在那个中转站等着骆驼队，因为根据我的计划，我们一到遗址，就立即让骆驼队回来，接着再把所有剩下的物资储备带到遗址那里。我尽最大可能，让这几个运输队严格按计划时间完成，以避免无谓的等待，而且毛驴也不可能坚持两天以上无水的旅行。

我清楚地知道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迅速判断出遗址的位置。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的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我要借用一个中国官员用的大信封寄走一封信，通过柴奴特库勒和阿不旦中转站送往若羌。然后，在若羌按办的关照下，由中国骑马的邮差在经由焉耆送到喀什噶尔，虽然这样做较为安全，但速度很慢，要花上6个星期的时间。接着，再从喀什噶尔经由印度送给我在欧洲的朋友，这又要花费大约6周左右。这样的话，我今天在沙漠中写的信件在复活节前后就能

送到我在欧洲的朋友手中了。在10个月之后，仁慈的神看到这一切，让我其他的沙漠邮包安全地跨越万里迢迢，终到目的地，我是多么高兴呀！

12月15日的路程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所有现存的湖泽地带，并且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整个15英里步行过的地面没有流沙覆盖，全都是坚硬的灰色土壤，而且长年遭受风蚀，成为雅丹，皆从东北延伸到西南。风岭之间的高原顶部也被风吹成了犁沟，也是东北—西南走向。受流沙侵蚀、像雕刻过似的地面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里曾是个古老的湖底，现存的仅有一段的免遭风蚀的湖底的狭窄区域堆着低矮的沙丘。我很快就发现小沙丘地带大都是死掉的树林，通常为东西走向，与我们向北走的路线正好垂直。大多数胡杨与红柳的树干都已经枯萎和褪色，或半埋于沙中，或仍笔直地直立着，好像很规则行列。

在接下来的两三英里中，一块一块枯死的树林不时出现，古河床中，我经常发现成行的野生胡杨，或大或小，其特点是和河床平行，并因此让人知道这里曾有一条条奔流不息的河道，并形成了塔里木河早期三角洲的一部分。在有水的时候，树木阻止流沙流动；当水分消失、树木死掉之后，流沙将树木掩埋，又保护了树木免受风蚀。成排的树木之间是风蚀形成的深沟，看上去十分陡峭，我认为可能是上次流水退却之后，这里才开始受到风沙侵蚀的。在一个离营地3英里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个标志明显延伸很远的洼地，它在过去应是个河床，两边的岸壁像约11英尺高的高墙，洼地的走向与盛行的东北风的风向一致。

在我们穿过的这个地区，地面状况说明在湖底土壤开始沉积以后、受严重风蚀以前，这里曾经有一片水生的丛林，由于干燥以及随之而来的侵蚀作用，原来的湖底由于遭到风蚀而迅速萎缩。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沿风蚀过的地面才走出营地1英里多一点，就碰到了许多石器时代的工具，我自己捡到的第一件是个粗制的小石斧，接着又捡到一个箭头和一把坚硬的石刀。更多类似的东西接连不断地出现，尤其是

M. Aurel Stein

石刀、石核以及各种各样的火石片。队员们深受鼓舞，目不转睛地四处寻找这种小东西。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那远道而来的忠诚厨师贾斯旺·辛格，在我的第一次探险时，他就是个寻找小件文物的高手，目光敏锐而有耐心，善于在遗址附近的风蚀的地面上寻找到东西。而且，他性情乐观，举止优雅，在蒋师爷不在的时候，我很乐意把他留在身边，从而我就能亲眼看着他耐心地寻找小件东西了。在行程的大部分地方，我们不断发现粗糙的手制陶器碎片，有灰色、棕色及红色，还有炼渣。

因为我们要尽可能走直线，所以就要放弃在左右两边进行勘察，如此频繁地发现遗物，说明曾经有人在史前时期在这条路所经过的区域生活过，但到什么时期，这里的自然状况才恶化到威胁人类生存的程度却无从知晓。其中的一些箭头制作精良，即使没有专业知识，我也可以断定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以我对罗布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很容易想象出当初这片土地的样子：那个时候，从塔里木河分流出来的各条河流流经此地，沿河生长着大片的丛林，这里居住着分散的半游牧民族，如牧民、猎手和渔夫。在距最后一个营地不到5英里的地方，拾到一个精致的铜箭头，说明这里至少在人类历史早期偶尔有人来过这里。它的做工与后来在北部的古代城堡发现的古物非常相近，它可能是公元的头几个世纪的猎手或士兵留下的。

这些不期而至的发现，让我想到了另外几个奇妙的问题。这些石器时代的遗物原本应该埋在不同的地层里，风化作用使得它们现在躺在了同一地层中，它们应该属于几个相差很久的年代？受死树和散沙保护形成的阶地顶部，与风化的地面高地并不一致，但是否可以依据二者高度的差异来计算从石器时代起风的侵蚀作用达到的程度呢？假设这里在较晚的年代才注入了水，那么淤积的黄土无疑会增加地面的高度，一直到由于干燥、树木死亡，进而受到剥蚀作用，这是不是另一种可能呢？

然而，我现在关注的是确保不偏离方向，保证人员的安全，很难有精力解决上

述问题，甚至无法对地面进行准确、全面的测量。而且，接下来道路起伏不平，连保持正确的方向都有困难。阶地之间是陡峭的沟壑，阶地之上是连绵的沙丘和成排的死树，所以视野有限，望不见任何明显的地标。在穿越雅丹时，骆驼的蹄子就已经受伤，根本不能爬上陡峭的沟壑，所以我们只能不断地绕道而行。测量员拉姆·辛格风湿病仍然很严重,身体与精神都备受煎熬,已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此确保不偏离方向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可是我手头现在也仅有一个指南针可以利用。

但是，保证方向并不是我唯一的工作，仅仅让队伍沿着直线、尽快地到达古戍堡还是不够的，我还必须为那些在到达古戍堡以后，返回盐水泉取冰块、食品的队员设置路标，以防发生意外。在这种坚实的地面上，留不下任何足迹，而且本地区冬天的第一场大风暴很快就会到来，那时雅丹和沟壑之中的流沙将被吹得漫天飞舞，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最为重要的是留下容易辨认的路标，因为在发掘工作结束之后，我计划把探险队人员分组，而我自己将从另一条新的路线穿过沙漠，返回塔里木，所以，在一些容易被发现的地方，我用死树或黏土块做出路标，具体工作由奈克·拉姆·辛格、铁匠依斯拉木及其他负担不重的民工来做。事实证明，这种预防措施十分明智。

这一天，穿过了沟壑和坚硬的阶地，流动的沙丘散落其间，把人和骆驼累得筋疲力尽。半个小时只能走大约1英里，骆驼已经再也走不下去了，况且黑暗中行进也不安全。天黑以后，我们就在错综复杂的低矮风蚀谷中扎营，地面土质非常坚硬，以至于把铁钉敲进地面扎帐篷都费了很大劲。死树也很少，但幸运的是我们人手多，有足够的人可以出去找柴火。有些骆驼的蹄子因行走于盐碱三角洲和陡峭的沟壑雅丹而严重破裂，于是趁着火光，哈桑阿訇和他的随从赶忙给它们钉掌，直到午夜休息时，我仍可以听到那些可怜的家伙仍在痛苦地嘶叫。

两个小时之后，我被大风吵醒，狂风摇动着我的帐篷，吹进大量沙子。在冰冷

的东北劲风中，为保住帐篷，我们在钉子上压上大堆的土块，又困又累又乏。自从离开阿不旦，气温一直在华氏12度徘徊，今晚的气温也没有降低多少，但却让人感觉到格外地寒冷。我真不知道，在沙漠探险的这段日子中，这种冻彻骨髓的东北风会吹多少天。我早上5点起床，除了两个结实的猎手外，那些蜷缩在火边的民工都磨磨蹭蹭，不愿意走，以至于快9点了，队伍才上路。

刺骨的风还刮着，从这里往北，沙粒好像更大、更沉，风已经不能把它给吹起来。所以，早上，我在营地之上用平面测量仪观测时，可以看到北方远远地有一个红棕色的低矮山脊，那是库鲁克塔格（Kuruk-tagh）山地，我们要发掘的遗址就在它的脚下。南面的阿尔金山山顶冰雪覆盖，在乌云的衬托下，显得尤其醒目。所以，我兴奋地轮流瞭望亚洲腹地两大山脉——昆仑与天山。视野中的天山和昆仑山在某种程度，缓解了毫无生机的罗布沙漠所带来的无法抵抗的空旷感，现在，我决定向正北方前进，看能否碰到赫定在荒漠中央发现的某个遗址；同时，这样可以减少由于确定方位的不同而错失路标的几率。我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最后一个渔民营地开始，我就开始尝试走一条在赫定几次从南部接近古遗址的两条路线之间开辟一条新路线。

12月16日的行程中，地面的状况都与昨天相同，接连不断的雅丹的走向一致，皆为东北—西南，而且它们顶部的沟壑走向也是如此。现在正刮着呼啸的东北风，可以亲眼看到风如何销蚀制作出这些作品——沟壑和风蚀雅丹。在沟壑的两边，风蚀作用的威力最大，流沙像流水那样刨蚀着。任何人，哪怕是最不会观察的人，也能看出东北风与该地区地貌之间的紧密联系。沟壑深12英尺或者更多，但要想在沟壑里躲避刺骨的寒风那就错了，沟壑里的寒风好像更加强烈，任何人想在雅丹的沟谷中找到一块避难所都是徒劳的。风总是向沟壑陡峭的壁岸吹，强烈的气流从两边吹来，仿佛形成一股涡流。路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成排的死胡杨与红柳，从

西到东排成行，它们通常长在坚硬的、像石膏样的岸边，与低矮的沙丘比邻。在走出营地约5英里后，我们到了开阔地面，雅丹的顶部皆被死掉的芦苇茬所覆盖。

火石和粗陶片很明显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来仍旧接连不断地大量出现。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的地区仍是史前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就在赫定认为的早期罗布旧湖区之内，这些碎片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接下来的1英里，我又发现做工相对精良、内红面黑的陶片。3英里之外就有一片小塔提，证明这里是公元历史时期(historical period)的遗迹。

在将近半英里的路途中，坚硬的地面到处都是炼渣与陶片，黑红两色相间，颗粒更加细致，让我想起了尼雅和其他早期遗址的陶器碎片，其中有一些碎片，如一个大瓶子的瓶颈部分，能够确认是轮制。当托合提阿訇和我身边的几个人捡到一枚保存完好的环形铜章，无论从形状上还是设计上，它都与从和田地区遗址发掘出的公元1世纪的遗物有相似之处，我上面的那个想法很快被证明了。发现一个没有刻字的方钱，形状说明是汉朝的，这进一步说明人类是在历史时期才居住在这里，而不是史前时期。高高的沙包被死红柳丛联结在一起，其外表与塔提类似，但这种情况也限制了风蚀作用。还是穆拉赫的眼睛敏锐，他发现在3个沙丘顶端的红柳仍然活着，靠近之后，我们发现附近有野骆驼的粪便，说明一定有很多野骆驼来这里找东西吃。

天空阴霾，刺骨的寒风咆哮不停，我们都快冻僵了。下午两点左右，风渐渐小了一些，雪却落了下来。将近半个小时的降雪稍稍改变了阴郁的环境，让人感觉舒服了些。雪只有约半英寸厚，第二天一早太阳出来，除了雅丹突出飞檐下的积雪外，其他地方的全融化了。即使这样，这场雪也帮我们节省了几天的冰块，并让骆驼有机会润润舌头，但还不能痛快地喝上雪水，因为在给它们卸下重物之前，天就已经黑了，这时候再让它们走出营地不安全，何况它们的蹄子已经受伤。又走了约1英

里，穿过一长排清晰地标记着古河道走向高达10英尺的枯死胡杨树，这时天已大黑，我们被迫停下来。我们所处的是狭长的沙丘带，上面覆盖有死红柳树，看样子还可以为我们遮蔽风寒，于是就地扎营。按照推算，现在离赫定说的所谓“大炮台”遗址不足8英里，我急切地跑上一个大沙丘，用远望镜观察远方的地平线，以期能望见某种遗址迹象，但没有任何收获。

从若羌来的民工开始心事重重，忧虑不安。现在，经过6站长途跋涉，他们非常劳累，看上去越来越沮丧。如果不能够兑现我以前的诺言，在以后的一两天之内到达遗址，那么他们会完全崩溃，并可能制造麻烦，乃至返回若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表现出乐观和自信，尽管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地面上实现预期计划的难度很大。我们时常被迫停下来，研究行进路线，背着行李和给养反复绕行的次数也增多了，现在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行进路线是否正确。

凌晨1点，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我的帐篷差点被吹倒，大家乱作一团。在扎帐篷时，已经尽量把钉子钉得足够紧，但这也经受不起这么大的风，固定帐篷的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断开，钉子都被拔出了地面，帐篷被吹到了空中。劲吹的沙尘令我感到窒息，我从梦乡中醒来，大声呼喊远处篝火边的队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帐篷的外围篷布用大块黏土压住，虽然还有点摇晃，可总算固定住了我的帐篷。为了抵御严寒，我穿上能抵挡北极那样寒冷的厚重羊毛大衣，以及夜里穿的缝着毛皮边的马甲，蹬上吉尔吉特（Gilgit）皮毛靴。队员们则穿着羊毛皮大衣和内里填着棉花的袷袢（Chappan），脚上穿上了毛毡袜子和皮恰鲁克（Charuk）（穿上以后，再也没有脱下来过），可谓全副武装，但是，假如没有足够的树枝树干来烤火，他们还会吃更多的苦头。天亮以后，风小了些，流沙的速度也很快减缓了下来。当然了，那天早上我吃的食物也掺满沙子，此后这种情况便成为家常便饭。

当我的队伍最终出发时，已经快9点了。在太阳冲破阴霾之前，我们并没有走

多远。东北风一直吹个不停，天气越来越冷。即使我加厚了帽子与手套，头和手仍感到很冷。这样的天气，若在北极，人心中还会暖烘烘的盼望着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刚刚穿越雅丹与低矮沙丘向北走了5英里，我们就在路上相继捡到了3枚中国汉代的钱币，还有一些铜箭头和大量不知做何用途的小型金属物件，这说明我们已经接近了一个汉代遗址。又过了4英里，到了一个东西走向宽阔的标志明显的洼地，沿岸有一行行死了的胡杨树和受侵蚀的红柳丛，穆拉赫立刻就认出这条古河道就是他记忆中赫定发现遗址南面的那条河。一走过这条河道，视野立刻变宽了。很快，在被严重风蚀和犁沟不断的平地之后，库鲁克塔格的外围矮沙脊出现在眼帘之内，满目的红色和黄色，赤裸裸的没长任何东西。

当天早上，我许诺过第一个看到遗址的人将会得到银子作为奖赏。为了赢得奖赏，以及看到了即将到达目的地的希望，民工们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前进，最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离那个干涸河道约1英里的时候，遇到一个高地状的雅丹，骆驼停了下来，我们正在调试平面测量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赶驼人抢先一步，大声叫喊说他看到“炮台”了！所有人的眼睛都随他手指的方向向东看去，不一会儿，我就用望远镜证实了那远在地平线上升起的球形突出物像是个古建筑，很明显是个佛塔。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从若羌来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兴奋感染了，喜笑颜开，好像一切困难都行将结束了，而我自己的人也显得洋洋自得，好像不会再有什么别的情况发生了。

最奇妙的事情莫过于观看骆驼总管哈桑阿訇的庆功举动，他站在一个雅丹上，右手拄个拐杖，左手叉着腰，像个凯旋者，对着他的听众——那些民工大声演说。一路上，他对民工采用鼓励和威胁的两种手段加以管理，既像个证明真理的先知，又像个狂热的煽动者。如果不是他反复不断地对民工说，在我这个欧洲“大人”的指导下，借助地图和指南针，我们可以找到藏匿在塔克拉玛干中的任何地方，若没



⑫罗布泊遗址的佛塔废墟

有他做的这些工作，事情不可能发展得这样顺利。现在，他终于带他们准时到达了阔纳沙尔(Kone-shahr),兑现了当初许下的诺言,他就好像满载猎物而归那样高兴。民工们现在最期望的莫过于得到他们的工资和发现古代文书——亥特(Khat)的奖金。

我知道哈桑阿訇爱招惹麻烦，也很狡猾，但他自有他的用处，尤其在沙漠探险中更有用武之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像希腊老探险者的精神和行为。他站在那里，穿着大红斗篷，戴着紫色尖顶帽子，满脸喜洋洋的表情，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气概，完全不见了他那种忧郁和愤怒的神情。他让我想起赞诺芬（Xenophon）诗中一个希腊雇佣兵，大声叫着“特拉塔”（Thalatta）、“特拉塔”！在这以后，在罗布沙漠中，我多次想到哈桑阿訇的性格是不是来自于列范廷人（Levantine），他身上是不是流着先人的血，他的先人（像Maes雇佣兵，即马其顿人）可能在攻打中国后，留了下来。哈桑阿訇天资聪颖，精力充沛，莽撞有力，性情粗暴。瞧！他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人。

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的遗址确实属于赫定发现的东部遗址群，也是最主要的遗

址群。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向那个方向前进。路线的方向和雅丹的走向基本一致，这有利于我们前进。距离将近5英里，尽管所有人都迅速前行，仍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那里。一到达，我就确定那个用大块土坯砌筑的遗址是个佛塔，无疑是赫定1901年回程中第一次发现的那个遗址。在周围还发现了很多汉代铜币，一些铜制箭头和其他小物件。

前面我们看到的遗址群由3个遗址组成，东南角那个最大的遗址很快就被穆拉赫认出是赫定营地所在地，我们与最大遗址之间是严重侵蚀的地面、连绵陡峭的沙洲，以及沙洲间深达20多英尺的沟壑，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我们才能过去。这最后的3英里就像障碍赛，极其累人。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到了佛塔遗址的底部，这个建筑物在异常荒凉的遗址群中是唯一的地标。

遗址的建筑几乎已经完全倾颓，大量的木材散落在地面，于是我们就地取材在高高的阶地上点燃一堆篝火，在它的引导之下，两个小时后，过度疲劳的骆驼队才赶到。这一周，可谓耗尽了精力，费尽了脑力，弄得我筋疲力尽。然而，当我与民工们一起坐在火堆边烤火时，遗址和雅丹变成了引人注目的浮雕，所有的人都因胜利到达目的地而喜气洋洋，忘却了疲惫。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小帐篷中写信给远方的朋友，一直写到自来水笔被冻住，报告他们我安全到达的消息，信中自然表述了我现在兴奋的心情。

我应真诚地感激赫定，正是因为他那精确的地图，我们没浪费一天就找到了这些荒芜孤独的遗址，尽管实际路线与地图不尽相同，也缺少地标。根据我们自己用平面测量仪做的测量，以及在远至若羌西南山区做的三角测量和充分的天文学观察，经过计算，我们绘制了新的地图，我测得的遗址位置与赫定测定的位置在经度差了约1.5英里，在纬度上只差了不到半英里，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差别显得微不足道，这可让我钦佩不已。

M. Aurel Stein

M. Aurel Stein

第三十二章

首次发掘罗布泊遗址

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到达了遗址。第一夜是令人愉快的，12月18日早晨，温度计显示气温为华氏零度，于是我就躺在床上，盖着温暖的毯子、垫着毛皮，多待了一会儿。但在这里，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所以我还是在黎明时分起床。一个小时之后，各小组按既定计划分好的，准备出发了，所有的行李都留在我们位于主遗址群中的营地，冰块被小心地堆在离我帐篷很近的地方，那里位置不显眼，不易被人窃取。5头骆驼被派回我们的中途仓库，取回留在那里的给养以及由毛驴驮去的冰块。

余下的骆驼被带往北面阿特米什布拉克（Altmish-bulak）盐水泉，好好休息一下，吃点草料，这些家伙已经好几日没吃到草料了。骆驼队由托合提阿訇照管，他在一年前曾随亨廷顿（Huntington）穿过了喀拉库顺沼泽地东面的盐碱湖床，到达阿特米什布拉克。后来，他又到过赫定发现的两组遗址，我相信他能在附近迅速地找到泉眼。根据他的估计，即使骆驼没有负重，也得走两天才能到，短暂的休息之后，他骑一头骆驼回到西边那组遗址，接着继续向西和西南走，侦察一下那里是否有其他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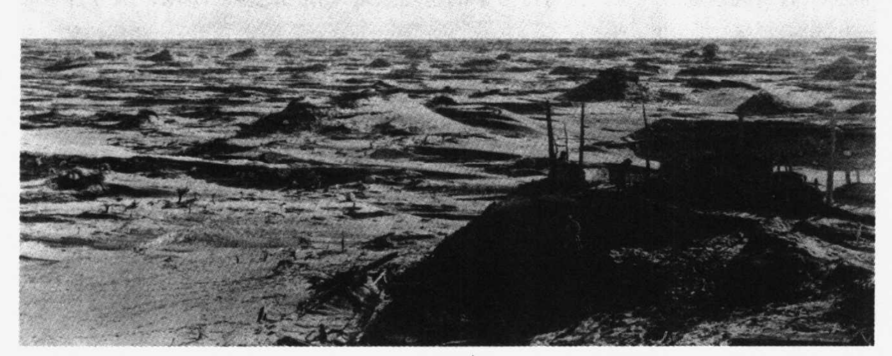
在同样的方向上，我又派拉依·拉姆·辛格在较近的范围里进行调查，希望他能在我们现在所在遗址的西面，精确测量出赫定经常提到的遗址方位，因为小比例路线图上没有标示出来。早上，我迅速地对遗址进行了勘察，我想有这么多人，应该能很快清理完这些遗址。所以，我指派哈桑阿訇，拨给他一些骆驼，让他负责在12月23日前把营地搬到西面遗址的附近。

卸掉了行李，骆驼和赶骆驼的人似乎都想离开这片遗址。8点一过，骆驼队离开了这里，留下我和民工，一切显得安静而沉寂。我站在佛塔高大的底座上面，下面就是我的帐篷，民工们在晨光中吃完早餐，眼前的景象既那样熟悉，又那样充满了新意。在风蚀地面高高的阶地之上，木头和泥土建成的房屋遗址仍然挺立着，梁木已经破碎，被风吹得发白，就像沉船的遗留物，建筑结构与我记忆中的尼雅古址毫无二致！但它们之间的环境差异却十分巨大！

⑬从罗布泊遗址佛塔废墟向东南远望，地面受到了风蚀作用



M. Aurel Stein



⑪④从罗布泊遗址佛塔废墟向南远望，地面受到了风蚀作用

这里没有沙包和流动的沙堆，满眼净是连绵不断的陡峭的雅丹，由于都是东北风的风蚀而成，所以方向一致。这些沙丘和雅丹让我想起了大海，但不像大海可以自由地流动，而沙丘和雅丹被冻得结结实实，形成无数的沙丘。视野之内，都是这样的景色。通过我的高倍棱镜望远镜，除去佛塔南面和西南的一组紧密排列的遗址群，在北面远处没有发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只有几个分散开来的土堆，显然亦是土坯结构。很难想象在这个风蚀如此严重的地区，普通木结构建筑怎能保存下来。

发掘过程中，也同样遇到了熟悉的东西与陌生的景象。清理遗址内部的积沙，搜寻散落在风蚀坡上的文物碎片，等等，对于尼雅遗址而言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我早就知道这两个地方的遗址所属年代完全相同；但对我而言，在一个欧洲人已经挖过的遗址上发掘，自有一番新的感受。1900年，赫定幸运地发现了这些遗址，并在1902年再次造访。赫定那本绝妙的书中有一章题为“古罗布泊的遗址”，配有精

美的插图，我从中了解了这些遗址的大致状况。他的发现确实很重要，其作为文物证据在很多方面也是充分的。但他毕竟在这里只停留了6天，其中只有3天在东部的遗址群和西边的一座遗址进行实际的发掘工作。除他之外，只有5个人，而且他们都没有发掘遗址的经验，而有待考察的遗址数量又相当之多。所以，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对这里的遗址群进行一次彻底的发掘。然而，谁能事先保证再发掘会有什么新的结果和发现呢?

为了鼓励我的民工们，我说在第一个遗址机会就会有的。它是一座房屋的遗迹，建在一个小阶地的顶部，位于佛塔的正南方向，二者相距只有大约50码，很明显这间房屋原来的面积更大一些。房屋内有4个房间，其中一个超过30英尺长，根据剩

⑪⑤罗布泊居民点遗迹和佛塔废墟



M. Aurel Stein

下的残墙可以清晰地再现当时的样子，它与尼雅遗址一样，用木材与枝条建成。阶地斜坡上散落着大量木材碎片，尤其是东、南两面，表明那里曾有建筑物的其他部分，而所有的泥土都被疾风带走了。由此，南面原始地面的高度已经被降低了整整18英尺。屋内地面尚存的沙土也仅剩下一两英尺了。

然而，就是这一两英尺厚的沙土，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首先是一片木头，约半英寸宽，写有一竖行中文，其大小完全与我在1901年第一次去尼雅时发现的那些中国古代木简相同。赫定在一个遗址中曾有类似的发现，我已经预料到我会在这里发现中国木简。紧接着，两个长方形木简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它们上面写有模糊的四五行佉卢文文字，但仍可辨认出来。以前，我从不敢设想在这么远的东方会找到古印度语的书简。

在邻近一个屋子的墙角，找到了第二块中文木简。后来，当我们开始小心清理在斜坡上散落的树木碎片中间发现的垃圾堆时，印度人连续大叫几声，说发现了中文纸质文书。大大小小的碎片共有6片，明显是公文。但保存更完好、更神奇的是紧紧捆在一起的、记有中国经文的纸质文书，看上去是做佛教画衬背用的，而佛教画是在薄石膏板上制成的大幅宗教画。颜色没有留下多少，也无法确定其内容。在衬背上分栏排列的字应是经文或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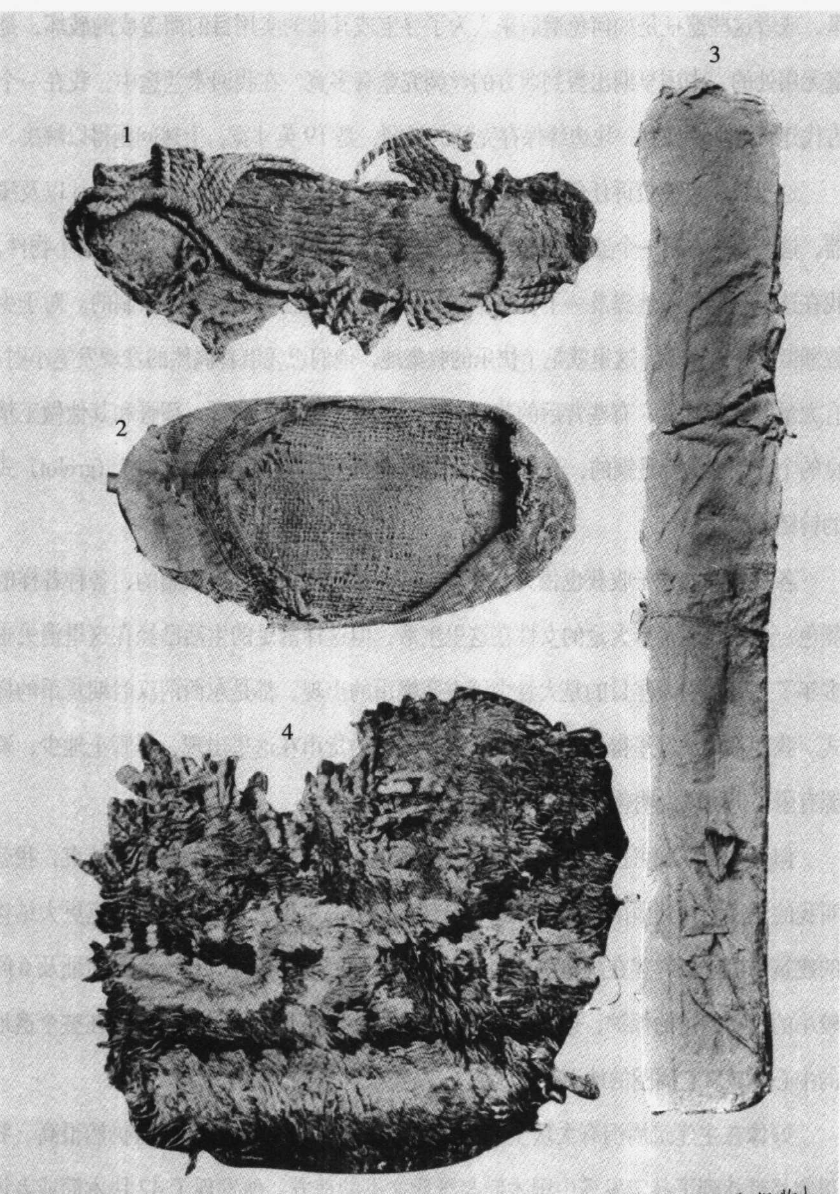
从四散的碎片中，又发现了两块佉卢文木简。刚一开始对它们进行快速研究，我就发现了有趣之处。其中一个是一个楔形文书的封面，尽管所有的文字都已被流沙严重销蚀，从封泥凹槽和一编排孔等可以看出这种复杂的木简使用方法，在这遥远的塔里木盆地东端是与和田地区一样的。另外一个木简表面更加模糊粗糙，我注意到了它们之间有实质性的不同。这是一个椭圆形厚树皮，显然是从红柳树干上切下来的，刻上了两行长长的佉卢文文字。与尼雅遗址发现的光滑整齐的木简以及其他刚发现的佉卢文木简相比，这种材料显得尤其粗糙。我注意到它们的表面之所以

粗糙和破损，并不是全由于风蚀与暴露的原因，更是因为其材料是胡杨或野生白杨，而不是尼雅地区用的松木或非野生白杨木。

这是一种重要现象，之后大量观察证明，遗址附近几乎没有棚架和林阴道。现在谈及建筑结构，我往往要提及罗布泊遗址东部的建筑，其木材都是河边的丛林中野生白杨。在这座遗址附近，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园林树，如白杨、沙枣和桑树，这些树从和田到瓦石峡的古代遗迹中都很普遍。后来，我又考察了罗布淖尔遗址西面，并发现那里也只有一个单独遗址，很明显是某个重要居住点，发现了组成古老棚架的死树干。从一开始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仅仅说本地区农业资源不足，还不足以解释这些古代的居民点为什么被遗弃。

在第一个遗址的发现不仅仅局限于文书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具有特殊意趣的古物。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两块上好羊毛织成的绒面毛毯碎片。由于磨损不是很厉害，颜色被保存了下来，有棕色、大紫红色、浅黄色和亮蓝色，与纬线、经线以及绒面处理的技术都与现代的便宜的日本毯子非常相似，但这里无法对细节进行分析。这是我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第一块绒面毛毯，我欣喜不已，但我没有时间来细致地观察。不久，在与遗址北侧相连的一块地面上，发现了一块价值略低的织物，但仍没有发现上层建筑的遗迹。这是一小捆黄绸，轻轻卷在一起，显然还没用过，变得又干又脆，以至于第一次拿起来时就碎成了两片，其全长 19 英寸左右，直径 2 英寸多。

这些中国古代丝绸表明，在公元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国就已经通过这条经由这处遗迹的古路向西方贩卖丝绸，在很久以前我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五颜六色的织物无疑是衣服是碎片，在这座遗址以及其他遗址中又陆陆续续地出现。仅从这一项发现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曾经万里迢迢、源源不断地运到西方古典世界的最著名的赛里丝（Seres）丝绸究竟是什么样子。去猜测为什么房屋的最后一代居住者遗弃这



⑯从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代织物

里，或者这些遗址是如何免遭后来人为了寻宝或其他的实用目的而造成的破坏，是毫无用处的。中国早期出售到西方的丝绸究竟有多宽？在我回米兰途中，我在一个古代建筑遗址中找到一块边缘保存完整的丝绸，是19英寸宽，上述问题得以解决。

这里我不可能赘诉任何有关小工具的细节，如勺子、筷子、铜盆的碎片以及漆器，这些都是在第一个遗址中清理出来的。第一天在遗址附近发现了大量的小物件，我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及一下，有金属制的，有玻璃制的，也有石头制的。对于少数懒散的仆人来说，这里就是个快乐的收集地，他们想凭借着偶然的发现发笔小财。有大量的铜镜碎片，有些背后的装饰还相当漂亮，圈呀、扣呀、环呀和其他做工精良的个人装饰品都是铜的，石章上刻着几何图案，设计精致的格雷罗特（grelot）式的铃铛等。

各种各样的珠子收获也很大，玻璃做的，糨状物粘的，石头制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些表明曾有大量的女性在这里生活，但这样富足的生活已经在这里消失很多年了。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中国方孔铜币的出现，都是东西两汉时期货币的样式。我们不难从这里得出这么一种看法：大量的货币在这里出现，尽管土地少，资源有限，仍可以说明曾经车水马龙。

但是，现在我可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琐事。对于独立结构的清理一结束，我就叫我的民工们转到西南方向，在约100码的地方有个佛塔，在那里有一座更大结构的建筑物遗迹。它建在阶地状地面最东边，阶地约200码宽，由于受到遗址及6间较小的房屋遗迹的保护，这片阶地没有被侵蚀成为雅丹，而是仍然伫立在整个遗址的中心区域。它周围的地面都被吹成了12英尺深的坑，甚至更深。

好像在主建筑周围有大块土坯垒成的城墙，3个狭窄房屋的厚墙仍然很高。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赫定发现中国木简与纸质文书的地方。他发现了42块木简或者说“木片”，以及大约200张纸，包括不少小碎片，这些全是从首尾相连的房屋中最东

边最窄的那个房间里的垃圾堆中发现的。在被扔出来和散落在南坡上的垃圾中，我们又彻底地搜查了一遍，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纸片和木片，大多数都是细薄卷曲的木片，在这些木片上很容易发现这些中国木片的原始尺寸约是9.5英寸长，半英寸宽，一些已经磨平作废，预备再次使用。由于材料用的是本地没有的松树木（其木质非常柔韧和光滑），所以要节约着用，上面所说的为什么木简要磨平作废也就不难解释了。

留一些人在依布拉音伯克的监视下，仔细筛选这堆垃圾。下一步，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大型的建筑遗迹，它是树木和枝条建成，已经受到严重侵蚀，此建筑形成了以刚才提到的那段城墙为标志的主楼的西翼。大型胡杨梁木散落在风蚀的东坡上，其中一些曾支撑过中央大厅的柱子依然伫立不倒，高约13英尺。有关文书的内容有用的信息都被赫定带走了，这些信息表明此房间曾是个中国官员办公室。我们对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清理，除了发现大的螺旋胡杨木制的饰品外（这些应曾是支撑房顶的柱子的装饰），再也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相连的西边一块场地看上去曾是外屋，或者露天院子，我派人到那里发掘，很快便相继发现了中文文书，大部分为木质，也有纸质的。在这30片木简中，其中一部分是相当完美的，其他的尾端有些烧焦，明显是被当作灯芯用过。哎呀！我身边没有一个汉学家，就连蒋师爷也不在，我无法明白其中的内容。但是，一个木简的一端还有毛发编成的细绳，说明原来与一物体相连，这样就很容易猜测出其用意所在。根据沙畹（Chavann）先生3年之后所做的分析，它是系在装满谷物的袋子外面，标明是分给军营分遣队里的一个姓“关”（Kuan）的士兵。

天黑之后，我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帐篷里，第一天令人鼓舞的发现让我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刺骨的东北风在夜里仍然愈刮愈猛，民工们靠着砖墟里燃起的篝火而眠要比我这个小帐篷暖和，想到这里我心里仍很高兴，因为这个小帐篷只在冰冷的

火土灰上燃着两支蜡烛，直截了当到需要新鲜空气，才把蜡烛拿出去。没有谁比我的小猎狗“塔什”更舒服了。穿着它的“皮装”，四处寻找暖和的地方，钻进毛毯中就再也不顾别的了。贾格尔（Jaeger）羊毛毯放在最下面，那就是它最喜欢的窝，只要我自己不把它卷着拿在手上，塔什一定会钻进去。现在，夜里的气温很快降到了华氏零下 13 度，如果我没有全副武装，穿好皮靴以及从喀什米尔带来的毛皮边裤子，我是不会从被窝中出来的。

第三十三章

考察古代驿站

在12月19日，早晨寒冷，工作始于清理一个“衙门”西南60码以外的一个保存完好的遗址。12间房屋的长、宽、高无从知晓，梁椽的尺寸也都不大。在室内，流沙堆到了三四英尺高，以及熟悉的地面轮廓、木柱、树枝的摆放结构都与在尼雅相同，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不过别人并没有什么失望。第一个房间中墙壁坚实厚重，灶台很大，土炕也很宽，应该是冬天取暖用的房屋，但这里的发现不多，只有一些由染色原纱制成的地毯残片，手工很好，上面绣着精美的花，颜色尚佳。

一个通道把这间房屋和西面那个较大的房屋分开，我们在通道里发现了3个长方形大木简，保存较为完整，木头盒和印章匣子都还有，上面刻的大部分佉卢文文字保存得相当完好。其中两个木简被一块保存良好棕色的织品包裹着，它们的下面是约3英尺厚的沙土，显然这两个木简是从墙上高处的某一个容器中掉出来的。木简的材料是野生的红柳，而不是由人种植的白杨，这些文书在外观、刻字等细节方面都与我在尼雅的发现相似。作为官方文书，在木简起始部分都有当时的日期，于是我急于打开文书，很快明白上面的时代也是大王（Maharaja）时期，显而易见就

是杜噶喀（Dugaka），与刻在尼雅文书上的统治者的名字完全不同，这表明中国政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统治上，都允许地方的政权继续行使其家族式统治。

在主建筑北端的一堆碎片顶部的垃圾中，发现了不下12块佉卢文木简，我们认为现在所挖的房子曾经住过这样的楼兰地区的本土统治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长方形和楔形字体、契约书以及账簿都被发现，其中一些木头已经被严重刮坏和侵蚀，但留下来的文字足够说明这是属于本地某个小官达夫特（Dafter）的东西。与其他遗址发现的佉卢文文书放在一起，再加上我对发现地及其状况的观察，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期印度语言在罗布泊也被用于当地土著政府的管理和商务中。考虑到从和田到罗布泊的距离遥远，在塔里木盆地东端还存在这种印度语言文字原本，不失为一个历史趣闻。

虽然大多数新发现看上去好像简单明了，但它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和田地区，我还能解释这种印度语言为何为官方所应用，玄奘记载中说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他还提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印度人早期曾移民到这里。在东方这么远的地区，就在中国的家门口，官方仍使用这种印度语言，说明这里在政治上曾为印度人侵入和控制，印度人甚至在某一时期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或许，这种语言的使用是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留下的永久痕迹？因为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印度斯基泰人越过巴克特里亚（Bactria），侵占了这里，暂时打破了中国皇帝对于这些地区的统治，我们可以从中国佛教中看到些模糊的影子。

然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思考这样奇妙的问题。留下奈克·拉姆·辛格负责民工来清理那个伯克宅邸（我们引申“衙门”这词的意思上给它起的名）和附近的地面，我自己则对主遗址群周围的一些遗迹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当我沿着主遗址群的南边考察时，我看见风蚀地面上有一条长长的阶地，那阶地就像附近的雅丹那样，但唯一根本不同的是这条阶地走向是东西向。在仔细考察过阶地的顶部之后，我注

M. Aurel Stein

意到上面一个夯筑土墙，大部分已经毁掉了，尽管如此，有些地方仍高达4.5英尺，最厚的地方则有5英尺，我在南边所能找寻到连续的最长的土墙约有90码。

城墙保存下来的很少（称为“城墙”是为了和其他的墙区分开来），但它仍保护了阶地免受风蚀，所以我们在阶地上发现非常多的陶片。在紧挨着城墙遗迹一端的内侧，我发现有芦草建成的墙，也已损毁严重，城墙肯定是与某些建筑相连的。根据这些线索，我很快发现了相应古建筑的墙壁遗迹，它沿着主遗址群北面而建，呈一条直线，要比上面的城墙矮，但在方位和结构上完全相同。某些地方，城墙高达8英尺，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土层间有规律地填充了红柳树枝，其目的是使夯实的墙更加坚固。据我估计，南墙与北墙之间的距离约为1/4英里。

现在，就差确定东墙和西墙了，因为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都有了墙，古城堡才完整，方能发挥防御作用。然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遗址东部，从废弃的佛塔开始，除了相距很近的雅丹以及雅丹之间规则的沟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的迹象。最后，我被迫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首先，刮个不停的东北风和它带来的沙子在东墙形成了一个个缺口（现在的雅丹和沟壑的前身）；然后，东墙完全坍塌，并最终因受风蚀作用连同阶地上原先留下来的黏土碎块一同消失。但这种解释仍让人感到迷惑，直到半年之后，我去中国安西（An-shi）周围的城镇，对那里严重损毁的城墙进行考察，我才明白了其内部结构。那强大的风先使东墙出现裂口，继而把所剩余部分完全吹走，同样的道理，西墙也就这样消失了。东墙消失之后，西墙受到风的攻击力则会更大。

所以，西墙的消失并不令我感到惊奇。幸运的是，我发现两个风化严重的黏土土堆，二者相对，位于主遗址群的西侧，与南北两墙之间的距离相等，根据这一遗迹我可以测算出西墙的大体位置来。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两个土堆是两座位于城堡大门两侧的棱堡或者烽火台的遗迹。可以肯定，墙原始的厚度达24英尺，有些地

方现存的城墙高出地面约16英尺高。散落四处的粗重木柱，很明显是大门的遗留物。南墙与北墙之间的距离约370码。假设这个城堡像一般的中国城堡那样，城墙中央的区域也是四方形，那么遗址的所有遗留物都应该在城堡院子以内。

城堡外面，仅有附近的两座建筑有幸保存了下来，都是低矮坚实的土坯结构，看上去从前应是佛塔的地基。由于它们体积巨大，现在还没有被完全风蚀掉。其中城堡东北约半英里的那个建筑物现在已经成了金字塔的模样，约10英尺高，塔底每边长皆为35英尺。像遗址中的每一个大型建筑一样，这个“金字塔”也位于用两层红柳林和黏土建成的地基之上。另一个建筑物离城堡的东南角不远，体积更大，底边原始尺寸一定超过50英尺。它现存的土坯结构高达14英尺，加上所在的风蚀阶地高约16英尺，看上去相当雄伟。早期的寻宝人从中央挖了一个隧道，直接达到建筑物的西侧面，除了风蚀的破坏作用以外，人类的破坏作用从中可见一斑。上层的建筑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甚至连抹在墙上、起装饰作用的灰泥层都没留下来。

在城墙之中的遗址间，发现了大量的红柳丛遗迹，它们曾在废物堆脚下以及风蚀过后的斜坡的下半部分躲过了劫难，存活了下来。红柳丛的存在一定为保护遗址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死去的枝条也护住大多数阶地的斜坡。即使在风蚀的沟壑中，也偶然发现了小红柳丛和孤立的死灌木丛。在“衙门”不远的地方，我甚至发现了一棵仍活着的红柳。这些都说明曾经在某个时期，远在城堡被废弃之前，一定有河水曾流过这里，甚至可能在人类全部离开这里、灌木丛存活下来之后，依然有河水流经这里。

在东方和南方，穆拉赫和我派出侦察的人都没有找到任何建筑物的遗址。但在北方，站在佛塔上居高临下，发现雅丹上有两个破裂的土堆，我准备稍后再去那里考察。在东北偏北的方向，我发现了一个土坯结构建筑，分上下两层，约15英尺高，它的边缘原来的长度肯定超过了36英尺，但现在已经被风侵蚀破坏得不成样子

了，以致无法辨认其大致的形制结构。它极有可能是个佛塔的基座，由本遗址最常见的土坯砌成，土坯的规格为19英寸×11英寸×3英寸。除了这些大土坯块，下面还散落着一些小块砖，非常坚硬，无疑用火煅烧过，也许是上层的建筑用的。在西北方向约330码的地方，我又找到了一个相对大一些的建筑，旁边光秃秃的风蚀地面上有很多木块碎片，包括20英尺长的胡杨梁木。

在一段异常陡峭的地面，先向北再向西走了约一英里半的路程，我遇到了一个用小块砖砌成的遗址，与之相连的木制结构跟前面见到的很相似。这里受风蚀作用破坏得厉害，也没留下什么东西让我们来挖。在回营地的路上，约向南1英里，我穿过了一条古河道。河道的大致走向是从西向东，弯弯曲曲地延伸，看上去与我们12月17日到旧址途中穿过的那条河道相连，宽度从50~65码不等。河岸原来的标志物胡杨木与红柳丛都已经死去，河岸已经被风吹得下降到地面以下15~20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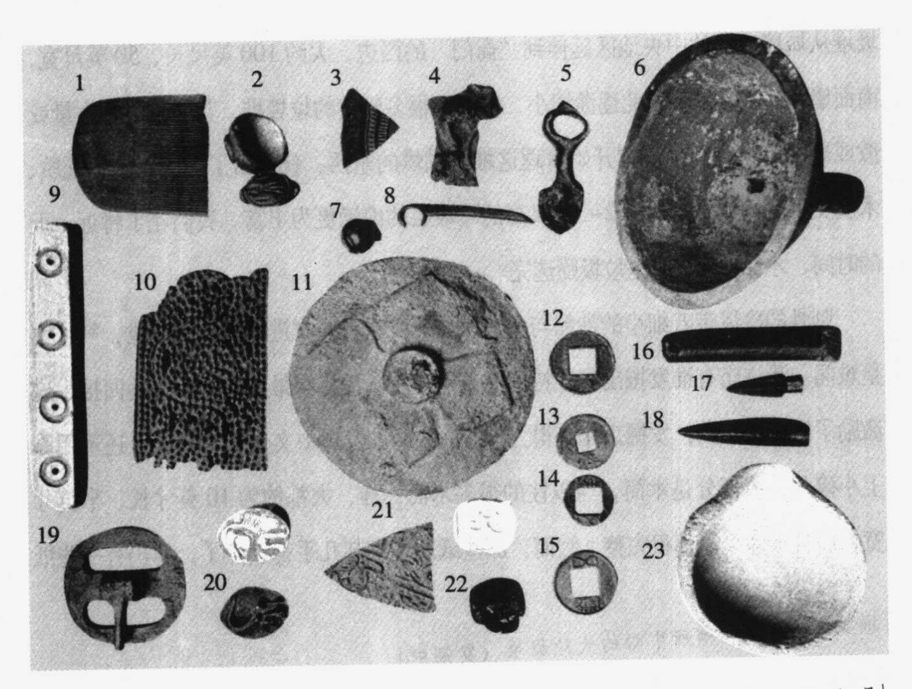
河床底部相当平整，有一层薄沙，与雅丹极不相同。河道的走向与本地盛行的东北风不同，加上河床较低（好像原来就是这样低），这些都有利于防止风蚀和流沙的破坏。在河水干涸的过程中，河床上积累了大量的流沙，这也可能延缓了风蚀作用。总之，由于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我们无法弄清最后一批人居住在这里的时候，这条河就存在，还是最后一批人离开之后，河水回流的结果。

第三十四章

来自古代垃圾堆的记录

在这里详细叙述12月19日以及以后3天我们是如何在那个“城堡”中进行艰辛的发掘工作的。由于受到保护未遭风蚀，那6个民居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变化很大，几乎所有的屋子中都有很多流沙或板结得结结实实的垃圾，其中保存了大量中文或佉卢文木简以及其他有趣的古代文物残片。与“衙门”北墙相连有用树干和树枝（木骨泥墙）建成的小建筑，两个房间之间的连接方式很是奇怪。西屋东墙的墙角里有一个3英尺高、约3步长的大土炕，在那堵墙的中心位置有个格子状的空洞，约7英尺宽，可以通过空洞看到东边的那个较大的房间。这个土炕是给这里的头领坐的，而与之相连的大厅是给仆人和来这里的人住的吗？在大厅里，还发现了墙壁中木头和树枝被烧焦的迹象。

在另一个屋中离土炕很近的地方，发现了一把木尺，11.5英寸长，保存完好，一尺分成10寸，这是根据中国10进位制制作的。关于它的历史年代，这把尺子应该是公元3世纪即西晋时期（Western Tsin）流行的度量衡。由于古代中国的计量方法在不同朝代变化很大，仅仅根据文献的记载来确定其年代是不准确的，但这把尺子的发现无疑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



⑪⑦在罗布泊遗址风蚀地面上发现的小古物，大部分用铁制成

这么多的遗物说明这里的人类文明高度发达，可就在旁边竟然发现了一块只有在原始人类时期才用来钻木取火的木块，这真令人奇怪，其中一端有四个烧过的孔，孔部分陷入木头中，边缘有个槽好像是用来将火星传到火棉上用的，一长条白色皮毛穿过孔与小木棍连在一起，木棍有个钝尖刚好适合这个孔，很明显这根小木棍是在孔中旋转用的，但要让它转得足够快还是需要有个转轮，很遗憾我却没发现它的遗迹。然而，在这个废址、尼雅、安迪尔以及敦煌西部古代防线上都发现了这种“钻木取火器”，说明在公元早期、在中国向西扩张的地区，这种取火方式还很流行。

没有一个毁坏的定居点能像一个大垃圾堆那样蕴藏着这么多的宝物，这个大垃

圾堆从城墙内部的中央地区延伸到“衙门”的西边，大约100英尺长、50英尺宽，南面墙高4~5英尺，向北逐渐缩小，中间有很多坚实的垃圾堆，其中包含有大量或散或聚的废物和稻草。刚开始清理这堆臭烘烘的东西，就挖出了大量的中国纸质、木质文书，尤其是距地面2~3英尺高的垃圾层的内涵更为丰富。我们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仔细地把这些垃圾筛选完。

刺骨的冷风带着细小的沙粒与古代垃圾的气味一同吹进了鼻孔和喉咙，气味煞是难闻。我许诺有谁发掘出具有特别意义的东西，他将在最后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激励了民工的干劲，发掘工作获得大丰收。我们共发现中文文书120份，还不用算上小碎片，大部分是木简，与以往的很多木简一样，大都约为10英寸长、半英寸宽，而且很多木简都很完整。然而，那些纸质文书却几乎都破碎了，但仍有一些纸

⑱罗布泊遗址古哨所中心的大垃圾堆（发掘中）



碎片较大，共计40片。佉卢文文书比较少，但与中文纸文书相比较而言，它们大都比较大且保存完整，其中一张纸质文书的书写方式与1901年在尼雅一个垃圾堆中发现的毛皮文书完全一致。

还发现了新东西，那是一个写有佉卢文的长条丝绢。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丝绢文书，丝绢在纸发明以前曾被中国人当作文书的书写材料。有两个古代长方形木盖，以及图章和线槽，十分像官方佉卢文文书的外套。它的发现满足了我的考古热忱，那上面的中文很明显地说明了几年前我关于用木简作为书写用具的技术源于中国的猜想是正确的，当初在尼雅发现的古老木简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更令人高兴的是下面这个新鲜事物，它带来新问题。有一小张纸上有两行不知是何种字体的文字，我过去从未见过。显而易见，它从右往左写，有一些文字和阿拉伯语汇很相似。仅凭借这样一小块碎片无法解开其中谜底，但那些明显带有西方文字特征形象的字让我想起粟特，甚至是古伊朗人，他们也许沿这条大路，或旅行或经商，来到这个能织丝绸的赛里丝（Seres）——丝绸之国。我把这个珍贵残片放到了一边，在这条古沙漠之路的东端有一座废弃的烽火台，我不知道在那里能否发现完整的丝绢文书。

从周围办公和居住用的房屋遗址中，又发掘出了各种各样的古代历史记录，比如大量的服装碎片，打碎的工具。衣服由各种各样的面料制成，从上好的丝绸到锦缎，再到粗糙的手织布，还发现了做鞋子用的皮革，以及毛线等碎片，让我尤其感到——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强烈——一种恍如隔世但又真真切切的生活细节。

古代垃圾堆中的发现给我的中国记录又添上了一笔，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十分鼓舞，希望从它们中间发现有趣的历史资料，现在一点一滴地开始收集。卓越的汉学家沙畹先生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这些文书进行了透彻的

分析。这些文书的字体是古老体字，有时候字迹非常潦草，内容断断续续，又涉及很多模糊的行政事务，这给我这位合作者、博学的中国古代考古知识专家造成不少困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克服重重困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与我交流他的释文与笔记，甚至在他出版相关著作之前，便已经让木简对于我而言变得不再难以接受，让我知道了这些记录所揭示遗址的当时情况。

首先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文书说明这个遗址是个小哨所，由一股中国军队驻扎，保护这条重要的古道，即从甘肃最西部的敦煌一直到塔里木河沿岸及其以北的绿洲。从早期中国史书中，我们大致了解到公元前110年开辟了一条由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罗布泊地区的路线，那象征着中国第一次向西扩张的政治影响，并在整个汉朝时期都在使用。但从那些文书中得到的信息还不足以确定它的确切位置。对于地质学或者考古学的考察方面，我在冬天与春天那段时间里收集了一些关于这条沙漠古道东西起点的材料，但这些需要文献资料加以证实。所以，本地出土文书中任何有关沙漠古道的信息对我都很重要。

中国史书中，有充裕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中国控制塔里木盆地时期，这条路一直是官兵把守最紧的一条，它沿天山南山脚下，穿越一系列的绿洲，从库尔勒（Korla）到喀什噶尔。当时大部分丝绸是通过此路运到费尔干纳（Farghana）与撒玛尔罕（Samar Kand，即古代粟特）。由于匈奴和其他天山北部游牧民族的进攻，中国统治了塔里木盆地，并派兵驻扎，以保护“丝绸之路”。看一眼地图，就会知道到达那一系列绿洲，最近的路线是从甘肃（Kun-su）最西部开始，经罗布荒漠（lop-desert）北部库鲁克塔格山脚下，恰好通过我正在发掘的遗址群，这就是中国史籍中所谓的“北路”。然而，现在这条古道上找不到饮用水，从塔里木到位于敦煌——若羌路线上的水井最近直线距离也有240多英里的路程，走完这么长的距离怎么可能呢？

M. Aurel Stein

除了中亚，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让我们体会到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在短时间内下降得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必须现在确定究竟要在这里停留多长时间。沙畹先生处理的文书中，有15件都是追溯到公元263—270年，当时正好是西晋的建立者武帝在三国（公元221—265年）鼎立后统一了全国，因此根据许多记录和沿线的岗哨来看，可以说在那时，这条古道上车水马龙，过往行人不断。但是，在第一个遗址里，我发掘出的一张纸片上面记载着公元330年，对某个胡人的惩罚，这就把中国守军在这里驻扎的时间往后推延了60多年。

很奇怪的是，在公元330年以后不久，有迹象明确显示这个哨所也就废弃了。那一年的年号（Nien-hao）是建兴（Chien-hsing）16年或是元年（公元313年是建兴元年)。西晋灭亡于公元316年，可以确定那时哨所已完全与中央中断了联系。否则，年号不可能沿用了14年之久。

另外一次考察提出这样一种可能，这种与中央中断联系的现象不只仅仅局限于这一个地方，它影响到了其他许多塔里木盆地的中国守卫部队。遗址不仅为一个边防要塞，它还是一种中转的“驿站”，以传达中国王权在塔里木的代表——西域长史（Commander-in-Chief of Western Regions）发布的命令，或者王室对西域长史的指示，或下级对上级的请求，我们从垃圾堆里发掘出土的6件文书说明了这一点。

其中一个是张氏（Chang-shih）给甘肃（Kan-su）某地的一位军官。另外一份文书内容是任命一位官员为西域长史文书侍郎中。还有一个有封泥槽的矩形简牍，内里的内容原来应该是官方报告或诉状，采用的是正规的官方文书格式：“因王督致西域长史，张（Chang）君坐前，元（Yuan）言疏。”这份文书本身很可能依照官方的传统写于木片上，后来被西域长史的下属带到别处去了。但是文书的封面仍然留在了垃圾堆里，向我们这些后人展示那位大人物所写的文字。



⑪⑲从尼雅遗址、罗布泊遗址以及敦煌古长城废墟中发现的中文木简

发现的木简并不少，只是大多已成了碎片。我们由此对当时的军事活动有了一点了解。很明显，当时的军事活动并没有在此地展开，而很可能是在遥远的北部或是西部。文献的大部分内容主要记录士兵的日常责任和义务等活动。正是他们的上司将“废文书”（弃置的木简）扔到了垃圾堆里。士兵们的职责是，照看食物补给，军事器械及一小队中国驻军的耕地。当时中国皇帝的政策是，在中亚设置前哨，此地的驻军即是用来保卫中国内地与前哨之间主要道路通畅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些记录日常行政工作的细微资料也能引起历史学者的极大兴趣，因为他们能从中找到组织方面的切实细节，这些细节虽然在中国政治扩张的史实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却从未被官方的记录所注意到。纪录中最大量的是负责当地军事文献的官员对谷物收成及储藏所作的陈述及命令。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工作人员的名单，他们要检查目录存货及口令。由此可见，当时流行的管理体制是很复杂的。针对个人或是小批特遣部队的细节化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每天给每人的粮食份额，我们还知道了他们每天是如何安排和使用骆驼、毛驴。由于不仅要保证来往人员，还要保证当地卫戍部队的食物供给，所以困难很大，这些困难可以通过一些不断重复的命令看出来。这些命令很有意思，它们不断催促将好几个等级的军官及士兵的粮食份额降低。

收支平衡的必要性被反复强调，我们意识到当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自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军事活动开始之时，人们便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将士兵用来垦荒，以便保证当地卫戍部队能自给自足，写在木简上的大量文字不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证据特别指出，土地被分给一小队一小队士兵用以耕作。这些土地有的已被灌溉，有的正要被灌溉，有的还有待清理。文字记录的有些地方，关于在哪些土地上种植哪种谷物或是草料都有详细的说明。

出土文书中提到了一位管理当地农业的主管，他很可能负责管理农业工具，比

如说铁锹、锯子和绳子。文书中有大量关于这些农业用具的申请使用及签收记录。文书中还提到一位专门负责灌溉的官员。在另一处，我们还读到了关于洪水冲毁了好几处堤坝的记录。在新疆低洼的三角洲地区，洪水一直威胁着农业耕作，这一记录便是一个非常切题的说明。除此之外，此地还有另一延续至今的危险，即是干旱。我们粗略地读了一封信，其中的内容向人们保证，赶着羊群的牧人往南走了一段路之后便看见了水。这样的事例说明，由于河道干涸或是改道，当时有些地区的丛林地带已不适宜于放牧。

从一位军械库的保管员自己写的或是收到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关于军事设备丢失的情况，还有为制作皮质盔甲、面具、弩弓而申请使用材料的报告。由此可见，虽然当时负责这一小片地区屯田的官兵，和平是其心中所想，但是军事战争的气氛仍未完全消除。不过总的来说，除了官员的活动之外，记录的大部分便是关于士兵的了。我们发现，这些士兵们被称为“胡人”（Hu），即是野蛮人。有意思的是，到处都有比较明确的暗示，他们的国籍总是：大月氏（Ta Yueh-chih），即印度斯基泰人。很明显，中国官员管辖下的这个驻地，或是其他位于西域的更重要卫戍部队中，外国雇佣兵主要来自于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眼中，他们有匈奴（Hsiung-nu 或 Huns）这个传统敌人的遗传。

我们从汉代的官方文献中的得知，大月氏（Great Yueh-chih）人，即后期的印度斯基泰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被匈奴人从天山北部的平原地区驱逐了出去。他们先是到了粟特，后来又来到了阿姆河流域。以后的好几个世纪，即使是在他们攻克北印度之后，其主要势力仍活动于阿姆河流域地区。与此同时，匈奴人在天山北部地区发展壮大，经常袭击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及穿越于其中的重要路线，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由于当地居民同现在一样厌恶战争，又因为匈奴被内部纷争搞得四分五裂，中国聪明的政治家们便转而从它西边的邻居，即印度斯基泰人处招募士

兵。因为两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匈奴人，所以他们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把罗马帝国在同一时期北部边界地区的情况与此地的情况相比较，将会得到很有意思的结果。

然而，从这个遗址出土的文书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并不是像上文中所述的那种中国中亚政策的大政方针。文献中所提及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关于个别士兵的事件。例如，我们从文书得知，因为上司的粗心大意，有一人被水淹死了，这位上司继而被严惩。这件事被描述得很仔细。在另一件文书上，我们看到了一张有关衣物的清单，这是发给一位新到的"胡人"士兵的。

出土文书中也有关于纪律问题的简略记载，其中有这样一条很有意思：去楼兰的人如果返回的早，其安全便能得到保证。这件文书清楚的陈述表明，当时遗址所在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楼兰。在前文中我曾暗示过，从中国的文献记录中找到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楼兰王国的首领们最可能将位于若羌或米兰的绿洲作为其国家都城所在地。所以，如果根据东方人地方称谓的一般方式，此文书的作者将楼兰指称为整个罗布泊北部地区的首府，我们便能很容易解释上述这条记载了。

在我做出上述分析以后，沙畹又对中文纸质文书进行了分析研究。所研究文书的大部分都是私人信件，其中有一些内容很全，有时能给我们一些关于中国卫戍部队生活的提示。但此处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详细叙述了。

幸运的是，我的中文训练很不足，这样一来，当理解这些记录时，我便不会将时间花在一些让人棘手的细节上了。要知道在那些极度寒冷的日子里，有多少工作需要我的体力和脑力付出。晚上刺骨的东北风永不停息，我虽然能躲在小帐篷里，但是在墨水被冻成冰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做记录、清理、打点、储存发掘出的"结果"。

我竭尽所能，尽快在所有能找到的遗址上进行发掘工作，因为冰的储量在急速地减少。测量员刚从西部的遗址处返回，他说那边也有好几天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托合提阿訇带着骆驼去了阿勒特米什布拉克南边的泉水处，他于 12 月 22 日返回。据他的消息，南部的水非常咸，无法形成冰。可怜的骆驼尽管已忍受了 10 天的饥渴，也不愿去碰那咸水。我本想留出足够的时间给西部遗址的发掘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更是焦急万分。托合提阿訇从西部遗址出发又搜寻了两天，但未能找到新的遗址点。既然从泉水处带来冰的希望已落空，对此我也就不那么遗憾了。当天傍晚，东部遗址的建筑遗迹及垃圾堆的发掘工作已经完成。终于，我总算能松一口气了。

M. Aurel Stein

第三十五章

艺术品之发现

我曾把骆驼送回中途的贮藏所，为的是储存补给及冰块。现在，它们及时返回，我便能着手安排将营帐移到西部遗迹了,这项工作直到12月23日傍晚才结束。因为距离只有8公里，我能够利用一上午的时间让大家将已清理出的遗迹重新掩埋，以起到保护作用。我自己则忙着对佛塔做一个详尽的计划及绘制其正面图。佛塔高足足有30多英尺，看起来就好像在守卫我们曾经发掘过的地方。我的这项任务可不容易，因为佛塔的外部特征已因风化及赫定的工作人员的发掘而遭到破坏。但最后，我终于成功地绘制出了3处佛塔的方形基址及其八角形塔身、圆形塔刹的立体形状。这座正统的佛教建筑完全是由土坯建成的。

就在考察的过程中，我在第二座最低端基址里发现了一个金属卷尺，这正是赫定1901年遗留在这里的。当然，这卷尺原封不动地留在此地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因为在这几年内，不大可能有人来此；同时，这里也没有流沙和风的侵蚀。两年后，在伦敦皇家地理协会举办的一次非正式晚宴上，我把这个小工具交给了它尊贵的主人。此事对我而言本是小事一桩，但却被报纸广泛报道，想起来真是有趣。

将营帐移到西部遗迹的路上得不断穿越雅丹和起伏的沙丘，这一行程对我们所



⑳罗布泊遗址佛教寺庙废墟（发掘前）

有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骆驼本来就不多，它们无法承载的行李及补给只能由民工们背着。我曾患有痢疾，这些天来因为总是在户外辛苦工作，痢疾又发作了。但12月24日一大早，我还是能够坚持从一小处遗迹干起。此处遗址包括了1900年赫定的一位工作人员偶然发现的一处佛寺。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陆续从这处佛寺发掘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木制雕刻品。由于他总是从东部的营地出发，所以他的发掘工作不得不受到来回往返的时间限制。因此，我觉得应该还有东西有待发掘。此处遗址包括上文中已提到的被严重风蚀的佛寺，以及在其东北及西南侧两处更大一些的建筑，很明显那是用来居住的。整个遗址占据了一座像小岛一样的高台的顶部，这高台长约200英尺，高约28英尺，高台北边是一片被风蚀的土地。

我最先开始清理的两处定居点很有意思，几个大房间里至今还保存着用树干和篱笆建成的墙壁，我很熟练地考察遗址建筑上的细节特点。墙壁最初有10英尺高，但在很早以前便向内全部倒塌了，堆在地面上，这样反倒躲过了风蚀。两壁是篱笆，篱笆中间是8英寸厚的灰泥，篱笆下部是一束束茅草，呈横向排列；上部是一种红

M. Aurel Stein

柳枝，织成斜纹。很明显，这些建筑物荒废不久，里面的物品就肯定被人彻底清理过，因为尽管倒塌墙壁的表层保存得十分完好，但是我所能找到的东西，除了一些汉代铜钱及烂掉了的普通丝织品、羊毛及毛毡制品外，只剩下一个大食橱上的几块木头而已。这种类型的食橱至今仍在新疆绿洲广泛使用。食橱前腿有17英寸高，其上布满精美的木雕；另外，食橱上还有几片镶板。雕刻风格毫无疑问地说明它是希腊风格佛教艺术。这具有一定的意义。

下午，我们的工作转向清理成堆的木头碎片。这些木头覆盖着那座已经被风蚀的小高台的中部，并标志着佛寺的位置。我希望能发掘出其他同样类型有艺术价值的东西，这个愿望很快就得以实现。即使是在位于顶部、没有任何沙层保护（正如赫定的工作人员离开时一样）的木制品上，我也发现了雕饰过的嵌板及柱子，其上

⑫罗布泊遗址寺庙附近的小佛塔废墟，建在正在遭风蚀作用的雅丹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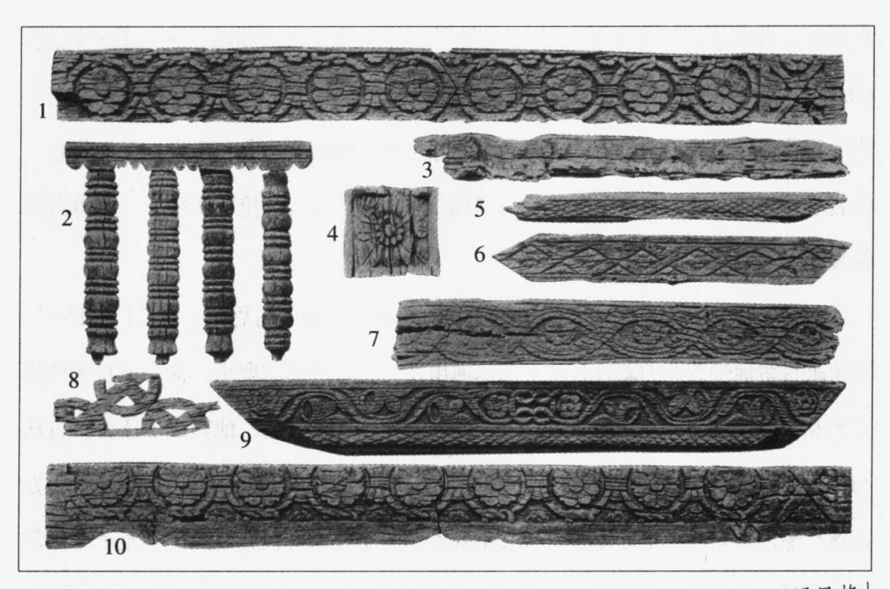
仍部分保留有美丽花纹的浮雕。其他的木制品由于完全暴露于阳光和风中，表面已严重褪色和干裂。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些已破裂的碎片，我也能发现一些熟悉的花纹雕饰的模糊曲线。我是从远离这里的犍陀罗雕塑了解和熟悉这些花纹雕饰的。

在高台东南斜坡处，流沙的堆积至今已有3~4英尺高。当我发现了有无数雕刻精美的木制品被掩埋在这里，并由此得到了一处安全的避难所时，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这里，我发掘出了很多粗梁柱，超过7英尺长、8英寸厚，绘有大量的八瓣莲花图案。我记得很清楚，1901年发掘尼雅遗址的一处居室建筑时，我曾在一幅壁画上看到过这一图案。其余的梁柱长达12英尺，可能也是用来做柱子的，上面的浮雕图案非常精美：大菱形中有盛开的四瓣花。这种图案在犍陀罗艺术中很普遍。有一长5英尺的木刻雕饰，可能是用来做门楣顶部的，系莨菪叶形及铁线莲的交织华饰。

所有这些部件可能都属于同一处建筑的装饰部分。这一建筑大致是方形，主要以木材建成。建筑物的外层基柱位于东南及东北面，长度分别为19.5英尺及18.5英尺。基柱在高台的顶部，仍然保持着其基本的形状。在东南梁柱的前方已被侵蚀的斜坡上，罗列着墙壁木制基架的遗迹。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风吹日晒，它已被刮到了斜坡上。房屋顶部的梁柱保存完整，我们能看到为搭起梁柱及楣石而制作的榫铆。在东端角落里，两个柱子仍立于原位，二者由一横梁连接。

小佛寺墙面相当一部分可能因为采光缘故而被掏空，其他发现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嵌板上的图案不仅有格子状的，还有其他各种形状及大小的花饰，以及各种怪兽的头及身体，其中有一头怪兽，嘴巴像鳄鱼，脖子很长，角被扭曲。尽管这些嵌板保存不够完好，但图案造型灵巧，有丰富的想象力。显而易见，这些镂空的嵌板曾是屏风或隔板的一部分，目的是阻挡夏天的暑热及强光。

佛寺内部也有许多装饰华丽的木器构件，1.5米高，顶部的栏杆4个一组，其



⑫从罗布泊遗址佛教寺庙废墟出土的装饰木刻，为犍陀罗风格

目的是作为一系列小双托架。室内其他装饰物包括：小佛塔模型；木制雕饰大约3英尺高，有基座和屋顶；一排蘑菇状的伞；大块木制圆花雕，可能是用于拱与楣之间部分的装饰，以及其他装饰品。然而，与佛寺内原来可能拥有的物件相比，现在能最终得以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比如，木制人像雕饰的手及前臂，质地优良的灰泥小块，这些小块灰泥上有浮雕的痕迹，好像源于一真人大小浮雕戴着珠宝饰物的手臂。这些灰泥碎块均出现在东北部的斜坡上，那儿沙层非常薄，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对于这个建筑物另两边来说，保护条件也不好。但令人感兴趣的是，沿着西南斜坡往下几英尺处，有一小堆垃圾得以保存下来。其中除了常见的各种各样已烂掉的丝绸和帆布外，还有一些中国物品的残块。

建筑木刻雕饰相继出土，地面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这时夜幕已降临。我完全被发掘工作所吸引，不像那些疲惫的民工那样注意力被来自营帐方向的人所分散。

突然间，我注意到正在发掘的人中间起了一阵骚动，大声叫喊“达克其开勒地”(Dakchi keldi，意即邮差来了)。我无法相信他们，但当我抬起头，我真是大吃一惊。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忠厚老实的吐尔地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背上背着一个袋子。与他同来的有穆罕默德·朱、贾斯旺·辛格，还有一位罗布猎人。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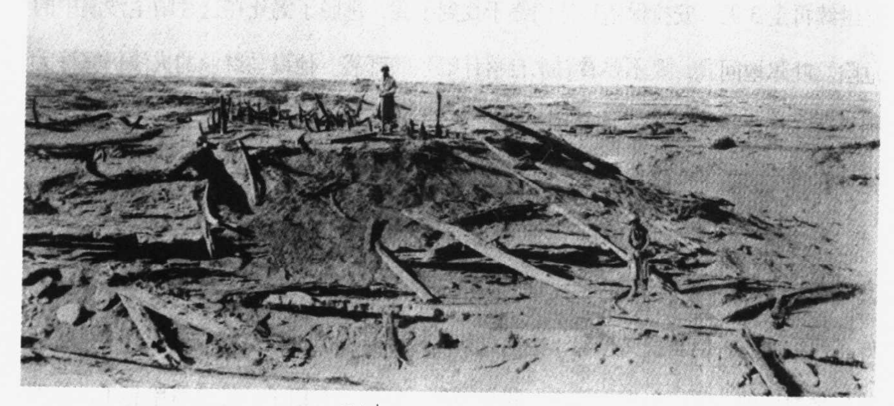
起初，我觉得忠诚的邮差从和田到此地的突然出现不可思议。在11月15日，我亲眼目睹他带着我的邮件袋从安迪尔河出发。我有严格的要求，命令他将邮件袋交到和田的巴德鲁丁汗 (Brudruddin Khan) 手上。12天后，他完成了任务。自从与他分离后，我朝相反方向行进了500英里，其间几乎没有停歇过，但现在他正处在这严酷的罗布沙漠中心地带，转交给我巴德鲁丁汗的问候，以及原本是3个但却硬塞成了一个的喀什噶尔邮件大袋子。队员们像能早下课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感激，将令人尊敬的邮差围在中间，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是的，他千辛万苦，做事尽职尽责，到了和田，到了汗萨合普 (Khan Sahib)，在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便带着新邮件断然离开家。这次他骑了一头雇来的马，并穿着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从和田到阿不旦一般需要30天，但他只用了21天。在阿不旦，他发现我已离开，没有人知道如何能赶得上我。吐尔地忠诚无比，非常质朴，他义无反顾，前来找我，并最终找到了。

阿不旦的伯克看到他决心如此之大，便找来那位年轻的猎人给他做伴。正是这位猎人一直保持着阿不旦和柴鲁特库勒两地间的联络（我在柴鲁特库勒留有仆人)。伯克觉得这样对吐尔地最安全。他们骑着毛驴用了一天时间来到柴鲁特库勒。以后的5天，他们沿着我们留下的足迹以最快的速度步行。出发时，他们对我会走多远去寻找遗址毫无概念，到离开阿不旦的第五天傍晚，他们从我半路上的贮藏所带出的一点冰也用尽了。第六天中午，他们到达了我们位于东部遗址的营帐，但发现是

空的。因为那天早上测量员新带着一批骆驼从盐泉归来，将营帐中的冰袋和补给都清理干净了。他们非常焦急，不知道我们到底走了多远，也不知道何时才有希望赶上我们。但是，他们忍住口渴，仍然继续往前走，并决定不再回到储藏所取冰，而是继续再走3天。安拉保佑！他们终于找到了我，逃脱了渴死在这片陌生沙漠中的危险。吐尔地问我，要不要看看来自喀什噶尔的邮袋。他说马继业的火漆仍完好无损地待在小火漆盒里，火漆盒则被缚在绳子的终端。把东西亲自交到我手上之后，他才在营火旁睡了个好觉。

对于我在沙漠中孤独的圣诞夜来说，这一大袋子邮件的降临是一个意外惊奇，真是喜从天降。回到营帐后，我要下属招待吐尔地喝茶，并拿出我食品储备中所有好东西给他吃。但当我又想起，他差点和同伴葬身沙漠，我觉得我非得为他的鲁莽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但那天傍晚，我只顾高兴地拆信看信了，把这事给忘了。虽然这些信都是4个月之前的，但在当时却抹去了我在异乡孤独寂寞的感觉。我借着微弱闪动的烛光拆开了最后一封信，至此我读到的全都是好消息！我真感激吐尔地，他带给我这样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同往常一样，一旦我突然与远方的世界有了联系，我便很难入睡。我醒着躺了很长一段时间，裹在毯子和毛皮大衣中，想忘掉寒冷，忘掉受伤疼痛的手指，但却没有用。周围的宁静是一种享受。我的思绪在我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圣诞聚会的各个地方，自由地飞来飞去，从喀什噶尔到遥远的牛津。

第二天早上，吐尔地不再有昨日英雄般的魄力，他看上去正如以前一样——一个诚实却相当愚蠢的家伙，除了尽职完成递送邮件任务之外，懒得无可救药。对我来说，尽管有大量工作要做，但仍沉浸在节日的快乐之中。而且，当想起工作将会带来大有前途的成果，这种欢乐就更强了。在我们最终将上文中提到过的佛寺中的建筑木雕清理完毕后，中午，我带着人手来到东南约1英里的地方，这里有两座连在一起的建筑遗址。其中的一座由于地面已被彻底风化，变成一堆零碎的木块。



⑫罗布泊遗址部分废墟（发掘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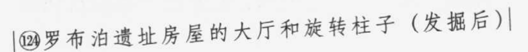
但这些遗迹中有装饰用的木雕，包括有华美雕饰的柱子，双托架，及镂空的嵌板。这些都是我们从没有被沙堆掩埋的斜坡上捡到的。上述遗迹说明，此处很可能曾有一座佛教寺院，它同我们以前考察过的那座佛寺在建筑形式和建设时期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距此地向西30码处有一更大建筑物，占据了一个大平台的顶部。幸运的是，这一建筑遗迹未受风沙侵蚀。我们接下来的发掘证明，此地之所以保护得如此之好，得益于一层厚而坚实的羊粪。这些羊粪在这个古代房屋居址的内部及四周均厚厚地堆积了一层，很明显当这座房屋荒废后，曾在很长时间内被牧羊人当作休息场所。

随着那保护层下有趣古物的重见天日，我愈加肯定这所房子原来曾经住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这其中有佉卢文官方所用形状的文书，保存得相当完好，有毛毯的片状残迹，织得非常细密华丽，用色考究，还有木制嵌板，很明显是属于食橱或

类似家具的一部分。嵌板上雕有花饰浮雕，形式源自希腊古典样式。有些物件看起来是用来书写的，木头上有书写痕迹；好几个独立的带封泥的木牍，封泥使用方式正如同马继业先生寄给我的邮件所采取的方式一样；一个令人好奇的，差不多呈方形的木牍，其表层除狭窄的四边外微微下陷，就好像等着用蜡或是其他类似覆盖物的涂刷，这种方式就是古典记事书板所采取的方式；一块平整的石头，是用来磨墨的。

建筑物内部有一大厅，长 28 英尺，宽 25 英尺。大厅顶部曾由 4 根装饰华丽的柱子支撑，这 4 根柱子至今仍立在原位上。柱子上部残破及裂开的程度非常严重，柱子下部因被埋在厚至 2 英尺的羊粪中而保存完好。在此处羊粪层下发掘出来一个木盒，是由树干粗略刨制而成，可能是用来喂牛的。这些发现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


⑫④罗布泊遗址房屋的大厅和旋转柱子（发掘后）



种差别，即该建筑最初的作用与当地古代居民重新进入原始畜牧业阶段后的作用之间的区别。

就精力和时间而言，清理这些坚固的垃圾堆比简单地挖沙堆要费时费力得多。因此，直到12月27日，我们才得以看到这一片遗址中最好的遗迹。这其中有两件有着奇特造型，并已着色的木制家具，可能是椅子的扶手。这两件家具十分形象地展示出了所有当地艺术与遥远的西方艺术间密切而又多样的联系。一件家具饰有浮雕，漆上得非常精巧复杂，是一头怪兽，可能是狮子，代表狮爪四周卷毛的线条亦上了多种颜色。很明显，这种设计属于波斯（Persepolitan）风格，来源于亚述(Assyrian)。另一件家具更大一些，呈圆形，系复合型图案，下部是马腿和铁环，上部则是人的胸部及脑袋，它的脸让人想起希腊的斯芬克司。上下部分通过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花来过渡，胸后两侧似有小翅膀，这更进一步说明，它来源于希腊古典的怪兽形象。

同样具有西方色彩的是一双装饰华丽的小拖鞋。这双拖鞋曾被穿在一位女士的脚上，质地相当不错。鞋底是皮质的，较薄，鞋上部由奶色羊毛织物，是一种相当考究的织锦法。鞋的前端条纹是十分精细的几何图案，上色巧妙，让人想起科普特人（Coptic）或拜占庭式（Byzantine）早期的造型。鞋头一侧因长期磨损而被补上了一块难看的皮革，同优雅的鞋子整体形成强烈的反差。

建筑遗址中有大量的柱子及镂空嵌板的碎片，其上有莨菪叶形、月桂叶形或其他古希腊经典叶形的花饰雕刻。柱脚部分较大，为长方形，用象牙制作，很明显其造型源于印度。室内还有汉文木简、丝绸碎片及竹制漆器，这些很可能源于远东。这间屋子内的遗迹好像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专门为我准备带回家的圣诞礼物。由此可知，这片中亚已被人遗忘的角落是如何通过艺术、贸易及文化的交流与所有古代的文明世界发生联系的。

M. Aurel Stein



(125)从罗布泊遗址废墟中出土的装饰木刻，部分为古典风格花纹

几天来，天空一直都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不断地进行着发掘。与此同时，我有机会对邻近地区做了大量考察。至于考察的结果，在这里只能提及位于遗址北部及西北部的大片芦草栅栏的发现。据我推测，栅栏一定是用来围起一个大果园或花园。芦草自身虽弱，但围成一圈后却成功地扎根于流沙当中，并形成一道清晰的防线，有效地阻止了风沙的侵蚀。因此，在有芦草庇护的一边，我们还发现死桑树及沙枣树的遗迹。距离此地西边约100码处，我发现有8株人工栽培排成一行的白杨树大树干，这是我在此地发现的唯一标本。其中一株长约47英尺，圆周6英尺。由此可见，在此处荒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有农业耕作。

在拉依·拉姆·辛格及罗布里克猎人的帮助下，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搜寻，但除了赫定已经发现了的东西以外，我未能找到其他建筑物遗迹。原有的遗迹风蚀严重，在整个发掘工作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如烧过的土坯，但我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超过1天。因此，我将日程重新作了安排。12月28日傍晚，所有去北部盐泉的骆驼都得以返回，我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这里的环境非常恶劣，到现在我们已辛苦工作了11天，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本希望骆驼能从盐泉那里带来些补给，现在既然没有，我们冰的储藏量已经非常少了。本来冰可能会变得更少，但在我们到达的那天下了一场暴风雪，落下的大雪一直覆盖到盐泉边的山脚下。一小部分雪水融化，牲畜得以饮用。大家长期处在大风不断的恶劣环境下，白天辛苦工作，晚上还得忍受刺骨的寒冷。这样一来，患病的人不断增加。测量员患有风湿病，大多数时候不能参加我们的工作。我自己则因为辛苦工作，痢疾复发，吃尽了苦头。

现在，我们该重新回到有水、有生命的地方去了。为使行动更有效，我决定将整个队伍分成两组。大队人马将带着考古收获返回阿不旦，约有4头骆驼行李，他们将按原路返回。原本希望测量员能在沙漠中对可能出现的新路线进行地形考察，但他的病情严重，只好负责返回的分队。我重新挑选了6个人，如有需要，他们仍

能进行发掘工作。我将带上他们向西南部尚未探索过的沙漠地区前进，继而到达塔里木。我从最早开始便非常想沿着一条新路横穿罗布沙漠，而且我非常想利用这次机会，不再有大队人马及特定考古任务的拖累，自由前进。

至于选取哪个方向，我则考虑了好几个方案。最诱人的是沿着库鲁克塔格山（Kuruk-tagh）东进，如有可能，则去寻找一条古时的贸易路线（过去中国曾派兵驻扎此地，保护来往客商）并沿着它行进。沙漠中有一条路线至今还联系着若羌和敦煌，古时的那条商贸路线正是从这条路上分途而去。但是我非常清楚，至少在120英里长的路线范围内找不到可以饮用的水。由于有盐沼泽及其他一些逾越起来非常困难的地面障碍，到最近的淡水井的距离也相应拉长了好些。再加上没有冰，以及牲畜提供新的补给，想要穿越罗布沙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们还可以沿着库鲁克塔格山脚至塔里木一路追寻旧日的商贸路线，但在这条西部交通线上不大可能有任何新的发现，因为赫定在第一次前往楼兰遗址时便已走过这条路线了。而且在那之后，亨廷顿先生马上从相反的方向穿过了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部的狭长沙漠地带。他确实发现了古河床，那便是现如今孔雀河（Konche Darya）的旧日延续到楼兰遗址那里的痕迹。但他并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所以我也不会选择这个方向。如果能深入到沙漠西南方，我便能考察整个尚未被开发过的地区。这条路线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便是麦尔得克协亥尔（Merdek-shahr）的炮台遗址。它离塔里木东部咸水湖并不远，赫定1896年曾看到过。我也想在开始米兰的发掘工作之前去考察一下。

方案既以敲定，为两队人马出发作安排就容易了。我用当时所能利用的所有材料将古代木雕打包，这费时又费力。但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印度人在内，都因马上便能离开这荒芜的工作地而异常兴奋。他们趁着营火，兴高采烈地做着这项工作，直到深夜。

M. Aurel Stein

第三十六章

横穿沙漠，到达塔里木

12月29日清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没有刮风的日子。我们离开了古代遗址。所有经由阿不旦回家的民工都已领到了薪水，我们用银币及俄国金币雇到了毛驴，在一头骆驼的背上为拉依·拉姆·辛格准备了一个舒适的躺椅；我又最后嘱咐了穆拉赫几句，由他照看已解散的民工。上午10点，我目送大部队安全离开，自己则向遗址道别，朝沙漠西南方向深入。同我以前不得不带领的营队比起来，目前我这个团体真是小得可爱，这其中有克什米尔厨师拉姆赞(Lamzan)，他老是阴沉着脸，而现在他的脸由于有数星期的污垢和灰尘的积累而变得比以往更黑；有我的贴身仆人，穆罕默德·朱；还有奈克·拉姆·辛格、依布拉音伯克、托合提阿訇，懒惰但好脾气的吐尔地及6位从若羌挑选来的民工，如果需要发掘的话，他们将派上用场。因为我知道，在通过塔里木侧面高大沙丘时，我们得做好翻越沙丘的准备。所以我留下了10头骆驼来驮行李，尽量减轻我们自己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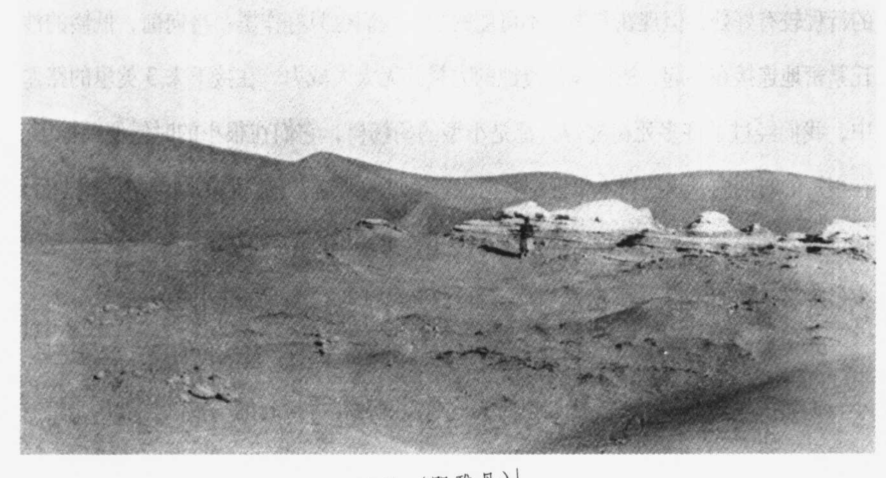
穿过风蚀的沟渠及巨大高地，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已很熟悉。走了4英里后，看见了在到达遗址那天曾遇见过的旧河床。此处河道非常宽阔，从西向东蜿蜒而来。我们一直都走在分布着雅丹的低地上，驼队在这种地域行进得非常轻松。然而，河

床尽头不到2英里，就要走出这片低地时，想到这儿，心里感到异常沮丧。由于东北风非常寒冷，我们本想至少可以把这片低洼地作为新旅程的一部分，这样对我们的行程较有好处，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也只好作罢。再向前，低矮的沙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所以风沙侵蚀的力量并无太大威力。在接下来3英里的路途中，我们经过了许多死树林带，都是小型的胡杨树，它们在很小的时候便死掉了。在很短的时期内，这些树木带标记着河水曾流过的河道，它们似乎同旧河道相平行。接下来，便是光秃秃的地面，风蚀也不严重，上面堆积的沙丘仅高6~7英尺。这时夜幕降临，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在一行自西向东排列的死胡杨树林带旁歇息。

毫无疑问，由于洪水泛滥，汉代时此处曾是优良牧场。自从我们离开主河道后，小青铜器的发现就很少了，比如说箭头。在当晚营帐旁捡起的一枚汉代硬币是唯一

⑫⑥整装待发，准备从罗布泊遗址出发的骆驼





⑫罗布泊沙漠中沙丘之间的黏土阶地（即雅丹）

一个能推测年代的东西。当然，在风蚀尚未触及到的地方，仍有一些更早时期的遗迹。因此，在这第一次远足中，我们便遇上了一些很罕见的粗陶器碎片，应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营帐附近我还捡起了一块质地良好的石斧或是玉斧。它有4英寸长，毫无疑问属于石器时代后期，它所处的年代究竟和本地区最早历史纪录的时代有多接近？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

12月30日，多云，风向改变了，风从西边及西北边吹来，但这一天的行程还是较轻松的。一路的重大发现都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典型的从东北方到西南方的风蚀地貌在那些荒凉的河岸及荒原上再也看不到了。开始时沙丘尚低，但后来逐渐高起来，沙丘之间平坦荒凉的地带则越来越窄。走过大约8英里后，不断碰上死去的托格拉克林，树林周围是半月形的沙丘，高达25英尺。由此形成的低地自北向南呈一条轴线分布，但仅有100~200码长。沙丘地带每隔3~4

M. Aurel Stein

英里便能发现托格拉克林带。由此可以看出古河床源自西北方，显然是曾灌溉过古代定居点的那条河流的支流。

在我们前往遗址的路上，在我们右侧东边更远的地方碰到了已枯死的树林。在平面图上，古河道正与树林相接。令人好奇的是，在第一条托格拉克林带（大约离CXXVI营地4英里），我找到一些落下后埋在沙中的枯叶，好像一小部分树木一直活到最近。在下一个林带附近，仍有少量多节的枝干活着，散布在一个红柳包上。

离此地不远，大概距我们最后的营地9英里处，一位民工捡到了一块铜镜碎片。碎片背后有浮雕装饰，同我们在上一处遗址发现的非常相似。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所找到的最后一丝能证明历史上曾有人来过此地的痕迹。由于沙丘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集，骆驼行进起来非常困难。仅向前走了13英里，天便黑了下来，我们于是停了下来。这里是高大沙丘下一片狭窄的风蚀地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古老河床的堤岸一样，只不过这条河流早在几千年前便已干涸了。托格拉克大树干已褪色并干裂，几乎辨认不出原本树种了。它们极易燃烧，就像火绒一样好用。周围的一切是毫无生气，有这样的篝火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次日清晨，风和日丽，天气比我们预想的要晴朗得多，空气非常清新，向地平线望去时，一切都非常清晰。北边是库鲁克塔格荒芜的沙丘；南边是白雪皑皑的其曼塔格。走在广阔又毫无人烟的低地上，能看到远方的山脉，这对我们真是一种安慰，低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到边了。走了半英里后，密集的沙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风蚀明显的平地。这片平地的表层较软，泥土的连接性似乎不太好，其间大片大片的地方都厚厚地积了一层蜗牛壳。以前在雅丹的斜坡上，我经常能注意到在风蚀过的那层土上会有蜗牛壳的积淀。它能证明，古时此地的灌木丛或河流中有流动的水。但我从前从未见到分布如此广泛，这么均匀，这么丰富的蜗牛壳的积淀。经受了长时间的风蚀作用，此地仅存有少数雅丹沙丘。这些沙丘在低矮的沙

丘中显得像岛屿一样。离营帐大约3.5英里处，我们碰见了死去的托格拉克树林，树林的周围是高约30英尺的沙丘。

从此地再往前约3~4英里远的两处地方，有绵延不断的沙丘，就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达坂一样，同被风蚀的平地相比大约有50英尺高。除这两处之外，我们所走的都是平地，这要相对容易一些。对此我非常满意。但随后不久，我便发现，除了上文中提到过的那片托格拉克林之外，古树的遗迹完全消失了。一直以来我们都以这些枯木做燃料，这样骆驼便不用背负燃料，可以少驮一些东西。这种做法一直都很顺利，我们便忽视了碰到意外情况时应有的准备。我让工作人员在驮袋里仔细搜捡出所有能找到的枯木的碎片，但找到的总共加起来只有几磅重。这时天色黑了下来。

这个晚上是190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但看起来不会好过了。虽然我非常乐意在宁静的沙漠中享受独处的快乐，可是一想到无法烧热水，又不能将食物加热，我怎还会高兴得起来。在找到塔里木的林带之前，我们还得继续忍受沙漠中的寒冷。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欢度新年呢？一整天走了14英里后，骆驼已精疲力竭，我则躲入一顶未生火的帐篷里。这时，在低矮的沙丘中，我发现在一处高达25英尺左右的风化高地上有一个浅黑色的土包。这是一个红柳包，其上有少量早已枯死的红柳根茎。我赶紧让人把它们挖出来，并燃起了营火。我们就围坐成一圈，开始准备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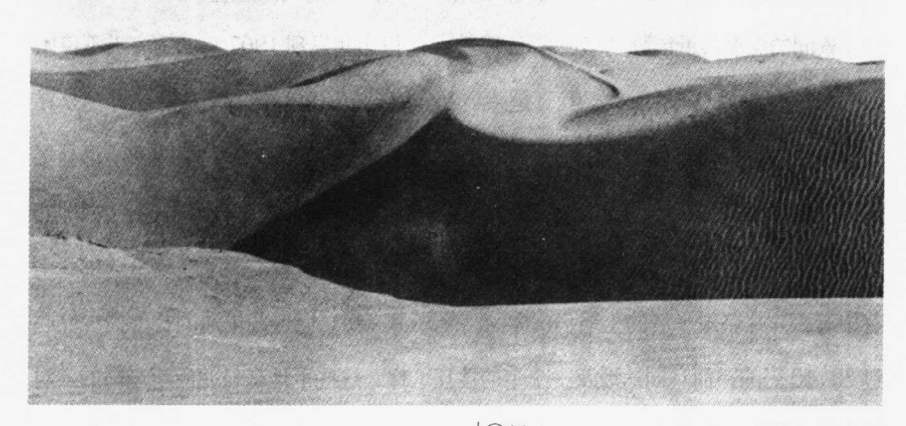
这个红柳包旁边的土地摸起来有些潮湿，而且表面还覆盖着一薄层盐，所以其下一定有地下水。但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走过的地方在很久以前曾是一个湖或灌木丛。但到底是多久以前呢？就目前而言，没有地理学或考古学上的证据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这一天的路程上，时而会有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器具出现。在此地被水淹没之前，使用这些器具的人们

是这里的最后一批居民吗？在这种问题的答案没确定之前，我们必须在整个罗布沙漠地区做非常细致的考察。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用于此的时间。同时，死树林及由此而标志出的古河床在此地完全消失。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

夜间的温度最低能降到华氏零下13度，所以当我发现1907年的第一天不仅阳光和煦，而且没有风的时候，我真是感到万分地感激。早间没有火取暖，即使是在太阳下，气温也只有华氏零度以上几度而已。这一天的行进对人和骆驼来说都是很辛苦的，因为每隔2~3英里就得翻越又宽又高的达坂，有些高达60多英尺。即使是达坂之间的低地也大部分都由连续不断的低矮沙丘覆盖着。偶尔在狭窄的槽状山谷中有一片片坚硬平展的土地，这样的路便好走一些。但这些平地的长度极少能超过30~40码的，而且同达坂及一个个的沙丘一样，这些平地是自北向南走向的，对我们的进程阻碍作用不大。

我尽量稳住步伐，向西南方前进。在翻越接下来的达坂时，我能坐在骆驼上，但是即使是这样，骆驼走的路也是高低不平。我们沿着达坂顶部走了大概半英里，又横穿了连接达坂的像山脊一样的地峡。我们不得不经常同这些沙漠上的绝壁打交道，它们或大或小，在我们的行程上呈对角线拉开，非常累人。不过它们的分布很有规律，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据我从塔克拉玛干干涸的河流地带所获得的经验，我可以作出判断我们正走入靠近河边的沙漠地带，这一地带同塔里木是平行的，而塔里木则是从北到南延伸开来。

达坂之间的平地则非常平展，松软，到处可见淡水蜗牛壳。离营帐12英里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干河床，看起来以前这里曾是个咸水湖。河床西侧有非常明显的河岸痕迹。在十几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死树到此地还是未出现，我们不禁感到一阵焦虑。从四处找回的枯木碎片已烂的不成形了，我们无法判断它们属于何种树，或是长于何处。走了大半天，非常辛苦，但仍未能



⑫⑧罗布泊沙漠中的达坂，高约50英尺

找到可当燃料的枯木。这时在一片硬灰泥上，我们发现了少量枯萎得非常严重的红柳根，只要几个人就能把它给抱完。但我们已可以释然，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今晚不必忍受没有热水及食物的痛苦了。夜幕降临，我们不得不在一处高大的达坂的脚下扎营。这不是个令人高兴的地方。夜空中繁星闪亮。这个晚上是这年冬天中最冷的一个晚上，最低气温降到了华氏零下48度。然而，当冰被火融化用来煮茶及煮食物后，我们便没有多余的枯木来点营火取暖了。

次日一早，我们从骆驼驮运的行李中卸出一些驮架，用于煮茶和取暖。然后，便开始了一天令人鼓舞的行程。我们有4座达坂需要翻越，但其间相对空旷的荒原（有低矮沙丘及偶尔出现的风蚀台地）看起来越来越宽阔。我们在已被风蚀的坚硬土地上时常能看到两天半前遇见过的死树。它们以小块的形式出现，无法判断出其生长地点。因此，当走过10英里，我们发现了几个红柳包时，真是非常高兴。这些枯

木腐烂得非常厉害，年代久远。走近后，又发现了一些粗陶罐的碎片，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与我们在途中碰见的粗陶罐碎片一样。

我想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便提出谁能第一个发现树或动物的踪迹，谁便会得到奖励。不久就有人大叫起来，说发现了死红柳枝。在低矮的沙丘中，仍有一些枯萎的枝干直立着。几乎是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前方有一块“福地”，这令人倍感欣喜。我看到犹如芦苇种子似的毛绒状物体在空气中飘动，这是有水、有植物生长的标记。罗布人管它们叫帕喀瓦希（Pakawash）。在翻越过一座宽阔的达坂后，我们于傍晚在它西侧的脚下扎下了营帐。这是一处长约1英里的低地，有大量死红柳枝，其中许多都很大，由北向南排开。很明显，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内，塔里木地区曾经灌溉过的咸水湖及河床就在不远处。但死树的枝干看起来又无疑比尼雅遗

⑫⑨在罗布泊沙漠中穿越达坂的骆驼，时值1907年元旦



址处的还要更古老一些。我们终于能点起篝火了。在闪耀的火光中，大家都非常高兴。我觉得，在经过上个月的劳累及忧虑后，我能稍稍给自己放个假了。但我们的补给即将用尽，想到这一点大家就高兴不起来。同时，一些骆驼也不断显出精疲力竭的迹象来。塔里木东部的咸水湖何时才能映入我们的眼帘呢？

正如大家所预料的，在1月3日的行程中未能在沙漠中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大家很想看到丛林的迹象，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达坂看起来越来越紧密，行程也越来越困难，但仍未有任何鼓舞人心的迹象。营帐外3英里处，少量仍活着的红柳被围于沙丘中。一片片平整的土地上，我们发现了死去的库木什（芦苇）茎秆的残株，有8~10英寸高。

我们经常经过沙丘中独立的死红柳包。约12英里后，我在一处高大的沙丘上展开地图，通过望远镜，我找到了位于西部很远一处地方一条自北向南的黑线。它很明显是由红柳包组成，这些红柳包上就应该有活着的灌木丛。我们继续前进，事实上我们很快便碰到了灌木丛，但它并不是以一个群体出现。在我们快走完14英里时，大家看到了一片芦苇，顿时激动起来。这一整天骆驼都十分配合，它们是不是也感觉到离水和牧草很近了呢？在离我们扎营的雅丹很近的地方有两株托格拉克，枝干多节，仍活着。我们切下枝干的顶部，骆驼便很急切地啃嚼起来，以补充元气。一整天到处可以看见蜗牛壳散落于平坦的沙地或荒芜的泥土上。不过陶器碎片却很少能够见到，至于铜器，我们只捡到了一块残片。

第二天早上，尽管天气异常寒冷，大家都特别活跃，很快便一切就绪，一大清早就动身了。起初进展很缓慢，因为我们面前的沙丘非常高，大概有30~40英尺，同时又没有沙丘与低地相继成组出现的迹象。有一座巨大的达坂，可能高达100多英尺，自北向南伸展开来。我们选了另一条靠南的道路，绕道而行。在前几天的行程中，我们多次采用过这种方法。不久，在我们的左边又出现了一座几乎同样巨大

的沙丘，我们只得沿着它北部边缘地带绕过去。这时，我们越来越多地遇见活红柳包和成组的托格拉克。沙丘终于越来越低，7英里之后，终于出现了低地。这片低地像一处通道一样，其上覆盖着库木什残株，四周由仍存活着的红柳包围成一圈。在此地我们首次注意到了野兔和鹿的排泄物，我们还发现了它们及更小的丛林动物足迹。我们顺着低地往前走。这片低地是不久前一处咸水湖的河床，很明显有洪水冲入西南方的痕迹。3英里后，一处茂盛的芦苇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骆驼弯下腰来，在近10天未进食物之后，它们终于可以美餐一顿、享用芦苇了。我们则登上邻近的一处低矮的沙丘，以便看得远一些。突然间，阿卡白尔干（Aga-bergan，他是木匠）认出了一片胡杨林，就在一年前他曾帮助一个罗布人在这里干活，他向我们打保票说阔台克里克库勒（Koteklik-kol）的咸水湖及渔夫的窝棚站点就在不远处。大家欢呼雀跃起来，我们继续往西前进，穿过了茂密的灌木丛和芦苇地。走了不到半英里，我们便站在湖的北岸了，湖正处于结冰期。

M. Aurel Stein

第三十七章

沿着塔里木和车尔臣河

这里留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在这个地方突然有这么多的水，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但是，显然所谓的“人迹”却是偶然的，因为不论我们一起大喊，还是拿卡宾枪放一枪，都不能在远处可见的木屋中引起任何显示生命存在的骚动。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很重要，如果靠近塔里木河河床和沿河延伸的大路，找到一名向导的希望会更大，于是，我们决定一直朝西走。在我们面前，晶莹透明的冰面光滑闪亮，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在到达它之前，我清空了留下的最后两袋冰，以减轻骆驼的负荷；经历了一月的节俭开支，突然将一堆堆上好的冰块撒到湖岸的沙地上实在还是令人伤心的浪费之举。

向西行进了大约一英里半，连续走过了湖水几个支流，水结了冰，清澈透明，可以一直看到6~8英尺深的湖底，看着鱼儿们游动。偶尔发现冰面上有渔人们打破的洞孔，可以放网进去。在洞口处测量，冰的厚度在1英尺左右。据托合提阿訇的记忆，当地有一种习俗，渔人们在冰上围成一圈，跺着脚，渐渐缩小圈子，赶鱼人网。这可是老实的奈克·拉姆·辛格第一次在冰上行走，走的姿势和动作让人发笑。迄今为止，我们穿越了崇山峻岭和大漠戈壁，看到了种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但无一

能在坚实的手艺人奈克·拉姆·辛格的脑袋里留下如此印象。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怀疑，当他回家讲述这个故事时，他那远在旁遮普的同村人是否会相信他还未可知。可怜的家伙，他可真是不幸，他现在还不知道他那双目睹了骆驼队在深水冰面之上行走这一奇观的熠熠生辉的眼睛却将要再也见不到他在印度的家了。

日落之前，我们在靠近湖西北角高高的红柳包下搭起帐篷，并在那儿接受了阔台克里克库勒孤身渔人的深夜造访。他是托合提阿訇和阿卡白尔干一直寻找的人。他没有任何贮备可以匀给我们的工人，那仅有的几条鱼也已经被工人们半生不熟地吞咽下去。从他那儿得来的信息，让我很容易地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即在塔里木河河床东侧一系列河旁潟湖中，与依来克河（Ilek）的航道相接的。在穿过沙漠时，由于在高高的达坂之间由北向南的地面更加好走，我们无意间走上了一条比我意想中要偏向南方的路线。这样在来到塔里木河或说依来克河时，发现自己是在麦尔德克（Merdek）遗址南部行进。

如此一来，1月15日，我们不得不沿依来克河向北行进，以弥补纬度上的失误。那一夜比在沙漠中度过的任何一夜都更加暖和。而当我们在明朗的天空下行进时，那一天的流浪也变得饶有乐趣。沿着一系列冰封的潟湖，来到了萨达克库勒（Sadak-Kol）近旁的冬日里被遗弃的渔人芦草屋。延伸得十分宽广的芦苇滩之间，依来克河河道似乎消失不见了。穿过这一片芦苇地，到达一片繁盛的胡杨灌木丛，并决定夜间在此休息。在高大胡杨树的遮庇下，夜晚好像几乎是温暖的。第二天早上，温度计显示仅有华氏20度，下了一层霜。幸运的是，我派出前往塔里木附近的托库木（Tokum）渔业站的一支小粮草队，现在已储备了面粉并携一名向导返回。于是，刻不容缓，我们立即起身，穿过了长满芦苇的依来克河河床（此处有整整2英里宽），走向阿尔赞（Arzan）的小屋。他是老渔人，在这间小屋，他一个人同牛羊共同生活了6年，他可能会带我们去麦尔德克协亥尔（Merdek-shahr）。迄今为



|⑬穿越罗布泊沙漠后，骆驼在第一块草地处吃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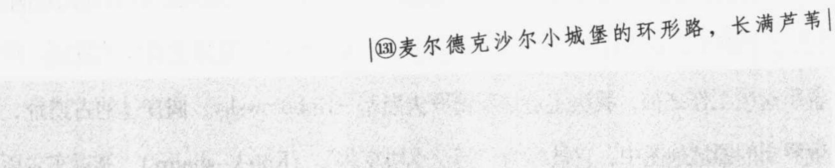
止，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罗布人（Loplik）都强烈否认他们知道这个遗址。

运气不错，在一个显著的沙丘脚下有个木屋，在那里找到了这个奇特的老牧羊人，他很乐意带我们去那个他称之为梯木（Tim）的遗址。很快，那窄窄一条活的丛林就被抛在了身后，向东走了大约两英里半，翻过相当高的沙丘，越过盐水泊低地，来到一个干涸的潟湖边上，我看到一道芦苇蔓生的小小环形堡垒的黏土防御墙。在那儿搭起帐篷之后，我对这个简朴的遗址作了一整天的细致考察，很快便发现它时代颇早的证据。

防御土墙下部是坚实的黏土，上面是土坯，上下都以一层层红柳树枝在水平方面特别给予加固，这一构造本身便显示着年代久远。土墙的顶部大约14英尺宽，底部可能更宽一倍，现在已大部分为沙覆盖。它现在高出地面10英尺左右。从土墙的

中心线处测量，这个小小的防御工事直径大约132英尺。除去覆盖着城墙土坯砌筑部分的沙土之后，我测量了土坯的尺寸，发现它与罗布泊（Lop-nor）北部古遗址建筑中使用的土坯尺寸完全一致，都是18英寸长，11英寸宽，4英寸厚。这种紧密一致性所显示的它们同属于一个时代的结论，很快便又得到了新的证实，我们找到了中国汉代样式的铜币，其中两枚还刻有一首歌谣，我们现已知道这首歌谣最早是由篡权者王莽在公元纪元之初散布的。

在中国统治塔里木盆地最早时期，曾有人驻防这个要塞，这一点理应毫无疑问。尽管这一遗址本身并不重要，其时代却无疑令它有了考古学与地理学上的意义；因为它在此地的存在，证实了塔里木的一个支流曾经在本纪元的最早年代流进了目前依来克河的河道，这对于争论颇多的塔里木河早期河道及其最终湖床的理论，很有



⑬麦尔德克沙尔小城堡的环形路，长满芦苇



意义。深深的奴拉合（Nullah）河从靠近遗址南部的地方经过，与巴依库勒（Bay-kol）沼泽平行。无从考证它是否会重新占据此地，但据说直到最近几年，它还蓄过夏季的洪水。

奴拉合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倒着干裂托格拉克柱子的遗址中心挖下去时，我们在大约4英尺深处发现了潮湿的沙土。显然遗址当年使用物品都是用可腐蚀材料制成的，它们无一能在地下潮湿环境中保存下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随后清理曾通往戍堡南门的通道时，我发现最初在其两侧的托格拉克柱子完全腐烂了，只剩下顶部3~4英尺有火烧过痕迹的部分。靠近水源这样一个事实，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遗址附近完全缺乏风蚀地和为什么我们后来没有找到任何常见的遗物现象。当天和第二天早上，我也没有搜索到任何其他的建筑遗迹。

就这样，我们在麦尔德克梯木迅速地获得了有关年代的证据，我对此比较满意。1月7日晌午，我得以再次动身向南行进，主要目标当然是米兰遗址的发掘。但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我决定造访罗博罗夫斯基（Roborowsky）调查过的古遗址，在俄罗斯的疆域地图中，它被标为“阔台克协亥尔”（Kötek-shahri），靠近车尔臣达里雅（Charchan Darya）末端河道。随行人员近几周在冬日的沙漠中从事艰辛劳动，已经疲惫不堪，并且他们的供给很快将用完，考虑到这个情况，我已不可能远离连接几个塔里木河沿岸的渔业站的道路，这条道路也部分地被用于中国由若羌（Charklik）通向铁干里克（Tikkenlik）和库尔勒（Korla）的邮政服务。由于大家都知道这条道路，我只需简短地陈述一下这一段行程就可以了。

刚刚再次走过依来克河宽阔的沼泽洼地，正在穿过河道丛林带向西南方向行进时，我们惊喜地遇上了我让穆拉赫去阿不旦请来的由艾则孜和穆萨掌管的马群。这样，行程突然间变得容易了，至少对骑马的人是如此。我还得承认再次骑在马鞍之上的舒适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让我能够边行进边欣赏塔里木景色的变化。我们见

到越来越多的活托格拉克胡杨树，沿途经过的荒原看来也像公园一般。我们还曾在一条冰冻坚实的河岸旁，走过一条由野生白杨树形成的壮美天然的林阴大道。这景象就像是那些遥远年代里某些场景的再现。我们在沙漠里看到的净是一排排倒下的死胡杨树，可这里胡杨树高耸在河床边，生机盎然。我们在托库木停留。那里，五六户罗布人家坐落在一丛白杨树林中，居住的芦苇屋宛若画中，队员们算是有了一个度过严冬之夜的避难所。我给他们买了面粉和一只羊，让他们大吃一顿，而我自己则可以再次喝到久违了的牛奶，并沉浸于这份奢侈享受之中。

第二天，我们去了希尔格恰普干（Shirghe-chapkan）的渔业点，再次经过了阔台克里克库勒湖和一连串小一些的潟湖。在洪水期间，依来克河河道把这些小潟湖连接在一起，但现在已干涸了。冰面处处光滑，赏心悦目。我渴望能溜着冰，迎着已吹了一天的严酷东北风，疾驰一番来暖和一下。尼雅孜库勒（Niaz-köl）离希尔格恰普干的六七个芦草屋不远，依来克河床在那里最后一次加宽，而在几英里之后更低的地方，后者又与塔里木河现今的主河道汇合了。但在历史年代，这条河的一条大支流在此处骤然改变流向，向东喀拉库顺（Kara Kosher）沼泽地方向流去，并且偶尔还会有异常大的洪水注入，它也成了通往阿不旦的直接通道。我由此道派了些骆驼前往阿不旦，去请调查员并从我的库房运些急需的物品，经由若羌与我会合。

我自己连同剩下的马匹骆驼，往西南方向前进。走了2英里后，穿过冰封的大约130码一段塔里木河冰面，到了河的右岸。再走过1英里多，我们到达了若羌——铁干里克公路，沿着公路向南行，直到晚上在库尔干（Kurghan）邮运站宿营时才又看到了那条河。这里的土地是光秃秃的沙地平原，除了几棵稀疏的胡杨，再没什么别的树木，看来这里比真正的沙漠更显荒凉。还有那个用阿古柏（Yakub Beg）时期一个小堡垒的木材和土坯建成的孤寂小二唐（Otang，即戍堡、驿站），与

周围破败的环境倒是很协调。一位中国师爷驻守在这儿，照管邮政服务，他脸色苍白，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幅神秘主义的画像。在低矮简陋的茅舍中，他给了我最友好的欢迎。尽管他热情好客，比起那肮脏的客房，我还是极愿意住在我的帐篷里。在这里，我还在适当时机，请这位彬彬有礼的师爷喝茶，尝尝我的厨师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蛋。他非常想听一听我在沙漠中游历和发掘的故事，而我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我的储备实际上已耗尽，除了一小包蜡烛之外，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给他作纪念。但我寄往喀什噶尔的几封信能按时登记待发，对我倒是一个安慰。

1月10日，前往罗布站的行程更令人沮丧。我们所走的这条可以通往若羌大路的小道转向西南方向，塔里木河终于消失在视野之中，整天都沿一片又一片沼泽地的边缘前行，这些沼泽地带组成了车尔臣河三角洲的最北端。最初，低地是干燥的，随后我们遇上了被一条条肖尔（Shor）分隔开的浅湖，走捷径穿过了它们冰封的湖面。最后，接近罗布时，我们又遇到了一道水沟，流水来自东南方，显然水源是车尔臣河。罗布二唐（Lop Otang）附近潟湖交错，周围的小山是盐地，甚至比库尔干更加凄凉。不过，在向东1英里处的一个渔村里，我们找到了许多可作发掘工作的当地人。这样，我就地解散了最后一批若羌队员并付清了工钱，他们曾勇敢地跟随我经历了沙漠中艰辛的数周，现在已精疲力竭，急切地想回家去。在罗布，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阔台克里克协亥尔的事情。幸运的是，深夜里一个若羌的米拉布（Mirab）从阿不旦派乌斯曼巴依（Osman Bay）赶来，这是作为对早些时候的我要求的回应，按办吩咐的，他能够做我们的向导。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赶紧出发。我们开始走上了一条通往若羌的路，靠近罗布时过了一座摇摇晃晃的桥，桥下显然是现在干涸的车尔臣河主水道。几英里后，我们向右拐，往西南方向走，随后走上一条标志清晰的牧民小道，穿过了一片极为荒芜的荒地。诸多迹象表明，它曾是车尔臣河泛滥地区的一部分，但据说在过去的四



|⑬从若羌来的阿不旦民工|

五年里，没有水流入我们在罗布附近穿过的主河床南面的水道，沿途低地上稀疏的芦草也在死去。我们只在两个小潟湖中找到了水。终于，约10英里以后，我们到达一条芦苇繁茂的河床，随后经过一条特征清晰被认为是苏拉克（Sulagh）达里雅的河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近期曾有水流过，但茂盛的植被表明附近地下水丰富，还看到岸边一排排托格拉克胡杨树向西延伸到很远。此处，我们遇到了两个男孩子，他们看管着一大群羊。最后，我们到了另一处干河床，茂盛的红柳环绕着它，一捆捆高高的芦苇扎成原始的墙垛，这成了我们方便的夜间庇护所。4个牧人为我们的营火亮光所吸引，深夜来到我们这里。我从他们那儿得知，为了给他们的羊群饮水，他们得把它们往北赶一大段路，到当时唯一有水或冰的罗布达里雅水道。车尔臣河转向最北部的河床，这解释了我们所经过的罗布北部大潟湖和报道中俄罗斯探险家

在三角洲东端发现的喀拉木兰（Kara-muran）沼泽地日益干涸的原因。

1月12日，去遗址附近的行程虽然漫长，但令人愉快。首先，我们沿着干涸的河床，穿过了逐渐繁茂的矮树丛，经过疏寂的托格拉克胡杨——真正的河岸森林前哨，最终走了11英里左右，抵达了干涸的耶肯里克库勒（Yekinlik-köl）潟湖附近狭窄的冰封水道。水道仅50码宽，东北边不远处，似乎终结在一小块冰封的洼地。沿着这条水道向西，我们走过了几英里肥沃的牧地，牧人们曾开凿了规则的灌溉水渠，他们显然是想尽力改良这片牧场。最终，这条水道将我们带到了主河床，它猛然映入眼帘时，是连续的一片整整400码宽的发光冰面，这是我在塔里木所见的最壮观景象。

岸边一丛丛高大胡杨树也非常壮观，在灿烂的日落余晖中，森林美丽而宁静，令我忘却了所有疲惫和寒冷。夜幕降临，我们在河岸与南边一个干涸的潟湖夏赫托合塔能库勒（Shah-Tokhtaning-Köli）之间美丽的白杨树丛中扎营。有了充足的水

|⑬扎在夏赫托合塔库勒的帐篷，位于车尔臣河边|



M. Aurel Stein

和燃料，我们就可以抵御刺骨的寒风。在“古镇”附近，派出寻找牧人的人遇到了一队人马，他们是收到我们从托库木发出的信息后，由若羌的伯克派来的。与他们会合，我们就更觉得满意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面粉、大米和肥肉，还有鸡蛋、冻奶和干果一类的小奢侈品，我们好像又到了一个“供应基地”。

第二天早晨，我把随行人员和牲畜留下，让他们好好过个假日，自己则和乌斯曼巴依（Osman Bai)、罗布人前往遗址。距离远比料想中要近，不过它也令人失望。向西南方向，我们穿过生长茂密的芦苇地，行了有1英里左右，其间可见干涸的潟湖的痕迹。随后，我们遇上了一个挨一个的沙丘，高达30英尺，红柳和野生白杨覆盖在上面，但是大多已经枯死，清楚地标志出一个从前的河床的走向。沙丘带大概有1英里宽，和现今车尔臣达里雅的河道平行。在更远处，是开阔的黄土冲积平原的水土流失地带，宽从1~1.5英里不等，长着许多低矮的“见证人”——胡杨，高度约4~6英尺高。

我们发现了大量粗糙而坚硬的陶器碎片和有碾磨痕迹的碎石，但我没能找到任何建筑物遗迹，也没有找到一枚钱币或是一件金属工具。所有的陶瓷碎片都是手工制作的，它们粗糙的颗粒物质与我经常见到的陶器极为相似，令人想到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从陶器碎片这一远古遗留物分布范围和陶片数量来看，我推断有人在这里长期居住，但人口不多，其年代比我们现有已知的历史方面证据所能上溯的年代更早。另外，河道沿岸的多处地点，很可能有类似的区域存在，但因被植被或流沙覆盖，所以不为人知。南边是一个真正的沙漠地带，沙丘低矮，风沙肆虐，有一条明显的牧羊小道，那是牧民往返瓦石峡（Vash-shahri）的路线，显然他们已习惯于穿行这一沙漠地带了。晌午以前，我返回了宿营地。在阳光通过光秃秃的树干照耀下来的时候，我开始提笔写信，这封信已经是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才抽空来写。夜半时分，我坐在皮毛睡袋里，也忍受不住严寒，不得已上床睡了，可信仍未写完。

在河畔的帐篷里，队员们和牲畜都非常需要休息，而周围的环境宁静祥和，是个休整的好地方，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停留一日。开始在米兰的全新工作之前，我必须完成十分紧迫的回复信件任务。我没有理由为这次停留感到后悔。天空晴朗，我从容不迫地欣赏着天空云霞最绚丽灿烂的色彩。上午 11 点稍过，我就派忠诚的依布拉音伯克带着我的邮包前往若羌。这时,天空呈现出奇特的黄色和褐色,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一场沙尘暴即将从东面刮来。过了一会儿,并没有起风,四周也悄无声息。

我向太阳望去，只见它的半个身子藏在一层厚厚的面纱之后，于是我意识到这是一次日食。看来我们运气不错，在这个亚洲内陆偏僻的角落里，日食依然是完整的。我无法描述日食奇妙的光色效果。除了几片南部山头之上的浮云，天空是明朗的，所以我能看到最完美的效果。天空中有黄色和蓝色，浓浓的色彩绚丽无比，一直延伸到西面的天边，地平线上则是一条深绿色的镶边，这样美丽的景色令我终生难忘。日食完全形成时，日冕的银色光辉遍洒在宽广而寂静的土地上，黄色的光芒如波浪般轻快地闪过，显得分外诡异，在它们的熏染之下，河上闪亮的冰面、褐色的河畔矮树丛和远处一道道沙丘看起来全都像虚幻的一般，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描绘。慢慢地，随着阳光重现，新的生活似乎又从那一片孤寂的树林里复活了，又听得到鸟鸣了。队员和那些罗布人带着他们那个种族惯有的一成不变的冷漠，仍旧安静地坐在篝火周围，没有一个人问我任何问题。下午一阵寒风袭来，这次刮的是西风，很快我就被迫拉上我的小帐篷门，暖暖和和地借着烛光继续写作。

1 月 15 日清晨，我沿车尔臣河顺流而下，向东前往米兰。过了通往若羌的道路向南分出岔路的地方，走入一片低树丛生的平地，这里通向阔库勒扎特玛（Kokölsatma）牧场，当天夜晚我们在那个牧场休息，若羌衙门派出的信使也骑马赶上了我们，他带来一封发自马继业先生的电报。这封电报回复我去年 11 月 15 日的信，我在那封信里让他通过阿克苏道台的一个不错的办事处，划拨给我 1500 两中国制式

M. Aurel Stein

银子。电文中说，这笔款项马上就会汇到，不过不是在若羌，而是在焉耆（Kara-Shahr）的银库，显然若羌的地方行政机构无力筹集一笔如此数量的巨款。

焉耆辖区的总部坐落在由喀什噶尔去乌鲁木齐深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上，位于我们现在往北大约350英里远的地方。电报从银库送来，花费了两周时间，尽管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喀什噶尔和焉耆使用电报以节省时间，可我仍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我从一封同时送到的中文、维吾尔文两体（Chinese-Turkey）书信中得知，焉耆的行政长官害怕银元运送所担的风险，让我自己去安排运送事宜。而事实上，要想得到这笔钱款，我就必须回到若羌。在出发穿越大沙漠去敦煌之前，我必须得拿到这笔预订的中国马蹄银，因此我决定经由若羌前往米兰。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我改道而行。测量员拉姆·辛格来信，说他已到了若羌，并且，日益严重的风湿病已使他无法工作。一些队员也因沙漠中的艰辛工作大伤元气，尤其是穆罕默德·朱，他在过去一些日子里从未停止过呻吟，总在抱怨胸膜炎或极其类似的疾病引发的疼痛。找个舒适的场所，休息几天，我的骆驼队也许能恢复体力，这里只有若羌能提供必要的休整条件。1月16日早晨，我将路线作了90度的调整，朝正南方向而行，向若羌进发，这无疑让队员们大松了一口气。那一天的行程漫长而乏味。首先，穿过车尔臣河三角洲，那里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得到任何水分的滋养，三角洲南部有矮树和其他低矮灌木，但它们正在渐渐地枯死。接着，是一片又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黏土和黄土地面显示出轻度风力侵蚀的痕迹，沿途干涸的河床，似乎由瓦石峡（Vash-shahri）方向延伸而来。走了11英里之后，来到车尔臣河宽阔的河床，此处大约有50码宽，但只有少量的水。随后，一片黄土大平原出现在面前，生长着渐渐茂盛的植被。最后，在黑夜里，我们到达了若羌绿洲耕作地区的边界。到此时，总计行程大约26英里。我们来到以前接待我们的人家，受到主人热情的欢迎之后，马上就开始休息。

M. Aurel Stein

第三十八章

米兰古戍堡

在若羌停留，队员们得到了必要的休息，他们实在太需要休息一下了。尽管我十分努力，却仍感到这5天时间对于在那里需要完成的工作来说还是太短了。我早早地去衙门拜访，我的老朋友廖大老爷热诚地迎接了我。我也借这次机会，安排依布拉音伯克（Ibrahim Beg）的焉耆之行，让他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取回我的库存银元。即使动用一切官方可能提供的便利，不费周折，往返的行程也得花上一个月；由鉴于此，我自己启程前往敦煌的计划不能再拖延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阿不旦休息了一周之后，测量员拉姆·辛格的风湿病仍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也意识到，即使他恢复了健康，能够下地工作，也不能指望他在来年冬天再去经受另一场沙漠探险考察的艰辛。恰巧依布拉音伯克去焉耆，要经过喀什噶尔，我就让依布拉音伯克在喀什噶尔给印度测量局总长（Surveyor-General in India）拍封电报，请求他派另一名当地的测量员，代替拉姆·辛格。9个月以后，拉伊·拉尔·辛格（Rai·Lal·Singh）在甘肃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依布拉音伯克走后，我开始忙着召集去米兰发掘所需的新队员，准备我这个庞大的阵容所需的一切储备，不光是为了已被延期的米兰发掘工作，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去敦煌的漫长沙漠之旅做准备。

我知道阿不旦毫无资源可资利用，因此，所需的运输工具必须提前几周在若羌就要安排妥当。

作了所有这些准备之外，我还得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为已经和未来发掘出的古物准备好足够的包装材料。在往东穿越沙漠之前，需要将这些古物安全地运往喀什噶尔。两个技能娴熟的木匠来帮忙，恰好我还有从印度带来的珍贵的铁钉和螺丝，还是奈克·拉姆·辛格厉害、有本领，他能在任何一个物资匮乏的遗址，用死树制造出包装箱来。但是，根据经验，为确保我的发掘物不受损坏所需的毛毡、棉毛、厚实的和田纸张及其他材料是不能当场制出的。我必须亲自检查所有物品，以避免因包装材料的质量不过关，而在运输时散落丢失掉文物。一个从和田来的邮差适时地来到这里，所以我需要马上把考察的初步记录写完，这样，我难以抽出时间回访按办，以答谢他提供的方便。他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对古代中国史籍和其他一些我在罗布泊（Lop-nor）发掘出来的文物很感兴趣。按办大人很有教养，却被流放到偏远与世隔绝的若羌，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应该做出一点点牺牲，陪他闲谈古物。在大约8个月后，可怜的按办死在荒凉的若羌托米（Tomi），现在回忆起来，我更觉得我当初就应该那样做，没有什么后悔可言了。

1月22日早晨，我终于得以动身前往米兰，发掘人员、物资供应一应俱全，只是队员和牲畜的数量略有削减。我的首发阵容中的两位老队员，即测量员拉姆·辛格的侍从穆罕默德·朱和喀斯木阿訇因体力不支倒下了。大概队伍中数他们俩年龄最大，之前的疲惫和艰辛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无力承担接下来我们面临的艰辛工作。于是，我决定让他们留在若羌休养。相信当我们在米兰进行发掘的时候，他们身体就能得到恢复，能够胜任负责运送前一阶段所获得古代文物的工作，我原本是要将这些古代文物从阿不旦的库房运回，现在就由他们俩把它们运到喀什噶尔。雇来的车尔臣骆驼有一半也已经累得要命，无法继续为我工作，所以也要把账结算清楚，

让它们重返绿洲。而那些在若羌召集的骆驼，同样也显示出精疲力竭的样子，因此我也不打算让它们参加随后漫长的沙漠之行。

我们仍沿先前的路线前往米兰，一路无事。从南边吹来阵阵微风，吹起的尘雾完全掩盖了南部的山脉。1月23日深夜，接近米兰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只有穿过一片1英里多宽的冰面之后，才能到达有植被的地方。这个宽且浅的河滩铺满了碎石，在我们11月里经过时，它还是干旱荒芜的不毛之地。托合提阿訇说，这里每年冬天都是这样，显然，这是因为河床里的河水冻结之后，涌出的地下泉水被迫向河床两旁漫延流出，时值严冬，泉水没有蒸发涌出地面之后随即被冻结起来，于是河床显得比其他季节宽了许多。

夜里一片漆黑，我们摸索着向河边的丛林地带走去。我们看到了有一堆火，亲爱的蒋师爷就在火旁，还有古怪的老毛拉和12个阿不旦来的罗布人，他们正在等我们，见我们来到，便愉快地前来迎接我们。根据我最初的命令，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在此安营扎寨耐心地等待，为即将开始的发掘工作做好准备。能和我尽心尽力的中国同伴重逢真是令人高兴！这几日，我们无法互通信息，现在我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告诉蒋师爷有关我们工作和经历的细节。我坐在篝火旁，在他热情的关照之下，很快恢复了体力。一直等啊，等啊，行李直到深夜才到达。

那一夜下了霜，最低气温达华氏15度，空气稀薄，令人感到窒息。清晨，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满是雾气和白霜的氛围中。我们出发去古戍堡时，雾气消散了。南面昆仑山方向的云雾也消散了片刻，我们趁机能看到雪在远处的群山上徐徐下着。在这极度干旱贫瘠的平原上，我突然发现空气中还含这么多的水分，真是一种奇特难以名状的感受。到达古戍堡之后，我让他们把帐篷扎在靠近墙根的地方，希望不久刺骨的寒风重起吹过沙漠之时，墙能给我们挡风避寒。骆驼们被送回米兰河边狭窄的丛林地带，去吃点胡杨的落叶和枯死的芦草。在这儿，不用为水发

愁，附近就有大量的冰，这省了我们不少劲，我不再像往常那样为水而担心和操心。于是，我们立即着手，继续一个半月前试掘之后就停下的发掘和清理工作。

不多一会儿，就获得了证据，证明我在前次试掘时作出的结论。先前清理出了一排房间，当我这次审视这些房间与房间之后防御东墙之间的地面时，我发现了另一排小屋，为穹庐风格，有点像个城堡，各种各样的废弃物一直堆到屋顶。在厚得难以想象的尘土之中、壁炉中扫出的炉灰里、麦草残留物中以及服装残片和残破器物，以及各种令人生厌的残渣之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吐蕃文书，有的写在木头上，有的写在纸上，它们大多只是残片，但也时常能够发现一些完整无损的。有一间小房子长仅约 11 英尺、宽约 7 英尺，其中部分灰泥墙上还残留着烟熏的痕迹，我们在这间房里发现了百余份这样的文书碎片。室内到处是腐朽的动物尸体和残枝败叶，整间房子简直就是个垃圾桶，文书残片深深地埋藏在里面，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文书挖取出来。房里到处弥漫着氨水的味道，这说明那些在灰土中摸爬滚打的吐蕃士兵出于某种特别原因把他们自己的住所，也就是这些房屋曾当作了五谷轮回之所——厕所。

这些建筑建于公元 8~9 世纪，曾经驻扎过卫戍部队，所有房屋，包括半地下的房屋在设计和建造上都很粗糙。我们在城堡东墙和东墙附近开始进一步发掘，花了 3 天时间才清理完，在这里发现设计较规则的建筑物。进一步沿着北面清理城墙内中心部分建筑，在那里发现了一组不规则的小屋，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墙壁很薄，用泥和粗糙的土坯建成，地面高低差距也很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养兔场。北面很多小屋并无入口，显然需要从顶部进入；一些房间地面比其他房间深 4~5 英尺，很可能用来作储藏室，存放这个堡垒曾驻扎过的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各类物品。不过，从中发掘出的具有考古学意义的物品极少。但在曾经用来住宿的房屋里，情况就截然不一样了，在某些方面来说，对那些多年堆积起来的垃圾堆进行发掘是我所有收



⑬④米兰城堡内部的东南角（发掘中）

获物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价值的。

一些地方的垃圾堆积高达9英尺，自上而下各垃圾层中含有丰富的木简和纸质文书，以下将会给予介绍。除去个别特殊情况，出土文书基本上都是吐蕃文的，文书的总数最终达到1000余件。许多木简制作有加盖印戳的印槽，一些保存较好的文书上有朱红色的封印，所以我打一开始心中就十分清楚大多数吐蕃文书可能都是官方信件。有的文书长达11英寸，密密麻麻写满了一行行草书，纸特别薄，只适于一面书写。

虽然吐蕃所处时代已经相对较晚，但是鉴于出土文书纸张的那些特点，那时文书书写材料仍以木简为主也就容易理解了。这暗示着纸张在这里一定难以获得，且并非为本地制造。制造较为精良，质地坚硬的纸张更为稀少，纸张质地差显然是由

于制作原料和工艺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上述结论很快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纸质文书字体大，书写规范，从宽宽的行距和穿绳孔来看，可知它是些佛教权威经典文本或诵祷经文的婆提书页。1901年，我在安迪尔成堡佛寺也发现类似的纸页，同样是吐蕃占领时期的文书。经魏斯纳（Wiesner）教授的细致分析研究，这种纸是用月桂树植物纤维制造的，而这种材料在当时的塔里木盆地还不为人知。因此，我怀疑这些曾为米兰卫戍部队成员喜爱并慰藉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诵读经文，可能都是从遥远的南方寺院经由喜马拉雅山脉被带到这里来的。

我对藏语知道得甚少，所以我并不想从那些大量的出土文书残片中，得知吐蕃占领期遗址的日常状况。然而，无论从它们当中能获知什么信息，这里留给我的印象都比不上肮脏和不适所给我的印象深刻，而那些吐蕃官员和士兵在这个孤寂的边

|⑬⑤扎在米兰废堡墙下的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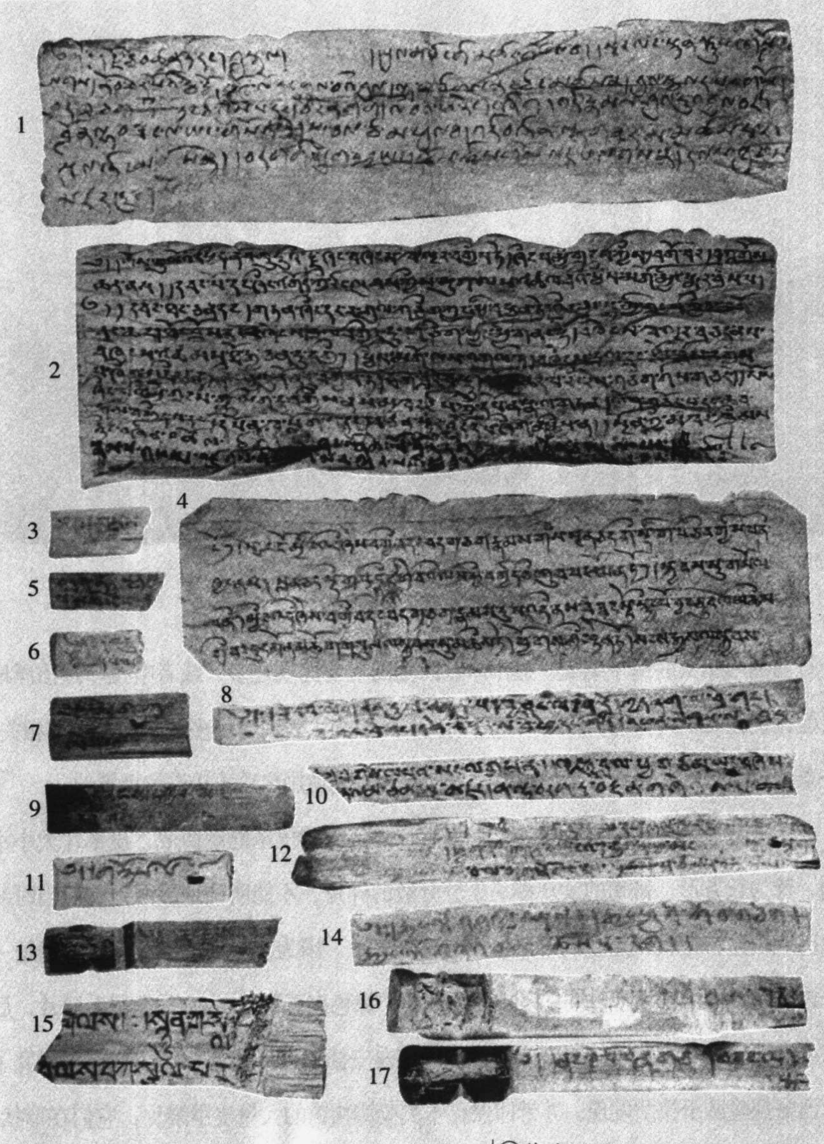


防哨卡中，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苦度光阴。这些建筑仍然在变化，空气令人恶心，地面的垃圾堆在不断扩大，表明这里一直有人居住。当时的居住者处理垃圾的方法十分特异，垃圾可能就地倒入某些空置的房屋，从而使一间又一间小屋变成真正的垃圾箱，甚至一直堆积到屋顶。吐蕃人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才在这里居住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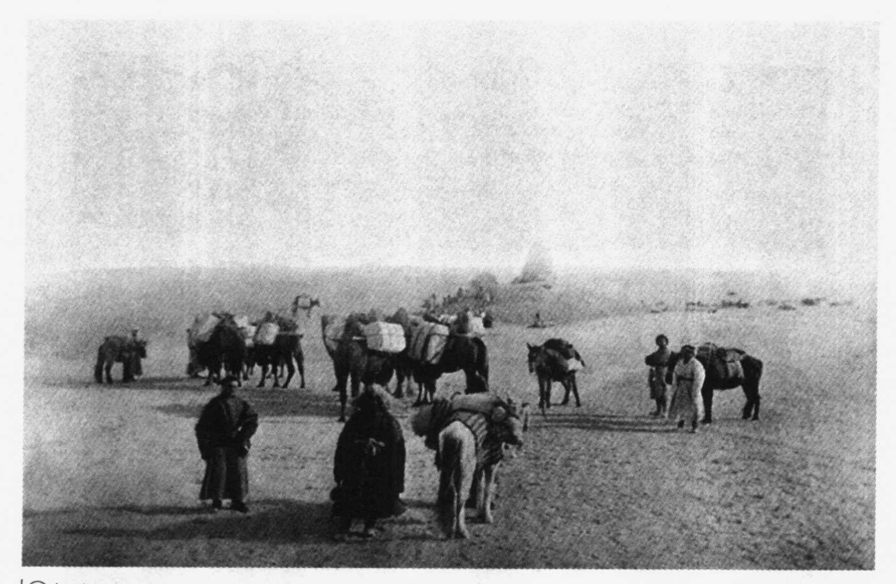
然而，这种做法对保留现代考古学资料而言极有好处，在这样一个最为安全、不会被侵蚀的地方，建立起一个大型的保存各种古代废弃物和古代文献的仓库，实在是一件考虑周详的创举。然而，当年的吐蕃人在这里度过的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啊！我有着清理古代垃圾堆相当广泛的经验，知道如何发掘、清理它们。一说到灰尘的厚度和日积月累酿就的臭味，我首先就会想到吐蕃武士们那些大量的丢弃物。现在已经离开米兰一年了，可我对古戍堡中的气味仍记忆犹新，从而给我正确地判定其他同类遗址的年代提供指导性帮助，后面我还会讲到与此相关的一些事情。

除去干燥的污垢和散落其间的各种文书，垃圾中还有武器装备、衣物等物品的残余物。所有这些物品制作都很简陋，而且相当破旧。这些垃圾堆一定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达到现在这个高度，每个房间的这种一致性是一个附加的证据，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此地的生活状况。这儿还有大量一片片粗陋的羊毛织物，如毛毯、毛毡等，它们一定曾经是士兵们的个人服装。色彩繁多，多为深褐色和暗红色，每一件都是穿得不能再穿时，才扔进垃圾堆中。丝绸碎片非常稀少，一些纺织精巧的小地毯残片也保留了下来，图案种类繁多，不过技法单一，大多是用羊毛线编织衣服那种方法织出的，与早期尼雅遗址和罗布泊遗址中发现的此类物品大不相同。

有一些特别奇特的发现物在这里不可能作细致的描述，比如：由一块精致的绣花丝绸做成的小包；一个保存完好的毛毡口袋，它可能是士兵的装备；一只浅黄色布鞋，鞋内有软衬，还缝着精美的几何图形；还发现了一条黑发辫子，扎得十分粗糙，说明扎这个辫子的人似乎不大耐烦用梳子，可是我们发现了大量木制和角制梳



⑯从米兰城堡废墟中出土的古藏语文书（木简和纸文书）



|⑬经米兰遗址前往敦煌的商旅队|

子；渔网用结实的绳子编成，显示米兰河里的鱼要比现在多，或者喀拉库顺沼泽地可能比现在的距离更近；折断的芦苇箭杆和铁箭头，表明了更多的行业与战争相关；一条山羊毛背带编织得结实而细致，显然是在长期使用之后才扔进垃圾堆的。

出土数量最丰富的是盔甲，它们由一片片上漆的皮革缝制而成，皮革片大小不同，皆为长方形。最初的发现都是十分分散的碎片，不能明确地显示出它们当时的状况或用途，但我还是立刻辨认出它们就是盔甲，因为多年以前，我在尼雅遗址一个古代垃圾堆中曾发现过同样一小片坚硬的“绿色皮革”，认为它是盔甲的鳞片，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正确无误。我忠实的朋友安德烈（Andrew）先生在仔细研究了由西藏探险队于拉萨发现，并带回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大量皮甲鳞片，它们在形状、风格和连接方式方面与我发现的那一小块皮革完全一致，为我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现在发现的鳞甲有的早已成为支离破碎的个体，有的仍然由窄皮革带子连接

在一起保持着最初的模样。它们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出现在眼前，即便此前没有在出土壁画或浮雕中发现这类古代鳞状盔甲（如在1901年清理出的一些寺院中的壁画就有关于盔甲的画面），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复原了这些曾保护过吐蕃士兵的皮革盔甲的原貌。这些鳞甲分布在不同的房间里数量很多，据此可知上漆的皮革盔甲在当时曾被普遍使用。

尽管这些散碎的鳞甲无疑是属于很多不同的盔甲，且大小和装饰都不相同，但在制作技术风格、串联方法等方面却有很多一致之处。一片片略微弯曲的坚硬皮革，可能是骆驼皮，两面都涂有厚厚一层色泽艳丽的漆，通常鲜艳的红漆层和黑漆层相间，漆有7层之多。在最上面一层，漆上小小的装饰图样，如环形、椭圆和双钩之类，模仿的是刮除法（Sgraffito）绘画的风格，制造出装饰效果。一些碎片上还发现

|⑬⑧从米兰吐蕃城堡出土的鳞片盔甲和古物|

24
25
26[a]
28
26[b]
29
27
26[c]
30
31

了黄铜铆钉，它也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为了固定盔甲的边缘，鳞甲较长的一边（长约2.75~4.25英寸不等）被重叠着放在一起，然后以巧妙设计的方式，用皮条穿过一对对小孔，小孔通常靠近边缘，但多少不一，这样就把鳞片紧紧连接在一起。竖直方向的连接方式与此相似，用皮条穿过两对靠近顶端的小孔，穿向每一片鳞甲的中心。

鳞甲都是向上重叠，方式奇特，与欧洲古典和中世纪的盔甲样式迥异，但与中亚和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绘画、雕塑中的鳞片盔甲一致。给出了这样一串鳞甲的图示，发现时连接它们的皮条带完好无损，这幅图对解释这些细节将起到一些帮助。奇怪的是，所有的长方形鳞片，看来却是属于盔甲衣的下裙部分，很可能是因为穿着磨损而导致散失在各处。由壁画判断，胸部应是由顶端削圆的鳞甲制成，但是却未发现一片这样的鳞甲。但是，我们发现了一大块显然是用于保护咽喉或手臂的制作精美的皮甲残片，证实了身体上部的盔甲也是用上漆的皮革制作。

第三十九章

米兰戍堡的吐蕃文书

我们辛辛苦苦干了5天，才清理完古戍堡，难以找出时间认真研究所出土的考古学资料的种种细节，另外由于心情也不好，也无心去做。从东北方吹来的寒冷狂风几乎从未间断过，有时还会转成南风或西风，寒风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观察不同地方清理工作的进展，我不得不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东边的主城墙顶上，我可算是对寒风的不断侵袭体验到了极致。而当我从墙上下来，到发掘点看看，眼前到处尘土飞扬，睁大双眼也看不清楚。尘土大部分是因清理污垢而扬起千年尘土形成的，又不断地被风刮到人眼和脸上所有暴露的部位。无论站在墙上经受寒风的洗礼，还是待在残破的古代房屋建筑中吃土，都不是什么乐事，很难判断哪一样更糟。

除了忘记不了上面所说的极度不适，我还忘不了清空靠近戍堡东南角两间较大房间的那段时日，屋内堆积了大量垃圾和文书。护墙已经残缺不全，狂风好像鼓足了劲似的，猛烈地吹刮着这个缺口垃圾堆的顶部。在这儿工作或站着，不论多短一会儿，都会获得一种比寒风刺骨的感觉还要糟糕的感受。碎石细沙挟风而过，还有垃圾表层的废物被风刮起，让人觉得自身正受到风沙的侵蚀作用。尽管这儿能容下

12人左右，却不可能让他们同时一次工作超过一个半小时，于是我安排他们轮流换班。老天不负有心人，文书不断被发掘出来。大部分时间我也得在缺口密切查看，关注重要物件的发现，防备丢失或盗窃。在清理和打开文书时，我必须将双手暴露在外，每次都感觉手指冻僵了，但我必须去做，即便如此我还算幸运，付出的痛苦能当场得到回报，发现不少保存特别完好的文书，这也鼓励了其他人。

多亏一贯机警而又尽责的蒋师爷愿意间或接替我的工作，这真令我感到高兴。测量员拉姆·辛格因风湿病倒下了，躺在帐篷里苦挨光阴，身上盖着专门为他匀出的一些毛皮和毯子。不久，我不得不让他离开，前往阿不旦。奈克·拉姆·辛格患上了热病，病不严重时，他也只能在避风的角落里照看队员，其他队员的情况一样糟糕。穆罕默德·朱仍留在若羌，像一名精疲力竭的老兵，等着让人护送回家。依布拉音伯克是队员中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先前曾提到过他，他被派往遥远的焉耆去取马蹄银。我的黑黑的克什米尔厨师拉姆赞也随即效仿他人，声称周身不适，裹着皮毛衣睡大觉，就这么度过了在米兰余下的日子。因为他当时老毛病又犯了，正受着一种恶性皮肤病的煎熬，如果从拉达克来的替补厨师能有哪怕一点点本事，做出些还能消化的食物，我也不会那么在意拉姆赞不能继续下厨了。拉姆赞极难对付，不论我们如何要求他提高厨艺，这家伙都学不会做最简单的欧洲菜肴所需的一点点技巧。

狂风怒吼，我栖身的小帐篷随风摇晃，好几次险些给掀倒在地，即使这样，我仍然繁忙地工作着，直到深夜，整理白天发现的文书。当我用几乎麻木的手指整理它们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今后阐释它们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这不仅仅是由密密麻麻的书写和潦草的笔迹所造成，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吐蕃文书大都是些纯宗教的经典佛学经文和作品，早期很少有非宗教性的作品。要想充分地阐述那些诸如在米兰古戍堡中发现的出土文书含义，不仅要精通语言学，还要对藏语和吐蕃人的生活极为了解才行。驻列城摩拉维亚使团（Moravian Mission）的尊敬的Rev. A.H.

弗兰克博士是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他是公认的西部西藏（Western Tibet）古物研究的权威人士，他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学者。让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他已同意接手这项工作。但是，他自己在今后几个月要进行考古旅行，目前不能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发现的吐蕃文书。这期间，我也只能根据 Rev. A.H.弗兰克博士以前对吐蕃纸文书和木简的研究心得，写一份简短的提示总结。同时我的朋友印度局图书馆馆长（Librarian of the India Office）博学的 F.W.托马斯博士（F. W. Thomas）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基本资料。

目前已获得的信息证实，就如最初怀疑的那样，米兰出土的大量吐蕃文书由各种各样的官方文件组成，如报告、申请等，它们主要是写给吐蕃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主题大多与军事有关，偶尔也会涉及当地的社会混乱状况。已经摘要翻译的 18 份文书中，有 6 份清楚地提及与敌军遭遇的情况。在一份写给大罗布（Great Nob）官员首领的文书中，谈及一个护送队被俘及派遣军队前往迎战的情况。在另一份文书中，小罗布（Little Nob）戍堡驻军首领向“伟大的主人，总指挥官”报告，他们虽然加强防御，但是敌人是如何突发进攻，残杀他们的家人，破坏了某些军事储备。还有一份从一些小绿洲送来的文书，请求急速支援以抵御北部边界的威胁，并报告了西部西藏的动荡局势，文书以要求援军“以飞毛腿火速赶来”作为生动的结束语。

一个老军官的请愿也很奇特。他抱怨没有收到承诺给他的报酬，暗示还需要他击退某次新的进攻。在别的文书中，我们还发现关于惩罚性的远征，敌方商队的行踪，对运输物资的指示等等各类报告，有在最高政府的命令下给某些高级人物的关于紧急事件的质询单，还有关于准许支取工资和某项特殊运输费用的批文。在一片木简上，Jehu-Iho——“四部酋长的仆人”（servant of the four Tiger ministers）——报告他在执行完任务后，到了小罗布，因未获得进一步指令而不安，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在一份由于灰尘覆盖难以辨认的纸文书中，我们得到了一封写给一

位高级官员的私人书信，推荐使用某种药物——由绵羊粪便混合黄油、大麦粉和其他可食的原料熬制而成。由于纸张的匮乏，同一张纸的背面有一份加盖了官印的另一个人请求发给返回家乡沿途通过关卡使用文件的长篇申请。还有一封更为夸张和冠冕堂皇的文书，日期是甲子记年（Twelve Years' Cycle）中的某一年，盖有9个红印，记载关于买卖在近期战争中俘获的一个奴隶的奇特法庭程序，一位僧人怕这个奴隶逃跑，在得到某些保证之下成交的文件。

我那些忠实的历史语言学专家朋友们认为，这些出土文书在古文字学、拼写方式和方言特点等等方面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但在此就不宜专门论述了。它们是古藏语中最早的文字记录丰碑，必将使人们对吐蕃时期社会和军事组织的各方面有新的认识，那是一个西藏在中亚政治历史上扮演着重大角色的时代。辨认文书中提到的众多地名是一件有趣而又颇有收获的工作。这些名字中有"Cher-chen"这个地名，它是车尔臣绿洲最早的称呼，在前面引用过的文书中出现的罗布（Nob），证实人们追寻已久的"纳缚波"（Na-fo-po）和"Lop"在语音上的联系，前者是玄奘描述罗布泊（Lop-nor）时用到的纳缚波，后者是马可·波罗所用的罗布，亨利·玉勒（Henry Yule）爵士已经考证它为Nob的中世纪的异体。如果正如同上面所引用出土文书中那些地名词语所强烈暗示的那样，米兰遗址被吐蕃人认作是大罗布，那么他们所说的小罗布很可能就指若羌，这和《汉书》（Han Annals）描述的一致，《汉书》把东面的"老城"（Old Town）称为鄯善（Shan-Shan）或楼兰、扜泥（Yü-ni），西方的"新镇"（New Town）称为"伊循"（I-shün）。我相信，《汉书》中所说的这两个地方分别就是现在米兰遗址和若羌遗址。

无论今后能够从这批丰富的文书中收集到什么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至少目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吐蕃人是在吐蕃统治中国新疆及其新疆以东地区的时期占领了米兰，这些古成堡极可能也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尽管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

M. Aurel Stein

很少，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时期一定是从8世纪中国对其西部统治的衰落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9世纪后半期。米兰古戍堡出土的千余件文书中，找不到任何中文记载，这也反映了中国的影响和控制力在塔里木盆地的完全消失，标志着另外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这也是这一时期不为人们所知的主要原因。

但奇怪的是，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挨着北面城墙内侧的一间屋里，只有浅浅的一层垃圾，我们在里面发现一份相当有意义的非吐蕃语文书。那是一个皱巴巴的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大张大约1英尺见方的纸和两张写满奇怪字体的破纸片。我立刻认出那是突厥如尼文（RunicTurki），是最早的突厥文本，这种字体大约是20年前在鄂尔浑（Orkhon）和叶尼塞河（Yenissei River）某些公元8世纪早期双语铭文中被首次发现。

声名显赫的丹麦学者，著名的蒙古碑铭语言和文字第一位解读人，V. 汤姆森（Thomsen）教授同意、研究发表我发现的米兰文书。他所提供的初步译稿显示，文书原本包含一长串名单，皆是突厥人名，内容是给个人，或通过代理人，颁发认可书，很可能是通行证。命令接受人所用的一些术语似乎证实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即使不是全部，都属于一支突厥军队。这一想法本身又暗示这件遗物属于吐蕃统治之前的一个时期，那时的塔里木盆地被来自北部的各个突厥部落所统治，中国当时设法从政治上控制他们，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功。

在米兰古戍堡里面和四周，我都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回鹘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我们知道大约公元860年或后来的穆罕默德时期，回鹘人赶走了占据这里的吐蕃人。如今，仍有一条可用作灌溉的河流在该遗址方圆几英里内经过，逐年的干旱也难以解释吐蕃占据时期之后人们为什么很快放弃这些戍堡，不论干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如果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考虑，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吐蕃人会丢弃这些古堡了。米兰戍堡是地处由塔里木盆地的南部绿洲通往敦煌的

直接通道的要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就像上文提到过的通往罗布泊（Lop-nor）北部的路线一样，这条路线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以来，一定曾是与中国内部交通的主干线。公元4世纪时，由于通往罗布泊（Lop-nor）北部的路线受严重干旱的影响，无法正常使用时，这条路线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吐蕃军队卫戍米兰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绿洲上，有两条从西藏中心地区和拉萨（Lhasa）穿越青藏高原地区和昆仑山山脉前往塔里木盆地东部最近的道路。这样，米兰对他们而言就是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可是，一旦吐蕃的势力从北部荒凉的山地消失之后，米兰的地位也就立刻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回鹘统治时期，伊斯兰早期和蒙古人（Mongol）统治时代，走传统古道从和田和其他南部绿洲到敦煌和中国，若羌都是最好的基地。

这样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可·波罗游记》中没提到过米兰，他所指“罗布镇”（town of Lop）无疑就是若羌。毫无疑问，当威尼斯（Venetian）商队经过古戍堡，进入“罗布沙漠”（Desert of Lop）时，这里就如同现在一样墙倒屋塌，一片沉寂、凄凉。有一次，深夜里冰冷的寒风刮得最狂野的时候，一个大商队走过了古戍堡墙下我们孤零零的帐篷，他们有六七十匹骆驼，全驮着敦煌的砖茶。这些喀什噶尔商人很有魄力和胆量，想尽快找到一块有水和燃料的地方，他们不顾凛冽的寒风，只是匆匆问候一下就离开了。他们是23天以来我们第一次遇见人从这里路过，丁丁当当的队伍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就像来自远古时代的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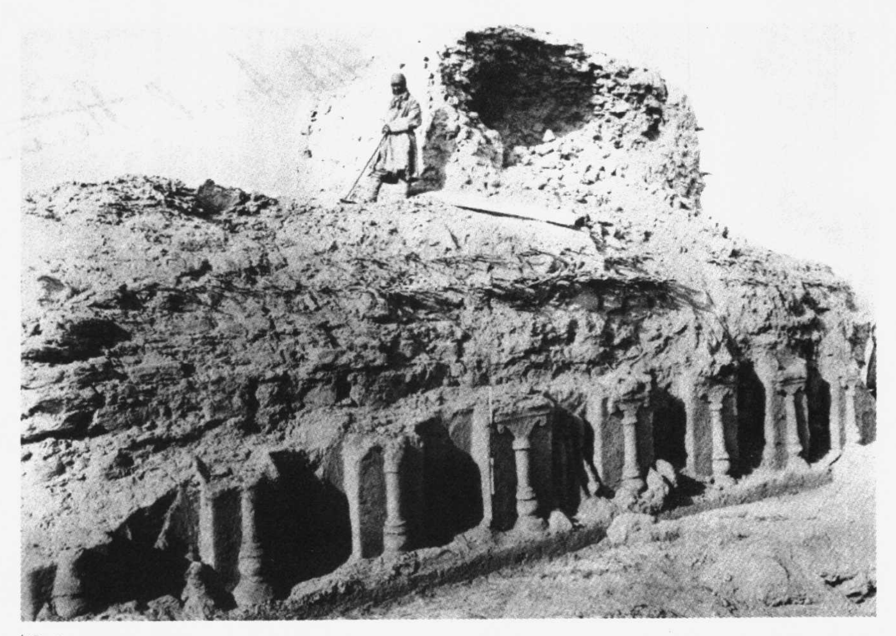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第四十章

米兰古佛寺

从古戍堡中发掘出如此众多反映遗址后来占据者状况的材料，从而使我更加急切地去寻找可能帮助我追溯本地早期历史的遗迹。1月29日，古戍堡清理工作进展顺利，我得以分拨出一部分工人，开始新的发掘。当我带人来到距离古戍堡东北部1英里多点的废弃古佛寺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那座古寺，在去年11月的试验性清理工作中，我们已发现了一些雕塑遗迹，雕塑样式明显属于早期雕塑。那天天气非常寒冷，最低气温达到华氏17度，顶着刺骨的寒风，温度似乎也永远不会上升了。但是，在探沟中工作时，我们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暂且忘掉了寒冷、大风和尘土所带来的一切不适。

在我第一次来访时，我曾把这座古佛寺认作是一个佛教圣地。清理之前，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模样，由土坯彻成，长约46英尺，宽36英尺多一点。可以清楚地辨别出寺庙遗址有上下两层，在地面之上第一层约有9英尺高，它顶上的第二层远比第一层坍塌损坏得厉害，遗址地面长大约是17.5英尺，宽15英尺，第二层虽然说严重毁坏，但是残高仍有11英尺多。寺庙风蚀严重，上层以及下层西北和东北面的灰泥表面和装饰浮雕已经完全剥落。沿着东北面和部分东南面的墙脚，在大片



⑬⑨米兰遗址佛教寺庙的地基

垃圾之上，我们发现了佛教浮雕装饰物的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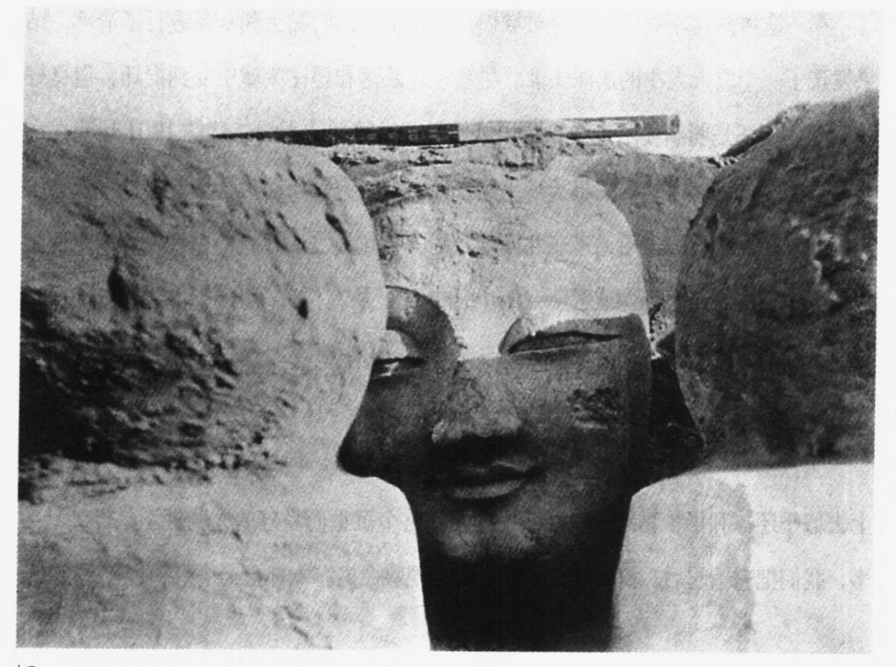
清除掉浮土泥块，就能看到下层或是底层曾装饰有成排的约2英尺宽、8英寸深的壁龛，外围是和它差不多一样宽的突出的墙面，墙上涂了厚厚的灰泥。由于风化，只有4英尺以下部分的突出物和壁龛才保存了下来。但仍然可以从中发现，凸出的墙面上曾装饰有纵行的极其类似波斯（Persepolitan）样式的浮雕，上有很大的大写字母和倒置的螺旋饰物，在浮雕下面是一连串圆圆的球状底座，光秃秃的土堆把底座分隔开，其风格明显相似于尼雅佛寺遗址中发现的雕琢华丽的木柱。这些壁龛内曾一度有过真人大小的灰泥塑像，但其中只有东北面中心位置的一尊塑像保留到腰部，而其他的塑像，除了许多支离破碎的残片之外，我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出脚的模样。

第一次考察这座寺庙时，曾对堆积在建筑东北面的黏土和灰泥进行了清理，结果发现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灰泥头像。尽管它在跌落和埋在废墟中受到损坏，但良好的制模比例还是明确显示出受希腊风格佛教艺术雕塑的影响，就像1901年我在和田附近的热瓦克佛塔的庭院里清理出的浮雕一样。有一条通道环绕着整个寺院中心的佛殿，在彻底清除了沿通道东北面堆积的大量垃圾之后，我们很快发现一个巨型泥塑头像，可能是尊佛像或菩萨（Bodhisattva），所在位置高出原始的地表整整有3英尺。头像的面部朝下，扔在破损的通道内所积的一层沙之上，这样面部保留较好，还有原始的涂彩痕迹，头像长整整17英寸。

头像的材料是粗制黏土，混合了麦秆，表面涂上一层较精细的软灰泥，灰泥看上去似乎还掺和了植物纤维。要安全地抬起这个沉重而易碎的大物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把它抬起后，没有严重损坏，我发现雕像内芯木柱已经腐烂，但仍很完好，

⑭在米兰遗址废庙的东北通道里发现的端坐的巨大佛像





⑭米兰遗址废庙里塑像基座之间巨大佛像的头部，为灰泥制作

我决定冒险将它移走。随后，另一个巨型头像在靠近东北面通道中心部位的垃圾中被发现，它更大、更沉，尽管遭受了种种损坏，其面部特征仍能明晰地显示其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特点。

在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查明了这些巨型头像的来历。随着东北面通道清理工作的进展，看到它的外墙外有一具盘腿而坐的巨型躯干。从保存下来的衣饰褶痕来看，它显然是尊佛像。清理工作在第二天结束时，我确定这一边总共有6座这样的巨型雕像。两膝之间，宽度约7英尺略多。靠近这一排中间有一座双手持禅定印(Dhyanamudra)，即保持沉思的姿势。它的头掉在了地上，面部朝上，受到严重损坏，这里充塞通道的尘土垃圾已近3英尺高。

在它的左膝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头像，明显就是对面外墙壁龛雕像的头部。相对而言，这个小头像保存较好。根据我在热瓦克佛寺发掘过程中积累的类似经验，这个头像可解释为在它即将坠落之时，最后一位虔诚的参拜者将它移到了这个安全位置。这些巨型坐佛雕塑仍保留了很多衣饰褶痕，足以证明远在罗布泊的雕刻者模仿了精雕细刻的古希腊雕塑褶皱形式，甚至连胳膊上悬挂串饰的那形似波浪状外缘也做得十分精细，模仿得惟妙惟肖，犍陀罗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就是从希腊古典艺术母体中衍生出来的。毋庸置疑，在吐蕃人占据这里的很久以前，这座寺院就已经建成。

在靠近一尊塑像基座前，又发现了一块6英寸长棕榈叶文本残片，梵文书写，用的是早期样式的婆罗谜文字。这说明，极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已经废弃，比原来预测的要早几个世纪。文书材料内容显然是佛教的高深经文，为婆提(Pothi)文本，在印度写成。从一些文字的古文字特征判断，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它不可能是在公元4世纪之后写成的，时间很可能更早。

根据这一片文书残片被发现的位置，几乎可以肯定它原先是作为还愿的供品，被放了在邻近的基座上的，其方式和我曾在安迪尔圣地所见一致。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一文本极不可能在当时存放时就已十分古旧，而且在佛像坍塌前，这么易碎的材料也不大可能长期地暴露在空气中，坍塌下的碎物把这片文书掩埋，对文书的保存起到了保护作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事例，我们发现了一个属于北边角落第3尊雕塑的头像，被卡在底座和右边邻近的佛像之间，头像摆得直上直下，面部丝毫无损，这是它距离巨型雕像的基座很近，避免了被重物挤压。

很奇怪，北面最易受到风的侵蚀，可寺庙的很多遗迹都在北面，但很快这一疑惑就解开了。我们随后的清理工作显示，在距离这儿几英尺的地方，外城墙与另一个更大建筑物的城墙相连，因此，这有助于北面古物的保存，但是在抵御风力侵蚀

的同时，后者遭受了严重损坏。它可能曾是佛寺庭院或是寺院建筑，东北有一堵坚实的砖墙，阻挡常常刮的东北风，现在仍还有长60英尺的砖墙。但是，只能发现一间与之比邻的房间的痕迹。这唯一的房间面积不大，外围周长19英尺，内有一圆形房间，令我回忆起在印度西北边省的佛教废址中常见的环形礼拜堂。

可惜，在破损的矮墙之内并没有发现具有考古价值的东西。在随后清理寺院东北通道后面的两堵墙之间的狭窄空地时，仅仅发现了一层层厚厚的羊粪和马粪。在一些地方，断墙上覆盖了厚厚的羊粪和马粪，这证实了在这处佛教圣地破落之后，这片土地一定曾生长过适合某些动物吃的植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尼雅和罗布泊(Lop-nor）的发掘工作，也揭示了完全对应的现象，证实了古代的耕地是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后，才变成现在这样完全荒芜的废地。

⑭米兰遗址圆顶佛教寺庙废墟，佛塔被围在中间



M. Aurel Stein

要把雕像遗物安全地包装和运走并非易事，因为它们不仅很重，而且制作的材料极其易碎。于是，我不得不费尽心机，队员们则忙着回填清理工作中发掘出的其他东西。我仍是采用在古戍堡中发掘营房时所采取的措施，尽管比较而言，古戍堡所出头像雕塑要比寺庙晚。在此期间，在古戍堡西边1.25英里处，仍然有不少裸露的废弃物堆，于是我抓紧时间，于1月31日开始新的清理工作。我一到这个遗址，就对其中一组5个土堆进行粗略的考察，得到的印象是它们是已严重毁坏的普通样式的佛塔遗址。但是，我仍被最小的土堆的古怪外观所吸引，小圆屋顶从废弃物中露了出来，保存相当完好，其基座很大，与小屋比例不大协调。

刚开始，清理工作只是发现了一个狭窄的露台或者是通道，它好像曾围绕在猜测中的约29英尺见方的主基座周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令人心动的发现。我把跟随我的那几个人留了下来，在托合提阿訇的监督下，完成清除外部碎片的工作，而我则初步考察下一个邻近的土堆。但在回来时，我立即意识到裸露着的土坯建筑根本不是什么台座，而是一座外方内圆的建筑物的遗迹，原来的建筑物肯定有一圆顶，一座小佛塔被围在了中央。从穹顶及墙壁上部脱落的大量碎片，已经完全堵塞了佛塔基座周围4英尺8英寸宽的环形通道。台座也是圆形，直径9英尺。碎片大多堆在原来所处的位置，堆起8英尺高。在很早以前，寻宝人可能从西侧挖了一个大洞，穿过内堂，一直挖到佛塔的基座，这倒为我们清除碎片杂物的工作提供了便利。

下午，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在环形通道的东段和北段很快不断显露出着色的灰泥断片。显然，小房屋的内侧墙壁曾装饰有壁画。当发掘到距地面大约4英尺高时，墙上展现出精美的带翅膀天使的画像，我完全惊呆了。我怎么想得到，在靠近荒凉的罗布泊盐碱大漠的地方，在中亚腹地，能见到古典希腊风格的小天使(Cherubim)，这真是不可思议！她们神态优雅，使人回想起基督教艺术形象中的经典景观，可它们在这个明显是佛教寺院的墙上，究竟作何用途?

看到这些小天使，我心里十分兴奋，为防止任何损坏，我急切地用赤裸的双手逐个清理。我很快就发现了纯粹古典的设计和着色对这些壁画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之深，比对我迄今为止在昆仑南部和北部所见的古代绘画艺术作品的影响更为深远。天使睁着大眼睛，表情神采飞扬，微敛的小口和轻微翕动的鼻子蕴含着可爱的神态，我不禁回忆起埃及和希腊女子年轻美丽的头像，多年前，在一位伯爵（Graf）收藏从托勒密（Ptolemaic）和罗马时期的发尤姆（Fayöm）木乃伊中发掘的长方形画中，我见到了那些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美丽头像。也许是因为有些壁画的面部特征隐隐约约地受到闪米特（Semitic）的影响，使我产生了这些联想。然而，壁画还有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的痕迹，灵活而富于变化，生动率真的眼神，优美的身体姿势，简洁流畅的轮廓，振翼的短翅向上弯曲，看上去很优雅。第一眼看过去，就可以确定这种风格的作品不可能产生于西藏占领期间和紧接其前的汉人统治时期。我们最好去庞贝式（Pompeian）别墅看一看，因为那时的工匠也画出了这样美丽的天使，那些工匠们还参与了建造了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哥特式建筑（Goths）。

这些天使在表现手法上典型的古典风格，明显是借自早期基督肖像的意义，可究竟意义何在呢？我仍难解心头的疑惑。这时，队员们一声喊叫，他们发现了“亥特”，这为确定日期提供了明确的古文字学依据。在填满了破碎的泥砖和灰泥的南面通道中，连续发现了3大片着色精美的丝织品，显然，它们曾属于一条供奉的旗帜或条幅的局部，每一片都用佉卢文写了几短行字。这些丝织物长约22英寸，宽6~8英寸。后来，又发现了编织同样精良的丝织品残片，不过没有写字。这些材料质地细致，底色呈乳白色，上有许多窄窄的条纹，浅黄色、棕色和紫色搭配得很和谐。

这些残片上及其随后出土的第四块丝织品之上的佉卢文文书手笔非常整洁，就像我在尼雅遗址中发现的皮革文书那样。由于这些丝织品属于公元3世纪后半叶，似乎有理由作出结论，这些还愿的奉献品也是大约同一时期放置于此地的。丝织物

上的书写墨迹色泽纯正鲜明，甚至无需覆盖任何保护性的物质，不像尼雅佉卢文出土文书中的皮革文书是经折叠的，文木简则藏在木盒里。所以，与寺院的废弃的时间相比，这块写有题记的条幅供品不大可能先于前者太久。由此，有理由相信，米兰就像尼雅、安迪尔和罗布泊北部遗址一样，是在公元3世纪末被废弃的。后来，米兰有一段时期重新为吐蕃人占领，安迪尔则为此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参照物。

写到这里，我要在此加上两句：这一章写好之后，我在巴黎的合作人、博学的阿贝·博耶（Abbé Boyer），告知了我他对这些佉卢文文书解读的结果，它们是许多人为自己及其亲人祈求健康的祷文。尤为重要的是，文书中出现的所有名字都源自印度和伊朗文。

在黄昏时分，在北面通道的城墙上又清理出了天使头像，使这些遭长期“困禁”的天使重见天日。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我们不得不就此结束一天的工作。然而，在东北面挖得更深一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灰泥壁画墙面，显然它们是从这个圆形的小建筑物的墙上部剥落下来的，现在紧挨绘图护壁堆着。我意识到进展下去需要极其小心，不得不把它们留在原地，因为在西面和西南面，寻宝人毁坏了墙，无一壁画装饰得以存留。碎片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到夜幕降临。

今天，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片深红色、黄色等颜色的精美丝织物，它们显然都是长旗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犍陀罗风格的木雕残片，可能曾是佛塔上装饰“Tee”和伞状饰物的。另外，我还见到了奇怪的遗物，可能是来寺庙的最后一批朝拜者们供奉的还愿供品，这包括许多人工做的花，由坚硬的木质纤维剪成，着以乳白、蓝、橘黄、紫等颜色，由纤小的木质茎秆支撑，把花的雄蕊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有两大块结实的东西，类似硬粗布，表面涂有蜡或灰泥，画有黑色和白色的图，现在仍有一些假花粘在上面。显然，这些画有图画的纤维材料是用来粘贴进献的假花。

那天晚上，我在寒冷的帐篷里坐到很晚，想要把这一天工作的情况和印象有条理地记录下来，这里的遗迹很少人知晓，它的古典绘画艺术被奇怪地传播到了罗布泊，我想找到研究其中奥秘的真正视角和意义，想着想着，不觉兴奋起来，感到身心都暖和了。它是一个有启示性的发现，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且现实的困难就摆在眼前。对这些坟墓中的精美壁画，除了把它们转移到别处，再无他法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和保护。但我清楚地知道，要将它们取下并安全地长途运送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壁画的支撑物只是一层易碎的灰泥，说白了也就是干泥，它已有多处，甚至是现在仍附着在墙上的部位，都有要断裂的迹象。剥下和包装它们的方法及手段都必须临时想出，其困难可想而知，更不用说要用米兰河上的丛林所能提供的材料做出足够大的结实的箱子了。

M. Aurel Stein

第四十一章

天使护壁

2月1日清晨，我让队员们离开营火，以便尽早开始环形通道的清理工作。除了西边有个已经完全毁坏的穿过西墙的入口，过道还有3扇窗户提供采光。窗户几乎是朝正北、正东和正南开设的，南面和北面的窗户几乎处于同一高度，距离地面约2.8英尺。窗户和门洞将环形墙壁分成了几个部分，每部分都装饰有带绘画的带状装饰或护壁，每条装饰饰带有6个紧紧相连的半圆形空间，每一个半圆形空间中都有一个真人大小的有翼人像的头部和肩部。带状装饰约1.5英尺高，它们的弦或顶线高出地面近4英尺。在这排带状装饰之下，是一条宽带状的波浪线，黑色的线条很粗，代表了海洋。这样，半圆形空间之间的拱壁得到了填充。每个半圆形空间顶部高2.2英尺，顶上有一条粗黑线，将这个“天使护壁”与其上方的几乎已完全毁坏的带状装饰分隔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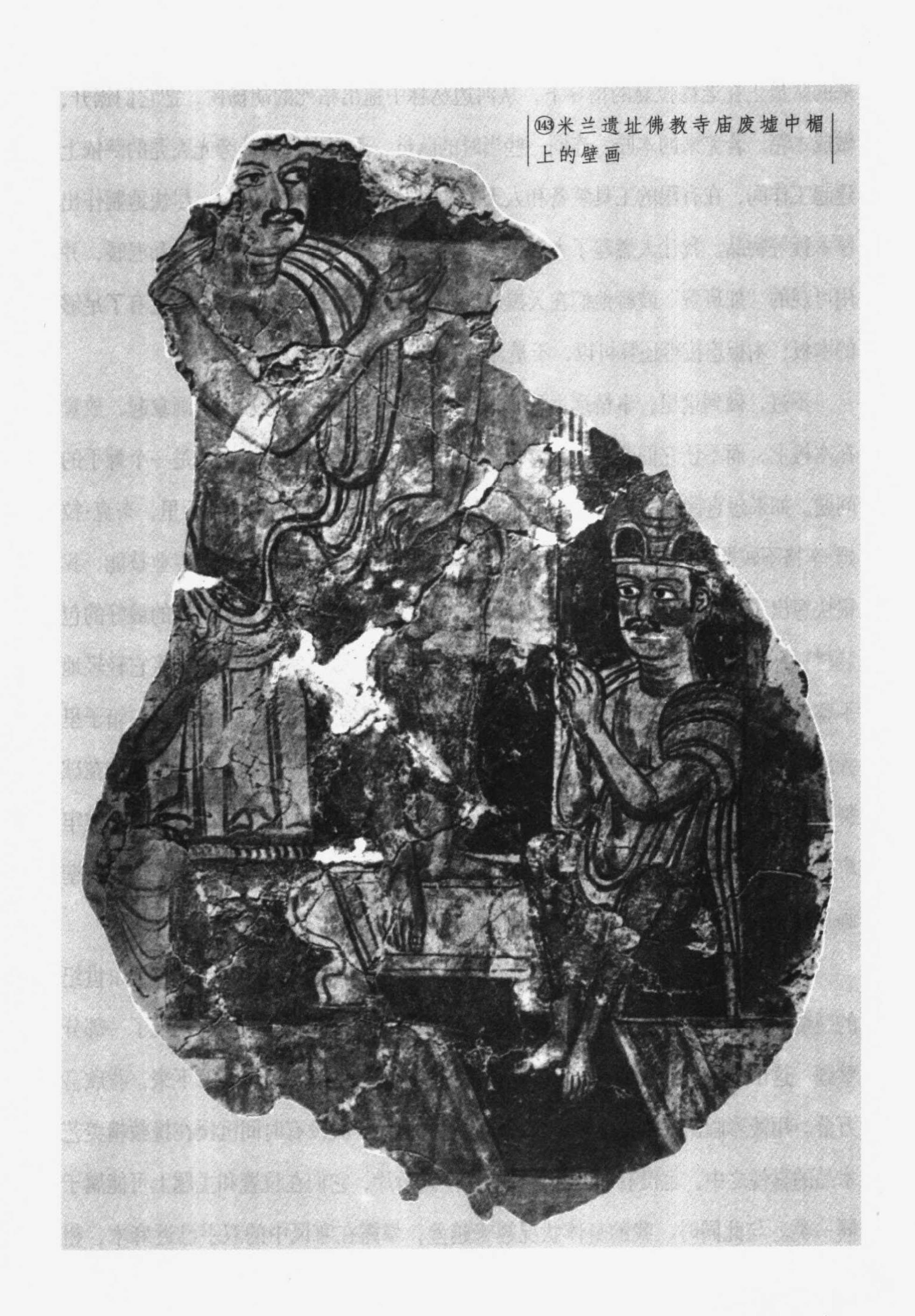
由于环形城墙遭到的破坏，东北和东南段墙外的底层护壁保存得极少。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了东南段积聚的碎片保护住了数量可观的装饰更高墙面的灰泥绘画残片。大一些的残片一层层地紧紧靠着仍未倒塌的墙。它们之所以得以存留下来，显然是由于在滑落下来之前，过道内已经堆积了许多圆顶上落下的碎片，从而阻止了

壁画逐渐从墙上剥落下来。这样，有一个地方，护壁完全隐藏在连续3层着色灰泥之后。有理由这样认为，即最里边的壁画断片是最先剥落下来的，它原来应是带状装饰中最靠近护壁的部分。

有的绘画灰泥断片长几英尺，且很容易被打碎，要想移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极其小心翼翼。灰泥唯一的制作材料是易碎的黏土，虽然掺杂了短草秆和碎芒草，但这也不足以使它有足够的凝聚力和韧性。所有灰泥断片的厚度都不超过0.5英寸。接触到它时，如果不是万分小心，它的边缘就很容易断开。尽管还有薄薄一层细黏土衬托着壁画，但它却不像后来发现的壁画底衬那样掺入了纤维，而且，这层细黏土质地比较坚硬，这样，灰泥断片一旦从墙上剥离下来，就更易断裂。这些落下来的断片紧挨在一起，它们原来可能属于同一组壁画，因此，若把断片从原地取走，我们就可能无法判断各个断片之间的联系。所以，在试图分离和挽救这些互相挤挨着的精美壁画断片之前，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下它们被发现时的状况和位置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翔实描绘笔记和拍照，但两者又有其各自的困难。一整天都十分寒冷，我蹲在狭促的地方，忙着做无止尽的测量，用铅笔做着记录，寒冷的北风很快就把我的手冻僵了。晚上，在帐篷里继续工作，铅笔换成了钢笔，写下当天的日志。拍摄工作也同样艰辛。环形过道宽仅4.8英尺，空间狭小，我们必须为相机寻找较佳的位置，可是要想用广角镜头摄下尽量大的面积而不让影像扭曲，更是难上加难。当我蹲在地上的沙石黏土碎片之间，调整相机高度，对焦距，可以用聚焦幕布遮住我的脸，使我暂时免受风吹之苦，这可就算是难得的事情了，对幕布我真是感激不尽。

现在是冬天，在废弃的古寺内的环状通道里，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能获得足够的光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初步的记录并非易事。在此期间，阿不旦



⑭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楣上的壁画

来的队员正在老穆拉赫的指导下，从河边丛林中拖出枯死的胡杨树，把它们锯开，做成木箱。若羌来的木匠，连同一些当时的队员，不得不在遗址旁光秃秃的萨依上建起工作间，在有限的工具装备和人天生的懒散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快地制作出厚木板等物品。我让人燃起了大堆篝火，给这些临时的工匠们提供光线和温暖，并用可观的“加班费”鼓舞他们在天黑后继续工作。这样第二天早晨，我就有了足够的木板，木板连接得还算可以，于是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壁画断片。

不过，做到这里，事情远远没有做完，如何把极其易碎的灰泥壁画拿起，放置在木板上，而不让它们断裂、打碎片或损伤到绘画精美的表面，这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想直接把断片拿起，几乎肯定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几天里，奈克·拉姆·辛格不顾严重的热病和刺骨的寒风，也起身过来协助我。运用他的专业技能，我很快想出了一个方案，而且效果不错。我一向都认为和田纸是中亚出产的最好的包装材料，所以用木板垫上薄薄的棉毛线后，又铺上大张厚实的和田纸，将它轻轻地平整地按压在剥落壁画的正面上。下一步，奈克·拉姆·辛格从小心存放的空箱子里弄出一大张坚实的锡纸，用薄薄的铁条将箱子加固，再缓慢拉锯一般将锡纸放在破裂壁画墙面的柔软底面，小心翼翼，以免损坏。一片墙上的灰泥从腹背两面都被牢牢夹住，不论它有多大，倾斜地拿起也就比较安全了，绘画的表面朝下，让灰泥壁画平躺在有软垫的木板之上，然后安全地运走。

我们如法炮制，一层又一层的壁画墙面从碎片中拯救出来，甚至已有几个世纪的裂痕也没有进一步变宽。当取出最外一层剥离的壁画断片之后，又发现了一部分壁画，这出乎了我们的预料之外，这么易碎的东西如此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欣喜万分。用淡彩画出的艳丽色彩让人大饱眼福。但是，我没有时间沉浸在挽救精美艺术品的喜悦之中，也没有时间归类和拼接壁画断片，它们在位置和主题上可能属于同一类。与此同时，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暴露在寒风中的双手已近麻木，粗

裂的手指又由于不断与浸盐的灰泥和碎片接触，疼痛得厉害，这些都分散了思想和注意力。然而，我仍得忍住病痛，仔细记录各个断片的位置及其主题、状况等所表达的意思。这些工作可能对之后确定壁画装饰品最初排列的各个细节有所帮助。

我也记录下了一个小发现：在大块壁画断片的脚下，发现了一只鸽子的羽毛，骨头和残留的鸽巢。让人觉得有几分怜悯。显然，鸽子把巢筑在墙的高处，结果墙坍塌了，鸽子死于非命，鸽子身边的壁画断片可能就是邻近拱顶的。由于命运的捉弄，这只可怜的鸟儿注定要成为考古学上的见证人，它在一个半身佛像之下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处，佛像手的姿势还正是佛教绘画中常见的“施无畏印”。

技术上的困难同样艰巨，当要凿下并转移有翼天使护壁的精美壁画墙面时，我们的责任感进一步增重了。其中有 7 块保存得相当完好，所以可以尝试通过移动来挽救它们，但是这些壁画墙面也还有许多裂痕，以至于让人为之担心，它们会不会在西去的长途运送之前，就粉碎成了碎泥。幸运的是，有 5 块这样的壁画墙面在东北段墙上，护壁之上几乎没有什么有壁画的墙面了，北窗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着手点。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每一个壁画墙面之后插入我们的印度装备中的一把柔软的大钢锯，将灰泥底衬和土坯墙表面锯开，此处的灰泥更厚，不像灰壁画中的那样易碎。

但是，我们还是不止一次地遇到了未曾料想的困难。在几块壁画墙面之后，我们遇上了一层盐质的凝结物，将灰泥牢牢粘在砖墙的细缝处。这可能是由于地下水渗入砖墙，析出了原来含有的盐分。通过不断的实践，我们学会用新奇的权宜之计应付这样的意外事件，尽管我们可用的工具手段和所剩的时间是那么有限。然而，我承认每一次移动新的壁画墙面时，都会害怕我的眼睛可能会再也看不到图画里高雅的王宫，以及人物的明眸善睐。不论这些奇妙的天使们原应出自哪一座万神殿中，我都觉得应为我们如此冒昧地对待她们的画像，而请求她们的原谅。

要将这些易碎的灰泥壁画墙面安全送往伦敦，看来困难重重。但我已决定做好

一切预防措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全力以赴地运送它们安全抵达目的地，这样才对得起我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的良心，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脑中构想如何最好地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2月2日晚上，当所有能够保存的壁画全部安全地平躺在木板之上，被仔细保护着不受狂风、飞沙以及别种伤害的时候，我的包装计划也已形成。

要让脆弱的灰泥不会碎成尘土和草秆，需要坚固紧密的材料；而要抵御箱包在几个月的长途中必须承受的来自骆驼、牦牛、马匹和装卸工的碰撞和颠簸，就需要韧性。问题是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欧洲商人们可能用于精细古物的材料不仅无用，而且更可能有害。但我想起了在尼雅和罗布泊遗址包装易碎的木雕品时，本来给骆驼吃的一捆捆的芦苇曾大大地有所帮助，于是我就决定充分利用正在干涸的米兰河附近生长芦苇的河床。

虽然我们业已粗裂的手指感到非常的劳累与疼痛，但仍进行了反复试验，终于得出了包装方案的细节。这一方案至少给了我一些希望，即我们不会徒劳无功。我让人们把干燥但仍相当柔软的芦草割成一致的长度，略长于壁画墙面的纵长，并铺成相当厚的一层，在它之上交叉着铺上一层短一些的与壁画宽度对应的芦苇。然后，又是厚厚的一层柔软羽毛状的芦苇尖梢，还带着花，正适合托住和保护壁画墙面背面裸露的粗糙灰泥面。我们又使用最初把壁画从寺院墙上取下时、用过的木板和锡纸，解决了翻转壁画的难题，让它们安全地躺在几层包装衬垫之上。

壁画如今表面朝上，在光滑的着色表面之上盖了一层薄薄的棉毛，为防止它被吹起，再盖上几张和田纸，在这之上又是一层棉毛，然后是第二块壁画的壁画墙面，但这一次是着色表面朝下。同样一层层的芦苇衬垫被用来保护它，但次序是颠倒的。这样，每一对壁画墙面都被裹上了厚厚的长方形芦苇包裹，随后又在其边缘加上相同的保护材料。然后，在包裹上下各置一块薄板，使芦苇保留在原处，同时也可使

压力分布均匀；再用绳子尽可能紧地系在夹板之上使之固定。最后，这些实际上已经牢固安全的包装被两个两个地放入为它们量身订做的坚实的胡杨木箱里。尽管有绳索紧紧捆着，富有弹性的芦苇包装到一定时候还是会膨胀，但这只会使包装更加紧密。

由于奈克·拉姆·辛格现在还不能工作，这项细致又有条理的包装工作实际上得我亲手完成，因为我只放心把其中最简单机械的工作交给维吾尔族人去做。这工作让我在严寒之中忙了3天，这个过程中我十分满意地确信到目前为止转移工作还未对壁画造成任何损坏。但在我的监督之下这几码的转移，比起这些脆弱的灰泥壁画墙面将不得不面对的几千英里的穿越沙漠和冰封地带前往火车站的长途跋涉中的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有时，我会觉得期待最终的胜利是徒劳的。那么，这一切进展，在我自己看来都很奇怪，就算它们无疑在那个粗壮结实的蒙古人看来很奇怪一样，他曾在一天早上经过我们的营地，赶着5头载着来自若羌面粉的骆驼，前往其曼塔格高原上他那遥远的家。当时，他快活而结实的身躯裹在层层羊毛之中，背着一柄重重的直剑，黄铜剑柄上镶嵌着珊瑚和绿宝石。他说着我们都听不懂的语言，无论如何也不愿面对照相机，看着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年代的人。我在这些腐朽的古老灰泥片上所下的工夫似乎使他大吃一惊。而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传统的考古学家正在哈德良（Hadrian）城墙近旁发掘一个罗马别墅的遗迹，突然间发现被一个身着全副中世纪服装的异族人正在一旁注视着。

18个月后，当我在和田不得不打开用骆驼由米兰送到此处的重近200磅的箱子，重新用轻一些的材料重包装它们，以适应马匹和牦牛驮运时，我获得了一些信心。除了几处轻微的裂痕，还没有造成任何显而易见的损害。这些轻微裂痕的出现很容易得到解释，主要是因为从略微弯曲的墙壁上取下的壁画墙面被平放所致。我在壁画墙面的灰泥背面呈网状地涂上厚厚的一层木匠用胶水，这样提供了一个有用

的坚硬的底衬，也是一层附加的保护，这是在米兰这种既无合适的包装材料也没有足够的有经验包装工人的情况下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但是，只有在米兰的艰难发掘结束了3年之后，这些箱子在大英博物馆被打开之时，才是真正获得解脱的时候。那时，我脑中所有对这项危险实验能否成功的疑虑才消散了。我亲眼看到这些精美的艺术珍品——可能也是在这种长途跋涉之中最易损坏的物品安然无恙时，当时的情景就和当初我有幸看到它们在风沙漫天的沙漠之中，从几个世纪的埋葬中被发掘出来时的状况并无二致，我真的感到欣喜若狂！

第四十二章

米兰壁画

当我回顾在米兰古寺的辛劳成果时，心怀着特别的满足感，这不仅仅是因为想到成功克服的困难，或给他人带来的艺术享受。对保存下来的壁画残片随后的考察令我完全地意识到，我的记录和相片再少，甚至是在不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也足够充分体现出这样卓著的壁画中所有展现艺术性的地方。只有把壁画原物带到我的朋友们——研究希腊风格佛教艺术和中世纪艺术的专家安德鲁斯先生（F.H. Andrews）和福彻先生（M.A. Foucher）的眼前，才有可能证实我在现场得到的印象，即这些壁画，标志着在佛教支持下传入亚洲腹地的希腊古典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时期。

由于在印度没有发现任何与犍陀罗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雕塑在时代和起源上相同的壁画，我们对于这一艺术发展的早期阶段了解非常之少，这就是为什么米兰古寺壁画的特殊重要性，尤其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年代如此接近，但是，想要展示出壁画所提供的包含在中亚佛教绘画中的古希腊罗马和其他西方因素的证据，需要一篇言辞华丽的长篇大论，而不是现在的篇幅所能完成的。因此，在这里我必须提供一些得自古寺壁画的典型标本，并简短地解释一下它们所体现的特别有趣之处。

在色彩板上重现的壁画组合尽管有破损，仍很好地展示了墙上装饰一度环绕小圆堡的上端饰带的原貌。那两块现在组合在壁画墙面中的宽约3.5英尺的绘画灰泥断片是在东北段护壁的脚下发现的，当时它们是断开的。它们在那儿的位置是紧贴墙根，在另两层壁画灰泥之后，可能它们是从紧挨护壁之上的部位落下的。发掘时期所拍的一张照片清楚地显示，外层壁画可能曾是属于墙更高处的又一上端浮雕装饰带。那道宽宽的黑色带穿过了顶部红砖所作的背景，显然是用来分隔两条上端饰带的。只有用巴黎的灰泥做新的底衬，代替着色黏土背面的易碎的泥和稻草，才能使破损严重的底层，浮雕装饰带实现永久保存和黏合。这项精细的工作是在大英博物馆中我在艺术方面的合作者安德鲁斯（F.H. Andrews）先生和我的第二助理德鲁普（J.P. Droop）先生，以精湛的技术极度小心地完成的。他们严格地控制补充原版壁画表面缺失部分或做别的“复原”工作的任何尝试。甚至去掉了原先做底衬的泥，也是为了防止其中所含盐分会在湿度条件下渗到着色表面，因为若不除去，它会从必须用来加固和黏合整体的巴黎灰泥（plaster of Paris）中吸收水分。

这样，安全保存下来的壁画墙面展现出了一个典型的佛教神像图的上部。我们能看到佛祖站在左边，身着深红棕色的长袍，这种颜色在印度传统中自古代就是规定给各个教派的苦行者和神圣的传教士的。根据头顶光环和略有破损的极具特征性的发髻，可以肯定这个法师代表佛陀。但无法确定他是释迦牟尼还是更早期的“得道者”。佛像右手举起作“手印”（Mudra）的姿势，在佛教画像中是“施无畏印”(Abhayana)，即庇护式；左手低垂身前，可能是提着衣袍。佛身后左侧是6个罗汉(Arhat)，或佛教圣徒，站成两排穿着各色光鲜的长袍。前排左端一人手执一柄白扇，很可能代表犁牛尾或是权杖（Chauri)，它是最高统治权的传统象征。富彻先生向我指出，如果那个头上有光环的人物代表释迦牟尼，那么这个形象可能是在这些明显是作为佛陀弟子出现的圣徒们左边，在椭圆形画面的深灰绿色背景上，可以看

见点缀着红色和白色花朵以及罂粟花样的叶子。在深色背景中一定自上伸出的右臂，手中抓着白色花蕾和花朵，显然是在抛掷它们。这一背景和佛陀右手之后对应的绘画精美的花和叶的背景，清楚地表明这一幕和大量关于佛陀生平故事的传说一样，是以花园或树林为背景的。

残余的饰带不足以让我们确定这一部分描绘的是哪一个佛教传奇故事。但不是肖像学意义，而是它在结构、设计和着色方面的艺术处理，赋予这一壁画残片以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其主题绝对是佛教的，但其体现的所有细节都显示它是由古代典范改动而成。佛陀的头部无疑是希腊式的，尽管他的鼻子有些许闪米特（Semitic）特征，而头顶发髻和耳垂很长，穿有耳洞的耳朵又顺应了印度佛教的传统。而法师及其弟子们大大的直视的眼睛，又和至今所知的中亚和远东地区画像中一律拉长和斜视的，特别用来表示美感的神态截然不同。如果我们还有可能怀疑那些有着直率的欧洲神情的大眼睛是艺术家们从何处得来的，则右边低处一排最后一位弟子左手从衣袍内伸出在颈部出现、且手指弯曲的奇特姿势打消了对其出处的任何疑虑。这是一个极其熟悉的左手的位置，因为罗马时期成百尊雕塑的左手都是由外袍露出。

人们久已深知希腊化佛教雕像有着从古典雕像直接借用过来并与其完全对应的姿势和服饰的例子。但却是由这些在塔里木盆地的最远的角落里发掘出的壁画残片来证实了，就绘画来说，在技术方法上对西方艺术的依赖从一开始就是同样紧密并延伸到技艺方法上。对于后一点壁画中只要画肉体的地方都一律采用了“光”和“影”的技法，这是最为有力的证据。古典绘画中所熟知的“明暗对比法”的应用，在以前也从未在印度、中亚或是远东的绘画作品中被发现过。

而米兰壁画也在所有身体裸露部分一律体现了这种技法。在所描述过的浮雕装饰带壁画墙面和天使护壁壁画，通常的方法都是在淡色肌肤之上施以浓淡不同的灰色阴影，用以表示脸周围，眼下及别处的阴影。为了获得“高光”效果，偶尔画者

娴熟地让表现肌肤的浅色彩通过或深红色的唇部或相似部位的轮廓线，从下方的适当部位呈现出来。在别处则聪明地用白色的粗笔表现“高光”效果。一些地方的白色颜料厚得足以获得真正的“高光”效果，这种方法显著地让人联想到适合于蜡画的处理方式，而存留下来的古典蜡画的实例也展示了这一技法。这些技法及其他技术细节明显反映出这些米兰壁画的绘画者们已从他们的西方光师那里继承了成熟的方法，用（因经常要应用所要求的）简练手法来制造一种完整效果。

一些壁画显示了由后古典艺术即希腊艺术发展而成的种种形式是如何被用来展示印度佛教的主题的。其中一幅壁画重现了一个高约3英尺的壁画残片，但已失去了原本的和谐色调。它可能曾属于高处的浮雕装饰带，在被发现时，它是在刚描述到的画报边上碎成几块。我们看到在一个低矮的宝座上坐着法师释迦牟尼的影像。一个深红色下装从臀部垂到脚踝处，一件浅黄色斗篷搭在左肩，上半身的大部分裸露着——这种装束与早期印度经文中对释迦牟尼外貌的传统描述完全一致。在希腊化佛像雕塑中，佛陀传道的类似展现也很常见，同此类雕塑一样，图中垂衣的处理无疑是一种古典方法。

从右边小一些的拜谒人像中，我们能看到同样的衣褶处理。但是，一顶上部饰以红圈，下部有两个半圆形深红色垂边的奇怪的红色尖顶圆帽明显地表明了这个拜谒者的王子身份。这种方式在许多米兰壁画中出现，但在释迦牟尼的佛像雕塑和在突厥斯坦东部的后来的佛教圣地中，我都无法找到其踪迹。它可能是从更西边地区之一，如巴克特里亚（Bactria）或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即粟特。佛教画像中对古典技法的采用正是由此处传到塔里木盆地的）传入的一个特征。左边的另一个膜拜人像只保留了部分膝盖和手臂。光影所描绘的两个水池或可能是两个围着栏杆的平台暗示这幅画表现的是内殿中或王室花园的情景。这很常见，正如佛陀生平故事中的人物常为传道者。

M. Aurel Stein

尽管这些壁画浮雕装饰带的断片以各个不同观点来看是不同的，且具有指导意义，但它们在艺术魅力和绘画意义上却无法与护壁的有翼精美人像相比。从一开始，它们就令我这个考古学家着迷，而且当我能够在安全且不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观察他们时，其魅力仍然不减。就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从护壁中挽救出的所有 7 块壁画墙面，考虑到所经路途和所冒风险，其运送情况相当良好。这样在这里就有可能再现在彩版画上见到的两块壁画墙面到达英国博物馆，且用巴黎灰泥替代脆弱的黏土和稻草底衬之前的确切情形，更换底衬后画表面的裂缝（部分是在墙上时就有的）几乎完全复合了。这两块壁画墙面最初是在院墙的东南段中间部位沿标有 AB 的线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清楚地展示了画师所赋予的这一系列小天使的不同表情。而其外表，如头形、翅膀及简洁而优雅的服饰，明显地显示出其目的是在表现天国博爱的一致效果，尽管面部带有强烈的个性因素。

要想最好的体会达到这一效果的技法，得要细致地考察这块壁画墙面上所见的两块邻近的板块。上端的一块显示出青蓝色的背景，可能意指蓝天，和一个明显正在上升的年轻人像的头部和肩部，那圆润的面部轮廓，大大的圆睁的眼睛，头部3/4的转回，鹰钩鼻子和其他一些特征，在下面的和其他壁画墙面中也都有所体现。然而却一眼就可辨出分隔开弯曲的红色嘴唇的直线所显示出的嘴部的特别的坚定，和头部明显强调的热切的凝视。悬垂在略微加长的右耳前的波浪形的黑色鬈发都构成了面部的丰满感，让它显得更严肃了一些，和轮廓的粗线条描绘及衣垂鲜红色的平易的条纹极其协调。所有这些护壁人像共有的一个奇怪的特征是在剃光的前额上留有一小撮头发，奇妙地做成类似于带有缕状茎的双叶形。这一流行样式的根源仍有待追溯。

在下面的壁画墙面中，人像普通左视的线条被双眼向右的凝视平衡过来，这一巧妙的手法使得人物整体上格外活泼。头部浑圆，像丘比特的头，双颊丰满，却不

是文艺复兴时期婴儿式的肥胖。大大的，圆睁的眼睛透出快乐诚恳的神色，这一生动的效果为虹膜的巧妙绘制烘托出来，栗色的虹膜被画成竖直的椭圆形而不是圆形的，显示向一旁凝视时虹膜缩短。嘴唇丰满含笑，绘成鲜亮的朱红色，体现出粉色的肉体和丰润的亮光。嘴角处细微的地方体现出酒窝。所有器官和轮廓都是在一层淡淡的肉色之上用毛笔随意挥洒而成。脸颊和别处更暖一些的粉色和阴影处处理得很好的灰色使整体效果更为柔和。

除了这些护壁画体现出的色彩和明暗对比法技巧的运用之外，所有人像都体现出一个明确的目的，即总体效果与轮廓均有粗犷之感，完全适合他们所处的弱光环境。尽管有许多都是遥远的西方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的简单再现，但米兰画师们凭借艺术感和艺术技能，设法让自己熟悉的图案适应了特定的建设条件，这一点仍值得关注。我认为其确凿的证据在于护壁中有翼半身像的整个姿势，是根据他们位于狭窄的环形过道墙壁上距地面仅约 3 英尺的位置而巧妙设计的。他们的头，无论向右向左或是正向前方，都刚好上抬到能够仰视通过窣堵波回廊的朝拜者的眼睛。出于同一目的，他们都被画成向他飞来的样子，这体现在双肩的倾斜和两翼向上的优雅的曲线上。长羽毛的尖部分开，明显是在鼓翼而飞。

但这些充满青春的有翼天使的概念最初是如何形成呢？他们又是如何被画在这座佛寺的墙壁上的？这个问题确切地回答要比乍看起来时困难许多。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艺术的总体的古典基础，和有翼人像在希腊式佛教浮雕中偶或出现用以表现某些圣灵，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这些米兰护壁人像最初的祖先应是希腊神话中年轻有翼的爱洛斯（Eros）。但有许多迹象在警示我们，这个发展脉络在中期阶段可能更多地受到东方理念的影响。简单说来，我们面前的这些人像，他们年轻并非幼稚的面容，他们开口很低的服饰和类似性别之分的特征，都更接近于一些早期基督教教堂的安琪儿，而非最初作为他们的原型的爱神（love-gods）。

如果早期基督教画像可能施有影响这一点听来太过惊人，那么应该记住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很久，天使是天国有翼使者这一概念就为不止一个西亚宗教体系所熟悉，尤其在古伊朗境内牢固确立了这一观念，而此地是古典艺术文化的一切要素传入中亚的必经之途。在希腊化的东方，甚至是埃及，都没有地方留下了够早的天使图像，可以解释古典神话中的丘比特于何时何地摇身一变，成了米兰护壁壁画的画师们用作佛教圣地装饰物的那种有翼人像。在这些人像中，大部分的面部具有明显的闪米特人特征，让人本能地想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伊朗，把那里看作是有可能产生最初的改变的地方。

目前深入思考这一问题颇具诱惑，但对批评家来说却是无用的。幸运的是对于那些天使们如何成为了中国境内佛教圣地的护壁装饰这一问题，我们能更有把握。犍陀罗的希腊化佛教雕塑确凿地证实了源自有翼爱洛斯（爱神）的人像实际在印度用以代表佛教神话中所知的，借自更早的印度教传奇中的名为乾达婆（Gandhavas）的一群天国使徒。

因此如果有一位中亚希罗多德（Herodotus，希腊历史学家）曾经参观过这座米兰佛寺，并向住持询问这些奇怪的有翼人像的意义所在，本地的守护人就会丝毫不觉得尴尬地把他们说成是犍陀罗。尽管这种解释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说是可行的，我仍怀疑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因为在发掘下一章将描述到的一个邻近的土墩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相同的佛教圣地，在上端浮雕装饰带之下，绘有虔诚的著名的佛教传统的场面，护壁上则是世俗的，显然是西方人特征的人物。

M. Aurel Stein

第四十三章

一组喜庆人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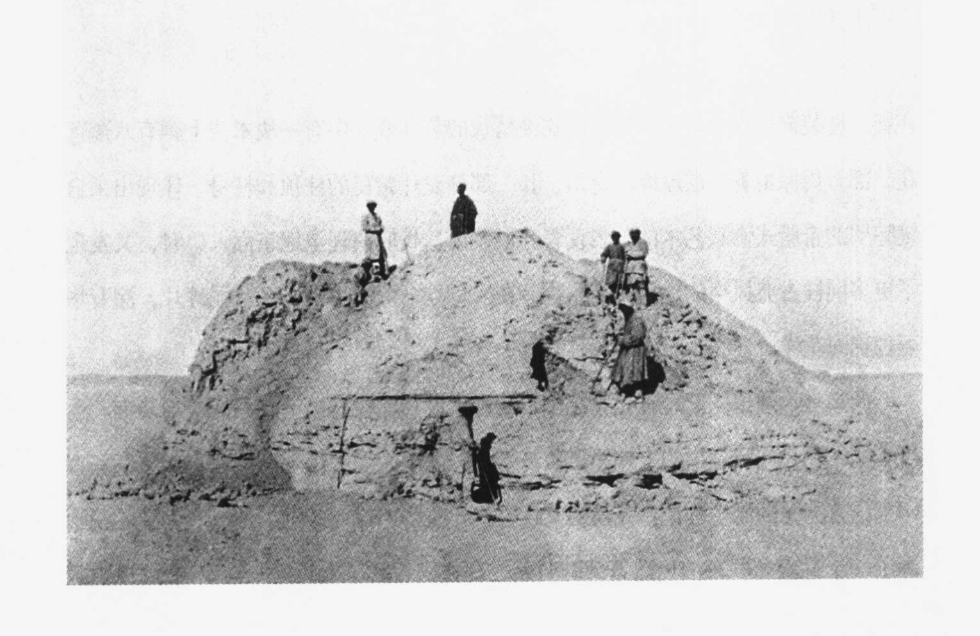
为之操心不已的壁画打包工作远未完工之时，对邻近遗址的进一步考察又有了令我惊喜的发现：在位于西北方向60码处的一方形遗址中发现了一块着色灰泥。那是一堆严重毁坏的土坯建筑物，约15英尺高，它的形状和平坦的顶部显示它像其他几个邻近的土堆那样，不可能是坚实的佛塔的遗迹。由于极为靠近，所以可以在壁画打包工作仍在进行时就开始发掘它。很快我就确定这一遗址原先是个寺院，构造上与刚刚清理过的那个极其类似，中心是建在环形内殿中的佛塔。外围通道仅保留了南面一小段，此处墙壁上存留的壁画很快被清除出来，墙壁下部的护壁上有画得极为醒目的天使半身像。上端在狭窄的浮雕装饰带上有一名形似古罗马格斗士的人以一根棍棒护身，与一狮身鸟头鸟翼极像古典的半狮半鹰怪兽的怪物格斗。尽管绘画手法粗糙一些，但其风格样式都极为近似于我们先前抢救下来的壁画，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认定第二座寺院与已经考察发掘过的佛寺始于同一时期这一事实。

环绕佛塔的环形通道被大量杂物垃圾堵塞，它们是坍塌的拱顶上的大块土坯。尽管我用所有人手发掘，并让穆拉赫去阿不旦带来所有可用人手清理它们，仍然花

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辛苦工作。但在天黑前已有足够进展显示出内部的尺寸，并证实环形内殿的墙上曾装饰画有壁画的浮雕装饰带和护壁。佛塔尽管顶部严重破损，残高仍有 11 英尺高，直径 12.5英尺，有一系列明显突出的土堆，原是用作环形基石。和那个小小的“天使之寺”的废塔一样，它曾在早期被人由底部挖入，无疑是为寻“宝”。环形通道宽 7 英尺，由此推断曾覆盖在佛塔之上的穹庐顶总长应有 26.5英尺。

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作为依据用以估计圆顶的高度，但在土坯垃圾中发现的精美木雕残片显示拱顶曾有足够的高度，覆盖的不仅仅是佛塔本身，还有一个木制的华美“T”形顶饰构成上部构造，支撑着连续的恰特拉（Chattras），即伞状顶饰，实际上这是犍陀罗雕塑的微型佛塔复制品和缅甸及其他佛教地区宝塔一律都有的现象。

⑭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所在的土墩（发掘前）





⑭⑤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和佛塔的内部（发掘后）

在曾一度装饰过这个“T”型顶的雕刻精致的装饰残片中有一块木头上刻有八瓣莲花，部分仍保留着一层厚厚的金箔，和一部分设计精良的柱顶和柱身，体现出来自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的著名莨菪叶形装饰。我们清理圣地东面入口时，又发现了更多同样古典风格的建筑木雕遗物。在入口处一侧的平台还有灰泥碎片，涂有华丽的锦缎花样。

两边环形通道的清理首先发掘出了我预先设想能在城墙上找到的壁画装饰。运气不错，在最先清理出的上端浮雕装饰带中的两个人像旁出现一些佉卢文文字和古印度语言涂写的简短题记。先前的发现已引导我得出这一结论，即这些寺院的壁画源于一个尼雅和罗布泊仍然繁荣的时期。现在则得到了支持这一结论的最好证据。

但即使是这样，当在冰冷的狂风和炫目的尘云中发掘了两天，我终于得以清理和更亲近地观察那些壁画时，我仍对残墙上的壁画所展示的景观感到惊叹。

在西边的一段环墙可能曾有过另一个入口，但已被早期的寻宝人夷为平地。由于这种破坏，现在发现的壁画被分成两个分开的半圆形，两端均破损，北面墙上的装饰由于某种原因遭受了严重破坏，以至上端浮雕装饰带中除几个模糊的成组小人像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但在至距地面约3英尺的下端护壁中，尽管色彩已经变淡，灰泥出现大量裂缝，仍很容易辨认出非常优雅的构图，构图的设计和细节都与希腊、罗马古典艺术风格相近。二者之间有关联的特征是装饰带正中的男孩小天使裸像（Putti），以及表情轻快的年轻人肩上扛着的一条宽宽的花环和用鲜花组成的花饰。他们之中无翼厄洛特（Erotes）和戴着弗里吉亚帽的年轻人交替出现，后者尽管有一张女孩式的脸，却确凿无疑地令人联想起罗马帝国崇拜的太阳神（Mithras）。

更为显著的是填补波浪式鲜花彩饰空处的绘图。每一处都有一个男子或一女孩的头和上半身，完全是古希腊、罗马古典风格的轮廓，尤其是绘画丰富的个体表情造成了震撼人心的效果。男子头像的类型各不相同，一些神色颇像罗马人；另一些人却是柯特人的发型和胡须，暗示他们属野蛮人群。但一眼看去即可搞清楚，他们和穿插在他们之间的几个漂亮女孩的画像都与佛教崇拜或神话没有关联。在可辨认的地方，人物手的姿势更证实了这一根据画像面部显然的快乐表情和圆睁的亮泽的眼睛所得出的结论。一个装饰华丽的女孩将手放在一个三弦乐器的颈上，而在近旁另一鲜花彩饰的半圆空间，有一个快乐的年轻人，服饰和五官都让人想起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他右手举起，几个手指伸出，其余弯曲，像是在参加古代的猜拳游戏（Mora）。

一等到我能近距离地观察南面墙壁上半圆形空间内的绘图，对这一护壁纯粹世俗本质的一切疑惑均消释了。此处墙壁现存部分仍有9~10英尺高，东南部壁画的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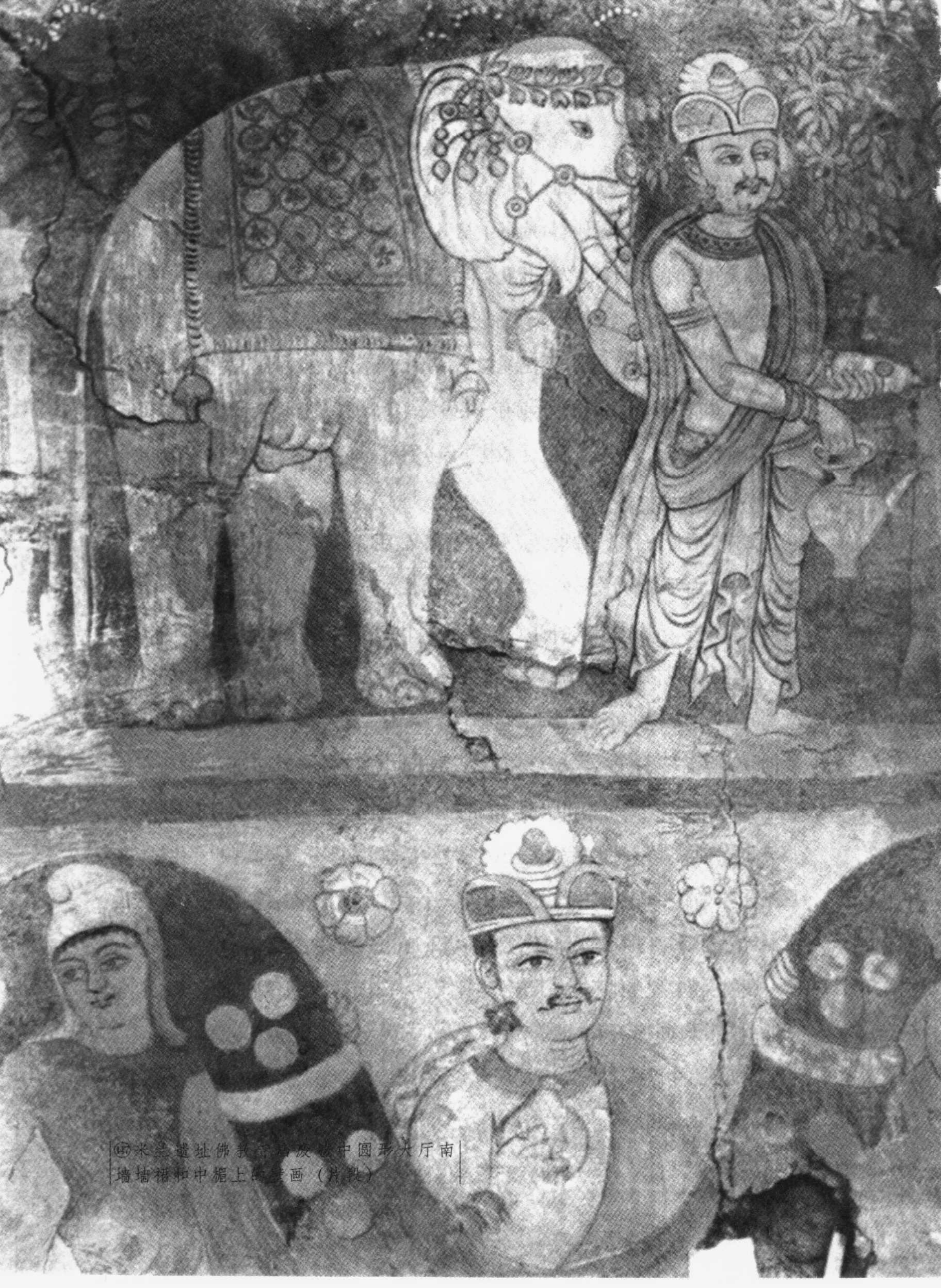


(146)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东南墙墙裙和中楣上的壁画（片段）

泥表面保存的要更好些，紧靠东面入口的半圆绘画空间内是一朵大的八瓣红花，其标志鲜明的植物种类特征明确表明它是一朵莲花。下一个向上的波浪形鲜花彩饰搭在一个绘制精美的无翼爱神（amorino）肩上，他的前额上有我们在邻近寺院中天使身上已见到过的奇特叶状鬈发。鲜花彩饰的下一个空处，是一位优雅的女孩在弹四弦曼德琳。她端庄地向下看着，黑亮的头发用一根红丝带在颈后扎成一束，头上缀着一个花环，一条由红色珠子和悬垂的珠宝组成的链子绕在额前；每只耳朵上都坠着一朵红花或是个花状饰物，耳前有一绺鬈发；丰满性感的双唇与这位成熟美人的华丽装饰极为协调，搭在她肩上且盖住了部分石板色背心的朱红色外衣更增加了艳丽色泽的效果。

紧挨其后是一个戴着弗里吉亚头饰披着绿衣手持鲜花彩饰的人像。在她的另一边，是一个面朝着那个女孩的长胡须男性半身像，五官和服饰都十分引人注目。浓密的卷曲头发、胡髭和长长的胡须立刻就把这个头像和在这个护壁别处见到的与希腊、罗马古典风格极为近似的男性头像面庞区分开来。但他的眼神，窄窄的额头、宽宽的嘴唇都奇特地暗示他是那种晚期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中高卢人或西徐亚人一类的北部野蛮人。右手拿着一个透明材料制作的，显然是玻璃高脚酒杯举到唇边。淡蓝色的外衣前横披一条围巾，乳白底色上是显眼的红色与黑色的错综图饰。面部、姿势和服饰的一切特征似乎都传达出对现世生活的坦然享受，这似乎也往往都是新疆维吾尔人的一个显著性格特征。画师把一个紫色的葡萄放在右侧鲜花彩饰构成的绘画空间内头戴弗里吉亚头饰的人像手中岂不是很适合的联想吗？

我的目光停留在他旁边一个男性半身像上，一眼看去就应该是印度王子。那是个脸刮得很干净的年轻人，只留有一点卷曲的胡髭，类型和衣着都与第一座寺院的基座附近残片中以拜佛神态出现的人物完全一致。五官和迷梦一般的眼睛都传达出确凿的印度的柔和神情。头饰极具特色，一顶圆锥形的帽子，像印度西北边界人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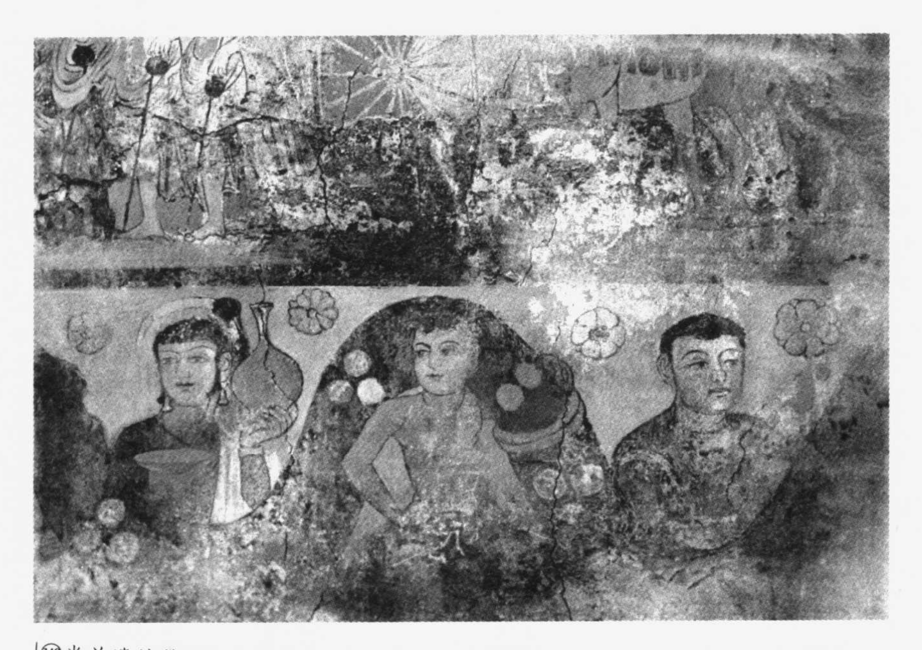
(147)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南墙墙裙和中楣上的壁画（片段）

着的尖顶“库拉”（kola）；两片红线条的帽垂在前额向上翻起，缠着一条白色的轻薄头巾（Puggree）。轻薄头巾的末端在脑后结成某种头巾，正像在许多悉达多（Siddhartha）王子和别的皇族人物的犍陀罗雕像中所见的那样。耳部一个大的饰物，脖子上绕着宽的珠宝带，右腕两条重重的臂镯，似乎都象征着印度上等男子常有的对珠宝的天然喜好，就如犍陀罗浮雕大量展示的那样。一件宽大的淡绿色外衣搭在左肩上，胸部其他地方赤裸着。右手似是举着一个水果，外形像是一个石榴。

下一对半身像的显著西方外形让我的联想远离了印度。在一个无翼小爱神旁边首先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画像。左肩上负着一个细颈的透明罐子，右手托着一个帕特拉，即碗或钵，姿势优雅。她娇美面庞的希腊特征，似乎奇怪地与其他类似黎凡特（Levatine）或索卡西亚式（Circassian）的美丽混合。黑亮的头发上戴着白色镶有红边的头巾，右边系了一个大的黑色结，好像是近东或伊朗式的。耳前垂下长长的鬈发，前额垂下一些头发，饰有3条珊瑚珠的链带，耳朵上戴着优雅的粉色垂悬重饰物。一件有红棕色袖子的紧身背心罩住了胸部和肩部，头饰上挂着一个细致的淡绿色面纱。

在这个孤寂的遗址中，这些壁画显得何等的美丽和优雅啊！但也很奇怪的是与这个美丽的画像相对的一边是一个明显的罗马式男子头像。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头像，窄长的前额，方下巴，结实的脸庞刮得很干净，满头剪的极短的黑发。服装是一件深色外衣，右肩上搭着一条浅绿色的披风，画面褪色得很厉害。但我仍能辨认出举在胸前的右手，其中特别之处是第二和第五个手指伸出、中间两个手指弯曲的手势显示他是在玩“猜拳游戏”。

这幅画之后的壁画表面破损得太严重，显不出任何头像或是帕特拉（碗或钵）的轮廓，即使在墙的护壁高度也是一无所有，但就在西段墙壁的缺口开始处，保留下来一个拿着花环的女孩头像，在白色弗里吉亚帽子之下，她的脸庞十分美丽。右



⑭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中圆形大厅南墙墙裙的壁画（片段）和中楣较低部分壁画（片段）

手修长的手指握住一只帕特酒杯（Patter）举到胸前。这个侥幸存留下来的娇美头像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生命的完美化身，好像从手指到整幅构图都有了生命。

在这个古老的朝拜场所遗址中，画师们的艺术成果留存了下来。但他们又怎么会料想到从他们欢快的手中绘制出来的这些种种体现生活乐趣的作品，在被埋葬了许多个世纪之后又得以重见天日之时，会由于四周的一片沉寂和荒凉而产生更具震撼力的效果呢？这些绘画反映出的温暖而欢欣的生活与光秃秃的碎石达什特（Dasht）形成了难以言喻的奇特对比。我也不由得想起同这些幸福享乐的场面相比，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经历的生活又是多么不同。长久以来这些荒凉遗址除了显示出它曾经是已经消逝的遥远过去历史的痕迹和目前生活在这里的那些可怜人的栖身之

所，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能看到这些图画，就不仅仅是考古学上的享受了，我把它当作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表明有这么一个能找到美景和享乐的地方，它未被冰冷的寒风和沙漠工作的顾虑和不适所打扰。当我一次一次地仔细观察着这些在概念和手法上都属西方文化的迷人护壁人像时，它们和我之间的间隔似乎缩短了。

有了以上这些感受，这样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常常认为自己是置身在西徐亚(Syria，即叙利亚——译者）或是罗马帝国的东方省市的一些别墅遗址之中，而不是在中国境内的佛教圣地，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沙漠里的严冬气候却让我时时意识到我们的真实处境。寒风几乎是不停地吹，不时强劲得成了真正的狂风，在这遗址的墙内就像在罗布泊（Lop-nor）雅丹一样刺骨。厚重的尘土也让拍摄工作有两天无法进行。幸运的是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进行细致的研究，还能写下大量的笔记，尽管手指已冻得麻木，吸水笔里的墨水也冻住了。

M. Aurel Stein

第四十四章

佛传壁画

这一组宣扬感观享乐和充满青春活力的人物壁画似乎是这个佛寺护壁的一个奇怪装饰，它和佛陀传道正统之间的对比所体现的问题，让我怀着更大的兴趣去看其他残存的壁画装饰。北面半圆墙壁受到不小的损坏，上端浮雕装饰带只能够看到相互分离的一组组人物，大多都被破坏了，尽管他们本身颇有意思，但对整个组合和主题却无提示。但在东南面紧挨护壁之上的浮雕装饰带有 18 英尺多长的一段完好无损，而其上的图画是我在发掘过程中所见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

在一块约 3 英尺宽的真正庞贝（Pompeian）红，上下都由对称的黑色、石板绿色和奶油色的一系列窄色带标示出的浮雕装饰带上行进着一个列队，第一眼看上去极像罗马的凯旋仪式。我由左端看起，经过接近东面入口的一块部分破损的浮雕装饰带，看到一个王子模样的人骑着马出了宫殿大门。墙的木制框架和门上的雕饰都极华丽。骑马人头顶的门楣上写着一行佉卢文文字。骑马人的服饰很像护壁中“印度王子”的服装，一件深红色的斗篷搭过左肩，垂至腰下，身体下部盖着一件像是印度人腰布（Dhoti）的绿衣服。一件华丽的珠宝臂镯和一条宽的红色颈链显示出骑马人的高贵身份，他的马画得相当好，为白色，马勒和马笼头都饰以红穗。一条由

3根细绳或带子组成的宽带横过马的胸部且固定在马鞍上，带上固定着显眼的圆形和方形牌饰。整个都像是罗马帝国晚期雕塑中的马具。

在骑马者前面是一辆由4匹白马拉着的两轮马车，戴着刚描述过的那种马具。这一队快跑的动作表现得很轻松，好像是临摹了一个熟悉的样本。两轮马车的车身前部为紫色、顶部有一条有着精致的装饰线条的黄带，可能代表金子。其上是一美丽女子的头和肩部，她显然在用右手引着缰绳。黑色的发缕垂在颈下，两耳有两绺鬈发。脸具有“天堂女神”（Houri）特征，显示伊朗在某些晚期古典模型上的影响。她的衣服是一件淡紫色的紧身上衣，前面开襟，由两条珠链横过胸前穿接在一起，一件暗绿色的披肩披在左肩，显出很重的褶皱。这个美丽的驾车人之后有两个孩子，画得不太好，但由前额上的特别的双叶状鬈发可看出是男孩。

马车前是一棵深绿色画成锥体的树，点缀着黄花，和在寺院M.III中的壁画上的完全一样再往前是一头行进中的装饰华丽的白象，画得极其逼真，大概是整个浮雕装饰带中画得最像的图像了。象的眼神和表情都被熟练地捕捉到了。前额和象鼻上的华丽装饰包括叶冠、饰带，凸起装饰物和环饰，在此不能一一描述了。我也不能详细描述鞍布和披在它身上的地毯似的覆盖物上，设有着清晰的菱形花纹的图案，色彩绚丽。在右后腿上有一则小而工整的两行佉卢文题记，下面我将仔细介绍。

白象由一人牵引着，他的服装极具特色，和护壁中的完全一样，颈、耳、手臂和手腕上戴着大量珠宝，由此判断，显然画的是一位印度王子。他左手牵着象鼻，右手提一形状奇特的水壶。底座很细，直鼻，近似北印度的人所知的一种名为“恒河海”（Gangasagar）的在传统中用来祭祀时的水的器具。向前往这一队列走去的是4个衣着朴素的人，由他们浓密的头发和胡须及手拿的长棒判断，很容易看出他们是典型的印度苦行者的形象。这群人最左边是个白胡子老头，头扎简单的白色薄头巾（Puggree），第二和第四个是中年人，第三个是没胡子的年轻人。他们的衣服

只是颜色不同一件腰布式的衣服围在腰间和腿上，左肩上披着黄色斗篷，胸部赤裸。他们身后左右画着两棵有枝有叶的开满花的树，手法随意，似是写生之作。这之后的墙面就被严重损坏或是完全缺失了。但还可辨认另一辆两轮马车的部分，显然是由一名男性驾驶。

在这迷人的浮雕装饰带之上，热闹的队列背景奇特，用的是近似庞贝 (Pompei) 红的颜色，其意义何在呢？当时，我所能确信的是这一场面显然是取自某个神圣的佛教传说。但我对佛教圣徒传说所知甚少，无法认出它来，即使所需参考书目随我所用，不过找不出时间来做系统的研究。尽管当时我对阐释这一浮雕装饰带感到困惑，但有件事情却更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对以上浮雕装饰带组合与护壁中人物的艺术处理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无疑存在却又难以名状。后者几乎所有一切总构想，从容的设计，光和影的着色技巧，及人像处理的自由大胆，都强烈显示其画师主要是复制这一种艺术中那些已发展成熟的造型，不过看得出来的是他对这种造型的精神实质和方法都已足够熟悉，因而让每一幅图都具有个性，看着他在护壁上所画的作品，我无须问自己这些壁画墙面和装饰性图形代表什么。弥漫其间的美好生活和喜悦足以让西方人心领神会。

护壁中绘画内容则不相同，然而绘画技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点，因而证实在此作画的是同一个人。尽管许多特征，如帏帐和双轮战车，明显借自古典艺术，却给我一种印象，即画师所模仿的范本已然超越了远比其僵硬的显然是印度传统的母本。许多的问题尚未澄清，现在匆忙下结论可能过早了。但我认为有可能是这样，无论这个画师他最初来自何方，为这个神圣主题所限制，不得不严谨地采用希腊化佛教艺术几个世纪以前就已为这一特定佛传故事所采用的传统表现方式。在护壁上装饰性的和好像是世俗人物的身上，他却得以自由地、更直接地表现与他同时期西方艺术的影响，简言之，浮雕装饰带中的绘画内容体现了印度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特点，

护壁则反映了通过波斯传入的源自罗马的同时期艺术形式。

浮雕装饰带的主题之谜最终得以解决，是在1901年夏天，我将它交给我的朋友印度佛教图像学的权威，也是我最好心的合作人——福彻教授（A. Foucher）。他根据我提供的照片和描述，很快就认出这个场面是选自须大拿（Vessantara）王传，出自成百个本生故事（Jatakas）或说佛陀早期本生故事中的这个故事在巴利语文本中也有详细的记载，讲的是佛祖早期化身为须大拿太子，因为乐善好施，送了一头有降雨之能的神奇白象给婆罗门（Brahmans），从而在他父亲的王国中背负恶名。他和家人因此被逐入森林，他和妻子曼坻（Maddi）及两个孩子乘两轮马车离开皇城了，施舍了许多贵重物品。当他后来遇上婆罗门乞讨人时，物品已分发完毕，他又逐一舍弃了马、马车和剩余的所有个人财物。最后他在隐居处又依据神的意愿将妻子和孩子作为虔诚的礼品献出。神在试探了他无尽的仁慈心之后，将妻儿归还与他，最后以世俗的幸福生活结局。

一旦故事被确定下来，就很容易辨认出王子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乘着四匹信德（Sindh）马拉的华丽马车”离开皇宫，正如本生故事所描述。浮雕装饰带中在森林背景下前来见他们的4个托钵僧无疑代表他在故事中施与了马匹的4个婆罗门人。但由于一种在佛传图画中极为常见的（包括中世纪圣徒画在内）年代错误，本生故事中最突出的事件，即王子赠送神奇白象被放在了场景中间，尽管故事的发生先于他离开皇室和之后被放逐森林的所有事件。

同时，在次要主体上也显示了与上述故事吻合方面，如象头和象身上华丽的珠宝装饰和同样重要的王子右手提水壶将水倒出的细节，这出故事清楚地表现了一个印度式的布施象征。后来的一些事件一定曾画在北壁半环画框上端的浮雕装饰带上，根据福彻先生的启示性确认，我们认出了甚至是在损坏严重的浮雕装饰带最底部的一些有特征的图像，如曼坻在丛林中遇见的野兽。

整个壁画的意义一旦明白了，我更为急切地想搞清楚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保存良好的浮雕装饰带部分的佉卢文题记的确切含义。我仔细临摹下它们，并根据现场能够认出的几个词推测他们的语言是在尼雅、安迪尔和罗布泊文书中使用的同一种印度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我也注意到有关在大象右大腿上用黑墨书写题记的这一奇特事实。它由3个略微弯曲的短行组成，尽管只有1/3英尺高，在大象皮肤的白色底色上格外易于辨认。

如果这些文字是用来记录绘画场景或人物的名单，这个题记则显得太长，书写也不像宫门上另外一处题记那么优雅简洁。另一方面，它看来也不像是某个过往游客的涂画，尤其是其位置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综合上述各种细微的理由，我曾一度构想这则小题记可能包含关于画师本人的一些写在显眼地方的简短记录。

令我惊奇的是，这一猜想在3年后我都几乎忘却时，却奇怪地得到证实。那是在这一题字的照片和摹本被著名的巴黎文献学家及我在文字学方面最得力的合作者——阿贝·博耶研究之后。根据他的反复研读，文本应解释为：“这一壁画是接受了3000巴玛卡（Bhammaka）的提塔（Tita）所作。”这样解释的唯一疑虑在于灰泥上在“Bhammaka”一词前两个音节之间有一道裂痕，并且对印度词典编辑者记录的“钱币”作为梵文“bharma”的意思并无原文可供确认，尽管语音上听来像其衍生词。

这里先把可能提到画师的问题搁置一边，我仍有足够理由在此提及这一则奇特的题记和阿贝·博耶的译文，因为如果我们接受译文是正确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画师的名字“Tita”认作熟悉的西方名字“Titus”（泰特斯)。无论从词源学或从语音学，我们都无法将“Tita”解释为印度和伊朗语言中原有的名词形式。另一方面，古印度由西方引入的众多希腊和别国名字的类比，都证实Tita正是泰特斯（“Titus”）在梵文或帕拉克里语中会采用的形式。

M. Aurel Stein

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 Titus 是一个人名，在本纪元的最初几百年，在整个东罗马帝国（Roman Orient?）包括叙利亚和其他邻近波斯的周边省市都很常用。近期印度考古学的新发现也让我们知道一些希腊、罗马古典名字，如叫 Agesilaos 和 Heliodorus 的人，多为艺术家或侍奉皇室的人，不仅在印度（Indus）大陆，即便远在印度岛，直到公元 1~3 世纪的印度斯基泰（Indo-Scythian）统治期都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米兰佛教寺院的时代不会距这一时期太远。寺院墙上的壁画则雄辩地证实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对这一遥远的中亚角落有着直接而有力的影响。

那么，受雇在这里绘制壁画的艺术家之中，有一个从地中海岸到底格里斯（Tigris）的东罗马都很常用的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设想在那个时代被带到中国境内的有这样一个名字的绘画、装饰艺术家应是欧亚罗马人（Roman Eurasian），拥有一半东方血脉，却在希腊传统中长大成人。在他之前，还有来自同一地方的人旅行到“塞里斯国”（Seres），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托勒密《地理志》中的一段经典篇章中得知。书中他讲述与连接着叙利亚和塞里斯首都的大贸易路线有关的消息。消息是地理学者马里纽斯（Marinus）通过“一个叫马埃斯（Maes），也叫提提亚纽斯（Titianus）的马其顿商人”那里得到的。这个马其顿人的家族世代经商，为了做生意他派自己的代理人前往遥远的塞里斯国。

在这里我不能进一步探讨这个小题记所包含的亚洲内陆艺术史，也不能详细叙说写在门楣上的看来更为简洁优雅的另一个短题记。它也是以帕拉克里语（Prakrit）形式书写的，经过博耶先生的解读，认为题记的位置本身就暗示它是指其下壁画中骑马的王子魏珊达剌（Vessantara），尽管很奇怪他在这里被叫做伊斯达它（Is idata，梵文为 Rs idatta），不过也很正常，因为这仅只是各种各样的名字，只是在我们熟悉的诸如“苏达拏”（Su-ta-na，梵文为 Sudana）、“须达拏”（Hsu-ta-na）等称呼中又增加了一个。

通过反复摹写，可以很容易得到这些题记确切、永久的副本，但对壁画却不可能做出与其艺术和考古学价值等同的记录，甚至一个在有特别的感光板及相关设备的摄影室里工作的职业摄影师，也会发现他即便用尽各种技术也难以用照相机保留下这些和谐，但正在褪色的壁画色彩。对我这样一个业余爱好者，在现有的工作条件下那就更不可能了。其实，我穿一身笨重的皮大衣，蹲在地上够低够远的位置拍摄在只有 7 英尺宽的过道内仅仅高于地面的环形壁和护壁的壁画就已够难的。许多天来狂风吹起的尘雾使天空昏暗的不得不延长曝光时间，而相机又在风中摇晃，破坏了照片的效果。为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拍摄的底片的准确性，需要当场冲洗每一个底版。但在夜间极度寒冷之中，底版在帐篷中晾干时又有被冻结的危险。为减少完全失败的风险，我不辞辛苦地用不同光圈和曝光速度将壁画拍几个来回，最后却在 4 个月后有了冲洗底片的条件时发现我的努力仍未能得到足够的记录。

即使拍摄能更为成功，我仍会感到十分遗憾无法重现这些优美壁画的色彩，另一个，也是唯一的选择是将壁画从墙上取下。尽管我不愿将这些精美的壁画切割成可以搬运的板块，但还是进行了尝试，一个精心实施的实验证实在我现有的手段和时间之内，进行这样一项计划，几乎肯定会导致完全的破坏，最终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切割壁画。

墙上的灰泥和其他寺院中的材料有所不同。它有两层，外层明显，处置得很好，且很光滑，但仅 1/4 英寸厚而且非常脆弱，内层厚约 3/4 英寸，更柔软，仅混合了一点麦草，因此远比其他寺院的墙面更易破损，别处墙上的灰泥采用统一材料，混合有大量碎麦草，更具黏合力。当我小心翼翼地移走护壁上分离的帕提（丘比特式的儿童图像）头像和一个已经破损的男性半身像，我发现要阻止单薄的外层部分地破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后的灰泥已经松动了。我这才勉强意识到除非将表层墙皮后面的土坯墙完全挖掉，并有特殊的仪器取下和加固弯曲的灰泥墙面壁画，否则是

不可能安全地分离下任何一块较大壁画墙面的。

意大利的壁画剥取者凭着几代人积累下的经验和各种技术设备，也许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甚至他们也不得不冒破坏文物的风险解决分解这个拥挤的壁画浮雕装饰带的问题，这之后，也不可能保证安全运送这么远的距离。但我在沙漠里又如何能获得需要的技术和设备，甚至是保证完成这一工作所需的时间呢？我在当地所获得的一切有关穿过沙漠去敦煌的路线的信息，都告诉我有这么多人马车队的动身时间，如果延长到2月底之后是不安全的，因为许多路段上都依赖冰水，咸水内的盐分太多只有在结冰以后才可以用。即使行进迅速，沙漠之旅估计也要持续至少3周。

因为不可能有多余的骆驼给人畜带足给养，供应和运输上的困难阻止了任何想要推迟一个季节行进随后考察的想法，那样需要更多畜力运输冰或水。从这里及早东进的想法也是我的意愿，希望古沙漠之行沿途有值得发掘的遗迹。这种希望虽然渺茫，却十分强烈，这样我不得不考虑在盛夏酷暑到来之前为发掘可能发现的遗址留出足够的时间。

离开这些提供了如此丰厚的古代艺术品的寺院，我的心情并不愉快，在继续给可能取下的壁画打包和考察分散在周围的早期居留地遗址时，我尽可能久地让古佛寺内部照射到几个世纪以来都未见过的阳光。它们中多数都是通常类型的破败的佛塔土堆，没有了外围的环形围墙，但在很久以前都曾被寻宝人挖过，其余几个可能是真正的居住遗址，部分用土坯建成，但被侵蚀得更为严重。

这些地方也有有趣的发现，但我不能在此细说。我的总体印象是这些更为古老的遗址所在地尽管有吐蕃戍堡，但在后者驻扎卫戍部队时，一定就已被彻底废弃了，实际上也就是寸草不生了。因为只有这样才似乎能够解释风蚀效果的显著不同。在这些更久远的建筑附近，一些地方风蚀作用侵空了低于最初地面深达17英尺的土

壤，而在戍堡城墙周围最严重的地方也不超过6英尺。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周暴露在严寒和不断的狂风之中，当米兰遗址的实际工作终告结束时实在是一种解脱。但下达命令开始最后一项工作，即重新回填寺院内部以保障对壁画的重新保护却让我感到难过。这项繁重的工程在来自阿不旦的援工的帮助下于2月11日完成。看着那些曾令我在冬季的沙漠中如此赏心悦目过的精美壁画，再次逐渐消失在灰尘和土堆之中，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就像是正在埋葬尚有生息的真人。唯一能减轻一点沉重心情的只是对它们最终复出的渺茫希望，和想到他们若是看一眼四周的荒凉，可能会更愿意在黑暗中安息。我无法预见命运的安排，15个月后，它们会再次从保护层下重见天日，却目睹了一幕人世的悲剧：我的勇敢的奈克·拉姆·辛格永远地葬身于黑暗之中了。

但在当时，我却感觉它像一件困难却回报丰厚的工作。当天我由诚实的托合提阿訇引路骑马离去时，天色已晚，我的心在黑暗中飘浮，希望在东方将能够见到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十五章

启程去敦煌

米兰的发掘完成了我在罗布泊（Lop-nor）地区的考古任务。但在动身前往敦煌和中国西部腹地之前，在阿不旦还得完成大量旅途打点和准备的繁重工作。不过在经历了米兰所有的苦难之后，这段停留还是让人感到愉快的，尽管阿不旦提供的芦草屋实际上简陋不堪。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仓库在提拉（Tila）的照看下十分安全，马匹也休养得很好。在温暖的栖身之处经过休息后，测量员重新又站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风湿病带来的疼痛和沮丧。而我自己要不是一直忙于各种实际工作，我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就忍受得了这种拥挤的住所和渔民冬季住所周围地带极为肮脏的环境，以及这个地方单调无味的景色。在干涸的塔里木南面暗淡的沼泽地带，盐碱地和冰面混合成一种无尽的平淡。

在这里我每天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在户外散步，这样的环境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对过去4个月的所有考古发现进行分类和打包，其中大部分我决定送回喀什噶尔让马继业先生安全收管。除了我准备自己保存的文书装了4箱，所有其余的古物，包括罗布泊遗址的笨重且脆弱的木雕，都需要进行特别的再包装以承受长途旅行，而且在旅途中，我不能在场保护它们不被粗心地对待。鉴于我们所面临的长途跋涉，

尽可能减少行李也是很重要的。借此机会我也将两个可通电的铁水箱，和多余的架子及不再需要的书籍和所有纸张一齐送回和田，等待我来年归去。

沉重的古物货品需要规模可观的骆驼及马匹的运送队。我将它委托给两位资深的维吾尔仆人照看：喀斯木阿訇（测量员的马夫）和穆罕默德·朱（我自己的仆人），上文曾提到过我曾不得不把由于沙漠的艰辛而生病的他留在若羌。不论如何，他们俩都不再适合随我前行了。我明确告诉他俩将在喀什噶尔支付应该给他们的欠款和报酬，这一明智决定使我的物品有希望被安全运送。尽管我在不断地催促，直到我到阿不旦的第七天，才看见包括勇敢的维吾尔邮差在内的车队动身前往喀什噶尔，开始他们为期 2 个月的旅程。

同时，我也在同样努力地为我自己的车队开始长途沙漠之旅做准备。确实在经历了去年 11 月的历险，又听说前面路上大部分地区都有水和牧草，我的随行队员们对在前面的戈壁荒漠中将要度过的数周生活都不怎么担忧。但是为人畜准备 1 个月的供给仍是件繁重的工作，而排它们的运送就更是如此。我的团结的队伍共有 13 人，11 匹马可骑，还有 8 头骆驼。这些骆驼经历了罗布泊沙漠的艰辛之后仍然状态良好，并一如既往地是我的旅队的主要依靠，它们正够驮我们的行李和部分食物储备。它们勇敢又好养活，只要几皮囊菜籽油偶尔给它们作“茶”饮，像哈桑阿訇过去常说的，以让它们保持精力。而马匹没有料草就不行，关键是如何驮运够 1 个月的料草和我们的食物。多弄到几头骆驼做此用途是不可能的。我们穿过罗布泊沙漠所用的几头骆驼仍因劳累太过虚弱，若被带上一定会很快被累垮。而一旦我们开始了长途的沙漠之旅，就一定会严重拖延我们的进程。

因此，我就想到那些有耐力的毛驴，它们在去年 11 月曾是运冰队伍中极为有用的补充力量。在若羌有许多驴，通过极好的廖大老爷为我施加他长官的威力，毫不费力就弄到 20 余头所需的毛驴。但是这些强壮的小动物无论所需食料多么少，也



⑭洛瓦寨泉和古代湖床岸边的冰面，以及盐碱覆盖的罗布泊湖床

都需要喂养，同样也要人照看。它们一个月总共所需的食物差不多又需要同样数目的驴来驮运。这样当我仍在米兰并开始计算我的运输需求时，对这些驴的考虑就令人担忧了。

我很自然地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在它们的草料耗尽时，让部分毛驴轮流回到阿不旦。但就算如此，正确地计算这一计划及其食料供应的种种数字仍然是一道麻烦的数学工程。最糟的是，我担心若羌精明的主户们会让我尽可能多地雇不健康的家畜，希望它们在途中累垮，要么被立即送回，要么死在途中，为其主人赢得丰厚的报偿。为使自己免遭此种计划及其不良后果的影响，我早已安排让超出我们所需数目很多的一大批毛驴被送到阿不旦以供筛选，选出一批可依赖的动物并非易事，几乎就和确保出发后它们能被合理照料并避免被偷换一样困难。

由于无休止的物资运输，以及从若羌请来的修补亟须修理设备的“乌斯塔”

(Ustads，即工匠——译者）紧张的工作，所有的打包工作，我们营房前的景象就像巴扎一样热闹。在室内，伯克的芦草屋里居住的人就像填满了将要溢出的戈壁萨依，我就在那儿从事耽搁已久的写作工作和做各种记录。我的队员们尽管对近在眼前的长途沙漠之旅不甚挂心，却对我们如何在沙漠另一端的“黑大爷”（Khitai，即汉族异教徒——译者）的生活感到好奇与不安。毕竟无论是我对“古镇”的奇特寻访，还是将他们带到新疆境内别的什么地方，他们都觉得仍在“真主的土地”之上，而我的印度随从们也喜爱绿洲的安适，因此也有同感。

我们即将进入未知、奇怪的异教的中国内地，随行队员们道听途说，知道那里的生活方式有多么不同，那里的人们又是多么不愿意接受他们这样陌生人的习俗，并满足其所需。因此，所有的人都急着要支出欠款，为他们自己准备一些额外的装备和小的奢侈品。一个颇有事业心的商人从若羌带货来开了个临时的小店，获利颇

⑮运送古物的队伍从阿不旦向喀什噶尔出发



丰。我应该补充一句，几乎我所有的维吾尔族部下都通过我所能找寻到的往和田、莎车和喀什噶尔的汇款渠道，在此时给妻子和家中汇款。

在当地居民罗布人，无论老少，都十分欢迎我们的到来，令我舒心的是诚实的依布拉音伯克带着1500两中国“马蹄银”到了，不到1月前我曾派他为此事前往焉耆衙门。他从若羌出发骑马7天内走了330英里，但回来时却因两个中国衙门的随从花了整整两倍的时间。为安全起见，胆小的老按办一定要派给他随从，还犹豫着他是否应该付费。

马蹄银的及时到达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得到了可靠的信息，银币或金币都不能在敦煌使用，只有中国传统形状的银锭。但在接受这些大大小小的马蹄银之前，我当然要先过秤，尽管我知道在此类事务上可以信任依布拉音伯克。这一操作是由一架整洁而设计巧妙的象牙天平来完成的。我在和田买了一架，为东方的原始货币条件做准备，但很快就认识到它并不能为我省去这一流传久远的货币系统，或是缺乏系统而带来的无休止的琐事和麻烦。

当蒋师爷用麻木的手和无穷的耐心完成了所有的称量工作后，我发现银元的盎司数，按我在和田最新听到的汇率，少了相当于40卢比，大约3英镑，不可能因如此小的偷盗而怀疑伯克，而且装银元的袋子上的官印是未动的。蒋师爷参看按办的信件最终得出了正确的解释：在新疆财库接受官方称量时付了费，而我自己的称量是与新疆的商业交换中所用的重量标准相一致的。从我的经济顾问处也未能得知其差异有多大。但不管怎样我已预先领教了在甘肃等着我的那些货币或是度量衡的复杂系统，它还很快令我憎恨那架无辜的天平，认为它是台精良的而有效的整人工具。

我自己如今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在晚上找到空闲来记录在若羌发现的两个哈布达勒人（Habdal）语言样本的。我将他们在我的一群队员们之中带到米兰，留作一种语言学工作的享受。他们属于那个非常奇怪的流浪部落，在新疆被称为哈布达勒

人，他们很小的半游牧移民队伍主要靠乞讨、织垫等为生，在塔里木盆地西部更大的几个绿洲都可见到他们。他们的语言里有许多波斯词汇，而且无疑是由伊朗传入的，但除此之外，他们广泛地使用从他们的新邻居那里借来的突厥形式和词形变化，并包含了相当多混合的奇特因素，其根源尚未得知。我的两个古怪的、善变的哈布达勒人多年前来自和田附近的塔木乌格勒（Tam-oghil)，娶了若羌女人，忘记了不少他们自己的语言。但从我们的夜谈中仍然引发出了他们留存的语言储备。

就像所有我能用到的罗布人那样，他们给我留下了人体测量学记录。我一再在前者中看到了鞑靼人特征，如突出的脸颊骨，细长的眼睛，稀疏的胡子，这些特征将与塔里木盆地边远地区或多或少纯洁的突厥特征和南部绿洲的更为古老的英俊的人群区分开来。直到1世纪以前，这些罗布人实际上还是游牧的，由于他们艰辛的生活方式，他们似乎很健康，完全不受当地可恶气候的许多缺点的影响，如极冷或极热，冰冷的冬风，夏季成群的只在沙暴时才不出现的蚊子。阿不旦人大多因此患上奇怪的痛风病，像个萎缩了的80岁的老人。

古怪的老穆拉赫自己就有着这么一对仍活着的老双亲，因为他们请求他不要去敦煌，尽管我希望留下他做再发现古老沙漠路线的向导。托合提阿訇也因为他年迈母亲的请求不得不被留下。虽然失去了这两位极好的罗布随从的协助，但是当忠诚而充满精力的依布拉音伯克，我的老克里雅达罗尕（Keriya Darogha)，自愿请假跟随我去在遥远的——我需要去工作的任何地方时，我倍感高兴。他原来一直只是作为地区首领的代理人陪伴我。然而他从不询问报酬的问题，这在维吾尔随从间是很少见的。当然这意味着在两年之内放弃在他的地区里得到新的伯克位置的所有机会。但蒋师爷立即挥毫写了封优雅的书信给年轻的按办，霍大老爷用礼貌的赞扬之词解释依布拉音为何更愿为我效劳。

终于在2月21日我同我的探险队出发开始漫长的沙漠之旅。我们准备的时间

比马可·波罗在前一段已提及过的章节中所说的从前商旅们的准备时间要略久一些。他写道："现在这些准备穿过沙漠的人在这个镇（罗布）休息了1周，以让自己和牲畜恢复体力；然后带上人畜所需的一个月的供给做好了准备。"但事实是阿不旦不是一个城镇，马可的商旅们也没有事先在冬季的沙漠里经历考古探险考察的斗争。行李的分配与装载占去了早上很多时间，我到10点才能让整个队伍，包括近40头毛驴启程。解决最后的账目和所需物品等事务又让我再延迟了3个小时，但最终在送给主人的女人、孩子们一些贵重的欧洲小礼物之后，我也动身了。蒋师爷在这里逗留了11个月之久，非常受孩子欢迎，离别时颇为感动。伯克亲自送我过了沼泽地往东南去，直到他的主要居住地的芦草屋成了平坦的地平线上一条低矮的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我们看到新疆的最后一眼。在塔里木盆地的这个乌勒提玛吐勒（Ultima Thule）周围，放眼望去都是阴沉单调荒废的盐碱地。我们看到左边有一系列小的两岸生有芦苇的湖，都与正在干涸的塔里木河相连，而且时而会看见捕鱼的小船。道路所穿过的干盐层覆盖的地方无疑曾是相对较近时期河床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丝植被的痕迹，直到我们骑行了近24英里，在夜色中靠近一条被名为"阿其克布拉克"（Achchik-bulak），即"苦涩的泉水"的蜿蜒河床。我们才在一个叫做墩里克（Donglik）的地方停下，我发现狭窄的水道被水和大量红柳及芦苇覆盖。这里颇受喝融化的冰水的马和毛驴的欢迎。而我也很高兴能享受帐篷中的安宁，在那里写一篇发给欧洲的一件大邮件，这件事让我在深夜花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早晨，出发前装载行李时我在小石山上注意到西边大约3英里处有一座又高又大类似炮台的土堆。来此处送我的穆拉赫和托合提阿訇告诉我那不是土坯砌筑的人工建筑。然而它看来却很像是人为建造用作路标或守望站的。构成它的砾石会被土壤中所含的到处可见的盐碱自然地凝成砾岩或石灰泥。它所指示的方向正是前往米兰和通过它去若羌的直接商队路线。尽管昨晚付出了努力我的邮件仍未完成，

而且它的发送不能被延迟到下一次停留之后，时间紧迫，我勉强放弃了前往土堆考察的念头，因为前去有可能要绕路。

我们在墩里克四周看了看，发现在营地近旁有另一条道路的痕迹，尽管历史不久。那是一座红柳小山上的一个木制小亭子，上有中文题字，记录着在当朝皇帝统治的第17年，由新疆最高官员派遣的中国官员前来考察去敦煌的道路路线。

那一天行进了近20英里，朝东北方向去，大部分是在光秃的砾石萨依边上走，萨依上有一片狭窄的红柳堆，指向北方。走完2/3的行程后，它也消失了。剩下的行程就是走过低矮的砾石堆，没有任何植被的痕迹，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由于天色渐晚，我十分高兴赶往映入眼帘几堆已经很少见到的红柳包，并决定在这个至少燃料有保障的地方过夜。从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托合提阿訇和为了一个走过这条路线，现在做我们向导的若羌看驴人处得知，这一段行程直至下一段结束都不会有水。因此得从墩里克带冰过去。

那一夜我为完成我给喀什噶尔和欧洲的大邮包工作直至凌晨2点，第二天早晨当我终于看到它在依斯拉木、和田邮差的负责下安全启程，确实才松了一大口气。依斯拉木是在1月经过若羌时挑选出来的，从那时起一直跟着我。考虑到种种条件限制，这封邮件是回得较早的，并且依斯拉木早就急切地想要回到他在和田的家，我很满意地在第二年冬天得知我这最后一封从新疆境内发出的邮件以破纪录的三个半月时间抵达英国。诚实的托合提阿訇热情地向我道别，这个结实的罗布猎人从去年11月起就开始为我效力。他将护送依斯拉木和我的邮包去若羌，我给了他20两银子，约相当于50卢比做工资，他很高兴地带着这些钱离开了。对于直到30年或40年前还不知有钱，只知物物交换的阿不旦人来说，这是一大笔数目。

这一天的行程漫长而令人劳累，尤其对没有水喝的动物更是如此。但好处是空气不寻常地宁静，并且我们行程的很大部分都是顺着一个古老河床，看着河床南岸

的某些特征也是很有意思的。早上在一个红柳堆上放置平板仪的时候，我已注意到芦苇带向北延伸，在更远处视野范围内是一片白色的光秃平原，显然覆盖着肖尔或是盐花。当再朝东北走了几英里后道路靠近一个砾石河床时，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那无疑是个古河床，因为我们行走在上面被碎石覆盖的高原突然朝北陡峭地陷下去。路线现在偏东，似乎一直和这条砾石老河岸线靠近，但切断了它的蜿蜒起伏。在一个地方道路穿过了一个从前的河湾，在那里古老的湖床被奇特的30多英尺高的分离的平坦黏土梯台打破，它们看起来像是侵蚀形成的，包裹仅只是风力作用，还是风和水轮流作用形成的呢？之后我又在许多时候问我自己这个类似的问题。

再往前，一片红柳包又出现在我们左边，明显地显示下层土壤至少还阶段性地接受着生命之源——水分的涵养。很快就有了解释：在行程正中我们穿过了一系列干涸的洪水渠道，标示出拉钦（Lachin）河的河道。据说它会将偶或来自雨水或融雪的洪水带入贫瘠的高山，从这里向南看山的外部支脉已经隐约可见了。在河道边上我们穿过它的地方没有植被，只有一窄带流沙，然后就又是我们从墩里克就一直沿其边缘行进的单调的砾石萨依景观。

我们来到低矮的高原边缘时，天已黑了。道路往下延伸至高40~60英尺的陡峭黏土悬崖脚下，在那里再通向干涸的河床。我们继续走完行程的最后5~6英里时，在我们之上的古河岸是个好向导。月光下我能看到一条狭窄的芦苇生长带在河岸线上，它另一边是闪闪发光的白色盐层覆盖的湖床，一种死寂的自然景观。最终我们到达了钦达里克（Chindailik）的宿营地，在那里，我们在一片沼泽地带之间找到相当大一块结在一个盐泉之上的冰面，最后面的那些疲惫不堪的毛驴直到半夜才到。我们竭尽所能去融化足够的冰以供那些急需喝水的马和毛驴饮用，但这个进程极其缓慢，而有些毛驴实在已筋疲力尽，因此当我次日早上听到报告有3头毛驴死掉时，并不感到吃惊。

我们2月24日的行程更加漫长，对动物们而言甚至也更为难耐。我们沿着有40~50英尺高的陡峭黏土悬崖的旧湖岸脚下走了只有2英里，它就转向东南方向，显然是个环形大湖湾。为避免绕一大圈，我们走进了完全平坦的盐层覆盖的荒地。它地质学年代的早期是一个湖湾，可能在各个历史时代都是不可逾越的盐泽地。事实上，若不是自路线再开通以来各种交通在坚硬的盐层表面走出一条小路，我们的队伍很可能会觉得绕湖湾行走要更为容易，以免骆驼会很快疲惫和脚疼。因此我后来得知在我之前一年多曾走过这条路线前5个阶段的亨廷顿先生凭借他一贯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了湖岸这面有这样一条小径时，我毫不感到吃惊。当然我们无法判断它的使用是何时中断的，是在近期还是在很久以前。

整整16英里我们都是以直线穿过这个确实是塔里木死海的大湖湾，碾碎的盐分让人想起一条覆盖着冰包且在冻结期被压缩的河。行进如此艰难，当我第一眼看到出现在古湖岸上成大块分离的黏土梯形台地时，终于松了一口气，它们有50~80英尺高，当我们经过它们之间时，我注意到在台地斜坡的不同高度上有盐花，证实了这些梯台是在这个大湖目前的干涸状况之前形成的。但很清楚它们最初出自于盆地南面的盐沼地边上低矮的砾石覆盖的高原。

夜间我们穿过朝南突出形成的一个尖岬的部分，走了1.5英里，最后，我们再次下到了湖岸悬崖的脚下。沿着它在黑暗中走完了通往洛瓦寨（Lowaza）一段余下的26英里。有一段路我已经注意到单独的红柳堆和潮湿的有着盐花的一小块土地。走到泉水处，我们发现它的水可以喝，四周的地面都长满了芦苇和矮树。次日清晨，我发现水是从其后梯台的一条窄缝中细细地但平缓地流出，它在梯台脚下的水道有整整150码远都结上了层厚冰。有足够的水对动物来说是个极大的恩惠，但对其中一些而言水来得太迟了。所有物品到达时又已是半夜，但我只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有两头骆驼已经被留在路上，任由它们死去。又有3头已经站

不起来了。

显然如果这样的损失继续下去，很快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将我们的供给运往敦煌。有理由担心派来照看来自阿不旦和若羌毛驴的人对他们应该照看的毛驴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了。因此我安排自己的人照看牲口和负责喂养工作，所有食料都由一个共同的储存处配给，整个驴队也交由伯克监管。为鼓励赶驴人，我许诺除了所有者应得的租费之外，会为每一头安全带到的毛驴付给他们一笔特殊报酬。这些措施很有效。两头已报告说无用的毛驴被哄劝着吃了些燕麦，并被移到了芦苇矮树丛丰盛的泉边。可以被安全地留下来，希望等到人们从敦煌返回带它们回家时它们还自在地活着。但第三头可怜的动物却注定要在我前去射杀它之前死掉。这样死亡总数达到6头，对这一数据我可以立即声称，尽管到敦煌前还面临着极端的疲惫，但我很满意能把这个数字保持下去。

我们所有的牲口，包括勇敢的骆驼，肯定都需要休息。但根据先前得到的消息，下一站科什兰孜（Koshe-langza）会是最好的休息地，因而我决定继续前进，行进中我们的路线继续沿着古湖床边缘延伸，自然景观并无多大改变。在最先的大约7英里，我们穿过了另一个湖湾，没有第一个宽，其土壤尽管覆盖着肖尔，仍显出古芦苇生长地带的遗迹。然后我们又遇上了一列连续的湖岸台地，沿着它们高出平坦湖面约40~50英尺的边上行进。湖床完全被盐层覆盖，目力所及之处一直向北延伸开去。

这片土地死一般的沉寂，后来被远处可见的一座向南延伸的高山和约17英里后穿过的一窄条红柳丛生的沟壑所打破。一片泉水浇灌并覆盖芦苇的盐碱地在黏土梯台脚下延伸而去，无数的脚印表明，野生动物们，包括野骆驼，会常下到沟壑中去喝水。它们可能是来自于库木塔格（Kum-tagh），这就是阿不旦猎人们曾模糊地谈及的南部山脉高一层斜坡之上的沙地。

最后，路线降至古湖岸的脚下，湖岸在此地极陡峭地升至100~120英尺高。总共走了约22英里后，我们在晚上7点30分之前到了科什兰孜，有6件行李被留在路上，等第二天早晨去找回。但最终当一群牲畜的到来显示出它们至少全都被安全送来时，我知道我没有白白信任伯克在行使权力和掌管运输上的坚毅和精力。

第四十六章

沿着前人的足迹

2月26日，我们停了下来，因为我们的队友和牲畜都极端困乏，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体力。科什兰孜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落脚之地，那里有繁茂的牧草和丰富的水源，黝黑的泥炭土壤上长满芦苇，清澈的泉水从中涓涓流出。天气开始稳定下来，也不再那么冷了，最低温度在华氏23度左右。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在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发现了一具骆驼的死尸，就在离宿营地没有多远的地方。我们估计那是3个星期以前开往敦煌的一支商旅队留下来的。清晨，刮起东南风，薄雾蒙蒙，景色宜人，但是我的内心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牲口安静地吃着青草，队友们围着篝火欢快地歌唱，而我却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帐篷里忙着写报告。早餐非常简单，匆匆吃完之后，我抽出时间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精神的大餐，重新整理记忆，回味自罗布泊至中国的那些古代路线。这时候写的记录现在还装在骡皮箱里，它们详细地记载了我们艰辛的行程。等你看了之后，你或许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它们记载了鲜为人知的古代路线，可以为研究者们提供崭新的参考，对此我倒是感到非常欣慰。这些路线，最早在《汉书》有关西域的一些章节里就有记载，它为我们留下了“西域”的考察情况，还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政权在公元前2

世纪左右进行第一次扩张的故事。尽管有大量准确而重要的历史数据记录，但不管付出多大努力，我仍然不可能在地形的细节上有所突破，也不可能准确指明当年汉朝扩张时到底走的是哪一条具体的路线。显然这些事实是要通过悉心研究才能够发现，仅仅是回顾一下，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领使团出使西域，与大月氏取得联系，以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匈奴。从那时起，中国人就知道主要有两条路线可以通往西域，这里所说的"西域"就是塔里木盆地和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那些国家。当时，人们知道有一条路被称为"北线"，是从敦煌出发，经过车师（Chu-shih，即现在的吐鲁番），穿过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到达喀什噶尔，再从那里翻山最终抵达费尔干纳和索格底亚那，也就是现在俄国属土耳其斯坦。另一条，或者称为"南线"，也是从敦煌出发，首先经过楼兰（或者称为罗布泊附近的鄯善），再从那里沿着昆仑山北部山脚穿过和田到达莎车，这样就到达了阿姆河山谷的大月氏。

没有人准确地告诉我们，"北线"到底是怎么伸展到吐鲁番和北方沙漠绿洲的。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汉书》中一些重要的记载知道，在公元前 121 年汉朝打败匈奴之后，他们的使团最初是通过楼兰这条路与西域进行直接交往的。据说，此时匈奴对汉朝人充满仇恨，他们唆使楼兰国国王多次对汉朝使者进行伏击，并抢劫了使团的财物。大约在公元前 110 年，汉朝的一员大将奉命率领一小队轻骑兵出征，最终俘获了楼兰国国王，征服了吐鲁番。在汉朝赫赫军威之下，西部的其他小国也都只好纷纷俯首称臣。

后来，也就是在公元前 104 年，一名使者被派往大宛（或称为费尔干纳）去会见当地的首领，结果却被大宛处死。汉武帝被迫派出一支军队远征，要严惩这个边远地区。这一次又是在楼兰，一队匈奴骑兵企图切断汉朝胜利者的归途。汉朝随即派出一支解围的军队，浩浩荡荡从玉门关出发了。这支军队的出现迫使楼兰国王最

终与匈奴断绝联系，并使其国家归属于大汉帝国。远征胜利之后，“汉列亭障至盐泽”，也就是先后地修建起来保障交通的军事设施和驿站，这些设施从敦煌向西一直延伸到罗布泊湖。

同时，两个军事殖民地相继建立起来，并由一个“代理保护者”（都护）行使汉朝在塔里木盆地的政治控制。这样，实际控制边界就自然而然地保留了下来，并且显示出相当的重要性。在《汉书》里，有一段有关张骞的传记，它细致地反映出当时汉朝越过敦煌推进其边界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据说，在费尔干纳的首领们决定驱赶汉朝使团之前，曾经说过：“汉朝远在千里之外，从那儿来的行人在盐漠中经常会迷路。如果他们从北线出发，他们很容易受到匈奴的袭击；如果他们选择南线，他们就会缺少水源和牧场，再说，整个路途中很多地段没有人烟，在那里他们得不到任何的供应物资。要是汉朝使节们带上几百名随从，他们中会有一大半在路上就饿死了。这样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派军队来呢？”（见《汉书》卷六十一李光利传记载：“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译者）毫无疑问，在通往楼兰的路上，这些被提及的物资方面的障碍的确是极其严重的。

在我们到达科什兰孜之前，我意识到所谓盐泽指的就是一个结了盐壳的巨大湖床，它无边无际地向北方和东北方伸展开去。此时，我们已经在这片“盐漠”上面跋涉了好多天。我也真正体会到了交通是多么困难；为穿越这片沙漠，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想起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汉书》另一段记载，这段文字讲的是公元前1世纪初楼兰人在交通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现在最靠近汉朝的是楼兰王国的最东边界，它的前面是白龙（Pih-lung）堆，那里缺少水源和牧场；与汉朝保持交往，楼兰就得为我们提供向导，运输物资和饮用水，走很远的路来迎接汉朝

使者；然而，他们自己也难以避免遭受匈奴军队的伏击，他们逐渐意识到，与汉朝保持交往给他们自身带来许多麻烦，所以他们决定放弃。”

但是，这一类的抱怨和不满并没有挽救其在当地的小首领地位，因为从敦煌到塔里木盆地最直接的路线正好经过这片土地，也就是说，这片土地是汉朝政权通往其行使政治控制国家的路线上一个要塞，而当时，也就是在公元前一个世纪和公元后两个世纪里，汉朝的实力越来越强，国力越来越盛。据《后汉书》记载，大约于公元25年至公元170年之间，塔里木盆地与鄯善（或楼兰）发生了一些事件，但它没有具体描述从中国西端到那里的路线是如何延伸的。

幸运的是，沙畹在其研究成果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魏略》（Wei-lio）的一些有趣的信息。《魏略》编写于公元239—265年之间，它是继魏朝之后的一部不完整的历史著作。其作者鱼豢（Yu Huan）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从敦煌和玉门关通往西域有三条路线，而不像以前所知道的只有上面所提及的两条。

南边的路线以敦煌为起点，首先穿过游牧民族婼羌（Jo Chiang）部落，然后到达今若羌（Charklik）周围，即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最后往西到达帕米尔高原。看一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路线是围绕高大的阿尔金山山脉而行。在有些季节，较短的沙漠路线因高温和缺水而不能通行，这时，南线就是连接敦煌和若羌之间的一条惯用通道。1907年秋天，拉依·拉姆·辛格在回到若羌之后很快勘察了这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在《魏略》中被称为中道，始于玉门关，朝西再穿过一些沙漠地带（在下文中会提到）后，转向西北，到达“古楼兰”。这个方位，以及后来要讲述的龟兹（Kuchar，今库车——译者），朝楼兰的西方走会到达那个地方。而古楼兰很明显指的就是罗布泊北方遗址，我冬季就是在那里发掘中国古代边防设施的。

第三条路线，被称为新道，通向西北方，经过一些至今不明的地带，进入吐鲁

番。由于这条路线位于北部边远地区，我并不关心它的时间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在往前行进一段路程之后，朝着东北走的这条路线将把我们带到在《魏略》中记载的中道上去。很明显，就像沙畹已经认识到的一样，后面这条路线就是《汉书》中所讲的“北线”，其名称后来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大约在公元2年，另一条通过吐鲁番的北方路线开通了。

由于在沙漠里停留了一天，我不可能对这些历史记录给予评论性的分析，更不可能做出分析所需要的细致研究，但我仍然很乐意欣赏这些早期记录的真正价值。我的确很感激那些记录，因为它们在揭示历史地理学的事实之外，还激起了某种别的东西，即人类对这些史实的兴趣。中国许多虔诚的佛教朝圣者一定经历过这条古代的沙漠之旅，并且幸运的是，他们中间有一个最早为人所知的重要人物——法显(Fa-hsien)，这位人物曾生动地描述这条道路，他的记载流传至今。他和另外4个和尚下定决心要到遥远的印度去寻找精神的引导，于是随着一名使者从敦煌出发了。他们对这些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知识，所以才得以战胜邪恶的妖魔和炙热的狂风，最终穿过他们眼前的这片沙漠。据说遇见妖魔和狂风的人大多都会死掉，能够逃脱的人少而又少。“空中看不见一只小鸟，地上也看不见一头野兽。尽管你热切地向四周观望，想看看到底路在何方，但结果却总是让你大失所望。你不知道选择何方，你能看到的唯一痕迹和启示就是沙地里留下来的干枯的白骨。在沙漠里走了17天，大约有1500里，朝圣者们到达鄯善王国，这个王国高低不平，小山林立，土地贫瘠。”（参见《魏略·法显传》：“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岁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由于在此之前，罗布泊北方的居民已经迁走，这些朝圣者们的路线无疑是朝向米兰和若羌的。在以后的15天里，他们朝向西北赶往焉耆，这就证实了以上判断。

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线，在法显经过的两个半世纪以后，又有另外一位更

加有名的佛教朝圣者经过，他就是玄奘。玄奘心怀虔诚，经历多年的流浪，从印度回到中国，带回了大量的经书和佛教纪念品。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朝圣者所写的《大唐西域记》在他到达罗布泊的时候就停止了。他坚信，返回历程的剩余部分是在中华帝国的疆域之内，而这个帝国在那时已经开始向西扩张，所以也就在他的记录之外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门徒为他所写的传记中了解到，玄奘是穿过从罗布泊到敦煌的沙漠，而最终完成其行程的。

在经过米兰时的艰苦岁月里，我常常想起玄奘；我所住的这些破旧的庙宇——无疑当时已经破旧不堪，很可能曾经也住过我的那位中国保护神，还有他那带着佛经的旅行队伍，想到这些，我就会更加喜爱这些房子了。有些时候，我在想这些佛塔废墟小土堆中或许就有哪一个做过他的落脚休息的场所。那些旅行者在通过这里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虽然经历了好几百年，但在这充满着死亡和荒芜的地方，仍然要比在生机勃勃的地方坚定得多也持久得多。

但是，在所有穿过这片沙漠的旅行者当中，我最容易也最经常想起的要算马可·波罗了。在令人畏惧的盐滩边上，安静地待在帐篷里重读马可·波罗爵士不朽的著作，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享受，在这本书里他向人们讲述了罗布大沙漠无穷的奥秘。即便仅仅是触摸这本书也会让人精神振奋，因为这是亨利·玉尔（Henri Yule）的翻译版本，它饱含着广博的见闻和文学的魅力。我也非常感激马可·波罗后人的女儿，她至今仍然没有忘记我所从事这项事业。与此同时，蒋师爷加入我们的行列，帮我补习中文。只要时间允许，无论什么时候，学习中文都是每天我们必做的一项工作。由于我既不能错过中文课，又舍不得这个威尼斯人的动人故事，于是我要求自己用我最好的中文水平将这些有关沙漠的叙述翻译过来。我也知道，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我的老师蒋先生感到满意，因为他对这位旅行者也非常感兴趣。

再来看一下亨利·玉尔的译文："这片沙漠十分宽阔，据说骑马要花1年的时间

才能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这里是最窄的，但也得花1个月时间才能穿过去。到处都是沙丘和沙谷，在这里你找不到一点能吃的东西。不过，骑马走一天一夜以后，你会看见清水，可能够50人或100人以及他们的牲口喝，但要再多一点恐怕就不行了。穿过整个沙漠，你会发现许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在28个地方你会遇到好喝的水，但水量都不大；在4个地方你会找到特别咸涩难咽的水。

"那里没有任何野兽，因为没有可以供它们吃的食物。但在沙漠里你会遇到一件奇怪的现象：当行人在夜间行走的时候，他们中可能会有一个落在后面，或者是睡着了之类的，当他试图要重新赶上同伴时，他会听见幽灵们在说话，并误以为他们就是他的同伴。有时候，幽灵们会叫他的名字；于是，常会有一两个行人被引上迷途，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们了。这样就会死掉许多人。有些时候，迷途的行人会听见类似于远处道路上人马的脚步声和哼唱声，他们会把这当作可以帮他们找到同伴们的声音；当天亮的时候，他们发现上当受骗了，但此时他们已经面临困境。甚至在白天，有人也听见幽灵们谈话。有些时候，你会听见各种各样乐器的声音，更常见的是听见鼓声。所以，在行进过程中，行人们习惯于紧紧挨在一起走。所有的牲口脖子上都带有铃铛，所以它们不容易走丢。在睡觉的时候，人们树立起一个牌子，指明第二天要行进的方向。沙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的。"

我没有必要通过经历来说明，马可·波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沙漠历险故事只是他在当地听到的古老民间传说。亨利·玉尔爵士很久以前就表明，害怕被凶灵引入歧途，这一直萦绕在早年穿过中国与西域绿洲之间沙漠的行人的想象之中。在法显对穿过尼雅和车尔臣之间沙漠那段旅行印象的生动描述中，他也清楚地提到过这种说法，这在我们的引文中已经出现过了。玄奘也曾提到了这一点。

《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Ma-tuan-lin）描述过从中国到焉耆的路线，从他的描述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与《马可·波罗游记》译本相近的内容。由于马端临与

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旅行者是同时期的人，他所记载的内容一定来源于更早的资料。“在任何一个方向你都看不见任何东西，除了天空和沙子，你甚至找不到一点路的痕迹；行人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引他们前进的东西，只能看见人和牲口的骨头，以及骆驼拉的粪便。在经过这片荒地时，你可以听到各种声音，有时候像歌唱，有时候像哀号；经常会有行人走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的声音，这时他们可能会走上歧途，并完全迷失，因为这是幽灵和妖魔们发出的声音。”在翻译《马可·波罗游记》后半部分的叙述时，我仔细观察蒋师爷倾听时的神情，他兴致勃勃，但似乎也被这荒凉偏僻之地给镇住了，尽管他在大多数超乎理性的问题上一直是一个怀疑论者。

就像玉尔所说的：“这些妖魔对戈壁沙漠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当我走完这整条路线时，我才发现地形特征与他的记录和描述在事实上是何等的相似，然而我比以前更确信，马可·波罗讲的有关妖魔的故事完全是当地传说。在叙述我后来的观察之前，我想在这里先说明一下的是，马可·波罗对穿过这个沙漠的距离以及行军次数是多么的正确。我们用平板测器对这条从若羌（他所说的“Lop 镇”）到沙洲(Sachiu)城（也就是沙洲或者敦煌）的路线进行测量，发现这条行进路线的总长度果然是 380 英里左右。

我们艰苦行军，强行前进，终于在 3 个星期之内成功地走完了这段历程，包括必不可少的停顿在内。但是商人们认为一般来说满载的牲口需要歇息 28 次，并以此得出，平均每次行进的路程为 13 英里。我很怀疑一个大规模的商旅队是否真能够在 1 个月之内完成这趟行程，并且不至于损失牲口。经验表明，有 4 个停留地要么找不到水，要么就是水太咸而不能喝，正好对应于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有难咽水源的 4 个地方。同样地，他有关于别的地方的供水受限的警告也被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我们还没走多远就碰到了他的叙述中提到过的“沙丘和沙谷”。

第四十七章

干燥罗布泊的终结

2月27日早晨，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寒风像平常一样，从东北方刮过来，吹在我们脸上。大约有10英里，路线沿着宁静而醒目的湖边伸展，湖的四边都是碎石和粗糙的沙子构成的光秃秃的荒野，也可以说路线穿过了盐层覆盖的小海湾边缘。然后，路面变成了宽阔的长满红柳和别的灌木的植物带。在南边，古老湖滨的悬崖全部消失了，接下来我们看见的是有着许多风蚀泥土阶地的斜坡萨依，南边更远的地方，阿尔金山被白雪覆盖的山脊在明净的空气中隐约可见。在北边，也可以看见远处被盐覆盖的平坦的灰色湖床。但最终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条黑色的线，在这天行军结束之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它是库鲁克塔格凸出的棱角。看着它，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我们途中经过的灌木带变窄的地方，地面的水平高度要比光秃秃的盐碱地高出20英尺左右。突然要看平原上那么凄惨荒芜的景象，这使我的眼睛有些适应不过来了。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大大增强了阶地和废弃建筑视觉效果。这些阶地在这次行军快要结束时，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的右边，并且越来越多，让人应接不暇。夜幕降临之前，在一个叫做潘加（Panja）的地方停下来宿营，在那儿，我们找到了

鲜美清凉的泉水和充足的可供牲口食用的灌木、草丛。

刚才所描述的特殊地形在第二天的行军中变得更明显了。一整天我们都沿着一条狭窄的沼泽带前进，沼泽地上覆盖着大量的红柳、芦苇和灌木，准确无误地标出老湖槽的边缘。光秃秃的盐原连绵不断地伸展到路的北方，但那像阶地一样的下坡在走了4英里之后就不再那么明显了，有些地方甚至与之一起消失。真是奇怪，南边临近沼泽带的地面现在看上去就像坚硬的盐糕的外壳，牲口在上面行走极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跟着那条潮湿的小路前进。在我们沿着前行的沼泽地带与南边贫瘠的含盐草原之间，地面逐渐向上升起；越向前走，盐壳就变得越硬。在对泉水和路线的排列进行勘测之后，我认为这种情况表明这里的潮湿程度已经逐渐下降了。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样估计是理所当然的：这条我们一直沿着前行了大约30英里的狭窄的沼泽和植物生长地带，比起我们从科什兰孜的沿湖岸黏土阶地走过的那条路线，更接近现代的一条湖岸线。由于这种关联，我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的气压高度仪显示的潘加海拔高度为2400英尺，是记载中罗布泊盆地最低的海拔。沼泽地的泉水多盐，难以下咽，但对动物而言也并非不能喝。沿途的灌木丛有大量的足迹和动物粪便，这表明野骆驼、野鹿和别的动物过去常常从山上下来，到这里喝水和吃草。

含盐的干旱草原和沼泽地十分平坦，光秃秃的，而我们经过的黏土阶地，距潘加大约8英里，独自远远耸立，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但在要结束当天行军的时候，我们路线的左右两侧高高耸起一群40多英尺的“见证人”，由于风蚀的作用，它们满脸沧桑，身形陡峭。在黄昏中，它们微红的黏土峭壁如同城堡和楼阁一般，看上去有些像南北走向的低矮山脊的残余部分。但天已经太晚了，我们那时无法追溯它们与南方地平线上狭长盐丘之间的关系。那晚的宿营地有一口叫做阿其克库都克（Achchik-kuduk）的井，井水特别难喝，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沼泽地带的尽头

已经被我们抛在背后几英里的地方。

一整夜，都在刮着东北风，冷飕飕的。看来，我们第二天的行军一定会步履维艰。但有一阵子天气特别晴朗，从帐篷近处一个土丘上看去，景色变得好多了。在我们正北方，可以清晰看见低矮的库鲁克塔格突起的棱角，贫瘠的山脊似乎从东北方绵延不断。在它所环绕的植物带南边，一条狭长的低矮山脊与之平行，躺在高大的流沙丘的下面，延伸至很远的地方。由于流沙堆积，小山似乎也达到三四百英尺高。这个山脉准确无误地朝向东北方，而它离路线的距离只有 8 英里，甚至更少一点。我很容易就能辨认出山的基底是黏土，与从它脚下伸展出去的风蚀阶地的基底是一样的。

这些风蚀阶地越来越高，最高的达到 50 多英尺，在它们陡峭的侧面上，可以看见水平的沉积地层。我立刻意识到，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它们与外界隔绝的这种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风蚀引起的。然而，后来往东部继续观察，我才彻底了解它们在影响沙漠地区湖的形状和沙漠表面状况的特殊重要作用。

我就这样前进着。这些光秃秃的土堆模样是那么的相似，就像是用人手雕刻出来的一样。从阿其克库都克向前走，一路上大家都禁不住被这些奇形特立台地深深地吸引，直到仔细观察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奇形怪状是由风蚀引起的，所有的幻想这才烟消云散。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种视觉上的迷惑在许多世纪以前早已给中国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在中国早期有关这块荒原的记录中留下了印记。

《水经注》是中国著名的经典著作，它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 6 世纪初，沙畹先生在其中的一个注解中，发现了有关塔里木河河道的生动描述。从中我们了解到，这条河最终流入沼泽，这些沼泽对应的就是《水经注》中的“蒲昌”（Pu-chiang）海或者现在的罗布泊。这条河位于鄯善东北和“龙城”西南部。鄯善在前面我们已

经提到过，大致是现在若羌和米兰地区。

“龙城”被描述成一个伟大的野蛮王国的都城旧址。据说，罗布泊的一次泛滥毁掉了这个城市。“但是它的地基保存了下来，地基非常宽阔，如果一个人在黎明从西大门出发，他要在黄昏时才能到达地基的东头（《水经·河水注》卷二记载：‘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馀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译者）。”它的名字可能来源于一个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当地经常刮一种风，这种风以龙的形状向西方刮去，变成曾经围绕这个古城的河岸。不管事实上早期的旅行者所认作的巨龙——他们最喜欢的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都丝毫不会怀疑，有关这个古城的整个故事，最初都是由从潘加到这里一路上我们看到的那些风蚀阶地的奇形怪状引起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奇妙的地形特征在刺激人的想象力，创造民间传说这一方面有着多大的作用，这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一致的。

关于这片广袤的被盐覆盖地区的详细描述，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想象当中的“龙城”的具体位置。“这个地方方圆1000里，它完全由盐组成，盐都是很硬的固体块，从那儿经过的人铺下许多毛毡，让牲口们躺下来休息。如果往下挖，人们会发现大块的盐，就像巨大的垫子，一层一层有规则地堆积起来。薄雾和浮云老是遮住了繁星和太阳，那里很少有活物，却有大量的恶魔和怪兽。”很明显，这段生动的文字描述的就提起了盐壳的老湖床。从阿不旦和米兰来的旅行者几乎都要绕过这片广阔的湖床，再越过阿其克库都克。

关于“龙城”所在地区的具体位置，评论者增补了一些论述，从而证实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据说，它西接鄯善（或者说若羌地区），东至“三大沙漠”，也就是

M. Aurel Stein

敦煌的西部，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它坐落于湖的北端，根据这种说法，蒲昌（或者罗布泊）也被称作盐泽。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方面与我们的"龙城"的定位是多么的接近。《魏略》对"中道"的记载，那时指的就是"龙堆"（Lung-tui）地区（或者称作"龙形的山丘"），这个地区就在从敦煌来的行人所说的老罗布泊站之前，这决不会仅仅是一个巧合。再看一下地图，我们发现，到罗布泊北部那些被毁地区最直的路线，就在这里逐渐变窄，变成小路。

这次行军在这里结束，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咸水井"。我们找到一口只有4英尺深的井，里边的水有一点咸，果然是名副其实。在我们后边几英里，流沙薄薄地覆盖着地面，上面散落着红柳的种子。我们3月2日的行程表明，现在我们终于走完了被盐覆盖的湖床，将这块我们绕行了那么长时间的土地远远抛在脑后。库木库都克（Kum-kuduk）是一个宽阔但界限分明的山谷，我们在里面朝东北方前进。在我们左边，满眼是昏暗的锯齿状的小山梁；右边三四英里，是低矮的由沙丘覆盖的沙丘。它们之间洼地的底部，大约有12~15英里，看上去都是平坦的沙原。这片沙原被大片芦苇和稍少一点的红柳覆盖，与我们经过的死一般沉寂的沼泽相比，这种景象看上去要让人愉快多了。

到处都可以看见土丘和阶地，它们从南边山脊延伸出来，一直伸到路上，甚至更远的地方。一整天，我们几乎都没有看见大量的盐。要知道，我们的骆驼当中有一些早已需要换蹄掌，它们的蹄子一定酸痛至极。没有那些盐，对这些老伙计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安慰。走了17英里，我们在一个光秃秃的土堆后停了下来。在那里，有许多矮树，并且出人意料的是，只向下挖了3英尺，就得到了许多水。这里的水要比我们以前的井水淡了许多。自阿不旦出发以来，这还是队员和牲口们第一次在夜幕降临之前搭好了帐篷，发现水源，对此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很幸运，过去一连几天刮个不停的刺骨的东北风在那天下午停息了。没有风，最低温度是冰点

以下华氏20度，多么惬意的一夜啊。

第二天，天气情况依然不错。从右边光秃秃的土丘上延伸出几个指状的支脉，我们绕着它的北端大约走了10英里。这些山丘的高度都在80~100英尺左右。在它们之间，有一片长满小矮树的间隔地。我们到达过去行人经常停留的地方——羊塔克库都克（Yantak-kuduk）井。但这段路对一天的行军而言太短了，于是我决定继续前进，希望到时候我们再挖一口新井。从阿其克库都克出发以来，我们一直沿着前行的被沙丘覆盖的山脊越来越靠近我们走的路线。在较低的斜坡上布满了粗盐，经过长期的风蚀，路面非常平坦，方便行走。在它的北边，平原上长满芦苇，一直伸展到库鲁克塔格山脚下。

在行军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意识到东北的山谷底部越来越高，于是在以后的两天里，我就做好准备要对之进行观察。我们在红柳丛中停下来过夜，在那儿只向下挖大约1英尺，沙土就比较潮湿了。挖到4英尺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充足的水源。由于这些水是从坚硬的泥土中流出来的，所以带有一点咸味。毫无疑问，这个沙漠谷地有着良好的地下水蕴涵，但这些水到底从何而来的呢？

3月4日这天，我们的行程比较长，但天气晴朗，我们心情也不错。我们知道将要走到拜什托格拉克（Besh-toghrak），它是在到达敦煌西北沼泽以前最好的停留地，在那儿休整一天，我们会重振精神。高耸的山脊上覆盖着沙丘，我们靠着山脊走了大约5英里，到达库鲁克塔格。一路上，我们的左边都是长满芦苇和矮树的沙原。一条风蚀形成的淡红色阶地出现了，将沙原与以后的路隔开。这条路上有许多野骆驼走出的脚印，看上去，这些骆驼是从南边来的。这些路到底通向牧草，还是水源？我们不得而知。大约走了12英里，我们经过了科什库都克（Kosh-kuduk）井。但在到达这里之前，右边沙丘和碎石坡被几乎平坦的大片芦苇所代替了。从我们前面的远方，我们可以看见一条低矮的碎石坡，看上去正好穿过平坦的谷底。但

M. Aurel Stein



⑮去敦煌途中，在拜什托格拉克扎营

一到达那儿，我就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原来山谷的方向竟有一点弯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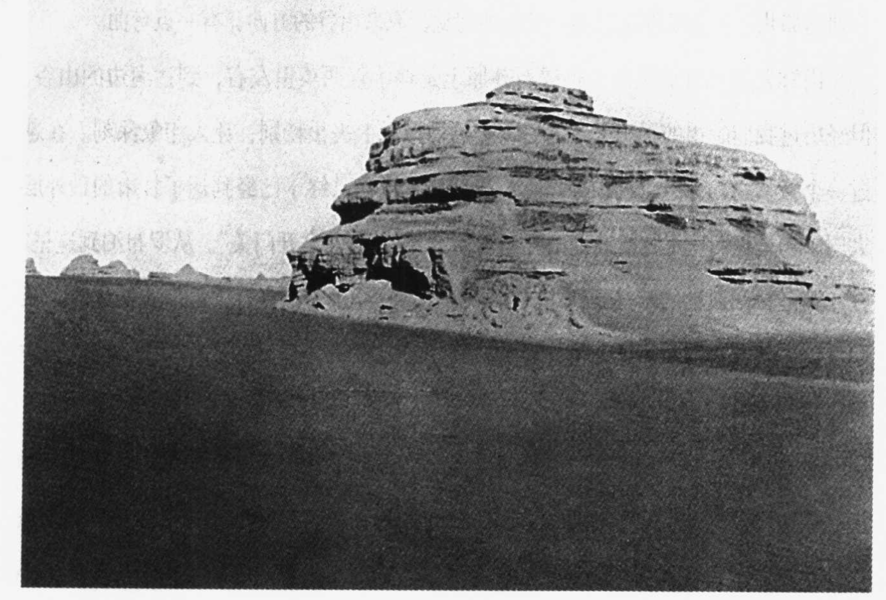
山脊大约120英尺高，在碎石高原上延伸了仅两英里左右，到达南边的山谷。但经历过我们后边的平坦无奇之后，它的外形看上去很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在越过一个鞍状物，穿过它的顶部之后，我们都觉得自己终于已经到达了甘肃的最外层大门。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山脊命名为"开门站"、"开门关"。从罗布泊到这里，在一路漫长而孤独的骑马旅行中，蒋师爷与我已经谈了很多有关玉门关的话题。玉门关曾经是甘肃紧靠古代沙漠之路的边界，沧海桑田，今天终于有机会弄清这个位置，我怎么可能不激动呢?

真奇怪，从顶上往下看，风景完全不同。连绵不断的芦苇，像湖一样平坦，看上去向东伸展开去。它不再是紧接南边高耸的沙丘，而是紧靠着几乎垂直的黏土悬崖，悬崖看上去像是被古代河流的潮水侵蚀而成的。山脊东面的植物更加茂盛，小

丘上有那么多长刺的低矮灌木丛和以前未注意到的圆形的长满芦苇的洼地，这些东西对我们可怜的骆驼和毛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啊！要想阻止它们往前走，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的向导阿塔乌拉赫（Ata-ulah）发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黑点，他认为那是拜什托格拉克。但在我们到达那以5棵胡杨树命名的地方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胡杨树看上去是普通的品种，年龄也不大，成排地屹立在离悬崖脚下150码的地方。这些树都被风吹得向西弯曲，然而，我还是禁不住满怀敬意地靠近它们。它们是生命最勇敢的护卫，在被河流周围的丛林（未能流进罗布泊）扔进荒无人烟的沙漠之后，仍不放弃维护生命前进的步伐。在离这些树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两口5英尺深的井。在弄干净之后，井里流出来的水要比离开潘加之后任何地方的水都好喝。

|⑮疏勒河终端盆地西边缘附近的风蚀黏土阶地|



第四十八章

奇异的古河床

那天在拜什托格拉克，我们把那段停留的时间很好地利用了起来。很幸运，东风在上午时分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舒适宜人的平静和温暖，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有很大的帮助。下午2点，温度计标明的最高温度是华氏72度。从去年11月14号到达安迪尔河以后，我还没有在帐篷里如此的感到舒适。骆驼和马背都受了伤，并且还有其他的病症，需要严格仔细地看护和检查。由于经常需要进行鞍具维修，所以我想在这里经营维修店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些耐旱的小毛驴也很勇敢地坚持下来了，这会儿正在美美地饱餐芦苇和长刺的灌木，最后还得小心地把他们赶拢到一起。储存品少了好多，所以我们也用不着所有的毛驴，于是我挑了8匹最弱的，留下给一位阿不旦人，在我们租用的其他工具从敦煌返回之前，这些毛驴就由他来照看。气候温暖适宜，草场肥沃丰溢，牲畜看起来都精力充沛，矫健有力。只有一匹可怜的毛驴除外，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它掉进一口井里一整夜，第二天被救起来时已经冻得半死了。而当我把火生在周围让它取暖，并用力摩擦它的身体时，它居然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到下午时它已经可以走路了，我还看到它正在满意地咀嚼着额外配给它的玉米呢。拉姆·辛格是名勘察

员，他忙着用经纬仪观察这一地区的纬度，记下海拔高度，仔细地读取水银气压计以检查我们的无液气压计是否正常，并由此得出我们所在位置以及库鲁克塔格山脉的准确高度。根据后来那些数据的计算结果，拜什托格拉克营地的高度是海拔2620英尺。

这很明显地证实了我们上升了一个高度，尽管轻微却很确定，我想我在前两次行进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了。对我来说，在观察中品尝到的地理趣味是无比巨大的。阿其克库都克逐渐变窄，成为一条自东北延伸下来的普通山谷，我们也进入了一个低洼地带。观察这里，发现沿着谷底掘井可以很容易地取到水，同时还看到淤泥堆积成的高高的堤坝环绕在边缘，这些现象表明，这个山谷可能在现存的地理时代曾被用来把地表水导入古老的罗布泊湖床，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阿其克库都克。但是从哪里会有如此充足的水，竟能把这样一个山谷侵蚀掉呢？肯定不是来源于北部贫瘠的库鲁克塔格山，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三角测量数据，就目前可见的山脉，远远没有超过4200英尺，也没有显示任何有意义的附属山谷；也不是来自阿尔金山的高山山脉，这条山脉离正南方还有大约100英里，只有极少量的排水，虽然垂直地流向我们所在山谷的位置，但是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就消失在巨大的沙砾库克塔格（Kuk-tagh）和流沙堆积的大褶皱里了。

很自然我想到了东边，山谷好像是顺着这个方向趋近拜什托格拉克的。我还知道疏勒河（Su-lo-ho）和党河（Tang-ho），它们是两条冰雪融化而成的大河，在靠敦煌的北部汇集到一起。再向西流过一小段距离后，它们应该最后流进了哈拉淖尔（Kara-nor）湖而结束。从俄罗斯地图上看，在离拜什托格拉克东部80英里远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后一条河，即党河。一系列相互孤立的小湖泊和沼泽地出现在哈拉淖尔西部，在我们前进的方向也有，这使人产生一种猜测：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与一条比他们远古的众多排水线相连，流向我们所在的山谷和干涸的罗布泊河床。

但是科孜罗夫（Kozloff）上校仔细绘制的明确路线图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湖泊和沼泽间有任何的联系。这是个很严肃的矛盾，使我感到异常的困惑和怀疑。

晚上的时候，蒋师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以帮助我们阅读中文。当他看到我还在仔细钻研地图，还在努力思考那个地理问题时，凭着一贯的好奇他提出了他自己的疑惑。他还很清楚地记得曾经看过一幅中国地图，在那上面罗布泊一直延伸到离敦煌很远的地方。看到阿不旦时，他就急切地找寻大盐湖城。现在当我们最终走出这个干涸的盆地时，他发现现实中他所亲眼看到的小沼泽与盐湖城传统的象征之间竟然有那么大的差距，对此，他表现出来的情绪已不仅仅是忧虑和惶恐了。我告诉他，近代欧洲文学关于“罗布泊问题”的各类书籍随处可见，我们几乎不可能从这些相互矛盾冲突的书中把问题彻底弄得清楚，除非我们在地图上把整个地区都准确地测量出来，并做出标记。

我很欣赏我的助手对地理知识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和对表层信息所持有的敏锐目光，这对我来说已绝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做平面制图，他都会自始至终站在我身边或者站在勘测员的旁边。中国人往往天生具有良好的方向感和阅读地图的能力，不管他们读书多少。所以他很早就熟知光学仪器（Diopter）的用法和平面制图的基本理论。令人高兴的是，他还学会使用经纬仪，只要拉姆·辛格有时间就会教他操作经纬仪来观测星际。我也掌握了一些必要的汉语，这样就可以讲解一些基本的实用理论。每当碰到奇特的地貌特征时，他总会打断我，并且打破砂锅追根究底，提出些尖锐的问题，这让我很吃惊。我经常在想，如果能够用蒋师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地形的认知感以及勤奋和智慧来培养知识人才的话，那么印度调查局应该是多么的出色啊。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在专心拓宽知识面的同时，通常对待人和事都异常热情，充满朝气。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他在兰州、乌鲁木齐、叶城和遥远的塔尔

巴哈台（Tarbagatai）等地任职时的各种经历，旅途的劳累和荒原的枯燥也因他的故事减轻了许多。偶尔他会讲到一些令人同情的细节，有时还会对他所熟知的上级管理中各种弊端不负责任地嘲弄一番，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会掺杂很多的幽默在里面。蒋师爷对我很信任，他告诉我他的许多熟人，即按办的亲信都在他们的衙门中获取了不光彩的利益，还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一些阴暗的手法快速积敛财富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蒋师爷想让我为他保守秘密，不要随便说出去。

3月6日早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温度计显示的最低温度是华氏23度，有霜。我们从拜什托格拉克出发了。那个留下来为我们看管需要休息的毛驴的阿不旦人，由于要留守在这里，似乎要面对孤独和寂寞了，但却很舒服和安逸。他有足够吃20天的食物和一箱火柴，还有想睡多久就睡多久的自由，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旅行队伍返回。我们向东边行进了约4英里，在那里我惊奇地发现柔软的芦苇和灌木覆盖的地面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呈颗粒状的粗糙沙地，从我们右边高高隆起的沙丘上穿过山谷向北延伸开去。在我们穿过这个地带的地方，沙丘向上延伸了20~30英尺，但看起来往南往北都高出了好多，而且表层有一种奇怪的壳状物，像是把这些盐碱颗粒都黏附到了一起。

植被也变得异常稀少。在走到离拜什托格拉克大约9英里的地方，我们发觉靠西部边界处全都是光秃秃的，并且一律都是平整的洼地，上面覆盖着一层沙化的盐碱物，很显然这是干涸湖泊的一部分。大概有2英里宽，自西南往东北方向拓展，看起来似乎形成一个更大的湖。我们在阿塔乌拉赫的带领下，在靠近东部边界处突然改向东南方向走，穿过又一个流沙凸起，登上高40英尺左右的山脊，最终到达了这个干涸湖泊靠北的一块洼地。

这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成百的黏状阶地高高地耸立，并成束状或者行列状在宽阔的洼地上向周围扩散，成为土地侵蚀最真实的见证。什么形状什么大小的都有，

M. Aurel Stein

但大多数都如岛或塔一样地耸立着，有着陡峭似城墙一样的壁沿，在原地看几乎跟地面是垂直的。而且它们彼此都一样高，处在同一水平面上，但由于底部侵蚀的不均匀，因而在相对高度上会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我在一块很大的阶地旁停了下来，但却足足有80英尺高。而且很明显，它的水平方向上沉积了一层精细而结实的淤泥，中间还有薄薄几层压实的土壤风化而成的沙粒。由于在这块洼地风化进程特别迅速，所以很多地方的"城墙"，即雅丹都倒掉了，而这块阶地底部的大堆的岩石碎屑告诉我们：侵蚀和磨损还在继续肆虐。

我们继续沿着被侵蚀盆地的北部边界行走，也就是那些巨大的"见证人"所在的地方。我们离开第一个盆地东部边界走了7英里，在这中间又穿过了两座沙丘，它们自西南方向就开始变成盐碱洼地。在这些沙丘底下，我们发现了很少的几根芦苇秆，差不多都是死的。继续往前走，又在矮灌木下找到了一些球果，然后又经过了一个黏质阶地地带，在这里唯一的植物就是长在流沙地带的红柳，但它们不是死掉了，就是已经完全枯萎了。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不过本打算要掘一口井的想法现在也不可能实现了。储水槽里的水在做晚饭之前就用完了，哈桑阿訇负责看管照料骆驼，他减轻了骆驼背上的负载物品。由于过分相信可以掘井取到水，我们现在的供应品也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至少还有充足的燃油可以在营地生火，用以抵御晚上刺骨的东南风，再说茶水还是够用的。

尽管没吃晚饭有些受不了，但我还是满意地坐在自己的小帐篷里，因为我在今天的行程中获得了好多观察的乐趣，虽然也比较累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在这条线路上可能遭受的艰辛和危难现在已经真实地再现出来了。在拜什托格拉克休整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但离开不久这条路线几乎就隐没在绵延的沙丘中了。在这里库鲁克塔格山脉开始向北倾斜并变缓变平，这就更容易让人迷失正确的路线。要是没有带拜什托格拉克当地向导，旅行者这时如果继续往东走太远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在洼

地（这块洼地正是我们一直坚持在找的）北方贫瘠的沙漠里错失方向。荒野里矗立的怪异的黏状阶地和沙丘也可能会给那些想从敦煌旁边经过的旅行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它像个布帘子一样挡住了山谷，这个山谷从拜什托格拉克往西南方向延伸，是通往罗布泊的天然线路。

然而这天行程中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沿路发现了大河床，穿过这个河床我们走了足足10英里。它的角度和位置都和哈拉淖尔有关系，这使我确信它肯定是疏勒河和敦煌（Tun-huang）河最末端的一个流域。但是敦煌河里的水是什么时候不再往这里流的呢？我们走过的湖床有一部分表面还包着一层薄薄的盐碱，看起来时间并不久远。然而地图上显示这个湖泊是在哈拉淖尔，也就是迄今为止认为是疏勒河和敦煌河断流的地方，充足的水源就来自于这两条河流。而且据罗伯罗夫斯基（Roborowsky）和科孜罗夫的地图来看，这两条河流位于偏西一个经度的地方。

幸运的是，当时看起来令人迷惑的疑团两个月后就有了答案。后来我们根据地图I上所标示的河道A重新做了一些相关测量，发现春汛和夏汛期间有很多河流从哈拉淖尔流出；在排水之后，类似一系列的小湖泊、小沼泽的水位变低，而排出的水直接注入大湖床的南部，最后在那里干涸，当时我们已进入湖床西边很远了。然而和多数新事物一样，这个发现又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在这里我不便详细提及这些问题，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然而那些高耸的黏土阶地又为何会分散在湖床上的呢？很明显，黏土是由湖水中的沉淀物构成的，这些沉淀物可能是在早期地理时代所沉积下来的。而它们之所以会相互分离，主要是由于侵蚀作用使原先古老的湖床分裂开来了。但是这种侵蚀仅仅只限于干燥时期的风力作用呢，还是流水的摩擦和腐蚀也起了一些作用？我想只有专业的地理学家经过仔细检查研究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同时我在哈拉淖尔和其他湖水流域一边观察各种各样的黏土形状，一边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也是

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站在它们所在的方向和群体出现的位置，我常常会发现原先被流水侵蚀而形成的凸地，后来慢慢受到东风的摩擦和风蚀以及风沙的肆虐，最终在一定的时期内就分裂成形状奇特，相互隔离的阶地。

在刚发现的疏勒河真正的下游流域，与我们找寻的山谷有着很显然的联系，而后者从罗布泊咸水流域的东北极点开始，向上延伸了数英里到拜什托格拉克附近，这对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有一些启发。这里我们有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在现存地理时期，疏勒河的水可能曾经从刚发现的地方向西方下游流域流出，进入拜什托格拉克—阿其克库都克山谷，然后抵达罗布泊洼地。营地里的无液气压计很清楚地表明，洼地的位置比拜什托格拉克高出至少200英尺。

我们在勘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阻隔湖水流域和山谷之间排水畅通的永久性障碍。在它们中间有一个沙丘地带，但是远远不足50英尺高，而且我们经过的位置只有2.5英里宽，怎么样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屏障。所以它只能作为洼地部分干涸的一个标志或者结果，而不是疏勒河在这里停止的根本原因。因为沙丘里的沙质物显然只是干涸湖水的沉积物和洼地里干涸部分翻腾出来的侵蚀物，它们都被强烈的东风吹起堆积到湖对岸。而且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干涸的下游河流两边，是绵延不断的高耸沙丘。这是干涸的河流未能冲走而遗留下来的泥沙形成的，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风化作用的产物。这里原本气候湿润，植被丰富。

所以，如果我没解释错的话，我们在新的探索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寻找证据，解释使塔里木盆地变得干旱的主要原因。通过实际观测，我已经了解到侵蚀作用是怎样在很短的时期内改变一个地区的原始面貌的。但一次次的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极度干燥的地区，地下水潜流也还是有的。这些地下水显然是以往河流的痕迹，当然这些河流早已经不能给那些贫瘠的荒漠带来湿润和水分了。于是我也准备把工作重心放在找寻证据来证明，库木库都克和拜什托格拉克间的沙漠里之

所以有着相对丰富的植被是因为在目前疏勒河的下游湖床和通向罗布泊的山谷之间有地下潜流通道。

我还观察到这个湖床里的盐质粉化现象很少，这也间接证明了上面的推论。如果所有的水体都是来自疏勒的洪潮并最后在那里蒸发消失的话，那按道理说来，湖床的表面应包着一层厚厚的盐质物，就跟古老的罗布泊河床一样。这方面已经说了好多，以至于已经没有太多的细节可言了。但我相信我们在往罗布泊的路上所勘测的山谷就是疏勒河及其支流以及敦煌河的水流向罗布泊的通道，而且从地理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离现在并不久远。

这一观察在地理学上的意义是不能完全用文字来表述的，因为如果它一旦被接受，那么新疆盆地的真正最东端就会从东经 91 度 30 分变成东经 99 度，而达到太平洋排出口的最西端。在这里，我还想加一句，我在后来考察中的结果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察结论，那就是敦煌——疏勒河排水区和塔里木盆地几乎在所有的物理特征上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M. Aurel Stein